

# Chine-USA: condominium ou confrontation?

## 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

—Une exploration d'histoire analytique

—如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分析历史事件

狄增如<sup>1</sup>, 李睿琪<sup>2</sup>, Bertrand M. Roehner [法]<sup>3</sup>

2019年 2月

<sup>1</sup>北京师范大学 系统科学学院 教授

<sup>2</sup>北京化工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教授

<sup>3</sup>巴黎第六大学 理论与高能物理研究所(LPTHE) 教授

ABRACA PUBLISHING

Roehner, 26 rue Poliveau, Paris 75005, France

roehner@lpthe.jussieu.fr

<http://www.lpthe.jussieu.fr/~roehner>

First Published February, 2019. Comments are welcome.

Produced in France

This publication is not copyrighted in the sense that its content can be used  
without restriction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s.

ISBN 978-2-9500181-0-6

EAN 9782950018106

# Contents

写在前面的话	7
前言	11
第一部分：关于中美的五个案例分析	25
<b>Chapter 1: 911恐怖袭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b>	<b>27</b>
1.1 两种描述模式	28
1.2 透视9/11事件	29
1.2.1 对于可能的反对声音的解答	31
1.2.2 只是另一个阴谋论?	31
1.2.3 西方战机曾投放的炸弹和恐怖袭击	31
1.3 如何辨别哪些事件属于同一事件集合?	33
1.3.1 物理学中对于“类似”现象集合的定义	35
1.3.2 为何高信噪比会使得科学分析更复杂	35
<b>Chapter 2: 中美全球领导力竞争</b>	<b>39</b>
2.1 合作还是竞争?	39
2.1.1 两种不同的预测冲突发展的分析方法	40
2.1.2 经典案例	41
2.1.3 西欧国家间的冲突	41
2.1.4 一个新旧霸权交替的特例	42
2.2 经济合作还是竞争?	43
2.2.1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示	43
2.2.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	44
2.2.3 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储备货币	47
2.3 中国经济的发展	47
2.3.1 GDP的增长	47
2.3.2 对外贸易	49
2.3.3 人民币在债券市场中的角色	49
2.3.4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	49
2.4 协同浪潮	50

2.4.1	产品协同以及快速的物流	50
2.4.2	产品协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50
2.4.3	中国近年来的技术突破	51
<b>Chapter 3: 国家激活</b>		<b>55</b>
3.1	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	55
3.1.1	清朝前期的版图扩张	56
3.1.2	清朝后期的版图缩小	56
3.1.3	国外势力的急剧变化	56
3.2	国家激活	57
3.2.1	广泛的信仰认同和增长的群众基础	58
3.2.2	人口增长	59
3.2.3	教育的普及	60
3.2.4	交互浪潮	61
3.2.5	经济飞速发展	64
3.2.6	有效的武装力量	64
3.3	国家激活案例的比较	67
3.3.1	广泛的信仰认同和增长的群众基础	67
3.3.2	自由帽的反复出现	68
3.4	小结	69
3.4.1	中国文学是否处于激活状态?	69
3.4.2	历史学家倾向于研究单体问题	69
<b>Chapter 4: 丝绸之路倡议与遏制政策</b>		<b>71</b>
4.1	比较视角下的丝绸之路倡议	71
4.1.1	马歇尔计划与丝绸之路的比较	73
4.1.2	与丝绸之路相似的三个案例	73
4.1.3	欧洲错过的基础设施建设机会	73
4.1.4	丝绸之路面临的重大挑战: 跨越语言障碍	74
4.2	遏制政策	74
4.2.1	通过军事行动来获得影响力并培植盟友	75
4.2.2	构建遏制网络	80
4.3	两种不同的模式可能会产生怎样的相互作用?	81
4.3.1	古阿姆民主与经济发展组织	82
4.3.2	在非洲的竞争	84
<b>Chapter 5: “视太平洋为美国内湖”</b>		<b>89</b>
5.1	美国称霸太平洋地区之源起	90
5.1.1	殖民夏威夷	91
5.1.2	开采鸟粪石(1840-)	91

5.1.3	兼并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1898)	91
5.1.4	太平洋战争(1941-1945)	91
5.2	对美国太平洋霸权地位的挑战	92
5.2.1	二十世纪初: 沙俄帝国	92
5.2.2	20世纪40年代: 日本	93
5.2.3	中国	93
5.3	美国如何说服日本与俄国开战	98
5.3.1	背景	98
5.3.2	日俄战争大事记	99
5.3.3	日本对和平条约的反应	105
5.3.4	塔夫脱太平洋外交任务	106
5.3.5	小结	108
5.4	美国如何鼓动其盟友对抗中国?	108
5.4.1	法国	108
5.4.2	日本	110
5.4.3	菲律宾	112
<b>Chapter 6:</b>	<b>可验证的预测</b>	<b>113</b>
6.1	什么样的预测?	113
6.1.1	比较历史分析学并非占星术	113
6.1.2	未来的不确定性	113
6.1.3	真正重要的是预测须要是可验证的	114
6.2	间接的军事对抗	115
6.2.1	1920-1936年间苏联与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南部的间接对抗	115
6.2.2	美俄间接对抗	115
6.2.3	发生在泰国的间接对抗	117
6.3	丝绸之路倡议面临的挑战	118
6.3.1	瓜达尔案例	119
6.4	信息战	120
6.4.1	应当怎样理解“信息战”?	120
6.4.2	南奥塞梯事件	121
6.4.3	中国对西方企业的收购	122
6.4.4	反共产主义如何塑造美国媒体	124
6.4.5	西方政府进行的媒体监管	125
6.4.6	谁将赢得信息战	126
6.4.7	媒体在日本的作用	127
6.5	结论	128
	<b>第二部分: 概念与方法</b>	<b>131</b>

<b>Chapter 7: 比较历史分析学：历史学与社会学之合璧</b>	<b>133</b>
7.1 因为简单而非因为重要	134
7.1.1 没那么简单的实验	134
7.1.2 简单性：人类思维的基本要求之一	136
7.1.3 现象学方法的局限性	138
7.1.4 历史学中的模块化方法	138
7.1.5 应用	139
7.2 历史社会学的比较方法	145
7.2.1 关于比较性研究方法的争论	145
7.2.2 寻找模式和行为策略集	146
7.2.3 “为什么”与“怎么样”	147
7.2.4 弥合宏观与微观社会学的差异	148
7.2.5 发展比较分析方法的障碍	149
7.3 昨天是明天的最佳预言	150
7.3.1 同源性、模仿、行为策略集	151
7.3.2 历史类比的运用与滥用	159
7.3.3 历史在何种程度上是不断重复发生的？	162
7.4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172
7.4.1 自然科学的实验真的可以完全重现吗？	172
7.4.2 米尔的经典逻辑	175
7.4.3 历史分析学和人类自由	176
7.4.4 不可预测问题和混沌	176
7.4.5 进步的必要条件：获得可靠数据	177
7.5 总结及《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简介	178
7.5.1 模块的确定	179
7.5.2 后续案例研究小结	180
7.5.3 撰写比较历史时会遇到的问题	185
<b>第三部分：结语</b>	<b>187</b>
<b>Chapter 8: 还要做什么？</b>	<b>189</b>
8.1 物理学与天体物理学为何能取得巨大的成就？	189
8.1.1 希腊在科学上的突破以及随后欧洲长期的停滞	189
8.1.2 以简单性为指导方针	190
8.1.3 物理学研究的集体性与可累积性特点	190
8.2 将社会科学转变为可累积的学科	191
<b>参考文献</b>	<b>195</b>

# 写在前面的话

写作本书有两大目标，第一是展现比较历史分析学(comparative analytical history)这一全新概念，我们之所以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它首先是基于多个事件的对比研究而非对于特定事件的描述或记录，同时关注于“简单”问题而非“复杂”问题、关注于“小”问题而非“大”问题，从构成大问题的大量小问题当中发现规律并进一步得出可验证的预测(testable predictions)；第二则是希望能为将历史学转变为真正的科学尽一份绵薄之力。无须多言，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前路也必是道阻且长，因而更须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天文学(astronomy)用了数百年才真正发展为科学，相似地，比较历史分析学也会须要数十年来真正完成其概念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望有志之士能够投身于这样的研究工作，若能视兹如兴趣爱好用闲暇之时进行研究或亦能有所成。我们提出如此倡议亦是受诸多非商用的开源计算机系统与程序(例如Linux操作系统和Python)开发过程之启示。我们可以为有兴趣推动比较历史分析学的参与者提供一些微薄的经费支持，无论您从事何种职业(无论是天体物理学家还是记者、作家或其他行业)也无论退休与否，只要您认为比较历史分析学这一方法有潜在价值并对参与这样的研究有兴趣，都可以联系我们。

由于本书是基于类似事件的对比分析研究，所以往往会涉及众多发生在不同国家的相似的历史事件，许多发生在国外的事件或许相对不为人所熟知，同时又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对每个历史事件都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所以当读者对某些事件不够熟悉但又想要深入了解时，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参照各种语言的维基百科或相应参考文献(本书中的参考文献均以“作者姓氏 年份”这样的格式出现，在书后的参考文献列表中可根据作者姓氏的字母序索引找到相应的文献)。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案例分析，第二部分是对于所用比较分析方法的概念与方法论的介绍，第三部分是对于比较历史分析学未来发展的展望。之所以这样安排也是为了在文本的趣味性与科学性之间找寻一定的平衡，对于小问题的研究科学性会更强但是或许会更加乏味，而大问题则可能更有趣味更为关注。所以在第一部分的案例分析中我们涉及的仍然

是一些大问题或相对复杂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完全解决甚至无法完全解释它们的方方面面，我们所试图做的是在这些大问题中发现一些对于更简单的小问题并从中发现一定的规律；而第二部分则更加关注于如何从小问题中发现科学规律以及更系统地阐释这些规律的发现对于解释大问题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对于更倾向于了解具体故事以及比较分析方法大致思路的读者，第一部分的案例分析或许更有吸引力；而对于更希望探索比较历史分析学背后的科学概念、图景与方法的读者，第二部分可以作为导入章节。

## 路漫漫其修远

本书在中国的出版之前，本书著者之一(B.M.R.)在1993年完成本书前身的法语初稿，200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译本(Roehner and Syme 2002)，而现在中国读者看到的这一版则几乎是一部全新的作品，其内容大量取材于中国历史事例，在方法论和主要的概念上则与前两部作品保持一致。

从法文初稿到如今的作品，其中的故事似乎颇有更深的意味，因为它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要出版一些全新的研究并非易事；而对于已经出版的书籍而言，要把全新的理念传达给他人亦非易事。

尽管在西方有很多出版商，但要打破学科研究的风尚樊篱和狭隘的思考模式仍然不易。事实也证明在中国找到一个愿意出版新式研究的出版商要比在法国容易得多。

回想1993年法文书稿被推荐给几家出版社的时候，结果始终是被弃置一旁，多数时候是被直接拒绝，因为这本书的主题“不符合我们的出版计划”。可一种新方法、新主张怎么可能符合既存计划呢？抱着英美出版商或许更加开放的希望，在当时执教于牛津大学的合著者托尼·赛姆(Tony Syme)的帮助下将法文书稿转译成了英文。然而当英文稿被推荐给英美的出版商时如潮般涌来的仍是相同的答复；最终在1998年底，本书著者之一(B.M.R.)决定访问美国以期从美国的知名学者当中争取支持。

在此要感谢萨缪尔·威廉姆森教授(Samuel Williamson)邀请前往哈佛大学访问两个月，同期也访问了纽约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其它数所高校。然后奇迹发生了，在应斯坦利·利伯森教授(Stanley Lieberson)之邀在哈佛社会学系作报告之后(1998年9月29日)，恰好有机会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迈克尔·阿隆索(Michael Aronson)共进午餐，而这开启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促成了四年后《Pattern and Repertoire in History(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一书的出版。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已故的查尔斯·提利教授(Charles Tilly)的支持，他是该书出版前的评阅人(pre-publication reviewers)之一，他不但建议

了这一书名并且对书中内容提出了中肯而宝贵的建议。

本书的部分内容取自《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一书，余下大部为新作，以期在科学性与趣味性上做到兼顾。文本最初由英文写成，中文版的面世有赖于多位译者的辛勤工作，没有他们本书的出版或许还遥遥无期。前言的初稿翻译由武国宇完成，第一章、第四章由徐壬捷完成，第二章由秦朗与刘佩佩完成，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由刘佩佩完成，第七章由刘佩佩、秦朗、徐壬捷等多人共同完成。另外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的曾安副教授对于本书详细的审校。

睿琪  
2017年11月28日  
于波士顿



# 前言

## 从天文学看历史学

写作本书的初衷可以从历史学与天文学及天体物理学的对比中窥见。

人类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开始观测天空并记录太阳、月亮、其它行星和恒星以及彗星的位置。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记录都导向了繁复的占星学(astrological)模型；而真正的天文科学只曾在两个地方萌芽：

- 从古利奈人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 276BC-195BC)到托勒密(Ptolemy, 100-170)生活的古希腊以及希腊化世界 (参见图1)。
- 在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1643-1727)生活的西方欧洲。1563年第谷<sup>1</sup>观测到木星(Jupiter)和土星(Saturn)交会，并发现当时普遍使用的托勒密天文表(Ptolemaian tables)并不准确，这一发现使第谷意识到天文学的进步需要系统、严格的观测(详见图2)；开普勒在1627年(即第谷去世26年后)基于第谷精确的观测发表了后世所称的“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牛顿通过论证开普勒定律与引力理论的一致性，证明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他们三人共同的努力和研究成果宣告了现代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开端。

值得一提的是，托勒密(Ptolemy)、第谷乃至开普勒(Kepler)除了在天文学(astronomy)上有重要贡献，他们也都曾在占星术(astrology)方面著书立说。在每一年的年初，第谷都要向丹麦国王呈交一份预测星象对政治和经济前景的影响的历书(Almanac)。鉴于占星学被认为比天文学“有用”得多，这种将神人格化的(anthropomorphic)态度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事实

---

<sup>1</sup>第谷不仅身为贵族，而且位列朝臣，他是纯粹出于个人兴趣才被吸引到天文观测中来，他也曾准备放弃丹麦宫廷俸禄优厚的官职来实现他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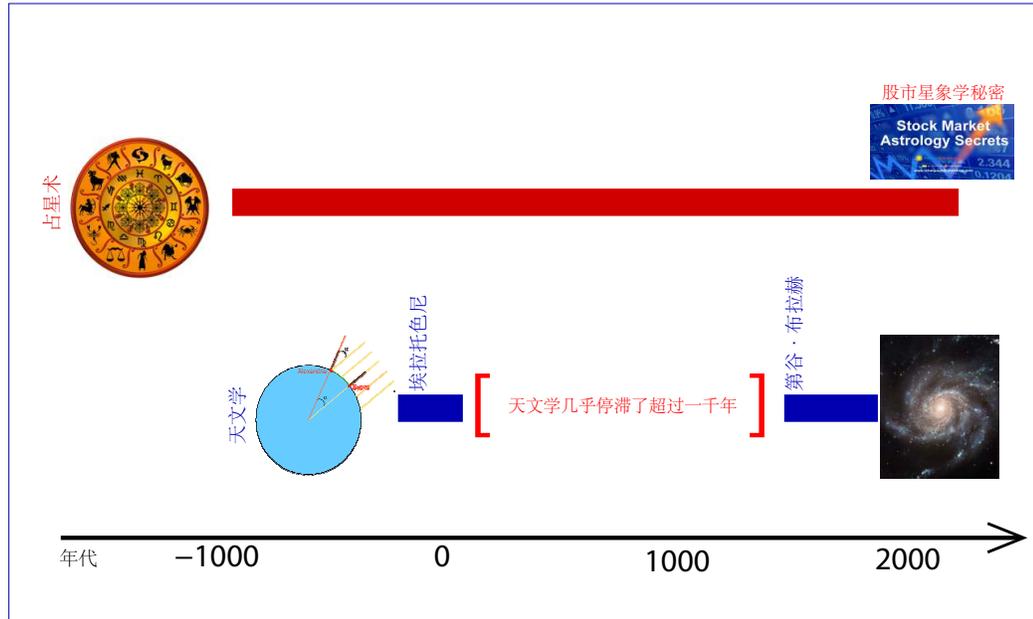


图 1: 占星术和天文学的发展。从历史角度来看, 占星术的出现远早于天文学, 而且它在各大文明中都有发展: 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和波斯文明。占星术虽然并非科学, 但到现在仍有许多人相信, 在西方都还有“股市星象学秘密”这样的东西。中间长达千年的停滞是欧洲的中世纪, 在这期间许多过去的知识被部分地遗忘 (Jacobs 2010)。

附注: 图中左下角的示意图展示了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设计的测量地球半径的精巧实验: 他知道在夏至日那天阳光会直射(阳光会射入赛印城内的一口深井并在井底的水上反映出太阳的倒影)位于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正南(但实则并非正南而是向东偏了一个经度)约920公里外的赛印(Syene, 现今埃及的阿斯旺Aswan), 所以他根据夏至日下午时分亚历山大港一座方尖石塔投下影子的长度推算出两地与地心形成的夹角 $\alpha \approx 7^\circ$ , 再根据两地之间的距离便推算出了地球的半径。不过应该注意的是, 在他的计算当中假设了阳光是平行的, 而这一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太阳离地球非常的远。虽然哥伦布大略知晓埃拉托色尼进行的测量, 但他却错误地解读了当年测量的单位, 不然他一早就会知道印度是远在他探险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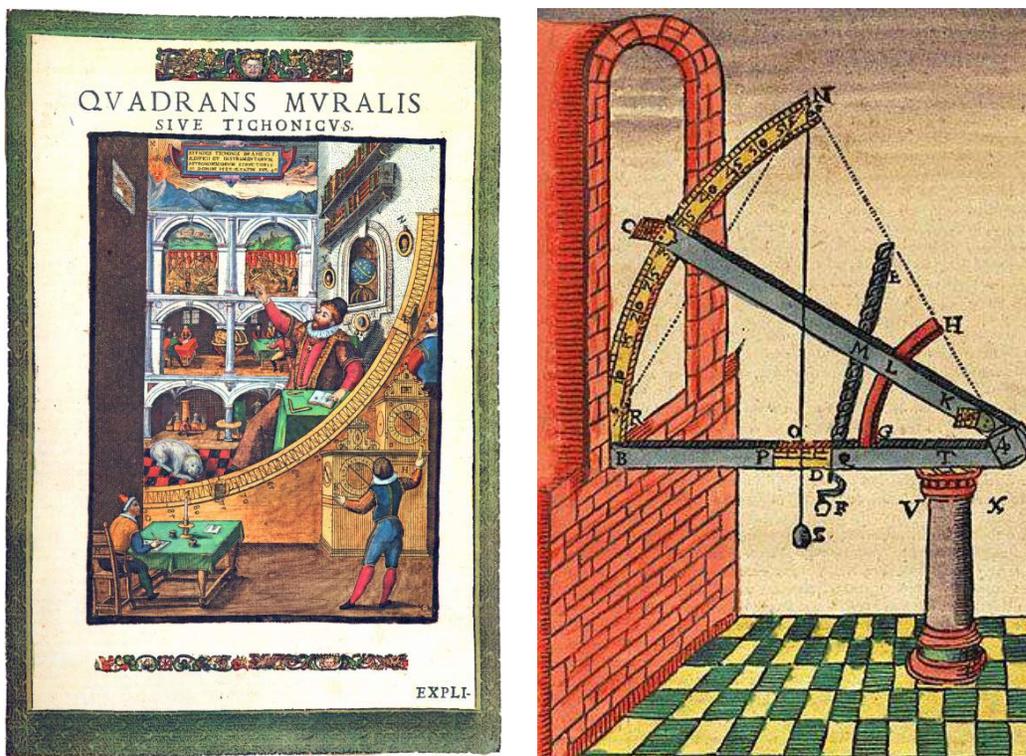


图 2: 第谷·布拉赫发明的两种测量仪器。左边是位于乌兰尼堡(Uraniborg)天文台的墙式象限仪(wall quadrant), 该天文台位于瑞典斯堪尼亚省南部和丹麦之间的汶岛(island of Hven/Ven)。右边则是第谷的超大六分仪。资料来源: 法文维基百科词条《Tycho Brahe(第谷·布拉赫)》

上, 诸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玛雅文明以及西方文明都为通过对观察天象来预测地上事物的变化而发展出了繁复的体系。

本书所提出的对历史事件的科学分析是如何可以与天文学的产生及其与占星学的分离所相比拟的呢? 随着文字的发明, 人类记录下了几千年来历史事件。但重述事实而非表达作者的想法或信仰就成了对于史家的第一个挑战。中国的史官通过对各类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述跻身于首批进行事实性记述的学者之列<sup>2</sup>; 希罗多德(Herodotus, 484BC-425BC)和修昔底

<sup>2</sup>中国最早的史书目前公认的是《尚书》, 它的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依体例又分为典、谟、训、诰、誓、命。编年体史书《左传》则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 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虽然西方的史家也多为宫廷史官, 但东西方在历史著述方面仍略有差异, 有些西方的事实性历史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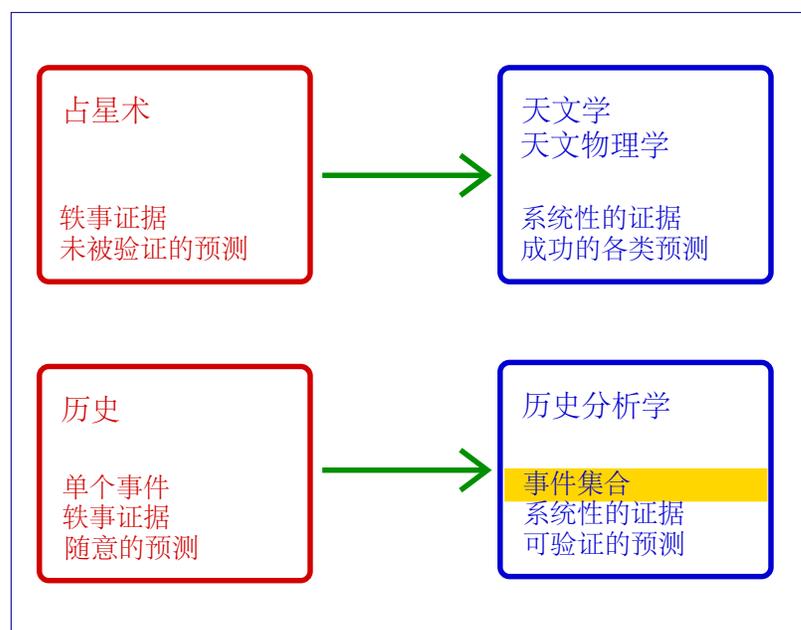


图 3: 向科学方法的转换。从占星术向天文学的转变最早发生在古希腊, 之后发生在十六世纪的西欧。在历史学科学化的转变过程中, 我们认为最基础的是相似事件的集合数据; 虽然帕累托(Pareto 1916)和法国的“年鉴学派(Ecole des Annales)”已经反复强调过这一步骤的重要性, 但目前这一点却鲜被认可,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想法在2016年的认可度可能还不如1916年时的情况。

德(Thucydides, 460BC-400BC)则是西方的代表。相反地, 当人们去阅读当代英语作家所写的关于1666年伦敦大火的故事时, 读到的更多的是关于罗马人、圣经和神明的公正, 而非大火这一事件本身。由于从特定事件无从得出“科学”(个例只能被描述), 要实现科学分析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出

作是由亲历者完成, 两个典型的例子便分别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书于公元前430年)和凯撒大帝的《高卢战争史》(成书于约公元前50年)。修昔底德被后世公认为作家和历史学家, 但他也是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位将军; 而凯撒大帝则是当年高卢(今法国)战争的最高指挥官。这类史书所涵盖的时间段通常只有数年(一般少于20年), 但一如古往今来所有由胜利者所书写的史书一般, 许多胜利者的血腥历史都被掩盖或美化, 自然也无法做到全然客观(即便是现今美国国防部所书写的美国军事史亦是如此, 例如他们所写的《Relations between Allied troops and the population of Japan(与盟军部队和日本民众的关系)》在许多事实上都有失偏颇而且倾向于美国)。只是在中国古代, 据我们所知未曾有过像修昔底德和凯撒大帝这样的历史学家。

相似事件(similar events)的集合(参见3)。

这个想法很容易理解，一个16世纪的天文学家通过对比相似性极低的金星(Venus)和彗星的轨道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基本上什么都得不到，因为客体之间差异太大，而且彗星的数据往往不够精确，而这更加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的比较。但是如果这个天文学家去比较金星和火星(Mars)的轨道，他就有可能发现我们今天所知的“开普勒定律”(Kepler's laws)。对于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要想得出有效的结论，我们必须比较被严格定义且具有充分相似性的事件。

这一点也是支撑全书的核心观念，分析和预测须要基于分类方法(categorization methodology)，当特定现象能够通过为数不多的几个参数进行描述的时候，上文提到的基于定律(如开普勒定律)的方法往往就很有效。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对于预测钟摆的舞动周期，人们只要测量它的长度即可。但是对于物理学之外的现象，其参数的可变性(variability)和数量往往远远超出能够用定律进行预测的要求。对于这类更为复杂的现象，基于定律的方法必须被扩展为我们所称的分类法(categorization)或归因法(ascripton)才能更加有效。让我们用三个例子来解释这一概念。

- 恒星的演变过程取决于数个参数，例如恒星的质量、年龄以及颜色。天体物理学家基于这些参数定义了标准化的类型，对于每个类型的演化时间轴定义地都非常明确。因此当人们想要大致预测一颗新恒星的变化时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确定这颗恒星的类型。
- 同样的方法也应用于医药学领域。医生会基于一系列已观察到的症状来确定一个病例是流感、结核还是肺癌。由于人体系统非常复杂、医学诊断须要涉及非常多的症状、也难免会有一些误判，但它仍然可以说是分类法的一个成功案例。
- 分类法同样也被应用于物理学中。假定想要预测螺旋桨周围的空气如何流动，如果通过基本原理[即求解流体力学(hydrodynamics)中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式(Navier-Stokes equations)]来做出判断将会非常复杂；但相反，采用分类法却可以很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螺旋桨可以根据其形状分成不同类别，而在每一大类中又可以基于一个描述某参数的索引号(index number)进一步划分为一些子类(sub-classification)，例如曲率(curvature)就是一个子分类参数。举例来说我们会看到以下的类别：NACA 0012、Eppler E 193、Wortman FX 75-141。所以若想对新型螺旋桨的空气动力学进行预测，只需要确定它属于哪一个大类以及它的索引号即可。当然，为了保证这一方法的有效性，所有类型的标准螺旋桨都必须经过风洞(wind tunnel)试验；

由于螺旋桨会有上百种不同的形状，所以得出这样的分类须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

对于历史事件而言，其可变性相比于恒星、疾病或者螺旋桨还要高很多；而分类工作几乎处于起步阶段，这也是为什么如今的分类法只能在相当基础的层面运用。要取得长远的发展，关键在于确定和定义大量相似事件的集合<sup>3</sup>。在医疗领域，疾病分类工作用了数个世纪才完成，现今通用的《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10(国际疾病分类, 第十版)》已经涵盖了成千上万个类别。这一先例表明我们必须保持耐心，但更须大力推进历史领域的分类工作。

## 有效对比之缘起

随着对历史事件的事后认识不断深化，进行精准且有效的对比的理由也变得相当清晰。本书所提出的方法有赖于进行恰当有效比较：既然是进行对比，那必然得是针对某一具体特征或属性，而且为了能使对比合乎情理，所比较的事件必须尽量相近。诚然这在物理实验中更易实现，但在历史分析中我们仍可尽量去找更多的相似事件来进行分析。这一比较方法论最早是由社会学家艾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引入，本书也会对此做进一步介绍。

然而少有历史学家愿意使用杜尔凯姆提出的比较研究方法(参见图4)，当然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是个例外。此人于1924年发表了一项主题为“皇室之触”(The royal touch)的研究成果，后来该研究被翻译为英文。该研究为我们所指的“严格定义且充分相似的事件比较”提供了绝佳的例证。在法国和英国关于“皇室之触”有这样的说法——即国王可以仅靠触摸病人就治好他所患的疾病。这当然是一个准确定义的现象，不幸的是，这种比较研究仍然相当特殊而孤立。尽管形式尚不够稳定，但比较历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能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法国盛行，主要归功于马克·布洛克建立的“年鉴学派”(Ecole des Annales)。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无论欧洲抑或美国的历史研究又回到了针对某一国家、某一段时间、某一种现象的个例研究上，例如“对1925-1935年德国失业状况的研究”。

对于这样的话题，人们尽可以讲出有趣的故事，但却无法从中得出任何科学理论；这样的研究无论是否包含经济学模型，都仍然只是停留在了描

---

<sup>3</sup>举个粗略的例子来说，若想用分类法研究农民起义，可以先根据其起因进行一个大类的划分，例如有的是因赋税过高、有的是因粮食短缺；在这些大类之下，我们又可根据起义人数、是否拥有武器来进行细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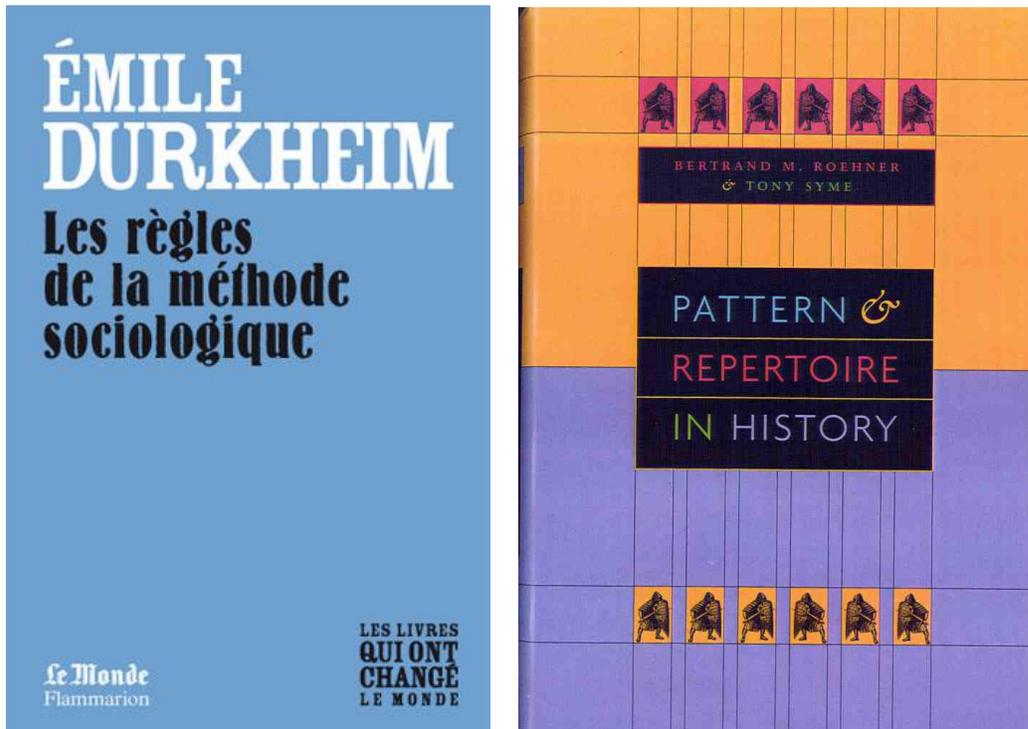


图 4: 两部作品, 一个主题。杜尔凯姆的著作于1894年出版, 其译名为《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社会学方法规范)》右边则是2002年出版的《Pattern and Repertoire in History(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尽管相隔一个多世纪, 两本书仍然有着同样的目的—那就是将社会学和历史学转变为可测试的科学。杜尔凯姆的书及其后续的关于自杀现象的研究(Durkheim 1897)阐释了如何通过类比“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将实验物理学的方法论应用于无法进行直接试验的领域。在《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一书中, 作者将杜尔凯姆的方法应用在了历史事件的研究上。

附注: 两本书均有在线免费版本。

述层面；而科学需要可验证的预测，要做到这一点，就势必须要分析基于某一效应所对应的多个事例所组成的集合。

## 实验物理学与观测性的天体物理学的方法论

实验物理学的方法论就是基于比较分析的，例如研究摆的第一步是要测量其的周期，第二步则要重复观察以检验这一现象是否能够重现。接下来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参数(比如摆的长度)，来观察其周期受到怎样的影响。这也正是我们希望在研究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所采取的研究步骤。

我们还是不妨举例来进行说明。第一步，我们观察2000年法国未婚成年人的自杀率；第二步，将2000年的比率与1999年和2001年的加以比较，观察这一现象是否能够重现。这一比率在随后的几年中确实保持平稳，误差在 $\pm 5\%$ 以内；接下来我们不妨改变家庭关系数量这一参数，就会观察到没有孩子的已婚人士的自杀率是同年龄段未婚人士的 $1/2$ 到 $1/3$ ；而在有孩子的家庭中，自杀的发生率比在没有孩子的家庭中更低。换言之，自杀率随着家庭关系数量的增加而降低。事实上，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法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且这一结论有可靠的数据支持(Richmond et al. 2016)<sup>4</sup>。

不可否认，上面所提及的案例仍是一个社会学而非历史学的例子，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领域可以采用统一的标准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不过分离主义者的骚乱(separatist disturbances)恰好提供了一个与历史相关性更强的例证，勒纳(Roehner)通过对一系列广泛的案例进行分析(Roehner 1997, 2002)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A国a地区分离主义者的暴力活动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变量：(1) a地区相对于A国的孤立程度，举例来说，a地区通常会A国与邻国接壤的边疆偏僻地区；(2) a地区在成为A国领土之前的自治程度及其自治状态在过去几个世纪内取得的接受度。第一个变量是地理因素，但第二个则是历史因素。换言之，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论和研究钟摆问题是一样的。勒纳在1997年发表的研究中分析了约40个相关案例，几乎所有的被研究案例都来自20世纪(Roehner 1997)。假如能够找到数据资料，那么通过加入几个世纪前那些更为久远的案例，就可能使那项研究的案例数达到现有的两倍或三倍。这也正是当更强大的望远镜让天体物理学家得以观测更遥远的星体时天体物理学家们在做的事情，而更遥远的距离也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是星体更早期的状态。

我们刚刚提到的都是可变性比较小，而且有史可查的事件样本又很多的情况。这是最好但可能也是相当少见的情形，一般来说数据的获取都是主

---

<sup>4</sup>本书中的参考文献均以“作者姓氏 年份”这样的格式出现，在书后的参考文献列表中可根据作者姓氏的字母序索引找到相应的文献。

要的限制因素。

但是这种实践层面的障碍不构成对方法论本身的质疑。即使在没有那么多案例的时候，分类法也仍然是为先前一无所有的领域提供规则与模式的一种好方法。经过一段时间，分类可以不断被细化，正如《国际疾病分类》自20世纪初建立以来实现了显著的发展。

## 比较视角看世界之宣言

接下来的例子表明在人类事务中进行比较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本能。将眼光停留于我们所处的小世界相比于放眼圈外要容易得多。

所有大城市都面对同样的问题：私家车与公共交通的矛盾、环境污染、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垃圾分类处理，不一而足。一部分城市能够相当出色地解决这些问题，而另一部分却被问题压垮。

然而对于一个想要学会如何解决麻烦的城市，派一个代表团去与自己情形相似且成功城市学习其管理方法(同时也应该吸取其他城市的失败教训)，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自己的城市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方法。但事实上使用此法的城市并不多，这也表明接受比较的观念也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当然对于在其它地方适用的措施进行仔细检验是完全必要的，至少这样一个比较研究可以让人清楚认识到这些措施的运作生效是基于一系列的原因，而不是随意为之的产物，哪怕某一措施看似确实有效也一样如此。通过对比我们往往更能发现事物发展的内在科学规律，也只要如此才能应用他城解决方案时不致东施效颦。

值得一提的是，现今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活动通过各类设备(例如手机、社交媒体、手环一类的运动设备、信用卡、公交卡等等)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这些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城市更多的信息，得以让我们能够更量化地描述我们的城市、更加准确地把握城市的脉搏、挖掘城市中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机理(Li 2017a)。类如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就可以挖掘出城市中人类移动的模式，而基于这些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定量地研究城市的交通效率(Dong 2016)、城市中人类活动对于空气质量的影响(Xu 2017)、流行病的传播预测(Li 2017b)等等。大数据让我们得以拥有更多的观测实例、使得我们所关心的相似事件的集合更加丰富，而这正是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

## 期寄于中国历史悠久的仔细观察传统

我们过去数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本书所提出的方法最适合乐于集中精力、观察细节的人，这更多的是一种思维转变而非专业训练的问题。

中国古代对于超新星以及彗星的观测与记录要比西方开始的早很多而且精确很多<sup>5</sup>，而这显示出中国有着巧妙而细心的观察传统。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观察呢？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没有第谷·布拉赫的观测，就断不会有开普勒定律，更惶论牛顿的理论突破；在中国完成的首次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研究<sup>6</sup>正是部分依赖于中国古代对多种化合物的作用及治疗效果的详尽描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进行的这一项目依赖的正是现代实验观测与过去积累的大量知识的结合。

诚然，传统中医药如今还在不断得到推广和运用，但在学术圈更多的还是追逐备受仰慕的美国大学和西方期刊所引导的趋势，这似乎与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精神一致，这一运动并非完全照抄国外，对于究竟从外国借鉴哪些事物表现地十分审慎。从提倡白话文(又称“现代文”)以取代过时僵化的八股文，到强调科学、推动妇女解放，这一运动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只是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运动”等反帝国主义运动杂糅在一起，这也使国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动机缺乏充分了解，大多情况都是其反帝国主义的动机被过分强调，反而较少提及向西方学习的部分。但当年新文化运动也确实是杂糅着向西方学习、但同时又反对西方这样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情感<sup>7</sup>；图5中的两人就曾在其二十岁左右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并对新文化运动进行过深入解读。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我们在本书中提出了可以科学分析历史事件的方法论，它着重于分析“小事件”而非“大事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分析的(analytical)。另外由于我们研究的并非单一的事件，而是重多相似事件组成的集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方法又是比较的(comparative)。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分析、比较这两个概念仍然太过宽泛，我们所提出的方法或许叫作“比较历史分析”会更准确一些，但由于这个名字略为冗长粗笨，所以我们在书中会根据不同的侧重将这一方法(比较历史分析)在一些情形下称作“比较历史(comparative history)”，在另一些情况下或许又会

---

<sup>5</sup>参见英文维基百科文章“Historical comet observations in China(中国历史上对于彗星的观测)”

<sup>6</sup>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奖时仍是中国公民，只是二人虽然也在中国接受过教育，但其研究工作(包括其博士阶段的研究)均在美国完成。

<sup>7</sup>二十世纪20年代发生在香港的反外暴动(anti-foreign riots)和对英货的抑制几乎让香港的贸易完全停摆。其实今日的中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也仍是处于这样一种矛盾对立统一的状态当中。



图 5: 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复兴。左：向警予(1895-1928)，女，1928年5月1日被国民党处决。中：蔡畅(1900-1990)，女，为新民学会(New People's Study Society)早期成员，该学会由毛泽东于1918年4月在湖南建立。学会本身属于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分，促进了部分经审慎选择后的西方文化的传入。两人的经历都表明增加财富这一西方的关键目标完全不在其考虑之列。新文化运动的审慎选择性学习精神是否会如本图右侧《睡美人》的封面所示一般经历重生呢？(图片来源于网络)

唤作“分析历史(analytical history)”；但这两个概念本质上对应的都是“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analytical history)”。发展比较历史分析学，需要仔细、严密地处理海量的历史数据，而在中国这一传统由来已久，正如睡美人一般，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唤醒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可以基于其自身的传统为新的研究方法提供肥沃的土壤，使之蓬勃生长并结出甜美的果实。

## 关于本书及其它

在本书中我们将采用相对自由的比较方法，而不会试图列出一张累人的类似事件清单。我们一般会将自己限制于2-3个事件的比较，例子虽然不多但也基本能将比较历史学的意味展现出来。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使这本书有趣而易懂。如果当读者欣喜地发现近日新闻头条上的事件实则可由耳熟能详的前人定义的模式为蓝本来进行解释，这种满足和愉悦正是我们希望向读者报传递的。这种认知与意识这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预测事件可能如何展开的第一步。

如果有读者想要了解更加系统的大样本调查研究，可以参阅本书著者之一(B.M.R.)发表于1997年的研究成果(Roehner 1997 a, b)。

## 比较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已经强调过，在西方除了像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这样的独立历史学家外，很少有历史学家曾尝试比较研究方法。那么中国的比较历史学发展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讲，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本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尽管马克思在多数情况下以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但在其为《纽约日报论坛(New York Daily Tribune)》所撰写的400篇作品中有很多文章都对不同地点发生的相似事件进行了比较。简言之，他已经实现了比较研究学者(comparativist)思维上的转变。他关于雾月政变(coup of the 18th Brumaire)的著作也有着同样的倾向，这些作品是否影响了某些中国历史学家呢？只是恐怕我们已无从知晓。

中国有一位知名历史学家黄仁宇(Ray Huang)，其研究方法亦有些许比较研究方法的意味。黄仁宇在共产党胜利之后移民美国，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位国家主义者，因而有人确信黄仁宇并未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有人将黄仁宇与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相比，因为两人都尝试在一定距离上观察历史事件并集中观察主要过程；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正是为了更清晰地发现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且在其著作中他经常将东西方历史进程进行对比。换句话说，二者都认定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存在某些普遍适用的规律。黄仁宇指出了在中国这些规律如何发生作用，但是并未尝试详细阐述这些规律在其它地方同样适用。简而言之，布罗代尔(Braudel 1967)和黄仁宇(Huang 1988)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但这一框架需要通过日后的比较研究加以证实和测试。

毋庸赘言，如果目前中国大陆有比较历史学家，我们会很高兴与之会面相识。任何帮助我们与之取得联系的信息都极有价值，我们在此先行致谢。

## 官方历史、规范历史与事实历史

在结束前言之前，我们感觉有必须讨论一下事实历史(factual history)与规范历史(normative history)之间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是我们从经济学中借用来的，下面我们将首先介绍实证/事实经济学(positive/factual economics)与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这两个概念。

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 有时也被称作事实经济学)主要研究“(实际情况)是什么(what is)”；而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则是解释“应该是怎样(ought to be)”。

- 实证经济学式的论断很可能会是这样：“2010年美国的收入差距要比法国的高”。

- 而规范经济学式的论断则可能会是：“牛奶的价格必须要到3欧元一升才能让奶农有更高的生活标准”，或者“应当对CEO的收入进行一定的限制来保证收入差距处于可控状态”。

不过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前的区别也并非一直如此清晰分明，一个主要原因是除了一些大家公认的常识之外，很多论断中也会有些被隐含接受的、含有一定倾向性的假设。举例来说，我们通常认为较大的收入差距是比较小的收入差距更坏的情况(可能只有一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不这么认为)。而这样的隐含倾向也会让实证经济学的一些论断部分地含有规范经济学特点，而且由于不平等性可以通常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度量<sup>8</sup>，这就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换言之，即使对于同样的情形，也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衡量指标和解读方式，进而产生并不相同的结论。

但是无论进行这样的区分有多困难，我们仍应时刻留意实然事实与应然论断之间的区别；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将走入混乱和偏颇当中。

相较于经济学，实然与应然的区分在历史学中实际上更加重要。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在记录本国历史时都会采取自己国家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本身就会让很多描述变得无法完全客观。例如对于同一段反殖民斗争的记录，同样的一支武装可能会被一方称作恐怖分子，而同时又被另一方称作自由斗士。明成祖朱棣1424年崩逝后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但他事实上与“纯仁”一词就相去甚远：他在位期间大兴文字狱、残害忠良，最为骇人听闻的便是腰斩方孝儒并诛杀其十族(共计873人，另有充军等罪者千余人)。而且在其逝后百年，明世宗于1538年改明成祖谥号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将体天与广运改为了启天与肇运，而这更凸显了明成祖所创下的功业的开创意义。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很容易窥见官方/规范历史与事实历史的区别了。

## 比较历史与事实历史之合璧

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社会学方法规则(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一书中强调应当用与物理学家研究自然现象相同的方式从“外部(from outside)”去研究社会现象。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告诫自己的学生没有任何化学家会说氧气是“好的”而氯气是“坏的”。但即使如此，他仍然很难让学生们不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对某一事件进行好坏的评判；“过失”、“错误”、“罪行”、“复

<sup>8</sup>例如我们可以用前1%的人的收入占全部人口的总收入之比来衡量收入差距、也可以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来进行衡量。

原(rehabilitation)”、“赔偿(reparation)”这一类词汇显然都属于规范历史学，很多时候都会让描述有失客观。

比较历史学则可以自然地为我们提供一个客观的视角。或许有人会谴责美国内战中有太多的人员伤亡，但通过比较历史学的方法研究众多内战之后，我们就可以马上发现所有的内战都是无情与残酷的，美国内战也并非特例。而且比较历史学重在揭示普遍的规律，或许在不同国家中相同的事件会有程度上的差异，但内在规律却往往是一致的。举例来说，制度腐败(institutional corruption)在西方也非常普遍，只是它被称作了“利益冲突(institutional corruption)”而已；而“折磨(torture)”则被称作“第三学位(审问)(third degree (interrogation))”。用词在很多情况下都非常重要，但他们所对应的却往往仍是同样的事实。

苏联领导人公布的对于斯大林成就的评估显然是规范历史学的论断；相似的，美国在每次战争或者对外占领之后，都会有为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工作的专业历史学家来给出一份官方历史档案。美国关于占领日本的历史记录有45卷之多，但尽管体量如此之大，在其官方档案中很多有关占领的事实都被故意忽略，因为这些事实与国务院想要给出的声明有所出入。

上述是典型的规范历史的例子，我们在本书中则力图局限于讨论事实历史；比较历史分析学视角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达成这一目标。

# 第一部分：关于中美的五个案例分析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用五个案例研究来阐述比较历史分析学(Comparative Analytical History)这一概念以及对于相应历史事件的分析 and 可验证的预测(Roehner and Syme 2002)。这一研究方法基于实验物理学长期遵循的原则，就是当进行重复试验可以获得相近结果时，我们才认为可以据此得出科学结论。如果实验不能重复，那么它就只是轶事证据(anecdotal evidence)，基于此并不能生发出科学。如果一个人接受轶事证据、认同许多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事件是独一无二也不能相互比较”的观点，那么这种情形下可验证性(testable)就无从谈起了。比较是科学的基石和重要特质之一，例如在天体物理学中，观测太阳系外的星系对于我们了解太阳系至关重要，有了足够多的观测与对比之后我们更易得出星系运行(甚至星系创生之原理)背后的统一规律。在发现太阳系外星系之前，天文学家只能观察到太阳系这一个实例，而单一的实例(single instance)只能被描述而无法通过可验证的方式去理解它们。



图 6: 关于太阳系外行星的艺术作品。比较是科学的关键，了解系外行星的特征可以让我们对于太阳系有更多的可验证性理解；同其他恒星的比较同样可以使得我们验证对于太阳系的理理解。虽然每一个系外行星或恒星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并不妨碍进行比较。

# Chapter 1

## 911恐怖袭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这一章可以被视为对比较分析方法的一个阐述，而这正是我们在本书中通篇使用的方法。为了防止阐述过长，本书剩下部分中的比较方法通常会被限于两到三个具体事件的比较分析；不过本章中我们的案例集合包含9个事件。我们也会着重详尽阐述为何选择这些事件作为研究集合，这一章可以看作我们对于所使用方法论的解释。

当我们试图去解释比较历史分析学(Comparative Analytical History)的方法论时，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找到大多数人熟悉的历史事件。这在大多数国家是不容易的，一个国家的公民通常更了解本国历史，但对于其他国家的历史却往往只有一个大概印象。举例来说，如果做一个问卷来研究美国人或法国人对中国历史有多了解，结果一定很有趣。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在这一章节选取的事件是大多数人都熟悉的，就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曼哈顿的针对世界贸易大厦的恐怖袭击。

2017年3月爱尔兰西部海岸的戈尔韦(Galway)举行的跨学科研讨会上，本书著者之一(B.M.R.)针对9/11事件做了一个演讲。因为与会者相对较少，他开始问所有的参会者对于9/11事件的动机有何看法。大多数人说这是基地组织(Al-Qaida)向世界宣扬他们的力量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9/11事件被视为一场并无明确目标的公共关系运作。

如果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分析9/11事件，我们将会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但是在我们开始分析之前，我们希望强调的是，就像其他任何历史事件一样，9/11事件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

## 1.1 两种描述模式

图1.1阐述了描述和分析历史事件的两种不同方式：一个是基于时间顺序的(也被称为纵向)描述，而另一种是比较式(也被称为横向)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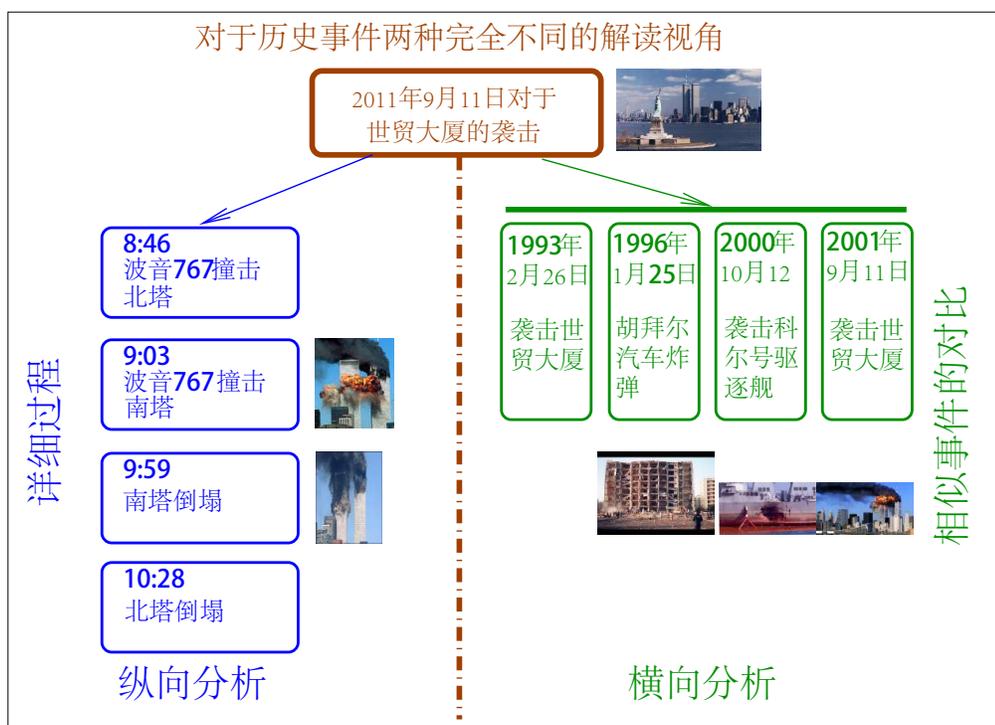


图 1.1: 详细的基于时间顺序的描述与相似事件的对比描述。叙写历史的标准方式是按照时间顺序编年而记。想要动用图右侧的比较分析方法，首先要定义何为“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明白在物理学中也有这种困惑。比如，牛顿拿苹果的掉落来与地月引力来做类比，但依当年的寻常眼光看来，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是很微弱、甚至完全不可能的。

- 图1.1左边所示的纵向描述是尽可能精确地用时间序列还原历史事件。图1.1给出了四个关键时间节点，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给出更多的信息，例如还可以记录每一班航线的起飞时间和它们的运行轨迹。这种描述事件的方式实则是历史学家最为经常采用的方法，因为它是还原事件的基本方式。

-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种标准方式，我们还可采用一种比较分析的办法，它的目标是在考量后找到事件背后的真正推手或机理。对于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现象来说，这种比较方法经常被用到。例如，我们可以拿不同国家的出生率或自杀率或经济增长率来做比较；只是目前这类研究大多是以纯粹的统计方式进行而非以问题导向的方式来研究。然而，用比较方法研究9/11这样的历史事件却并不多见。图1.1右边的描述方式就是基于多个相似事件的比较分析视角，由于空间有限，表1.1中的另外五个相似事件没有被列入图中)。

为了更清晰地阐述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来想想苹果从树上掉落的例子。如果我们从基于时间顺序的角度去描述其发展过程就会是这样：苹果变得太重了；树干变得干了；树枝被会大风吹得摇摇欲坠。但即使是最详细的描述也显然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重力的知识。与此相对的是，如果将苹果坠落的例子和其他相似例子(如松果和雨滴掉落)进行比较就可以将分析引入正确的轨道，我们或许就可以发现有一股隐藏的力量驱使着它们掉落。直到牛顿将苹果掉落与地月关系做类比，才最终迈出了揭示重力本质及其普遍性的最关键一步。

就像苹果掉落的例子所带来的启示，比较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要适当地定义比较集合(comparison set, 例如苹果掉落、雨滴坠落与地月关系这三者就是一个适当的比较集合)。下面我们就来解释如何定义9/11事件中的比较集合。

## 1.2 透视9/11事件

在讨论历史事件的成因时，通常都不是由单一原因而是多种因素引发的。因此，对于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成因，有经济原因，比如1929年10月股票市场崩盘，也可能是因为世界范围内谷物的过度产出。相反的，对于9/11事件来说，成因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很简单：9/11事件是被少数人群策划，这和战时军事基地策划军事行动是一样的，而任何军事行动都有明确的目的；同样的，9/11事件背后的主脑也有明确的目标。我们在下文将会证明他们的目的是想要美军撤离沙特阿拉伯。

但如果所有分析只是局限在单一事件中仍不够有说服力。相比之下，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分析9/11事件，其背后的动机就变得很清晰了——正是为了反抗美国驻军沙特阿拉伯。当我们将一系列相似事件放到一起(详见

表1.1)研究时, 就可以得出以下论断:

(1) 美军从1990年8月7日到2003年8月驻扎在沙特阿拉伯。此举被认为是美国迁怒于伊斯兰教的行动。沙特阿拉伯对于异教徒(比如非穆斯林)来讲地位比较特殊: 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麦加是伊斯兰世界中最神圣的城市, 只有穆斯林教徒才可进入; 麦地那(麦加往北500公里)是第二神圣的城市, 而且其与麦加相仿, 亦是非穆斯林不得进入麦地那的神圣中心<sup>1</sup>。在1990年和2003年期间, 就有9起针对美国(包括大使馆、舰船、军队以及世贸大厦)的大胆高调的袭击(high profile attack, 袭击事件详见表1.1), 这类袭击通常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和精心的策划。

自2003年8月之后针对美国的高调袭击就很少发生了。沙特阿拉伯在2003年还拒绝了美军使用苏丹王子空军基地(Prince Sultan Air Base)去攻击伊拉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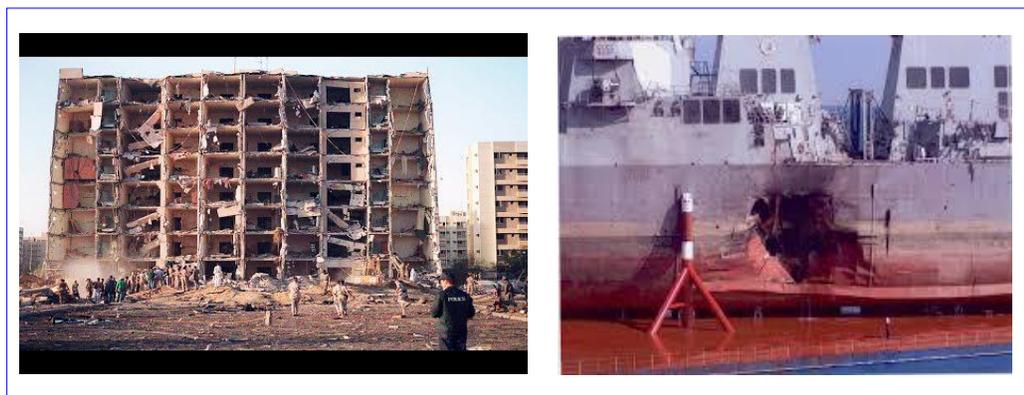


图 1.2: 发生于沙特阿拉伯和亚丁港的炸弹袭击。(左) 达兰市(Dhahran)的胡拜尔大厦(Khobar buildings)住着2000名被派遣到附近达兰空军基地(现在叫做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 King Abdul Aziz Air Base)的美国空军士兵。在1996年一个汽车炸弹袭击了这其中的一幢楼。(右) 在2000年美军驱逐舰科尔号(destroyer USS Cole)在亚丁港补给时被袭击。这张照片拍摄于其被装载于营救船上即将运回美国之时。

(2) 在沙特阿拉伯发生的袭击都是直接针对美国有关人员。

(3) 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于1998年8月7日遭到袭击, 而8月7日正好是美军8年前首次抵达沙特阿拉伯的日期。这些袭击之后, 一个自称“圣地自由卫军(Liberation Army for Holy Sites)”的组织宣称对炸弹袭击

<sup>1</sup>而沙特国王从1986年起就正式接受了“两大神圣清真寺的守护者”、“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的仆人”这两个头衔。

负责。然而在相关的维基百科的文章中关于炸弹袭击的这一负责声明却并未出现。

(4) 参与9/11事件的十五个人中有九个是沙特阿拉伯人。

这些行动都是高调的袭击事件，这在9/11事件和针对美军驱逐舰科尔号的袭击(参见图1.2)中体现得很明显，而且其他行动也显现出了较高的科技含量和精心策划。虽然内罗比和达勒思萨勒姆相距800公里之遥，但两地的爆炸袭击却几乎同时发生(二者分别发生在在上午10:30和10:40)，而且(爆炸中)使用了10吨TNT当量的炸弹。

《纽约时报》上关于在沙特发生的对美袭击的文章当然提及了这些袭击是为了抗议美国在沙特阿拉伯驻军。然而，对于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对美袭击的报道，这一原因却鲜有提及。

### 1.2.1 对于可能的反对声音的解答

或许有人会对上述的结论有所疑虑：如果这些袭击都是对美军驻扎沙特的抗议，那为什么并非所有的袭击事件都发生在沙特国土上？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沙特阿拉伯是一个非常专制的政权，反抗组织要在这里建立联络是很困难的。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认为袭击之所以会在内罗比和达勒斯萨勒姆发生，很可能是因反抗组织在那里已经有一定根基和联系了。为了验证我们提出的猜想，我们就需要更详细的关于袭击是如何被策划出来的资料。

### 1.2.2 只是另一个阴谋论？

现在人们已经有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每次恐怖袭击都会引出很多阴谋论。我们的解释也可能被认为不过是一个阴谋论，但我们的解释与阴谋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几乎所有的阴谋论都聚焦于单一事件，并声称能提供新的(但通常未被证实或无法验证的)信息。由于这类阴谋论通常只是针对单一事件，所以这些理论就不可验证。相比之下，通过分析一系列相似案例组成的集合，我们的理论是可以验证的。自从美军撤离沙特后，针对美国利益的高调袭击事件就很少发生了(参见图1.3)。另外一种更复杂的情形会是同一时间段内正好有两个独立又有关联的恐怖袭击活动一同发生，对于这种情况的分析会更困难一些，因为会需要仔细辨别以得出两个事件集合而不是一个。

### 1.2.3 西方战机曾投放的炸弹和恐怖袭击

我们不妨通过另外一个例子来看是否恐怖袭击的动机被媒体或官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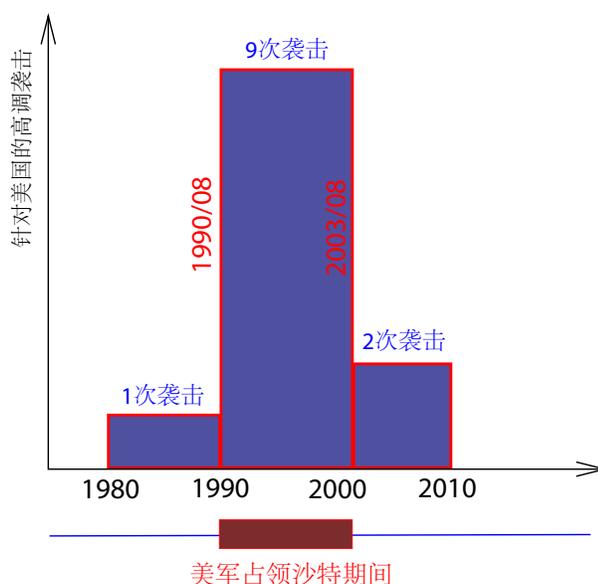


图 1.3: 针对美国得益的高调袭击事件分布图。在1990-2003年之外的区间里, 共计只有过3次针对美国的高调袭击: (1) 1998年12月21日的泛美航空洛克比空难(Lockerbie Air Disaster); (2) 2004年12月7日美国驻沙特吉达(Jeddah)领事馆遇袭, 身亡的9人中包括5名美国领事馆雇员(全部为非美国公民), 余下死亡的4人为袭击者; (3) 2006年3月2日美国驻巴勒斯坦卡拉奇领事馆遭到炸弹袭击, 包括一名美国外交官在内的5人身亡。数据来源: 英文维基百科文章《Lists of terrorist incidents(恐袭事件列表)》

有意或无意得隐藏起来了。在2015年11月和2017年5月期间, 自称圣战者(djihadist)的恐怖分子在法国制造了多起袭击。他们常常在发动袭击或被杀前留下遗书, 声明这些袭击是为了报复法国空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实施的轰炸; 本书著者之一(B.M.R.)是法国公民, 他发现法国媒体几乎从未提及袭击事件的发生与这些恐怖分子留下的遗书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之间的可能联系。法国媒体的这种态度究竟是未发现此种可能的联系? 还是故意避开, 以免公众可能会问及炸弹袭击何时会终止?

作为一个特殊案例,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2017年6月19日一次未遂的炸弹袭击。一个名叫Adam Djaziri的圣战分子在巴黎驾驶自己的车冲向一辆警车, 他本人在事故中丧生; 据称有燃气罐和数把武器在他车内被搜出。媒体在几天后披露了Djaziri于5月29日寄给多家报纸的信件。在这个长达6页的文件中媒体只给出了一句话, 就是他要求法国政府终止在叙利亚的轰

炸。然而就像其他案件中的那样，这一句话很快就被遗忘了。

除了法国的案例，我们当然也应该考虑其他国家类似的事件。在2017年3月22日的伦敦袭击后，本书著者之一(B.M.R.)曾向他的一位英国同事问及英国媒体有没有承认这次袭击可能与英军参与轰炸伊拉克和叙利亚有关。从事实来看，英国媒体也像法国媒体那样，对这一可能的联系几乎从未提及。

我们可以将观察的范围再扩大一些。事实表明在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典、英国和美国都曾有类似的袭击事件发生；瑞典是这些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参与过轰炸行动的国家<sup>2</sup>，而荷兰则是唯一一个参与了轰炸行动却没有遭受过恐怖袭击的国家(截至本书出版前仍然是这样的)。

简而言之，即使是没有恐怖袭击作案者所留下的遗书宣言，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也能发现参与轰炸行动和遭受恐怖袭击之间存在很紧密的联系。这显然会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媒体要试图掩盖这一可能的关联呢？他们难道不是自称“自由媒体”吗？

### 1.3 如何辨别哪些事件属于同一事件集合？

上面的例子阐释了比较方法论(comparative methodology)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首先须要找出与某一重复出现的现象所相关的事件的集合<sup>3</sup>。在表1.1所示的时间区间内，有些其他的袭击事件就并未被纳入我们考虑的范畴。举例来说，我们就没有考虑1995年4月19日发生在俄克拉玛州的炸弹袭击(Oklahoma bombing)、2002年10月12日的巴厘岛炸弹袭击(Bali bombing)以及2002年11月22日的蒙巴萨岛的袭击(Mombasa attack)。

为什么呢？不妨让我们来对这些事件进行逐一分析：

- 俄克拉玛州炸弹袭击(1995年4月19日)。一座联邦大厦外一个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爆炸使得165人不幸丧生。这座联邦大厦除了是联邦办公地点也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同时还是美国陆军与海军募兵办公室的所在，可以说这次炸弹袭击是直接针对美国利益的。然而此次炸弹袭击的原因却和表1.1中所罗列事件的原因完全不同。就像在其他案例中一样，袭击所发生的时间往往能够给出重要的提示。袭击发生于1995年，但我们不得不提及1993年4月19日发生的一件轰动美国全国的大卫教派事件。大卫教派(Branch Davidians)本是美国的

<sup>2</sup>加拿大只进行了燃油补充和侦察任务。

<sup>3</sup>如果我们可以从过去发生的众多事件中找出一系列倾向于不断重复发生的事件的集合，那么这种重复发生所带来的规律性就可以被用来预测未来类似事件的走向了。米姆克斯(Jürgen Mimkes)教授就曾提出过类似的方法(Mimkes 2017)

一个起于1934年的基督教新兴教派，由保加利亚裔美国人维克多·豪迪夫(Victor Houteff, 或译维克多·胡太佛)创立，后来分裂为不同派别。大卫·考雷什(原名Vernon Howell, 1990年改名David Koresh)所领导的其中一派在德克萨斯州韦科附近屯积了大量的军火，被发现后他们拒绝交出枪支，反而退守于其在当地的山庄与FBI对峙。FBI特工和大卫教派的对峙最终以进攻时引出的大火及进而导致的爆炸而结束，此次行动中一共有76名(也有说法是76名)大卫教派信徒丧生。所以这次的袭击主要是为了报复当年的大卫教事件而与美国驻军沙特毫无关联。

也有另一种猜测是认为这一袭击事件是为了报复政府将理查德·斯奈尔(Richard Snell)于1995年4月19日处死(他曾在阿肯色州犯下谋杀罪)。斯奈尔是出名的杀人狂魔、美国至上主义团伙的首领，而且他于80年代就曾试图炸毁这座联邦大厦。

- 巴厘岛炸弹袭击(2002年10月12日)。不考虑巴厘爆炸案一个显而易见也最为关键的原因是这次袭击并不是针对美国。而且在死亡的202人中，只有7人是美国公民却有88人是澳大利亚公民。当然如果只用美国公民伤亡人数这一单一标准并不充分，它只能被看作一个辅助判据(因为在内罗毕的炸弹袭击中，虽有超过200人丧生，也只有12人是美国公民)。就在巴厘岛炸弹爆炸的同时(事实上可能早几分钟)，一个小型炸弹在巴厘岛省会登巴萨(Denpasar)的美国领事馆外被引爆，然而它并没引起伤亡只造成了较小的破坏。这一袭击虽是直接针对美国，但其炸弹技术并不成熟，因而并非高调袭击(high profile attack)。
- 蒙巴萨岛(肯尼亚，2002年11月28日)。一个汽车炸弹在一家以色列人开的“天堂旅馆”外爆炸，导致13人丧生，80人受伤；死者中有3个以色列人和10个肯尼亚人。几乎同时，袭击者朝以色列专机发射了两枚地对空导弹，不过均未击中目标。这些攻击很显然并不是针对美国。一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的组织说这次行动是想要在巴勒斯坦分裂55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引起对于巴勒斯坦难民所处困境的注意。袭击的日期往后推一天便是55年前联合国投票通过巴勒斯坦分裂的日期。
- 有人可能还会提到2003年11月8日发生在利雅得Muhiya居民区的自杀式卡车炸弹袭击，事发地居民多为沙特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公民。袭击造成了其中18人死亡，但爆炸地点的选择表明袭击目标并不是美国利益集团(至少不是其直接目标)。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有些高调袭击在表1.1对应的时间段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例如1983年10月23日的贝鲁特(Beirut)汽车爆炸案就是针对美国海军军营和法国军人的。甚至有传言说，那次袭击使用的炸弹和1993年袭击世贸中心的炸弹用的是同一种爆炸物(一种汽油炸弹装置)。究竟是谁策划了那次袭击至今仍是谜，但从其展现的复杂程度和成熟程度来看，那次袭击或许是从某个政府在暗中提供物资甚至策划支持。

在我们本章的案例中，对于一个特定事件是否应被认定为相关或不相关，其标准还是很明了的；但我们也得承认，想要定义出严格的划分标准并非易事，因为诸如袭击日期、袭击中炸弹的技术特征都会是重要的因素。后文中我们会看到，对于医学甚至是物理学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 1.3.1 物理学中对于“类似”现象集合的定义

实验物理学可能是现代科学领域最成功的学科，而它是完全依赖于比较不同情况下的实验结果。换句话说，对于物理学家而言这一章所呈现的比较方法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诚然，经过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物理学虽然已经可以仅理论推导便得出许多新结论(当然对比实验依然重要)，但更应注意的是，比较分析在物理学的初期阶段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在一个学科起步阶段，最大的挑战便是通过仔细的观测对比来建立稳固的基础(而这正是第谷与开普勒当年所做的事情)。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即使是在物理学中，要把一个观测归入某一现象对应的集合或其他现象对应的集合也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仍拿物体的自由落体来阐述。理想情况下，自由落体意味着在真空中下落；然而，如果物体的密度远大于空气的密度，那么这个下落可以被认为是自由落体；但是如若物体的密度逐渐变小，那么这个落体就会越来越不遵循自由落体的规律。所以某一观测是应被归入“自由落体集合”还是“粘性介质落体集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测试方法的准确性，而不再那样显而易见了。

### 1.3.2 为何高噪声(high noise level)会使得科学分析更复杂

当论及实验物理学中的比较分析时，另一个现象就很有趣了。

对于牛顿定律的第一次准确验证是建立在第谷·布拉赫与开普勒对于火星的观察之上的，这一说法乍看起来似乎很另人惊讶——在实验室中设计实验来验证牛顿定律难道不会更简单吗？

行星之所以更让物理学家感兴趣是因为它们的运行不受摩擦力影响，而这个特征是极难在实验室环境中实现的；钟摆的运动可能已经是最接

近于微摩擦力的实验了。所以不足为奇的是，从伽利略(Galileo 1600)到弗里德里希·贝塞尔[Friedrich Bessel 1828, 其主要贡献是关于附加质量(added mass)的研究]再到里昂·福柯(Léon Foucault 1851, 其主要贡献是关于地球自转的研究)，钟摆在经典力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是出于上文提及的原因，当重复实验的结果不同时要去解释这些实验是很有挑战性的—涉及到湍流现象(turbulence)和量子力学效应(quantum mechanical effects)的实验往往就是如此；所以由于其复杂性，对于这类实验直到20世纪(而不是更早)才得以被解释并不另人惊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研究了光电效应，而他的预测被罗伯特·密利根在1914年通过实验证实；爱因斯坦和密利根为此赢得了诺贝尔奖。

对于之前的讨论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信噪比(signal to “noise” ratio, 记作s/n)低的现象比信噪比高的现象更难以理解。

由于历史事件可能有更高的噪声率，而且与湍流、量子效应不同的是，历史事件中的噪声并非完全随机，而这会让分析更加困难，所以相应的观察和解读就会变得更加棘手。当然毫无疑问的是，随着历史事件样本数量不断增加，我们终可提炼出类似于物理学定律的规律。而且现今发达的网络科技亦能让历史记录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易得。

年份	日期	地点	美死亡人数	描述
	1990	08/07		沙特 第一批美军部队抵达沙特阿拉伯
1	1993	02/26	6	纽约 针对世贸大厦的第一次袭击
2	1995	11/13	5	利雅得 对美管理下沙特国民卫队训练中心的轰炸
3	1996	06/25	19	达兰 针对阿尔科巴尔居民区的汽车炸弹袭击
4	1998	08/07	12	内罗毕 针对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炸弹袭击
5	1998	08/07	0	三兰港 针对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炸弹袭击
6	2000	10/12	17	亚丁湾港 针对美海军科尔号驱逐舰的炸弹袭击
7	2001	09/11	2,600	纽约 针对世贸大厦双子塔的袭击
8	2002	10/08	1	法拉卡岛 在美国海军训练时发动的袭击
9	2003	05/13	9	利雅得 四起同时对西方飞地(enclave)的轰炸
	2003	08/26		沙特 最后一批美国空军撤离沙特

备注：内罗毕在肯尼亚，达勒斯萨勒姆(Dar es Salaam, 又名三兰港)在坦桑尼亚，亚丁港(Aden Harbour)在也门，法拉卡岛(Failaka Island)在科威特。1998年8月7日的炸弹袭击正好发生在美军首次抵达沙特阿拉伯的8年后的同一天。据1996年6月26日《洛杉矶时报》报道，23名美国人在此次袭击中丧生。2003年5月13日的炸弹袭击发生在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访问利雅得期间。

资料来源：多数文章来自于《纽约时报》；下述文章来自于维基百科和CNN: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93\\_World\\_Trade\\_Center\\_bombing](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93_World_Trade_Center_bombing)

(2) [http://edition.cnn.com/WORLD/9511/saudi\\_blast/11am/](http://edition.cnn.com/WORLD/9511/saudi_blast/11am/)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hobar\\_Towers\\_bombing](https://en.wikipedia.org/wiki/Khobar_Towers_bombing)

(4,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98\\_United\\_States\\_embassy\\_bombings](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98_United_States_embassy_bombings)

(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SS\\_Cole\\_bombing](https://en.wikipedia.org/wiki/USS_Cole_bombing)

(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ptember\\_11\\_attacks](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ptember_11_attacks)

(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ylaka\\_Island\\_attack](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ylaka_Island_attack)

(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yadh\\_compound\\_bombings](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yadh_compound_bombings)

时间线: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errorist\\_incidents\\_in\\_Saudi\\_Arab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errorist_incidents_in_Saudi_Arabia)

美军部队撤离: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withdrawal\\_from\\_Saudi\\_Arab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withdrawal_from_Saudi_Arabia).

表 1.1: 由于美国在沙特驻军进而导致的以打击美国利益为目的的袭击事件



## Chapter 2

# 中美全球领导力竞争

本书第一部分的余下章节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全球领导力竞争这一重要问题。回顾历史，罗马帝国虽然统治了地中海世界，但同时期的中国、印度和波斯帝国也同样是世界舞台的核心角色(不过那时各个帝国之间的交互远比现在国家间少的多的多)。从1840年到1914年，大英帝国是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却从未达到美国在1945年之后的程度。英国在其殖民地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中国)有军事前哨，但在当时诸如英德法俄等其他强国的领土上却没有。美国自1945年几乎始终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科技各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自从二战和冷战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发展了一套旨在通过参议院、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司法部、美国媒体和大学协同行动来向海外国家推广美国模式的有效机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日渐扩大，中美关系间的竞争也日益凸显。那么比较历史分析学提供的视度能否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待这些问题呢？通过本章接下来的内容中，读者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 2.1 合作还是竞争？从比较历史的视角来看

在国际法中，共管领土是指一块政治领土(可以是边疆地区或国家)被两个或以上的主权国家平等地共同管治，形成势力平衡。例如英国和法国同意在太平洋新赫布里底群岛建立一个共管区，这个共管区从1906年持续到1980年，直到该地区以瓦努阿图名义独立。目前全球仍有少数的共管领土存在，这一概念可以被看作一种合作双赢的关系；不过历史上大国之间的相互合作现象相对罕见，反而是因为不愿分享领导权而陷入冲突的情况更为普遍。

### 2.1.1 两种不同的预测冲突发展的分析方法

#### 方法一：列举冲突起因

当两个国家处于摩擦阶段时，预测会发生什么的标准方法之一是列举出导致冲突发生的所有可能因素。但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对于冲突发生和发展(进一步发生)有影响的因素可能太多且太过复杂(很可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因素都有一定影响)；而各类原因中有些可能是极其重要的，但有些则可能只是偶然和间接的。

七年战争(Seven-year War, 1756-1763年)和革命战争(Wars of the Revolution, 1793-1915年)是英法两国为争夺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领导地位而发起的冲突。同样的，法国与奥地利帝国之间战争的起因也是欧洲大陆的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离我们更近的冷战显然是因美国和苏联为争夺世界领导权而起。然而，在1940-1950这十年间，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被美国取代，却没有与美国发生任何公开的冲突；而且到目前为止，英国仍然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这些例子表明，一个相同的冲突起因可能会因实际环境和情况的不同而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但由于对于这种“环境和情况”的估计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和视角，这种基于起因的分析方法往往会带来较多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简而言之，虽然原因分析法似乎是最自然而然的方法，但这种做法往往较难得到真正科学的结论。

#### 方法二：基于历史事件集合的比较方法

希腊将军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460年至-400年)曾说过：“如果我所写的内容对于那些想知道过去已经发生过的并且将来可能还会再次重演(因为人性使然)的事情的人有所帮助的话，我就感到满足了。”<sup>1</sup> 卡尔·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人们自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但这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已经存在的、给定的、从过去存留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有历代逝去者的传统，就像梦魇一样成为了活人脑海中的负担。”<sup>2</sup>

但这样一种基于过去事件预测和解释未来事件的方法乍一看似乎很难实现，或者说同样问题重重：我们要比较哪些历史事件？我们要依据怎样的标准来选择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这些问题细究起来似乎同样千头万绪，

---

<sup>1</sup>原文如下：“I shall be satisfied if what I have written is useful for those who wish to know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human nature being what it is, may well happen again”

<sup>2</sup>其原文如下：“People make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make it under circumstances existing already, given and transmitted from the past. The traditions of all the dead generations burden, like a nightmare, the minds of the living.”

远不如自然科学那样清晰明确；但应当注意的是，过去天文学家们其实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他们在天空中观察到的天体有很多种类(行星、行星的卫星、彗星、恒星等等)，我们现在知道，比较属于不同族类物体的轨迹是没有意义的，但这一点在过去却不是那样显而易见。

在使用比较方法时，首要的问题是收集并构建相似事件集合，然后通过分析这些尽可能多的相似事件来尝试得出结论。对于天体物理学家来说，当他们可以观察到同一类别内众多不同星体以及不同类别(小的和大的、年轻的与老迈的、红色的与黄色的等等)的星体，他们就有可能真正了解天体是如何运行的。这样的数据集合让他们可以测试各类假说和理论；但如果天体学家只有一个星体的观测结果，那么能做的更多的是描述，却很难得出普适的规律，而如果没有更多的数据那么想要验证相应的规律也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只有把数据的形式从单个事件变成一系列事件的集合时，我们才有可能对某些问题形成一个真正“科学的”理解。

### 2.1.2 经典案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希腊的主要城邦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次冲突开始于公元前469年，共持续15年到公元前445年结束；第二次冲突则是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持续了将近30年。在这些长期的冲突中，雅典扮演了海上霸主的角色，而斯巴达则是在陆上称王。

罗马共和国和迦太基帝国为了争夺西方地中海的统治地位，在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进行了三次布匿战争(Bella Punica)。经过百余年征战，在双方牺牲成千上万的士兵之后，罗马共和国征服了迦太基帝国，并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一跃成为西地中海最强大的国家。西罗马帝国在西方持续繁荣超过了四个世纪，东罗马帝国(16世纪之后开始有学者称之为拜占庭帝国)则一直延续到了15世纪。

### 2.1.3 西欧国家间的冲突

到了晚近一些的时期，法国和大不列颠为争夺西欧的统治地位，于1754-1815年间在欧洲发动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那些战争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世界战争，因为战火还蔓延到了这两个国家在北美、加勒比岛屿和印度的的殖民地上。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俄与奥匈帝国、德国和土耳其开战也是为了争夺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 2.1.4 一个新旧霸权交替的特例

历史上新旧霸权更替却没有发生冲突的特例是英国和美国。英国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绝对的超级大国，它在19世纪末期失去了经济统治地位，在1945年以后其殖民帝国瓦解，一同失去的还有其全球的统治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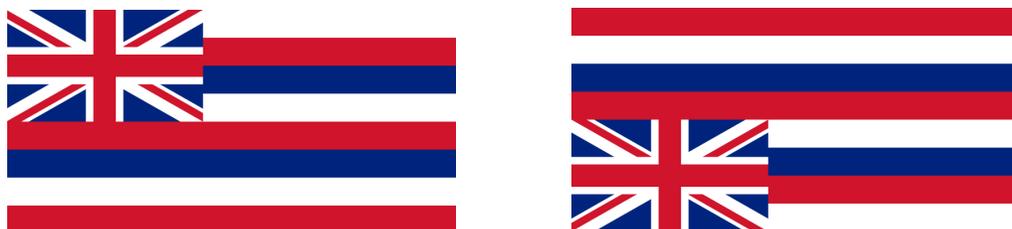


图 2.1: 夏威夷王国的旗帜。(左) 美国镇压其君主制之前夏威夷王国的旗帜。把米字旗放在左上角可能与英国帮助其恢复君主制有关；(右) 由夏威夷原住民团体使用的颠倒过来的旗帜。

关于英美于1887-1894年间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有一个有趣的事件。下文中给出的资料显示，虽然英国名义上支持夏威夷实行君主制，但事实上英国并没有真正反对美国对夏威夷王国君主制的打压。

#### 英国对美国接管夏威夷的温和反应

1887年6月英国举行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五十周年的庆典，世界各地的君主都被邀请前来参加庆祝活动。其中一位受邀嘉宾便是夏威夷的国王，夏威夷王国与英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国旗一角的米字旗就是明证(参见图2.1)。卡拉卡瓦(Kalaka'ua)国王派他的妻子和王国的公主<sup>3</sup>代表他参加庆典。在从夏威夷到英国的路上，她们还访问了华盛顿，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接待了她们。维多利亚女王在伦敦的白金汉宫会见了她们，女王回忆说，卡拉卡瓦国王早在1881年就正式访问过她。

但几乎在同一时间(1887年6月30日)，在夏威夷的美国商人在民兵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向国王强加了一部新宪法(bayonet constitution, 即所谓的《刺刀宪法》)。卡拉卡瓦国王紧急联系美国公使以及英法日的代表寻求帮助，但他们都建议他遵守这部新宪法。这部夏威夷王国立法机构从未批准、由一群美国人写的新宪法就这样剥夺了他的大部分权力。

<sup>3</sup>卡拉卡瓦的妹妹利留卡拉尼(Liliuokalani)，她于1981年1月17日继承了其兄长的皇位。

美国海军陆战队于1893年登陆夏威夷以支援当地的美国人发动政变，他们于1894年7月4日宣布成立夏威夷共和国。1894年7月，英国军队希望在夏威夷登陆，但夏威夷拒绝给予他们靠岸许可(详见《纽约时报》，1894年7月1日)。1894年7月20日，《纽约时报》刊发消息称，英国准备与新共和国就“互惠条约”进行商讨。这是对夏威夷共和国的一种非官方承认，而美国政府在1894年8月承认夏威夷共和国为受保护国。

夏威夷女王利留卡拉尼于1895年在一个军事委员会审判之后被废黜，她的六名支持者被判处绞刑，在英国女王签署赦免令之后，他们的判刑才被减轻。

那么英国政府难道没有意识到美国在吞并夏威夷后会进一步促进其在太平洋占据主导地位吗？更有可能的猜测是那是一次默认的霸权分享：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印度洋将处于英国的影响范围，而太平洋(尤其是东部地区)将处于美国的影响范围。

简言之，美国兼并夏威夷的步骤大致如下：首先通过各方影响使夏威夷王国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1848年)，之后强迫国王接受并实行《刺刀宪法》(1887年)，紧接着镇压君主制、承认其为美国的受保护国(1894年)，两国签订合并条约(1897年)，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地区(1898年)。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对下列土地的兼并也采用了类似步骤：

- 德克萨斯：1836年，德克萨斯共和国从墨西哥独立；1845年，美国兼并德克萨斯共和国；1846至1848年，美墨战争爆发。
- 加利福尼亚：1846年6月，加利福尼亚共和国从墨西哥独立，美墨战争之后，加利福尼亚共和国于1848年被美国兼并。

## 2.2 经济合作还是竞争？

诚然，没有哪个国家会公开承认自己不愿与他国进行合作，那么事实上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在这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的创立以及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能提供一定具有启示作用的试验。

### 2.2.1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示

中国政府于2014年10月提议创立该银行，目的是支持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7年5月已经有52个成员国、25个潜在成员国，这77个成员中有许多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国(国名后面括号中的日期是正式批准加入的日期或成为潜在会员的确认日期)：澳大利亚(2015年11月)、新西



图 2.2: 2016年9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庆祝中国货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中国画家穆家善(图左)赠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常务董事克里斯蒂娜·拉加尔德(Christine Lagarde, 图右)一幅画作, 当天克里斯蒂娜身着传统中式服装。来源: 新华社。

兰(2015年12月)、挪威(2015年12月)、韩国(2015年12月)、英国(2015年12月)、以色列(2016年1月)、沙特阿拉伯(2016年2月)、卡塔尔(2016年6月)、菲律宾(2016年12月)、加拿大(2017年3月)、巴林(2017年5月)。美国和日本是唯一未加入亚投行的经济大国。

### 2.2.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

截至2016年9月30日, 只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这4种货币被列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篮子。将人民币纳入SDR这项提议首先于2015年11月15日得到了IMF官员和常务董事的批准, 随后在2015年11月30日得到了IMF董事会24位执行董事的支持。为了将人民币加入其中并享有11%的份额, 以上四种之前就存在的国际货币就不得不接受自身份额的下降。

人民币加入SDR的故事十分有趣, 但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 我们必须先解释下特别提款权(SDR)的功能。

### 特别提款权(SDR)的功能

尽管特别提款权这个名字很奇怪，但它实则是一种货币。通常在强调其功能时，会使用它的货币代码XDR来进行表示。XDR于1969年被创造出来，在当时美元仍直接与黄金挂钩(1美元=0.888克黄金)；当时XDR应当起到怎样的作用并未达成共识，大体的初衷是为了在美元供应紧缺和不再被信任时增加货币供应。然而当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发行就不再受美国自身黄金储备的限制而可以自由增加，又由于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的参照，所以当时XDR几乎失去了作用。

而且XDR作为一种货币有其严重的局限性，例如只有中央银行(还有几家其他机构)能够持有该货币，而这影响了它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可以说XDR是一种极其缺乏流动性的货币。数年来，其主要作用就是作为储备金，但即使在这个功能上，其重要性也很微弱——到2011年1月XDR在全球国外交易储备金中仅占4%<sup>4</sup>。

XDR通常只有在发生重大经济危机之后才会被货币专家们想起，进而考虑是否应提高其作用。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2009年3月(也就是开始于2008年10月的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并不意外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席为中国发声，表示中国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满。而且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并不是唯一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不满的国家，在这样的体系下，美国可以对别国(如伊朗或俄罗斯)或外国银行(如法国银行“BNP-Paribas”或“德意志银行”)实施单边制裁，只要美国威胁停止供应美元。

要想改变这个被众多国家使用的体系，就必须有可靠的替代品。2002年欧元的引进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可能的替代品，但由于欧元区国家政治上的软弱，这一愿景很快就消散了。随着中国经济崭露头角，中国建议拓展XDR的作用。由于这样的改变最终会创造出一个美元的替代品，所以可想而知，美国对此持反对态度。<sup>5</sup>

现在可以回到将人民币加入SDR篮子的问题上，SDR篮子的主要作用是在尊重SDR构成货币的基础上定义XDR的价值。许多国家都使用这一相同的体系，例如新加坡元根据多种外国货币构成的篮子来进行自身的估值，只不过其篮子的货币构成没有公之于众。SDR篮子每五年才重新评估一次其要纳入哪些货币及其各自权重(历次货币构成及权重详见表2.1)。从表2.1可以发现，人民币11%的份额主要是通过削减欧洲货币的份额来实现的：欧元降低了6.5%，英镑降低了3.2%，日元减少了1.1%，而美元的份额几乎没有变化。

<sup>4</sup>参见英文版维基百科文章《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

<sup>5</sup>更多详细内容参见(Roehner 2015)。

时段	USD美元	DEM马克	FRF法郎	JPY日元	GBP英镑
1981 – 1985	42.0%	19%	13%	13%	13%
	USD美元	EURO欧元	RMB人民币	JPY日元	GBP英镑
2011 – 2015	41.9%	37.4%	0%	9.4%	11.3%
2016 – 2020	41.7%	30.9%	10.9%	8.3%	8.1%

表 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篮子货币构成及权重

经常有人说,就像其他很多成立于二战时期的国际组织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受控于美国,然而很少有证据能够支持这个观点。这里不妨用一个具体事件来阐释IMF的工作模式,从中可以看到即便美国没有正式的否决权,但也享有实际的控制权。

2010年IMF的执行董事会批准了一项旨在提高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表决权的计划,该计划将使中国的表决权从3.8%提高到了6.1%,印度从2.3%提高到了2.6%,该计划同时将IMF可用于济困的基金数额翻倍,以用来帮助希腊或乌克兰这样的国家。

但是该计划实则只有在获得美国同意之后才可能会被采纳和实施,因为IMF任何决议的通过都必须获到至少 85%的支持,但由于美国一国就拥有16.5%的表决权,所以其相当于享有否决权。在美国的董事投赞成票之前,该计划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事实证明,由于某种原因,美国国会并不急于讨论该计划;到了2014年,尽管奥巴马政府努力将其提上议事日程,但该计划仍然在等待讨论。而漫长的延迟导致几个IMF成员国(尤其是巴西)开始商讨如何摆脱这一僵局,常务董事克里斯蒂娜·拉加尔德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寻找解决方案。美国参议院最终于2015年12月批准了这些变化。很难理解为何美国国会迟迟不愿进行这项讨论,因为将美国的表决权从16.7%降到16.5%对其利益的影响微乎其微,只要其份额能维持在15%以上,美国就仍然能继续拥有至关重要的否决权。换言之,任何可能实质性地影响美国利益的改革在美国国会那里显然都很难通过。在现有组织结构下<sup>6</sup>,中国6.09%的表决权略低于日本的6.16%,而这显然与两国在国际贸易中各自的分量并不相称。

<sup>6</sup>详见IMF媒体2019年5月19日发布的《IMF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voting power(IMF执行董事以及表决权)》。

### 2.2.3 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储备货币

1913年美国出口额超过英国，27年后的1940年，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如果要仔细讨论英镑和美元地位的变化，最重要的因素大概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所导致的经济困境加速了英镑被取代的进程。将同样的规则用在人民币上，或许可以大致预期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储备货币的时间为 $2013+27=2040$ 年前后；但是这一估计很可能并不十分准确，因为相较于当年美国与英国的情况，现在许多条件都已经发生了改变，27年这个数字更应被看作是物理学中的数量级—换句话说，27年意味着这一变化更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内发生，而不会是在未来5年就发生，也不太可能是在10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发生。美元的份额从40%增长至70%大约用了50年。因此，人民币有可能在2100年左右成为主导性的储备货币(须要再次说明的是，这一估计同样仍只是物理学意义上量级的估算)。当然各国央行持有储备货币并不是衡量货币作用的唯一标准，另一个指标是货币在金融交易和商业交易中的份额<sup>7</sup>。

## 2.3 中国的经济发展

### 2.3.1 GDP的增长

1815年之后大约一个世纪里，大不列颠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尽管英国从未达到过1945年以后美国所达到的地位<sup>8</sup>)，德国作为一个可能的竞争对手，其出现足以引起英国统治阶级和皇家海军的担忧。德国的经济发展比英国更迅速，德国在吞并奥匈帝国后，1913年德国联盟人口达到1.18亿，是英国人口的2.6倍；总GDP达到了英国GDP的1.4倍(参见图2.3(左))<sup>9</sup>。

- 1913年时整个欧洲几乎都在抵制英国的统治而更倾向于德国，尽管美国当时的政治角色仍微不足道，但其作为世界经济领袖正在迅速崛起。
- 如果目前的发展情况在未来数年不发生较大变动的話，中国的GDP有望于2020年左右超越美国。

<sup>7</sup>之所以将金融和商业放在一起，是因为实际上很难将二者完全分离。举例来说，外汇交易可能被认为纯粹是金融交易，而且其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是短期(不到1天)的投机性交易；但有些外汇交易则是为了对外贸易而做的。此外，在许多大型商业交易中，买方可能会从美国进出口银行获得贷款。因此，金融交易和商业交易很多时候都是紧密相连的。

<sup>8</sup>例如英国货币在19世纪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远不如1945年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影响那么广泛，更多细节详见参考文献(Roehner 2015)。

<sup>9</sup>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英国所有殖民地(包括印度)的人口超过了3.5亿，国民生产总值几乎与英国本土不相上下；但德国殖民地的GDP则微不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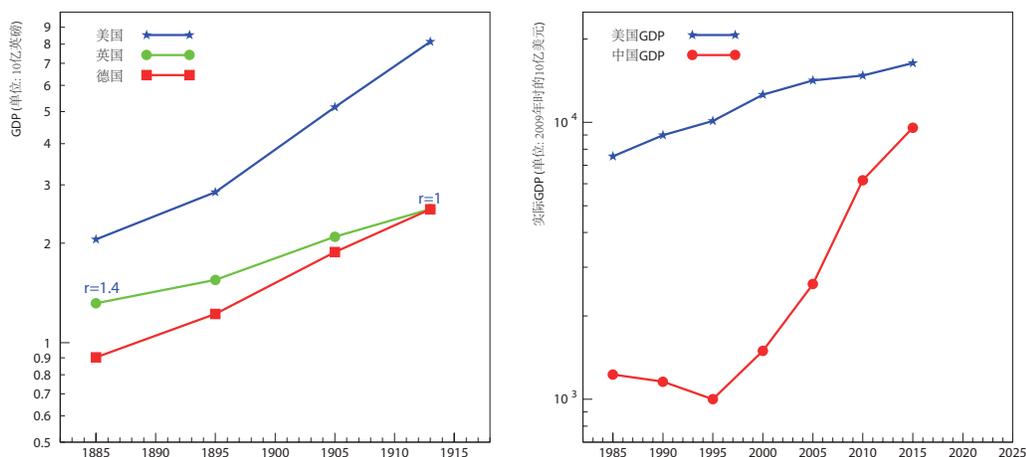


图 2.3: (左) 美国、英国、德国的GDP。1885-1913的28年里, 美国、英国和德国的GDP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0%、2.4%和3.7%, 图中变量 $r = \text{英国GDP}/\text{德国GDP}$ 。由于德国与奥匈帝国自1879年之后结成紧密的德奥同盟(两国同盟直到1918年一战结束才瓦解), 所以奥匈帝国与德国时常被视为一体, 依这样的看法, 奥匈帝国在1913年的GDP是德国GDP的40%, 所以如果直接比较英国与德奥同盟的GDP, 那么当时德奥同盟的GDP将会是英国的1.4倍(也就是 $r = 1/1.4 \approx 0.71$ )。 (右) 美国和中国的实际GDP。根据历史通货膨胀率校正计算后所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被称作实际GDP(real GDP), 其简易的计算方法为:  $real\ GDP_x = \frac{GDP_x}{CPI_x/CPI_0}$ , 其中 $CPI_x$ (Consumer Price Index)是 $x$ 年时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_0$ 则是作为比较基准的年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本图中的基准 $CPI_0$ 值是 $CPI_{2009}$ (也就是2009年时CPI的数值)。美国的数据是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 其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包含在境外的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而不是GDP, 不过二者数值差别很小。1985-1995期间中国GDP的下降是由于高通货膨胀率和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贬值造成的。

数据来源: (左) 1975年《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历史统计)》、参考文献(Liesner 1989), 奥匈帝国GDP数据来自于参考文献(Broadberry et al.2006); (右) 美国数据来源于联邦储备局(Federal Reserve)、圣路易斯银行(Bank of St Louis), 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网站“Trading Economics”(这是汇率数据的来源处)、Chinability。

### 2.3.2 对外贸易

截至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仍是美国及其亲密盟友日本(参见图2.4)，这种局面使得中国很容易在贸易战中受损。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可能会带动与亚洲国家贸易份额的增长，但这可能需要若干年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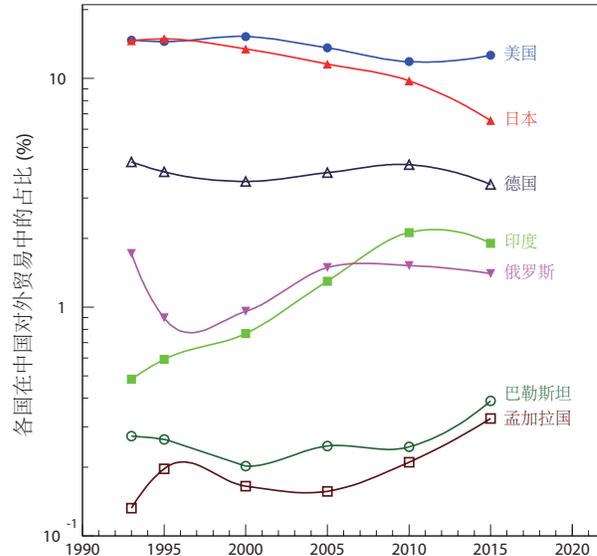


图 2.4: 各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Comtrade)”数据库。

### 2.3.3 人民币在债券市场中的角色

2013年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以36万亿元(约合5.8万亿美元)居世界之首，而在2000年中国债券市场还几乎不存在。更重要的是，2014年10月英国政府开始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意义重大呢？因为如果其他主要国家发行人民币债券，那么中国当局就可以持有这种债券而不受汇率风险的影响：当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将会贬值。

### 2.3.4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

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为100亿美元，2013年增长至860亿美元，这8年间其年均增长率为 $e^{\ln(860/100)/8} - 1 =$

30.86%，是GDP增长速度的3倍。到2016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6大海外投资者。

2017年第一季度，台湾省连续27个季度净资产外流。2017年一季度，台湾省在海外的投资为26亿美元，而这一阶段外国对台投资仅为9.3亿美元。尽管这些数据仅占2015年台湾岛内投资(将近1170亿美元)的很少一部分，但足以说明台湾省对于外来投资者已不再是一个有前途的投资地。

## 2.4 协同浪潮

### 2.4.1 产品协同以及快速的物流

经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构建是基于个人主义和竞争机制的，但是这样的假设忽略了协同(synergy)的重要性。协同不仅存在于员工之间，同样也存在于产品之间：工程师制造新的无人机原型会需要一整套从轻质材料到电子传感器再到发动机和电信设备的组件，如果他们能在一到两周内而不是两到三个月买到，那么他们的工作进度会快五倍。在中国，你有可能在淘宝或阿里巴巴上订购到高技术设备，而且近年来中国快速的物流更加助力了产品协同效应。来自法国的本书合著者之一(B.M.R.)就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虽然国内的读者的可能会对下面的事情习以为常，但在国外(无论法国还是美国)情况远非如此。

- 为了重复伯那德对流实验(Bénard convection experiment, 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实验)，我们需要晶体直径不超过5微米的铝银粉；这在淘宝上买不到，但在阿里巴巴上可以找到。大部分阿里巴巴卖家都是以吨为单位出售铝银粉，不过偶然间我们发现有一家公司提供500g的包装，但这仍是我们所需量的10倍，只是价格很低，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 为了进行另一项实验，我们需要一组筛网，网孔尺寸从几微米到几毫米不等。这次在淘宝买到了，而且3天就收到了。

### 2.4.2 产品协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产品协同不仅对于工程至关重要，对经济发展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在一项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国家的研究中(Baaquie et al. 2016)，我们比较了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1990-2015年间，中国农业的产出-从业人员比为4，低于其他经济领域，这一发现并不让我们意外，但令我们十分讶异的是，农业和其他经济领域生产率以几乎相同的比例在增长：农业生产率每年增长6.0%，其他经济领域生产率每年增长7.8%。毫无疑问，产

品协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将手机引进中国农村，农民随时可以查看详细的天气预报，这对优化(农业)工作日程相当重要；随着物流的发展，农民可以更快、更容易地买到种子、肥料和农具。换句话说，农业生产率同样得益于新设备的引进，即便后者并非农业设备。这就是产品协同助力经济增长的可能方式之一。

硅谷效应(The Silicon Valley effect)可以被看作是产品协同效应的一个版本。高密度的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的聚集产生了协同效应，虽然中国没有硅谷这样的城市，但目前中国许多大城市正在成为众多新产品的孵化器，如移动科技、无人机、高速列车、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应用<sup>10</sup>等等。

### 2.4.3 中国近年来的技术突破

目前中国至少在4个主要产业中居世界之首。

- 移动科技。《纽约时报》一篇题为《China, not Silicon Valley, is cutting edge in mobile tech(中国，并非硅谷，站在移动科技的前沿)》(Mozur 2016)的文章中写到：“坦白讲，说中国抄袭美国，这一观点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不真实了，而且在移动科技领域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经常抄袭中国”<sup>11</sup>。例如集支付与社交于一身的微信(WeChat)就曾被《纽约时报》以视频形式专门介绍过<sup>12</sup>，国外也有不少公司试图模仿；而且近年来以支付宝和微信为代表的移动支付的普及更是令国外媒体瞩目<sup>13</sup>。诚然在欧美国家信用卡系统更加完善与普及，几乎任何门店都可以使用信用卡来交易，而这也部分地阻碍了其移动支付的发展。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以美国社会为例，其更信奉个人主义，人与人之间相对更加独立，而这样的独立也部分地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相对更少、互相的影响也更小，而且美国的自由传统又使得社会对于个人和社区的选择不做过多干涉，但这也实则导

<sup>10</sup>当前很多人都在讨论人工智能，不过这一概念实则并非新鲜事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就期待神话般的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MITI)”会研发出新的类机器人和电脑；但30年后的今天，不得不说类机器人并没有取得那么大的进展。当然自动翻译还是取得了一些发展，但目前在许多方面仍不尽如人意。而最近Alpha Go大胜人类棋手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人工智能的突破，而完全不基于历史数据训练出的AlphaGo Zero则是完胜Alpha Go更是让人惊叹不已。而且近年来无人驾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目前的人工智能大多仍是专业的特殊智能，在类人的一般智能上的研究似乎还较少。

<sup>11</sup>原文如下：“Quite Frankly, the trope that China copies the U.S. has not been true for years, and in mobile it's the opposite: The U.S. often copies China”

<sup>12</sup>详见《纽约时报》发布的视频“[How China Is Changing Your Internet\(中国如何改变你的因特网\)](#)”。

<sup>13</sup>参见《纽约时报》文章《[How China Is Changing Your Internet\(在中国城市，现金正在迅速被淘汰\)](#)》。

致一些社区(community)相对封闭<sup>14</sup>，即便在美国的大都市也偶尔能看到仍在BP机、随身听的人，而这些在国内早已绝迹良久。更多的人际交互实则也推动了技术推广与普及的步伐。

- 高速列车。此类列车已经在日本、法国或德国出现了多年，但很少有国际合作方面的进展。与之相反，多个亚洲国家已经与中国签署协议合作发展高速列车。
- 无人机。在英文维基百科《Unmanned aerial vehicle(无人驾驶飞行器)》一文中，仅有一行文字提到了中国：“2016年中国展示了大量无人机设计，并且其操控无人机的能力已经超越其他国家”，但这很可能是由于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是在数年前写成，最近刊发在《福布斯》上的一篇文章(Joffe 2017)指出：“占领消费无人机市场的第一次大战已经完结，中国获胜。”截至2014年，大疆以5亿美元的全球销售额遥遥领先其他民用无人机公司—法国派诺特(Parrot)公司当年销售额为1.1亿美元，美国3D机器人(3D Robotics)公司销售额为2100万美元。
- 核电站。目前中国正在建设几个新型核电站。尽管这些核电站都是基于欧洲和美国的设计，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就像高速列车项目的做法一样，中国极有可能购买这些专利并开发自己的设计，而且中国相较于欧美各国高效的建造速度将带来很大优势，许多在国外未必能够成功的案例，在中国或许会有非常不同的结果。

而提及核电站建设，与日本的情况进行对比是具有启发性的。1999年，美国西屋公司(Westinghouse)将其核能业务出售给“英国核燃料有限公司”(British Nuclear Fuels Limited, BNFL)。之后，BNFL于2006年将西屋公司出售给日本东芝公司。当时东芝仅持有67%的股份。2011年9月，东芝从股民手中又购得20%的股份。但是紧接着，一系列技术和会计灾难相继降临。

- 东芝于2016年12月透露，由于其在美国建造的4座AP1000核反应堆成本超支，其对西屋公司的投资可能会产生负价值(收购价格约为50亿美元)<sup>15</sup>。自相矛盾的是，西屋-东芝公司研发AP1000的

<sup>14</sup>例如生活在美国的阿米什人(Amish)就完全拒绝汽车及电力等任何现代设施，而他们的信仰也完全受到保护。

<sup>15</sup>A NYT article of 29 March 2017 made the following fairly vague statement that the projects are “three years late and billions over budget”.

《纽约时报》在2017年3月29日的一篇文章做了相当模糊的陈述，称这些项目“推迟了三年，超支数十亿(美元)”。

设计目标是比其他“3代”反应堆造价要更低。

- 2017年3月29日，东芝-西屋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美国东南部4座未完工的核反应堆前途未卜。西屋公司总债务为98亿美元。为了生存，东芝不得不出售其最有价值的业务组件之一。乔治亚州的两个反应堆从美国联邦政府收到了83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这意味着如果不能由西屋公司偿还贷款，这笔钱将由美国政府支付。
- 有趣的是，目前在中国也有4座AP1000西屋核反应堆在建，其设计与美国的AP1000西屋核反应堆相同，对比中美两国核反应堆的命运将会很有意思。中国的4座AP1000反应堆在建，位于浙江省采用AP1000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的“三门核电站”预计将于2017年底投产，而这将是世界上第一座开始运行的AP1000反应堆。



# Chapter 3

## 国家激活

国家激活(National activation)这一概念与国家崛起(或大国崛起)有一定的区别，国家激活更强调国家处于一种积极向前且前景光明的状态(通常表现为较强的社会凝聚力、以及众多机遇的出现)，这就好比是人处于兴奋状态一般，也可以类比为物理中物体具有较大的动量(momentum)。这种国家激活的状态既可能出现在大国也可能出现于小国。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02年出版的《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Pattern and Repertoire in History)》一书中基于对21世纪东亚及南亚国家的观察与思考而提出的：

东亚及南亚国家具备了国家激活这一过程所需的若干条件：国家资源的强劲增长、人口的高速增长、民主化带来的各阶层民众对公共事务更广泛的参与讨论。但目前这种国家激活的类型与19到20世纪欧洲国家的国家激活并不相同。

东亚及南亚的几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最近15年(2002-2017)内已然很接近于国家激活的状态。下面我们将解释为何目前中国被认为已经进入了国家激活的阶段，而这一状态对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都会有重要影响。

但在进入具体细节之间，我们首先想请读者先将注意力放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上来——那就是内生因素(endogenous factor)与外生因素(exogenous factor)的区别。

### 3.1 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

“天下大势，分久必和，和久必分”。中华的悠悠历史既有一连串领土扩张的凯歌高奏，又有盛世过后的版图缩小、分崩离析和百姓的颠沛流离。然而如果认为盛世之后的丢城失地和混乱局面只是由内部因素造成，也会

有失偏颇、将问题简单化；清朝便是个很好的例证，它的衰落就不只是受内部因素影响。

### 3.1.1 清朝前期的版图扩张

清朝从1644至1912共持续了269年，在最初的70年里，清朝是一个成功的扩张王朝；但到了这个王朝最后的70年却毫无成功可言。但清王朝在最后70年里的内部组织结构及其效率与最初70年相比或许既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然而从军事成就和领土扩张角度来看，这两个70年简直是天差地别。

准噶尔之战(1687-1757, 清代文献称“平定准噶尔/准部”)是准噶尔汗国与清朝及其藩属蒙古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清朝取得最终胜利后一举将外蒙古、西藏以及新疆纳入了大清版图。

### 3.1.2 清朝后期的版图缩小

还是那个百年前平定准噶尔的清朝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中完败于英国，被迫签署《南京条约》：清朝依该条约须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并接受在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厦门建立通商口岸。法国在1843和1844年的条约中也享有了与英国相同的特权。

### 3.1.3 国外势力的急剧变化

对于清朝而言，其自1757至1842年间的主要变化并不是内生性的，而是外部的敌人比过去更强了太多。当年准噶尔人用骆驼扛着微型火炮打仗，这种做法虽然相当聪明但其效率却远远低于西方军队和海军使用的重型火炮和长射程步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又遭受了西方国家的多次入侵，而每一次入侵都让清朝更加衰微。

总而言之，虽然领土的变化似乎是衡量王朝兴盛与否的一个方便标准，但其也不应被视为唯一标准；对于这一点南宋王朝(1127-1279)就是一个例证<sup>1</sup>。

---

<sup>1</sup>尽管南宋在宋金之战(1115-1234)败北之后失去了对中国北方的控制，但南宋王朝依然是最辉煌、最富有创新精神的王朝之一。南宋拥有伟大的发明(诸如火药和指南针)、繁荣的经济、发达的金融业以及广泛的海外贸易和航海探索。在索马里和坦桑尼亚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多数中国钱币都来自宋朝，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年南宋在海上的成功。



图 3.1: 中国：西方列强的蛋糕。在这幅政治漫画中，英、德、俄、法、日正在瓜分中国：德国的威廉二世和维多利亚女王争论不休；象征法国的女孩(Marianne, 也就是所谓的玛丽安)并未参与瓜分，但她的出现具有外交意义(她被画师安排在俄皇尼古拉斯二世身边，提醒我们法俄同盟与德国的对立局势)。

来源：最初刊登在1898年1月16日的法国杂志《Le Petit Journal》上，转载自法国国家图书馆

## 3.2 国家激活

追溯不同国家的近现代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国家都曾出现过社会阶层流动与人口迁徙(social mobilization)和国家激活的阶段。更确切地说，当一个社会结束贵族专制统治，转而进入一种允许多数民众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状态，这一过程将促进社会交流、形成国家激活的状态。历史已经证明，更为频繁且深入的阶层互动通常会带来更高的社会效率、更强的自信心和更多的创新创造；而这些变化带来的新产生的力量总要寻找用武之地，领土扩张便是其出口之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不一而足，表3.1提供了几个典型案例：17世纪的瑞典和英国、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法国、1870年完成国家统一后的德国、后明治时期的日本、1947年重新建国后的以色列以及1917年革命之后的俄国。稍后我们将对这些实例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

国家	时期	信仰	新军队	领土扩张	主要领导人
瑞典	1580 – 1700	新教主义	征兵	波罗的海	古斯塔夫·瓦萨
英国	1640 – 1680	清教主义	职业军人	爱尔兰	奥利弗·克伦威尔
法国	1789 – 1815	公民权利	征兵	欧洲	拿破仑·波拿巴
德国	1860 – 1918	爱国主义	统一军队	欧洲	奥托·冯·俾斯麦
中国	1925 – 1950	土地改革	人民军队	无	毛泽东

注：表中第二列的时间区间只是示意性的，类似的社会阶层流动以及人口迁徙(social mobilizations)很显然不会突然在某年就中断或完全结束。尽管法国在1815年的军事行动(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以失败告终，但革命精神仍在法国长存，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的两次大革命的爆发就是例证(而且后者几乎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尽管瑞典军队在17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实行征兵制，但其实这一制度直到1789年依然是新鲜事物。“统一军队”指的是德国军队不再是由过去分散的来自巴登、布兰登堡、萨克森的兵团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部队所组成；如果用现在的情况做个类比，就相当于从北约(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这种由美国领导、不同国家部队组成的联合部队转变为一支真正统一的欧洲军队。

表 3.1: 不同国家的国家激活对应的时期

通过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是否存在领土扩张的可能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形势。例如1600-1709年瑞典得以成功对外扩张就是因为其邻国都很弱小(例如爱沙尼亚、利沃尼亚、拉脱维亚或波美拉尼亚)。当然即便没有出现领土扩张，通过以下几个特征也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国家激活状态：

- 1 广泛的信仰认同和增长的群众基础
- 2 人口增长
- 3 教育普及
- 4 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可以广泛地交互(interaction)
- 5 经济飞速发展
- 6 (在许多西方案例中)国家军事力量从过去依靠雇佣兵转变为招募本国居民

下面我们将详细研究这几个方面。

### 3.2.1 广泛的信仰认同和增长的群众基础

任何社会运动要想获得长足发展的动力，都必须拥有一定的信仰<sup>2</sup>基

<sup>2</sup>西方也会称此为福音(gospel)，在具体的情况中可以解理为信仰、信念，在许多社会运

础—参与者须深深相信并努力将此信仰传播到邻近地区的人群。这种信仰可能会是某种宗教信仰或教义，也可能是某种政治信仰[例如1789年诞生于法国的公民权利、1917年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或1925-1949年间中国革命所推崇的人民(尤其是农民)权利<sup>3</sup>]。

### 3.2.2 人口增长

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1840年的人口是4.12亿 (Ho 1959)；如果该数字正确，那么从1840-1953(当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的113年里，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 $(694-412)/(412 \times 113) = 0.60\%$ ；在1953-2015的63年里，人口增长率变成了 $(1382-694)/(694 \times 63) = 1.57\%$ 。虽然独生子女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但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仍比过去提高了2.6倍(见图3.2)。

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也有过类似的情形。从1740年到1792年法国人口从2460万增长到2800万<sup>4</sup>，年平均增长率为 $(28-24.6)/(24.6 \times 53) = 0.26\%$ ；从1792年到1846年，人口从2800万增长至3610万，增长率为0.54%。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由于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因为在接下来的50年里，法国人口只从3610万增长至3990万，年增长率仅为0.19%。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后的50年里，除去战争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达到了1789年之前和1846年之后年增长率的两倍左右。

---

动中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关于社会关系的新哲学观，而且在某些特定时期它也确实是以宗教教义的形式出现(例如基督教教义或诸如新教教义、清教教义等基督教的特殊信条)。

20世纪后半叶，新自由主义福音(neoliberal gospel)从美国传播到了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传到了中国。不过与法国、俄国或中国革命的信仰不同，新自由主义福音并未在普通民众中间广泛传播开来，反而是在经济学家、商人、立法者和媒体集团中更受推崇。

福音传播现象对于世界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理解影响这种现象的关键控制因素同样意义重大；目前在复杂网络研究领域已经有不少对于传播动力学(spreading dynamics)的研究(Pastor-Satorras 2015, Li 2016, Li 2013)，但这些研究现在都仍然太过理论，多数仍是理论上的数学模型，距离真正解释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sup>3</sup>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数百次农民起义，但据我们目前所知，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其他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失败了。而且有趣的是，当年国民党既不称起义军为“共产党”也不称“农民”而是称作“共匪/赤匪”。

英文维基百科文章《List of peasant revolts(农民起义列表)》罗列了部分农民起义，并将其中一些起义标记为“成功的起义”。然而仔细阅读相应的描述后就会发现，这些起义本身并未成功，它们只是在内战中支持了合适的竞争者。例如1789年烧毁城堡的法国农民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但这只是因为巴黎起义推翻了贵族统治。而且维基百科的这份列表并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起义。

<sup>4</sup>参见维基百科文章《法国人口(Demographics of Fr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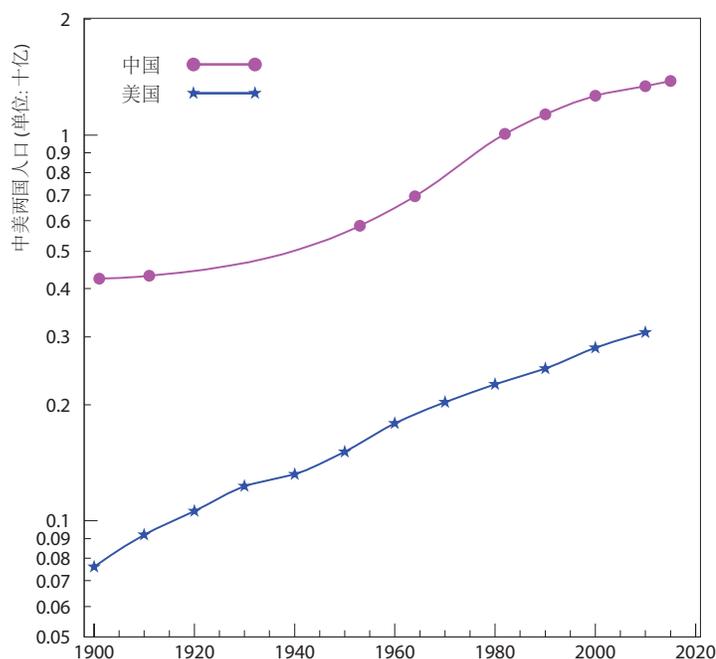


图 3.2: 中国和美国人口的增长。中国人口的增长是内生性的, 而移民对于美国人口增长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以前美国移民主要来自欧洲; 1960年以后则主要来自墨西哥。

资料来源: 英文维基百科文章《Demographics of China(中国人口)》和《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人口历史)》

### 3.2.3 教育的普及

教育的普及使得具有读写能力的人口占比迅速增长, 中国的15岁以上公民的文盲率自1949年之后迅速下降(见图3.3)。

中国的扫盲运动(在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 以及胜利之前的解放区)不仅针对学龄儿童, 还包括成年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老师要求孩子们每天教给他们的父母一个新的汉字; 换言之, 孩子们自己就成了他们家中或者村子里的老师; 这种方法见效相当迅速(参见图3.3)。这实则是一种基于人际强联接关系的网络化的影响传播方式, 这样一来老师的教学就被有力地放大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1960年当政之后将一个非常相近的方法应用于古巴。当时古巴农村的文盲率高达42%, 但很快就降到了5%以下。如果要判断古巴政权是否成功, 教育是比人均GDP更好的标准—因为美国从1960到2015年的持续禁运令对于古巴的经济发展显然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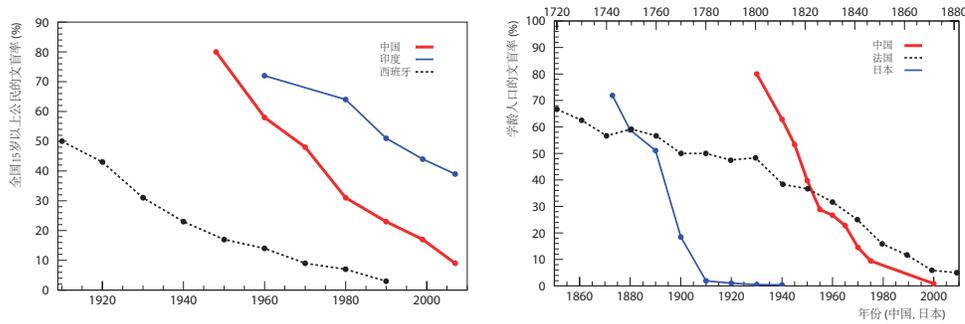


图 3.3: (左) 15 岁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定义中,“读写能力”为认识1500个汉字; (右) 学龄人口的文盲率。上面的水平标尺(1720-1880)是法国曲线所对应的年份。按照该度量标准,如果我们考虑总人口(而不只是学龄人口),文盲率的下降将会更快。

数据来源: 参考文献(Jan 1964, Peterson 1994, Tempest 1997), 以及网站:  
<http://www.asianinfo.org/asianinfo/china/pro-education.htm>,  
<http://www.nationmaster.com/country/ch-china/edu-education>

个严重的阻碍。

### 3.2.4 交互浪潮

#### 消除社会壁垒

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民和地主以及商人之间存在分化,这种现象与法国曾出现过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层分化非常类似。在这两个案例中,消除阶层壁垒<sup>5</sup>都提高了个体之间的互动。我们不妨来看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

英语中只会用“你(you)”来指代对方,但法语却有二种形式:“你(tu)”用于朋友,“您(vous)”用于不太熟悉的人(这一点与中文较为相近)。1789年大革命之后,“您(vous)”这种形式被废除了;因此至少在此后若干年,一位士兵就可以这样跟一位将军打招呼:“你好啊公民将军!”<sup>6</sup>语言的变化显示了消除人与人之间阶层分化的愿望。

消除分化的过程有二种形式(如图3.4所示):第一种形式下节点的空间位置没有变化,举例来说就好比农民拥有了更多的权利,但仍然待在他们的

<sup>5</sup>当然用何种方式来达成这一目标是须要非常审慎的,历史上的许多做法或许都太过粗暴,而且也未必会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sup>6</sup>法文:Comment vas-tu citoyen General? 英文:How are you doing citizen Gener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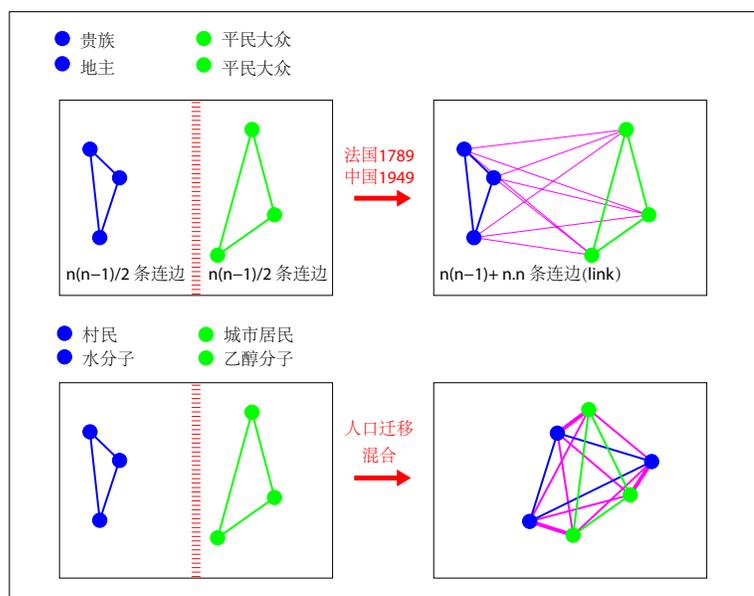


图 3.4: 通过消除壁垒来增加阶层互动。互动的增加有两种方式:  
 (上) 消除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间的壁垒。双方的个体分别用蓝色节点和绿色节点表示, 这一过程一如法国和中国在各自革命之前, 富人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刚性壁垒。  
 (下) 消除阶层壁垒并且同时重新放置蓝色节点和绿色节点的位置以使它们彼此更加靠近。举例来说这就好比是人口流动过程中农民从农村进入到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两类节点间的连接数量更多了, 而且连接强度也更高了。以物理现象做类比的话, 这一过程就像是水和乙醇(酒精)的混合; 在混合物中水分子和乙醇分子重新建立了新的联接, 这一过程还导致大量的热能释放, 继而可将混合物的温度提高4-5度。不过应该特别注意的是, 这样的类比只是非常粗浅的便于大致说明结构变化之用, 真正的社会过程远比物理过程要复杂的多, 许多实际的问题有很多无法用这样简单的物理过程解释的地方。

村庄中；第二种形式下两类节点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这种情况与农村人口迁徙(村民移居到城市)相一致。

衡量城乡差异的一个间接指标是婴儿死亡率(即刚出生至一周岁的婴儿未存活的比例)，它既可以反映医疗保健质量又可以反映生活条件水平。数据显示自建国近十年之后婴儿死亡率下降十分迅速(如图3.5所示)，这也说明政府缩小城乡差距的努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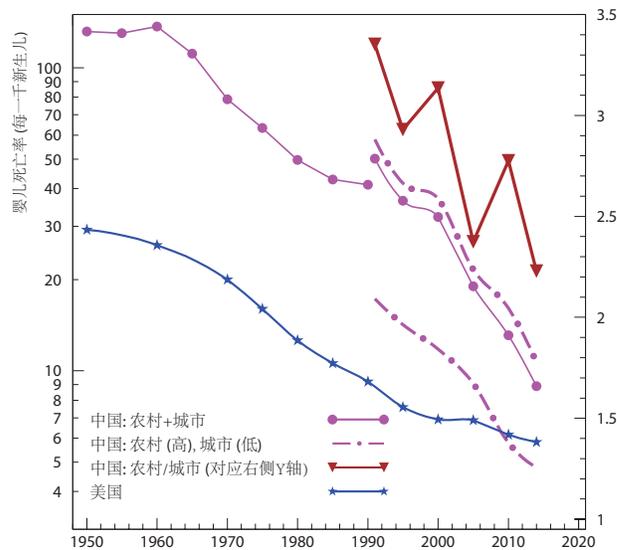


图 3.5: 中国和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图中上下两条点虚线分别是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数据；考虑到中国的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所以总人口曲线(图中的点实线)会非常接近于农村曲线就并不奇怪。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重大差距过去存在现今依然：从1950到1990年间我们没能获得农村与城市各自的单独数据，但1990年以后的曲线清晰地表明农村地区的曲线与全国数据的曲线非常一致，所以对于1990年之前的部分我们可以用全国数据近似代表当时的农村数据。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50到1965年间农村婴儿死亡率几乎没有下降。

数据来源：中国1950-1990：Knoema网站(一个专业的数据库搜索引擎)；中国1990-2014：《中国统计年鉴》；美国1950-2014：《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65,4,30 June 2016(国家人口统计报告)》

### 农村人口迁徙(城镇化)

在改革开放前后，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可以说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一种途径，这场移民潮也创造出了许多大城市[1000万人口在目前的中国只能算是中等城市，但在美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截止目前(2017年)都不超过10个]。同时伴随着包括汽车工业在内的各类工业飞速发展，如此高的人口密度也导致了許多污染问题。未来十年能否解决这一问题，让我们拭目以待。

### 3.2.5 经济飞速发展

中国的实际GDP(real GDP)<sup>7</sup>在1950-2016的67年间增长了100倍(见图3.6)，年平均增长率 $r = e^{\ln(100/67)} - 1 = 7.3\%$ 。图3.6还显示了改革开放前后实际GDP增长的显著连续性。

如果图3.6使用基于官方汇率所得的美元为单位，那么苏联在1952-1990年间的GDP就不是增长了4倍而是 $4 \times 6.6 = 26$ 倍<sup>8</sup>；但这显然不是真实情况，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支持这一结论的美元对卢布汇率曲线。最近的一项研究(Trefilov 2015)显示1988年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换0.58卢布，而黑市汇率为1美元兑换33卢布(是官方汇率的57倍)。所以如果以卢布为单位，那么苏联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就只有3.4%(如图3.6所示)。

### 3.2.6 有效的武装力量

对于任何一场革命或重大的社会运动，武装力量往往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革命者(反叛者)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使之足够强大、并足够相信革命的正义性，革命往往都会以失败告终。历史上有很多或成功或失败的例子：

- 太平天国运动从1850年一直持续到了1864年。这场兴起于中国南方的运动试图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将中国人民转变成太平天国版的基督徒、在全中国实现全面转型和变革。最终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清

<sup>7</sup>根据历史通货膨胀率校正计算后所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被称作实际GDP(real GDP)，其简易的计算方法为： $real\ GDP_x = \frac{GDP_x}{CPI_x/CPI_0}$ ，其中 $CPI_x$ (Consumer Price Index)是 $x$ 年时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_0$ 则是作为比较基准的年份的消费价格指数；例如图3.6中的基准 $CPI_0$ 值就是 $CPI_{1952}$ (也就是1952年时CPI的数值)。

<sup>8</sup>官方数据显示1950-1990年间苏联卢布的官方汇率增长了6.6倍(1950年1美元可兑换4卢布，而1988年1美元只能兑换0.58卢布)。但由于卢布并非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所以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任何汇率，都是人为制造进而没有意义的汇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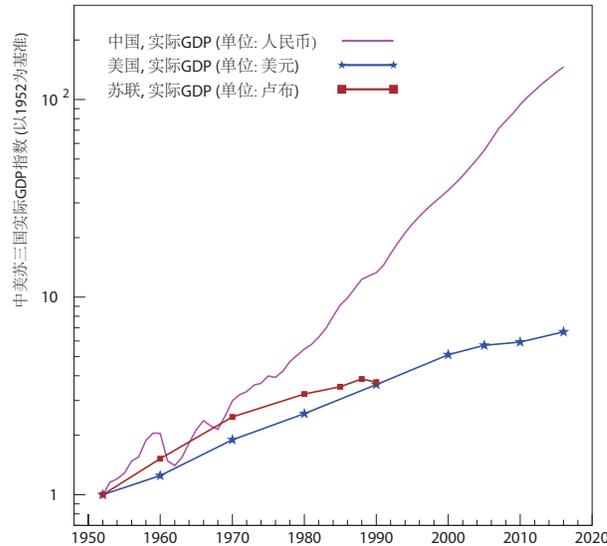


图 3.6: 中国、美国和苏联的实际GDP(real GDP)。为方便比较实际GDP的增长率, 三条曲线均以1952年为起点, 也就是将1952年实际GDP总值当作起始值(设其为1), 用后面年份的实际GDP数据除以1952年的数据就可以得到各年的增长率指数。苏联的GDP自1991年之后急剧下降, 尽管他们有美国顾问的建议作为参考支持(有种理论认为或许正是因为听从了那些建议才使苏联落得如此境地)。

资料来源: 中国: 互联网网站“中国力Chinability”; 美国: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USSR: 参考文献(Firth et al. 1998))

政府镇压了这场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整个运动中的死亡人数估计达到了3000万(占当时中国人口的10%)。

- 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俄国红军1917年革命之后派出大批远征军到俄国支援白军<sup>9</sup>, 即使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也派出了2300人的军队到俄国; 其他国家的派出规模更大: 日本派出了7万人, 捷克斯洛伐克派出5万

<sup>9</sup>白军是指1918年至1920年年间在俄国内战中对抗苏俄工农红军的军队, 主要由支持沙皇的保皇党和自由主义者等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组成。他们是支持过去政府的, 因此俄国红军在最初是处于反叛军的对位。

人，希腊派出2.3万人，美国派出1.3万人<sup>10</sup>。盟军共计约有14万人参战(详见英文维基百科文章《Allied intervention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盟军介入俄国内战)》)。所以如果不是俄国红军的有效动员与组织，俄国革命就会像太平天国运动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被粉碎。

-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美国派出约10万人的军队到中国来押送日军士兵回日本。但实际上许多日本部队在投降之后转而帮助国民党来反对共产党，他们直到数月之后才被送回日本。美军在1945年以后仍然延续着二战期间的做法—继续训练、武装并支持国民党军队<sup>11</sup>。对于很多人来说，1947年以后国民党军队的迅速溃败来得有点突然，然而如果考虑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中各自士兵的处境，这个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两方当时的对比确实相当鲜明：国民党军队普遍是被武力强征来的，而拨给军队的经费又常常被腐败官员所挪用；与此相反，红军军官与士兵同吃同住。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战斗打响前或战斗期间，国民党士兵纷纷倒戈。

下面方框中的内容是1949年1月31日在解放军占领天津后美军人员提供的证词(testimony)，根据其内容也可以部分地证明人民解放军在1940年已然是一支新型军队这一说法：

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行为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除了热水或茶水外拒绝任何礼物；他们经常主动把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分给自己驻家的户主，尤其是孩子们。他们在市区巡逻，保护公民财产。在商业街上，他们为那些窗户被打碎的商店设置了警卫。虽然大部分“前线”部队已经被不那么“精英”的部队替换了下来，但眼前这些军人的行为同样令人钦佩。城市解放大约一周后就可以向解放区其他城市发送信件了，但还不能向国民党占领区的城市寄信。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韩国内部事务记录，微型胶卷，第8卷，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读者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关于天津解放的记录会出现在关于韩国(Korea)的资料里，这是因为天津“经济合作管理局”(ECA，成立于1948年的美国机构，旨在管理马歇尔计划)的三位成员在1949年3月22日抵达首尔；这一日期表明当他们发布这份记录的时候，这三人已经不在中国了，也就是说完全可以排除他们说这些好话是为了获得人民解

<sup>10</sup>美国派出的军队由两部分组成：“美国北俄远征军”(American North Russia Expeditionary Force，共5000人)被派到俄国西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Arkhangelsk)；“美国远征军西伯利亚”(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 Siberia，共8000人)则是从菲律宾运到海参崴。

<sup>11</sup>更多细节详见参考文献(Roehner 2016c)。

放军领导人的帮助。当读者意识到向整个欧洲传播公民权利的法国革命军的行为与其信条其实并不总是一致时，这份证词便尤其引人注目。

### 3.3 国家激活案例的比较

本节将讨论其他国家激活过程中的某些方面，我们并不试图去进行系统性的对比，主要目标是突出相似性。

#### 3.3.1 广泛的信仰认同和增长的群众基础

人权宣言 (1789年8月)



相同样式的帽子也出现在二世纪的希腊雕像的头上。它之所以被称为自由帽是因为类似于过去被释放的奴隶所带的帽子。



图 3.7: 《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在这幅由法国画家(Jean-Jacques-Francois Le Barbier)绘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样非常有趣的东西: (1)顶部的辐射三角形里面有一只驱散乌云的眼睛, 它象征理智的统治。这一共济会符号还出现在1美元面额的钞票上“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格言旁。(2)左手边的女士象征着挣脱锁链的法国人民。(3)中间的红帽子(“自由帽”)是一个象征自由的古老符号。(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文章《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

为了说明法国大革命所传播的信仰，我们摘录了1789年8月全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的一些条款：

-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一条)
-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第三条)
- 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第六条)

这些声明标志着自那时之后普遍局势上的急剧转变：

- 过去，贵族的儿子可以继承他的社会地位。通过这个地位他可以获得一些职务，尤其是在陆军或海军，而普通民众却没有这个资格。
- 过去，所有主权的本原都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手握王权的人。

当时欧洲唯一的共和国是瑞士，因此法国在采纳这一宣言并试图将这一理念传播到邻国后，遭到了欧洲所有君主制王国的敌视和抵制。

### 3.3.2 自由帽的反复出现

图3.7中自由帽的反复出现说明历史事件中的元素往往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并且往往要比人类的寿命长很多)；自从古代的自由奴隶佩戴之后，自由帽就在法国历史的若干个时期中曾多次出现：

- 巴黎民众的一支武装力量在1358年2月23日攻入了西岱宫(Palais de la Cité)—14世纪之前法国国王一直居住在那里。民众领袖马塞尔(Etienne Marcel)要求查理五世佩戴一顶红蓝两色的自由帽(详见法语版维基百科文章《查理五世》)。
- 在1675年的反税收起义中自由帽再次出现，当时被称作“起义的红帽子”。
- 1792年1月，1358年的场景再次上演，巴黎民众攻入国王的宫殿，要求路易十六戴上自由帽。
- 从图3.7的底部可以看到，在2017年4月总统大选中，自由帽被用来表示对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ançon)的政治支持。

## 3.4 小结

与其再次罗列总结前面几节的内容，我们想以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来为本章作结。最近科幻作家刘慈欣凭借《三体》三部曲在国内声名鹊起，在2015年获得雨果奖之后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三体》最早以连载形式发表于2006年，并于2014年翻译为英文在国外出版，2017年还被翻译为了法文。我们将透过《三体》来讨论一下中国文学是否处于(类似于国家激活的)激活状态。

### 3.4.1 中国文学是否处于激活状态？

刘慈欣并不是第一个获得西方文学大奖的华人，高行健在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生于中国、学于中国，他于1986年在他46岁时来到了法国并于1998年成为了法国公民。虽然他的部分作品是用法文写成，但大部分都是中文写就。莫言在2012年成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中国公民。由于科幻作品在中国非常流行，刘慈欣相较于高行健和莫言可能在年轻人当中拥有更多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慈欣的成功可能能让我们窥见到中国在文化和艺术领域的激活过程的开端。

但是科幻市场仍然大部分被美国作家所控制，事实上刘慈欣在2015年与其他5位美国作家共同获奖，在过去所有雨果奖得主中有超过90%的作家都来自美国<sup>12</sup>。换言之，中国科幻文学想要达到与美国相齐平的程度可能要比在GDP方面取得平等须要更长的时间。

### 3.4.2 历史学家倾向于研究单体问题

《三体》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了三体问题，这类问题是指三个质量、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都是任意的可视为质点的天体(例如太阳、地球、月球)，在相互之间万有引力的作用下的运动规律问题。三体问题不能精确求解，而两体问题则可以通过牛顿力学轻松解决。虽然对于天文学来说研究单体问题没有什么意义，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在研究某一个国家时却容易将其当作单体问题来对待、而忽略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众多相互作用；然而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不只取决于其国内政策，也受到其他国家的强烈影响。

如果只从单体问题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科幻文学，那么似乎未来发展将异常顺利；但美国科幻作家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中国科幻市场的巨

---

<sup>12</sup>雨果奖的设立就是为了致敬美国科幻作家雨果·卡恩兹巴克(Hugo Gernsback, 1884-1967)。

大份额。除去代表他们利益的世界科幻小说学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和世界科幻年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 雨果奖就是在这个年会上颁发), 他们还在极力将自己的译作推销给中国大众。近年来中国的科幻世界出版社就是美国科幻小说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口; 自从其1979年成立以来, 共有157部外国小说(几乎都是美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为中文。有研究表明到2000年初时, 美国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的作品仍是中国科幻市场上的主流。未来十年科幻小说领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将会非常让人期待。

刘慈欣在不久之前还是山西一家水电站的软件工程师, 他在43岁时开始在《科幻世界》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发表自己的小说, 换言之他当初作为作家完全是一个业余爱好。我们也希望本书能够激起大家对于比较历史学的兴趣, 并且将发展比较历史学或者用比较历史学视角研究问题当作一种自己的业余爱好, 这样既能让我们对于各类事件有更客观的认识, 也能将比较历史的方法更加逐步完善。

## Chapter 4

# 丝绸之路倡议与遏制政策

本章涉及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话题：丝绸之路倡议与遏制政策。丝绸之路倡议是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旨在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与西亚、中亚和欧洲沿线各国经济发展交流与人文交流的项目。而遏制政策则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实行的基于多(盟友)国之间军事合作的对外政策，其肇始于美国驻苏联的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的“长电报”，他认为美苏一定会成为对手，虽然美国实力要强过苏联，但要击败苏联就得采取遏制政策，他建议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及意识形态各层面遏止苏联的对外扩张。该计划受到了美国当局高层的认同，促成了“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与“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这样两个看似不同的项目为何要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呢？我们从对比中能得出哪些科学规律与结论？这正是本章所力图回答的问题。

### 4.1 比较视角下的丝绸之路倡议

丝绸之路倡议目前来说无论从其规模抑或目标上都是相对独特的，不过几十年前国际上曾有过另外一个规模较之略小的经济发展项目—马歇尔计划(1948-1952)。为了解释马歇尔计划和丝绸之路的主要区别，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马歇尔计划。<sup>1</sup>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马歇尔计划基本就是一个资助美国公司的计划。读者或许会对这一说法感到惊讶，因为这看起来并不像它的官方名字—“欧洲复苏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但如果知晓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

---

<sup>1</sup>更多细节参见英文维基百科文章《Marshall Plan(马歇尔计划)》，如果有耐心读完整篇文章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摘要，读者就能发现很多始料未及的细节；我们在下文中也会提到其中一些内容。

援助必须被用来购买美国货物这一事实，上面这一论段就很容易理解了。而且认为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资金可以被相应的国家自由支配也是错误的想法，资金事实上由当地政府和“经济合作委员会(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ECA)”共同管理。每个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欧洲国家<sup>2</sup>的首都都有ECA大使，而大使通常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商人，他会资金的使用提出建议。ECA是一个纯粹由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领导的美国政府机构，其会长是汽车公司“斯图贝克(Studebaker)”的前总裁，大部分成员也都是美国商人。

对于当时经济援助的普遍说法是，美国捐出了170亿美元(占美国1948年GDP的1.6%)来帮助欧洲国家复苏经济，然而这一点并非完全正确。

- 没有参战和未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如爱尔兰瑞典和瑞士)自然不在援助之列，但是有一些参战国却也并未被列入：芬兰就是一个例子，当年它是属于德国阵营的参战国。从这一点上来说，马歇尔计划的目标并不只是单纯的复苏欧洲经济。
- 另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所有资金都是无偿捐赠。事实上，其资助由捐赠和贷款这两种形式构成，而且捐赠的比例对于不同国家是区别对待的：例如对于德国而言是100%的贷款，尽管在1953年需要偿还的数额下降了；对于爱尔兰是88%的贷款，结果就是到1969年马歇尔计划的欠债仍占据爱尔兰外债总额的62%；而对于英国来说贷款部分只占15%，其余为无偿捐赠。
- 与马歇尔计划一起进行的还有一个“技术援助计划(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这个计划资助24000名欧洲工程师、领袖和工业界人士参观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工厂和大学)。这个计划也将成百上千的美国技术顾问派往欧洲，为欧洲管理人员讲授最新的统计学方法。无论看起来这种交换多么有用，依然不能掩盖其不对等性，而最终结果则是试图使欧洲美国化<sup>3</sup>。
- 对于德国而言，当时的情况更为矛盾一些。虽然所有的复苏援助都已经被收到，但是意在将德国去工业化的“摩索根计划(Morgenthau plan)”却也在持续同步进行——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到了1949年位于汉堡的Blohm & Voss造船厂仍被拆除，所有不能被拆除的都被爆破摧毁。截止1950年，西德共有700多座生产工厂被移除或摧毁。

<sup>2</sup>马歇尔计划主要局限于西欧，因为迫于苏联的压力东欧国家并未参与，因而这一计划实行期间，东欧与西欧在经济上的互动着实有限。

<sup>3</sup>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认为马歇尔计划旨在对抗苏联并“美国化”西欧，但是由于美国对于欧洲媒体的影响，这一观点当时并未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

### 4.1.1 马歇尔计划与丝绸之路的比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歇尔计划比丝绸之路更有野心，而在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却有远不及丝绸之路之处。

马歇尔计划更有野心之处是在于其目标既有经济层面又有政治层面，意在保持美国在欧洲长久的影响力。从这一点上讲马歇尔计划是非常成功的，即使在67年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16个国家仍然是美国忠实的同盟，他们中大多还是北约的成员，而北约是一个由美国政府主导的军事机构，欧盟的成立也丝毫没有改变这种局面。

但从经济角度来说，丝绸之路比马歇尔计划更为宏大，因为它聚焦于整体共同发展而且涉及的国家范围也更为广泛，例如想要修建中欧铁路必须在沿途所有国家达成一致后方才可能；与之相对的是，马歇尔计划只局限于西欧个别国家的发展。

### 4.1.2 与丝绸之路相似的三个案例

除了马歇尔计划，还有三个与丝绸之路倡议相似的例子值得注意。

-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新政下的美国进行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项目被罗斯福的继任者所延续，一直持续到大约1960年代。
-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一直在非洲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点我们也将在本章的最后部分做简要分析。
- 在欧洲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

与丝绸之路相比，这些项目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就是这些项目都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之处则是丝绸之路试图在数个独立国家间建设起整合的基础设施网络。就我们所知，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如此规模的项目；罗马帝国曾在地中海地区进行过类似的建设，只是规模没有那么大，而且在罗马帝国的计划中，地中海周围的国家都是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这就使得基础设施建设比在不同国家之间更加简单。

### 4.1.3 欧洲错过的基础设施建设机会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欧盟接纳东欧和南欧成员时所推行的政策之一，那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然而当时的计划主要是资助政府，而不是促进欧洲国家之间的整合；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这更像是马歇尔计划。建立国家间的整合铁路网络本可以是一项伟大的计划，但由于欧洲经济政策中的新自由主义导向，这类计划并未被决策者们所考虑。欧盟委员会

更青睐于铁路私有化而不是建造整合的铁路网络，即使在英国铁路私有化并不成功之后依然持续；而其结果就是这样的政策并未促进欧洲之间的整合，反而是促进了互相之间的分离。应当注意的是，19世纪整个欧洲所有的铁路公司都是私有的，但这些铁路公司之后相继破产并国有化；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有出现。

#### 4.1.4 丝绸之路面临的重大挑战：跨越语言障碍

语言在任何跨国项目当中都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没有准确、顺畅的沟通，那么这种合作就不会太好。在非洲，这种情况相对简单一些，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已经成为主要语言。但对于丝绸之路来说，需要更多种语言。不过幸运的是，俄语在很多前苏联国家都有使用。

## 4.2 遏制政策

丝绸之路是涉及多国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方面的项目，而遏制政策(又称围堵政策)则是涉及多个国家军事方面的项目。二者虽然性质不同，但却也有值得对比之处，这一点会是最后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本章初始提到过围堵政策是美国1947年实行的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外交政策，它的提出事实上宣布了反法西斯联盟在战后的最终破裂，其当时的目的是阻止共产主义思想和斯大林主义的蔓延，也因此开启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密云。而要想实现围堵政策，美国就势必须要众多忠实的盟友国，同时他们的目标还得能够与美国保持一致、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网络互相协同<sup>4</sup>。

理想状况下军事合作应该是在双方相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当某方力量远强于另一方时，这样的合作通常会无法平等。北约是欧洲及北美洲国家为实现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在一般的观念里这一组织由美国主导。为了验证这一点是否正确，我们可以尝试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观察各成员国之间是否足够平等，如果各方力量相差悬殊，那么强的一方通常会主导；第二种方法则是具体分析公约组织所基于的公约条款。

通过对于军事力量的对比，美国远强于其它北约国家，美国的军费开支(2015年是6000亿美元)是北约其它所有成员国军费开支之和的3倍还多，在全球范围看来，其他主要国家(俄罗斯、印度、法国、英国、沙特)的军费开支总和为5660亿美元。而且美国的武器产量也远超其他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占据实际的主导地位应是毋庸置疑的。

<sup>4</sup>许多参与围堵政策的国家(包括日本、德国、英国和意大利)都要接受在其边境部署美军军事基地，美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海外拥有如此之多军事基地的国家。

具体分析北约组织的架构，其有三个核心职位：欧洲盟军最高统帅(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Europe, SACUER)<sup>5</sup>、欧洲盟军最高副统帅、北约总书记。后两个职位通常都由非美国人员担任，在媒体中总书记的曝光率也更高，而且最高统帅则极少被提及，而这一点让外界对于北约的印象更倾向于平等的多国组织，然而事实上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是最终听从最高统帅的命令，而副统帅以及总书记在这方面的作用则非常少。

多数欧盟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只有少数国家(诸如瑞典)不是成员国]，而里斯本条约(它实际充当着欧盟宪法的作用)中关于北约的条目(第2章第2节第42条第2号的第二段)如下：“欧盟的政策将不会侵害特定成员国的安全和防卫政策的具体特征，各国的共同防御将在北约的构架内实现并与框架内已有的共同安全和防卫政策相匹配。”<sup>6</sup>这一条款表明欧盟的安全与防卫政策须要与北约的目标想一致，然而北约并不由欧盟的国家所主导。

### 4.2.1 通过军事行动来获得影响力并培植盟友

二战之后的军事占领为美国在被占领国取得影响力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参见图4.1)，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ECA)大使和军事援助顾问团(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s, MAAG)的官员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大使不能公开干预被占领国的国内事务，但ECA和MAAG官员们的主要职责便是协助和建议：ECA官员们还实际影响和控制着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如何使用；类似的，MAAG官员则影响着美国军事援助如何被使用。ECA在马歇尔计划结束之后就随之解散，但MAAG或类似的组织却一直存在到现在<sup>7</sup>，并仍然能够通过北约框架继续产生影响。从美国国家档案馆至今尚未公开MAAG在1950年代活动的资料这一点上，便可大致看到其在当时(甚至目前)的作用一定不小。

我们可以发现美军战后的军事占领(比如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和韩国)都比较成功，而且这些国家现在仍然是美国亲密的同盟，他们甚至到现在都接受在本国领土上设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

除去二战结束之后对日本、意大利、德国等国的军事占领之外，美军近几十年来还在多国有军队进驻，其中有一些是通过联合国授权、经联

---

<sup>5</sup>这一职位一直由美国总统指定的四星上将所占据，第一位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而现任的是柯蒂斯将军(Curtis M. Scaparrotti)。

<sup>6</sup>原文如下：The policy of the Union shall not prejudice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the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of certain Member States which see their common defence realised i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NATO) and be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stablished within that framework.

<sup>7</sup>其后继组织通常被称作美国军事团(United States Military Groups, USMILGP/MILGR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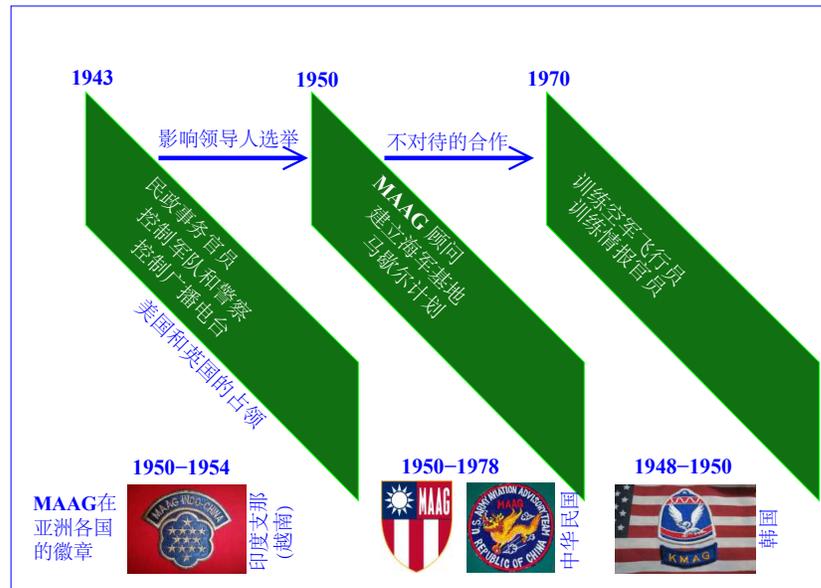


图 4.1: 二战后对意大利的占领及后续影响。二战后的意大利是欧洲国家中第一个被占领的战败国, 虽然本图内容主要以意大利为例, 但许多其他的例子也非常相近(例如德国、丹麦、日本、韩国、阿富汗、伊拉克)。二战之后的军事占领使得同盟国在意大利领导人选举中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无须多言当时精通英语就成了选举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MAAG是军事援助顾问团(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的缩写, 但其作用并非完全局限于军事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承接了占领初期民政事务官员们的作用。注: 印度支那是越南在1954年之前(那时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的名字, KMAAG是韩国军事顾问团的缩写。

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行动, 另外一些则是不符合国际法且未经联合国授权的行动: 菲律宾(前殖民地, 1948-1992, 2014年至今<sup>8</sup>)、越南(应南越政府之邀, 1955-1975)、黎巴嫩(联合国授权, 1982/08-1984/03)、格拉纳达岛和加勒比海地区(未经联合国授权, 1983/10-1985/10)、巴拿马(未经联合国授权, 1989/12-1994/09)、沙特阿拉伯(沙特允许, 1990/08-2003/08)、索马里(联合国授权, “重建希望行动”, 1993-1994)、科索沃(联合国授

<sup>8</sup>美国军事基地在1992年关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分别是多起驻军和当地民众的摩擦和美军不愿意保证军事基地内无核武器。但近年来两国关系再度转好, 2014年两国签订了为期10年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 美军于当年开始在5个菲军事基地建设军事设施。这一协议比美方原先所要求的要短, 不过此协议可视两国的具体需求延长(参见<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428/c1011-2494861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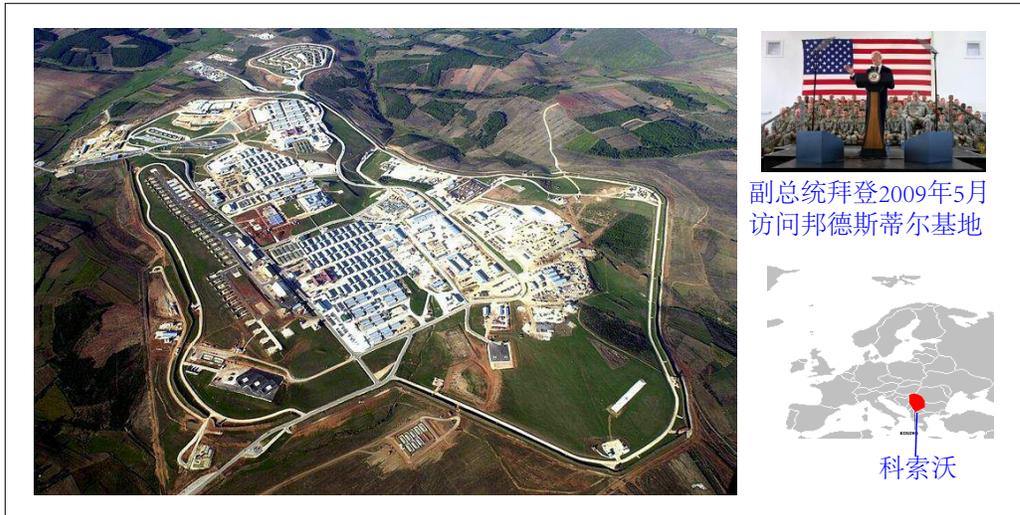


图 4.2: 美国在科索沃的邦德斯蒂尔基地。该基地在北约军队1999年6月进驻科索沃之后立即动工修建, 或许这一基地的建造早已是计划好的, 不然光营地设计阶段可能就会须要一年甚至更久。(参见英文维基百科文章《Camp Bondsteel(邦德斯蒂尔营地)》)

权, 1999/06至今)、阿富汗(联合国授权, 2001年至今)、伊拉克(未经联合国授权, 2003/03-2011/11, 2014年至今)。

上面提到的不少军事行动(比如索马里、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是以美军为领导、多国协同合作的形式进行的, 例如“科索沃力量(Kosovo force, KFOR)”行动中的部队由来自北约及非北约共39个国家近5万名军人组成; 然而美国是唯一利用此次军事行动建立了军事基地的国家。基地名叫邦德斯蒂尔(Bondsteel)营地, 占地4千平方公里, 可容纳7000人(参见图4.2)。尽管设立此基地的官方说法是将其作为科索沃行动的总部, 但实际上邦德斯蒂尔营地是由美国建立且由美军完全控制的。

不过总体上来说, 这些军事行动或进驻远比二战后的军事占领不成功, 例如越南、索马里和阿富汗; 而且有一些国家也并不接受在其本土保留永久美军基地, 例如冰岛、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

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军事驻扎的成功程度? 我们猜想互动的强度<sup>9</sup>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举例来说, 二战后对于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不仅仅是军事占领, 还有成千上万的民政事务官员随着军队进入了相应的国家。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

<sup>9</sup>strength of interaction, 这一概念最早在本书第3章中被提到过。

根据语言技能和知识储备选拔出来的军官，然后他们在美国会接受数月的训练，以便他们能够治理军事占领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警察、农业、交通、医疗、教育、文化等等。

事实上在1945年就有很多德国籍、意大利籍和日本籍的美国人，这使得解决语言问题很容易。随军队进驻之后，民政事务官员就会开始和当地人一起工作来履行职责；能够与当地民众一起工作是一个必备技能，因为没有副手他们就无法完成任务。当占领行动结束，从副手中选出一个接手该部门也就自然而然了；简而言之，这一过程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国家建设”，当然这些新的领袖极可能是亲美的本国人。

我们在后文中会将上述的解释称作“合作假说”，其成功程度会依赖于以下三个条件：(1)必须有能够说当地语言胜任相应工作的民政事务官员；(2)占领时间必须足够长(比如若干年)以便合作能够得到发展；(3)若被占领国正在发生内战，美国必须站在胜利方。

那么我们提出的假说符合现实观察吗？我们不妨来以冰岛和韩国这两个案例来进行分析。

### 案例一：冰岛

冰岛的案例相对简单，冰岛在二战时期先被英军控制，但在美国正式参战之后，英国将其让与美国管理，而当时占领冰岛的目的是阻止德军的占领。在这个案例中，没有民政事务官员进驻，因此驻军与当地民众几乎没有合作，只与少数能说英语的冰岛人有交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次大规模进驻，当时驻军人数达到冰岛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而这被当地人视为侵略，岛上民众与驻军有过多摩擦，双方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944年冰岛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到了二战末期，美国方面要求在冰岛留下永久的军事基地，结果冰岛人民集体投票反对；最终美国方面对冰岛政府施压，并利用当地民众对被苏联占领的恐惧，才得以成功保留其军事基地。

这一凯夫拉维克(Keflavik)海军空军基地<sup>10</sup>保留了50年，因为除了美国的经济补偿外，该基地还雇佣了超过一千名冰岛人作为员工<sup>11</sup>。此外，由于军事基地远离冰岛首都雷克雅末克，所以驻军和当地民众几乎没有积极的

<sup>10</sup>目前冰岛共和国最主要的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过去就属于这一军事基地。

<sup>11</sup>从所在国的角度来看，修建外国军事基地在短期内会雇佣当地劳动力、之后还可能会让当地人成为平民员工；但其往往也会导致一定的其他问题，例如军事基地很可能被酒吧和提供色情、甚至赌博服务的宾馆所包围，这主要是有很多年轻男性的结果。许多曾经被占领过的国家都存在这类现象，甚至到现在仍然有过去的印迹存留。当然并非只有驻军会导致上述问题，即便像新加坡这样素以管理严苛著称的国家，随着近年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尤其是劳工的进入，色情行业也日渐抬头，近年来红灯区在新加坡得到了合法化，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

互动。当美国在2008年试图协商降低租赁费时，双方未达成任何共识，基地随后关闭。

### 案例二：韩国

在对韩国的占领中，美国民政事务官员并不懂韩语，因为当时韩裔美国人并不很多，因此他们的副手就从懂英语的韩国人中挑选。这其中主要有两类人：(1)那些流亡海外的韩国人，比如李承晚；(2)与美国传教士有联系的韩国人。但这两类人员未必能够真正代表韩国人的利益和情感，因此尽管这之间有合作的过程，在1948年韩国成为主权国家之后，当选的韩国领导人似乎并不完全被人民所信任。在选举当天(1950年5月30日)，韩国警方逮捕了112人。尽管如此，韩国人民依然表达了他们对于权威的不满，这点可以从6月1日《纽约时报》的评论中看出：“独立党赢得了韩国的竞选。这次投票可以被看作是对现在政府的一次胜利和对该政体下警察手段的一次责难。”<sup>12</sup>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四周后发生的朝鲜战争拯救了李承晚政府，其独裁统治直到1960年才被推翻。但在尹普善短暂执政一年多之后，又被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权，政变之初美国并不支持，认为尹政府才是合法的民选政府；但最后朴正熙政府还是获得了美国国务院的长期支持。然而作为在军事占领下国家的一大特征，韩国军队倒是和美军有密切联系(Roehner 2016a, 2016b)。

### 小结

美军在二战及之后的军事占领确实为其带来了许多亲密忠诚的同盟(例如北约各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但像冰岛和韩国的情况则更复杂一些，军事进驻往往未必能带来与民众良好的合作关系与互动，通过对比也可发现当此类行动中没有民政事务官员参与时，它们就更可能失败，而且可能还会带来一些后遗症，比如与当地民众的冲突或者色情产业的发展等等。近些年美军与一些亚洲国家也有军事合作或驻军，例如与蒙古国(联合军事演习)、乌兹别克斯坦(2001年Karshi-Khanabad空军基地由美国租赁并使用)、塔吉克斯坦(2001年Manas空军基地由美军租用)，但这样的合作并不总是成功的，Karshi-Khanabad空军基地在2005年11月被清空，Manas空军基地在2014年6月被清空。

---

<sup>12</sup>原文如下：“Independents won the Korean elections. The vote is regarded as a defeat for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and a rebuke to the regime’s police methods”。

### 4.2.2 构建遏制网络

围堵政策的第二个重要步骤便是让盟友国构成网络协同合作，通常会有一个共同的被认为存在潜在威胁的国家让各国认为有合作的必要、而且须要采取一定措施(例如部署反导系统)。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的导弹危机正好发生在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洲际核导弹之后<sup>1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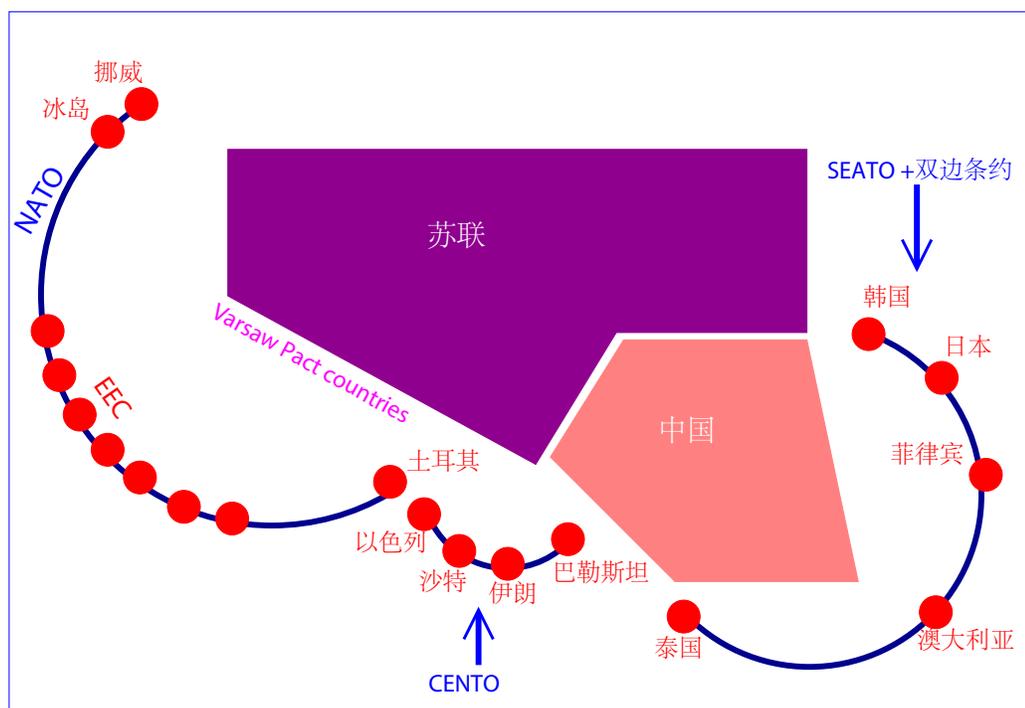


图 4.3: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冷战时期的围堵网络示意图。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是北西洋公约组织，CENTO(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是中央条约组织(1955-1979)，SEATO(South 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是东南亚公约组织(1955-1977)，EEC(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初为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

来源: 《纽约时报》1963年1月14日

<sup>13</sup>冷战中把世界带到核战边缘的真实故事可以在参考文献(Schwarz 2013)中找到。

### 反导系统的布置

鉴于苏联于1977年初在本国和东欧部署了大量SS-20导弹，北约在1979年决定在西欧部署新型核导弹：108枚潘兴II型导弹和464枚克鲁斯导弹。所有的108枚潘兴二型导弹都将被部署在德国西部以取代老旧的潘兴Ia型导弹；所有克鲁斯导弹中，160枚将被部署在英国、96枚在西德、112枚在意大利、48枚在荷兰、48枚在比利时。潘兴导弹更为精准(其误差在30m左右)，而且由于其部署在西欧其可以瞄准苏联洲际导弹发射基地，而SS-20虽然射程较潘兴更远(但部署在东欧也仍无法威胁到美国本土)不过精度更低(其误差在150-450m左右)。对于北约在西欧部署潘兴导弹，其对于苏联相对等情况将会是苏联在加拿大和墨西哥部署SS-20型导弹，如果后面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可以想见美国将会感受到何种程度的威胁。尽管在1981到1984年间西德有巨大的抗议，潘兴导弹仍于1986年被正式部署。抗议者声称潘兴导弹是对德国议会的挑衅，因为有条款说西德不能准备攻击性的战争，但德国议会法庭驳回了该提议。

当我们知晓过去的众多案例之后，就会发现如今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也只是多起类似案例中的一例，其大体情境都是相同的：出于各种理由，一个国家有时会被认为存在潜在的威胁，美国首先会向那些可能会受到潜在威胁的国家兜售反导系统来作为保护(在萨德的案例中，对于韩国来说存在潜在威胁的国家是朝鲜；而在冷战期间对于西欧各国来说则是前苏联)。一旦反导系统被部署，操作反导系统的相关人员就需要由美国的顾问提供训练，反导系统本身也要由美军人员进行保养和升级；而这也给了美国在他国防卫政策上一定的话语权。

## 4.3 两种不同的模式可能会产生怎样的相互作用？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既然丝绸之路是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项目，而遏制政策是基于多国协同的军事项目，那么这样两个看似不同的模式为何要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呢？

丝绸之路倡议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希望，然而由于美国较大的国际影响，以及各国对于潜在威胁的恐惧(例如韩国出于对朝鲜潜在威胁的恐惧同意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弹系统)，政治影响和国家安全有时候被放在了高于经济发展的地位之上(例如目前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正在伤害着双方的经济发展)。如果把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视为威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许就会被怂恿不去参与该计划(参见图4.4)，但这样最终损害的是双方的实际

经济利益。这里不妨让我们来看一下近年成立的古阿姆(GUAM)组织。

### 4.3.1 古阿姆民主与经济发展组织

冷战期间，苏联被美军的诸多同盟所包围(参见图4.3)：西边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南边还有和北约相对的中央条约组织(CENTO, 这是前巴格达契约的副产物)，此外还有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 包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而“条约组织”这一词语出现在这三个不同的组织中，或许说明它们有着同样的本源。

古阿姆组织的出现似乎也有些类似的渊源，其最初由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Georgia)、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乌克兰(Ukraine)、阿塞拜疆(Azerbaijan)和摩尔达维亚(Moldova)——组成(故而其缩写为GUAM)，其在“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支持下于1996年成立<sup>14</sup>，其成立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与鼓励，被普遍认为是抗衡俄罗斯联邦(甚至中国)在该区域影响的重要组织，其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建立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石油供给网络；古阿姆组织同时也致力于在成员之间加强军事合作并保持和美军的合作，拒绝俄罗斯在其边境部署军事力量，有研究认为其成立是冷战期间围堵政策的重演(Lafargue 2005)。不过到目前为止古阿姆组织远不如北约成功：

- 在2008年后此组织不再活跃，GUAM 高层峰会不再举行。
- 阿塞拜疆首相伊利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于2013年成功第三次连任，那么他究竟是美国的同盟还是俄罗斯的同盟，可以显然地从美俄两国对他当选的评论中看出：普京总统称这是“公平的”，而美国国务院则宣称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虽然阿塞拜疆没有正式离开GUAM，它也变得不那么活跃了。
-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组成了古阿姆组织的核心，然而由于格鲁吉亚前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的原因，两国的合作出现了一些嫌隙。在米萨卡什维利输掉2012年选举之后，他立刻离开格鲁吉亚前往了乌克兰；在他离开格鲁吉亚之后不久，他就被以多项罪名起诉。萨卡什维利在乌克兰不遗余力地支持乌克兰的操场运动(Maidan movement)和发生在2014年的乌克兰革命；2015年5月30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Poroshenko)任命他为奥德萨(Odessa)地区的总督，自此之后萨卡什维利在乌克兰获得了难民身份，但两国领导人之间也再无高层会议了。

<sup>14</sup> 乌兹别克斯坦在1996年GUAM成立之初并非成员国，其于1997年加入后该组织成为GUAM，在其于2005年离开该组织后，它的缩写又变回GU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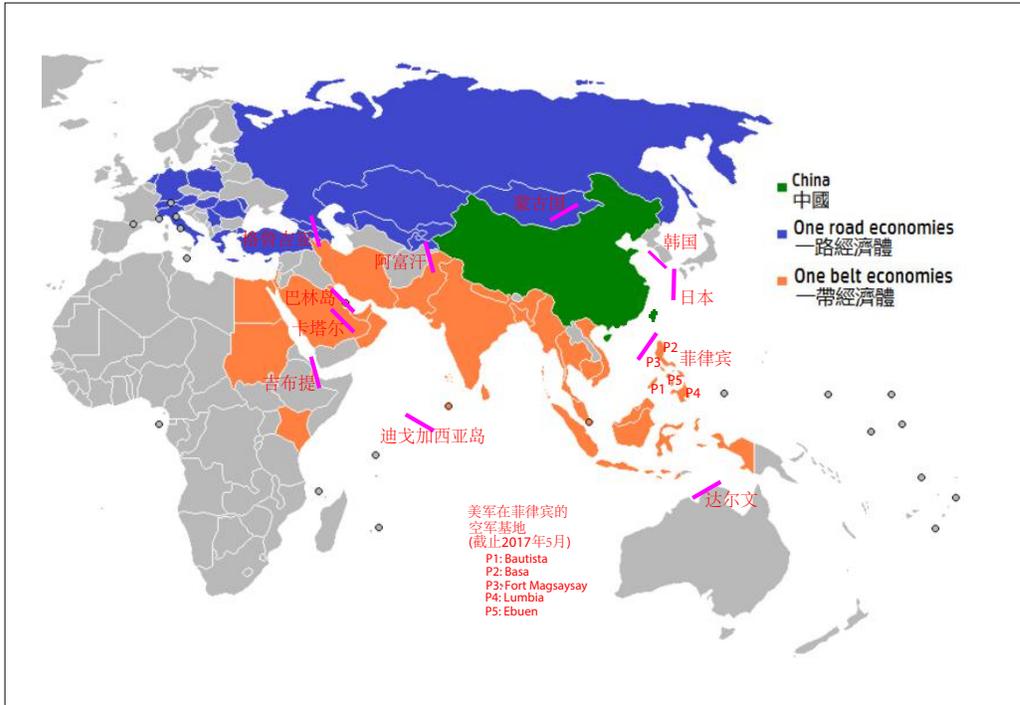


图 4.4: 一带一路经济体与美国军事同盟及其部分军事基地分布图。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过去参与围堵政策的东方国家美军都曾在二战或之后进驻过，而欧洲国家则多是美国的盟友。而且这些国家基本都有美军基地，虽然蒙古国并没有美军基地，但从2002年至今，蒙古国每年都会与美军举办名为“可汗探索(Khan Quest)”的联合军事演习。图中的清单列举了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还有很多欧洲的美军基地没有在图中显示(对于美国在全球军事基地数量的大致分布可参见<http://www.thehistoryreader.com/military-history/u-s-military-bases-worldwide/>)。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从2001年起也曾有过美国军事基地，不过到2005年和2014年都已经关闭。印度原本是少数几个没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之一，然而印度和美国在2016年8月30日签订了一个军事物资运输协议，印度可以使用美国的海外基地(可能是迭戈卡西亚基地、阿富汗的基地以及其他基地)，而美国则可以使用位于印度国内的基地。

来源: 参考文献(Rozoff 2010), 以及维基百科文章“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Karshi-Khanabad Air Base”, “Manas Air Base”, 底图来源于<https://larouchepac.com/20160921/china-engages-un-institutions-belt-and-road-while-obama-tries-provoke-war-russia>

### 4.3.2 在非洲的竞争

“围堵”这一说法以及图4.4表明遏制政策有空间和地缘属性，当年的目标就是为了包围苏联以防止其影响力进一步传播，尽管这一点在军事角度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仍然太狭隘了。非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非洲在空间上和文化上远离中国，但中国对于非洲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则由来已久(参见图4.5)，而这可以被视为新丝绸之路的先兆。

奥布里·赫鲁比(Aubrey Hruby)在2016年的沃顿中非论坛<sup>15</sup>上讲述了一个关于加纳和世界银行联合投资的布维(Bui)大坝的故事：大坝建造几乎停滞了近7年，这期间有社会审计、有环境审计，但就是什么都没建起来；最后加纳总统约翰·库福尔(John Kufuor)<sup>16</sup>在2006年前往了中国，然后布维大坝就在一个月之内开工了，并且在五年内完工。建成之后，布维水电站总容量达400兆瓦，年发电量10亿度。根据2007年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显示，在十个非洲国家中有九个国家的多数民众(60%-90%)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是好的，而这一比例显著超过了美国。

那么美国又是如何在非洲传播其影响力的呢？从下述事件中我们或许可以一探究竟。

-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非洲东南部)，2013年2月。美国特种部队与东非特种部队共同组织了一次会晤。
- 塞内加尔(西非)，2013年3月。美国与五个欧洲国家和八个非洲国家在达喀尔附近共同举行了名为“撒哈拉快线(Saharan Express)”的军事演习。
- 摩洛哥王国(非洲西北部)，2013年4月。1200名美国海军和空军士兵参与了在摩洛哥举办的“2013非洲雄狮(African Lion 2013)”军事演习。
- 乍得(中非)，2017年3月。美军特种部队与来自非洲二十国的军队进行训练。
- 索马里(非洲东北部)，2017年。数百美军部队训练索马里士兵，并参与地面突袭和提供空军支持。博尔达克准将(Donald C. Bolduc)<sup>17</sup>告诉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美军士兵时刻都与他们的索马里搭档通

<sup>15</sup>他是“非洲专线铁路(Africa Expert Network)”共同创始人和《未来的非洲：一个正在成为全球新生力量的大陆》的合著者。

<sup>16</sup>其总统任期为2001-2009年。

<sup>17</sup>他是总部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凯利军营的“美国特种部队非洲指挥部(U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Africa, AFRICOM)”的首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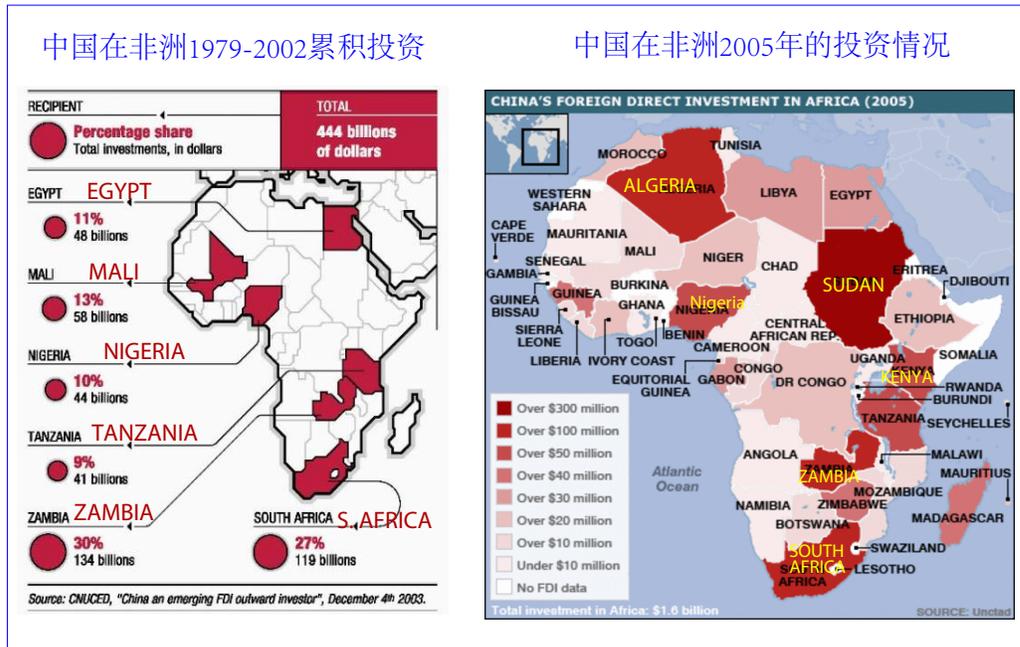


图 4.5: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情况。(左) 1979-2002年累计投资总额; 但左图中有一个错误, 其单位并非“十亿(billion)”而是“百万(million)”; (右) 2005年中国在非的投资分布, 对于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石油产业。中国在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3年中非贸易总额达到了2100亿, 而美非贸易总额从2008年的1400亿下降到了2013年的900亿。

数据及图片来源: 参考文献(Turse 2013, Okeowo 2017, Cooper 2017), C-NUCED 2003: China, an emerging FDI outward investor;

附注: 图中CNUCED 是法语中“Conférenc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 Commerce et le Développement,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缩写, 其英文名称为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缩写为UNCTAD

过无线电进行着联系，‘就像是教一个五岁儿童如何骑自行车’，但他们<sup>18</sup>不能和敌人直接接触”<sup>19</sup>。

- 邦特兰<sup>20</sup>，索马里(东非)，2017年4月。美军为邦特兰的武装力量提供空中侦察和情报(美军并未直接加入战斗)，在将近的十天时间里，邦特兰的军队已经把 ISIS 赶出了港口，并留下军队防止其反扑。博尔达克(Bolduc)准将说“如果我们只是把它(港口)放在银盘子里替给他们，那么他们将不会有任何拥有它的感觉，他们必须努力捍卫它。”<sup>21</sup>
- 马拉维(非洲南部)，2017年5月。美国在马拉维组织了一场“非洲陆军首脑峰会(African Land Forces Summit)”。美军花费120万美金接送和招待非洲军事领导人。

美军近年在非洲的军事行动分布参见图4.5，而且阿尔及利亚、马拉维、摩洛哥和坦桑尼亚的例子都显示美军的干预并不局限于那些正在发生内战的国家，不过美军所给予的支持(比如训练、咨询、提供空中侦察，但不参与军事行动)最终大多不是非常成功<sup>22</sup>。

---

<sup>18</sup>指负责训练的美军士兵。

<sup>19</sup>其原文如下：“American soldiers are constantly on the radio with their Somali counterparts like ‘teaching a five-year-old how to ride a bike’ but they cannot make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enemy.”

<sup>20</sup>邦特兰在索马里内战期间宣布独立自治。

<sup>21</sup>原文如下：“They won’t have any ownership of it if we just hand it to them on a silver platter” Bolduc said. “They’re going to fight for it.”

<sup>22</sup>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对国民党的支持以及在印度支那战争(也称第一次越南战争)中对法国的支持都是这种类型，而且结果也并不成功。



图 4.6: 美军在非洲的军事行动。AFRICOM的公众事物主管汤姆戴维斯上校告诉媒体：“除了我们在吉布提(Djibouti)的雷蒙尼尔(Lemonnier)训练营基地以外，我们在非洲没有其他军事基地，我们也没有计划去建造新的基地。”严格来说，这可能是真事；但是五角大楼有若干临时性基地，比如“非洲特别行动指挥部(SOCAFRICA)”、“前沿作战基地(Forward Coperating Site, FOS)”或者是“安全合作基地(Contingency Security Location, CSL)”，“肯尼亚突击部队学校”则是在非洲建立军事训练设施的例子。图中绿色推针表示的是美军2013年在第三国对本国部队进行的军事训练，黄色推针对应2012年时的情况。绿色标签指示2014年美军对当地部队的训练及建议或者战术部署，黄色标签为2012年时的情况，紫色标签表示美国“案例合作”，红色标签是军队国防合作伙伴，蓝色标签为美军基地、前沿作战基地(FOSes)、应急安全点(CSLs)、应急点(CLS)、有燃油补充协议的机场、各类共享设施。

来源： <http://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3/09/usmilitary-bases-africa>



## Chapter 5

# “视太平洋为美国内湖”

本章的标题摘自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1月2日的安全会议上的报告：“我们应当一直让太平洋成为美国的内湖。”<sup>1</sup>这句话很恰当地描述了美国在20和21世纪的对外政策。

那么中国对于这一问题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呢？2015年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一次召开于北京的会议期间告诉美国国务卿约翰·凯利(John Kerry)：“太平洋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足够大。”这样的说法相当符合标准的外交辞令，因为任何一方如果不这么说就意味着表现出了一种相当有侵略性的态势。与其只关注于各种声明，我们不妨来看下现实情况是怎样的：

- 美国在韩国的基地距离青岛只有400千米不到。
- 美军约有140个军事基地分散在日本列岛的各个地方，其在冲绳岛附近的许多基地距离上海只有600千米不到；无须多言，中国在太平洋的东岸是没有任何类似的基地的。中国即使是在南海岛屿建立一些相对较小的军事基地也都会引来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抗议与反对。

尽管美国绝不会公开宣称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纵观其20世纪的外交和军事史就会发现，大部分美国领导人天然地认为太平洋就应该是“美国的内湖”。每当另一支国际力量试图挑战美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统治地位时，最终都会导致战争。我们首先会在本章开始部分简要回顾一下这些不断重

---

<sup>1</sup>艾森豪威尔的原话是：“We have got to keep the Pacific as an American lake.”，其说法是“成为一个美国的湖”，普遍的译法都译作为“内湖”。虽然收录艾森豪威尔讲话的《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美国对外关系)》是大众可以接触到的正式出版物，但美国政府不会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应将太平洋作为美国的“湖/内湖”；不过五大湖的情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何谓“美国的湖”的参照—美国与其亲密(甚至是顺从的)盟友共同分享五大湖，而这也是美国对于太平洋最想要实现的控制状态。

复上演的历史事件，由于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和越战都更为大家所熟知，我们会着重分析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虽然它不如前面的战争更为人熟知，但通过对这一战争的分析却可以揭示出许多重要的规律。

接下来我们还会简要介绍一下相对鲜为人知但很有启示意义的事件——所谓的塔夫脱(Taft)太平洋外交任务，因为这一事件巧妙地设定了美国未来几十年对外政策的基调。1905年7月时任国务卿的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 他在4年后当选美国总统)带领了当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外交团对亚洲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1905年正是美国迅速对于扩张的时期，也正是那段时间美国开始确立了其在太平洋的控制地位<sup>2</sup>。

最后我们会简要解释一下在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是如何能够继续保持其对于原占领国的影响力的。

## 5.1 美国称霸太平洋地区之源起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1850年以来美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统治地位几乎从未中断过。1850年的中国闭关自守、政治腐败、国力衰弱，那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就只有英国和德国这两个竞争对手。19世纪后半叶的数十年内，俄罗斯的扩张在环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对美国造成了威胁。1867年美国耗资720万美元从沙俄帝国手中买下了阿拉斯加。随后，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败，其扩张也就此止步。日本长期以来都是美国的盟友，即便是在其最初攻占满洲里以及1937年全面侵华之后二者仍是盟友关系。事实上，当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寻求帮助以对抗日本时，罗斯福总统并未作出任何积极回应；这与捷克斯洛伐克在1938年被其欧洲盟友们密谋抛弃的情形非常相像，因此这一事件又被称作“东方慕尼黑”<sup>3</sup>。在下一小节中我们将总结美国是通过哪些步骤逐渐让太平洋变成了美国内湖的。

---

<sup>2</sup>当时罗斯福总统年轻漂亮的女儿爱丽丝·罗斯福(Alice Roosevelt)也是外交团成员之一，她乘坐豪华的旗舰造访中国。美国报纸将她与年迈的慈禧太后作比，意在影射两国之间的对比：年轻而勇敢的美国与衰老而保守的中国。

<sup>3</sup>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希特勒、墨索里尼于1938年9月在德国慕尼黑签订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的协定》(即慕尼黑协定)。英、法企图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换取希特勒东进侵略苏联。在英、法绥靖政策怂恿下，纳粹德国军队同年10-11月占领苏台德区，翌年3月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并于9月1日闪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是二战中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

### 5.1.1 殖民夏威夷

美国在1898年才正式将夏威夷群岛纳入美国版图，但对其殖民过程要远早于此。在美国新教传教士的努力下，1820年以后有许多夏威夷居民都成为了基督教徒。1825-1854年间在位的卡莫哈默哈三世(Kamehameha III)是首位基督教国王。1836年夏威夷酋长请求美国作为政府管理方面的法律顾问和指导者，威廉·理查德(William Richards)从众多美国传教士中被选拔出来担任顾问。理查德先生在1840年的立宪准备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部宪法让夏威夷成为了一个基督教君主立宪制国家<sup>4</sup>。

自1848年起，外国人被允许在夏威夷拥有土地。这项政策产生了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的效果——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事实上，1840年的宪法确保了“对所有人以及他们的土地”的保护，但这并未改变最终土地集中的结果。

### 5.1.2 开采鸟粪石(1840-)

美国对于鸟粪石<sup>5</sup>的开采始于19世纪40年代，美国依据1856年的“鸟粪石岛屿法案(Guano Islands Act)”以开采鸟粪石为由占领了超过100个无人居住的荒岛。这一法案声明当鸟粪石被开采殆尽之后，美国不再有义务保持占有，但也并没有说美国不能继续保持占有。许多占有声明已被撤回，根据这一法案目前仍有数十个岛屿归美国所有。

### 5.1.3 兼并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1898)

经过长达3个月的西美(西班牙-美国)之战，美国于1898年占领了关岛(Guam)、菲律宾和波多黎各(Puerto Rico)。

### 5.1.4 太平洋战争(1941-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平洋真正成为了一个美国的湖。然而，在美国主导太平洋的历史进程中，曾遭遇过若干次挑战。每一次争端最终都经由战争来平息，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

<sup>4</sup>这大概是美国人首次为外国领导人提供起草宪法方面的建议，之后还有其他诸多案例。我们在本书的第2章也有对此相对详细的介绍。

<sup>5</sup>鸟粪石是一种制作硝酸钾的原料，而硝酸钾在农业方面用途广泛，并且还可用于制作火药。

## 5.2 对美国太平洋霸权地位的挑战

“将太平洋一直当成美国的内湖”意味着东亚地区应当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美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统治地位被挑战过四次。

### 5.2.1 二十世纪初：沙俄帝国

1900年前后，俄罗斯帝国在满洲里和朝鲜的扩张威胁到了英国和美国的霸权。如表5.1所示，美国政府对此的反应是支持日本对抗俄罗斯，而这导致了1905年的日俄战争。

	挑战国	挑战时期	缓冲国	战争		参战与否
1	沙俄帝国	1890 – 1905	日本	日俄战争	1904 – 1905	否
2	日本	1937 – 1941	无	太平洋战争	1941 – 1945	是
3	北越+中国	1945 – 1950	法国	印度支那战争	1950 – 1954	否
4	北越+中苏	1950 – 1976	南越	越南战争	1962 – 1975	是
5	中国	2010 – 20??	日本,越南	?????	???? – ????	?

说明：“缓冲国”指的是美国的盟友国，他们代表美国与其共同的敌国开战。因此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亦称第一次越南战争)中充当了缓冲国，由美国为其提供资金；南越在第二次越南战争中扮演了缓冲傀儡国的角色。“参战与否”指的是美国是否直接参与了战争。几乎每次美国直接参战都会有数个盟友国：二战期间对日战争中的盟友包括澳大利亚、英国、中国、新西兰、芬兰；越南战争中则是澳大利亚、韩国、泰国。印度支那战争和越南战争之所以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并不是因为战争本身，而是由于其所导致的“多米诺理论”：美国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地区有一个国家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则其邻国将会出现多米诺效应而纷纷变色。该理论被美国当作其干涉别国的“正当”理由，但事实证明这一理论并不成立，因为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并没有导致其他国家出现多米诺效应。然而美国历任政府一定是深切认同这一理论，才导致他们数次深陷争端。虽然我们在最后一行的最后一列写了问号，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一场战争的确存在，美国很可能会直接介入，因为没有哪个缓冲国可以独自“完成任务”。

表 5.1: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权受到的挑战

### 5.2.2 20世纪40年代：日本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初期，美国完全接受日本在韩国和中国满洲里的殖民统治，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认为这样可以抑制苏联的扩张。日本领导人也相当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将入侵中国北部解释为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主义。由于军阀割据，国民党实际上无力控制中国北部，这种解释在美国看起来似乎的确站得住脚；通过1935年6月10日签署的梅何协定<sup>6</sup>，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安排”。美国随后继续向日本输出石油和武器，可见其并未反对该协定；即至1937年的“东方慕尼黑”事件，中方向美国请求援助而被其完全忽略。无论如何，对于美国来说，由日本统治中国北部总比任其开放、被共产主义者和苏联渗透影响。

日本于1937年攻打上海则完全打破了过去“安排”，因为上海当时完全被蒋介石控制，并未受到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威胁。这次行动以及随后日本对华东地区的占领威胁到了美国在太平洋的霸权，而这也导致了四年后的太平洋战争。

### 5.2.3 中国

无需多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对于美国维持其太平洋霸权是个不小的障碍。就像之前对待苏联一样，美国对华实行了围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 又称遏制政策)。这一政策首先导致了法国-印度支那战争和越南战争<sup>7</sup>。

#### 1950-1972：对华禁运

而在经济方面，美国于1950年12月16日冻结了中国在美的资产，而且美国与其盟友达成了对中国(长达21年)的严苛禁运协议。或许现在鲜有中外读者知晓“CoCom”和“CHINCOM”<sup>8</sup>，这到并不十分奇怪，因为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协会实际上很少被公开提起，就连英文维基百科中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文章<sup>9</sup>中也没有提到，而且这一文章认为当年对中国出口水平很低是由于中国的自力更生政策—但这显然是不实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就是1971年6月11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刊发了一篇题为《US ends ban on

<sup>6</sup>更多细节详见(Roehmer 2016c)。中华民国政府表示何应钦并未正式签字，只是口头同意梅津备忘录的条件。

<sup>7</sup>越战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越战于1976年以北越赢得胜利成功统一南越而告终。

<sup>8</sup>CoCom的全称是“对共产主义国家出口统管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CHINCOM则是“对中国出口统管委员会(China Committee)”

<sup>9</sup>参见英文版维基百科文章“History of tra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Trade(美国结束对中国贸易禁令)》的文章：“总统的行政令取消了长达21年的对华贸易禁运，开始向中国出口特定的物品并且也从中国进口物品，至此美国不再对中国单独对待，而是对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在贸易方面一视同仁。...总统令并没有解除对华禁运火车头(据说这是北京政府点名须要的重要物品之一)和航空器。”<sup>10</sup>。

这一行政令其实并没有完全解除对华限制达到自由贸易的程度，而只是让美国对于中国的禁运同对待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同了而已；在这个行政令之前，美国对于中国的禁运远比对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禁运要严苛。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由以美国为首的17个成员国构成的“对共产主义国家出口统管委员(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Strategic Trade with Communist Countries, CoCom)会来负责；而对中国的贸易则由一个单独的“对中国出口统管委员会(China Committee, CHINCOM, 这一机构存在于1952到1957年)”负责，这一委员会执行了更为严苛的被称作“中国差别(China Differential)”的禁运政策。虽然禁运始于韩战，但在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减轻，反而根据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授意而变得更加严苛(参见图5.1)。这一政策对外宣称的目标是为了通过引起民众普遍的不满将共产党的统治搞垮。当苏联在六十年代对中国的支持逐渐变弱之后，中国的处境就变得更加艰难，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72年。

而提到禁运问题，我们可以做以下的对比：

- 据说毛主席对于赫鲁晓夫于1959年9月访美感到非常不满，因为那时中国还在被美国严苛禁运。
- 北越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于1972年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sup>11</sup>同样不悦，因为那时越战仍在进行之中。

### 1973-2009：插曲

1973到1991年这近二十年是美中针对苏联而进行战略合作的时期，美国当时(尤其是越战刚刚结束之后)甚至愿意将最先进的武器卖给中国。之后

---

<sup>10</sup>其原文如下：The President's action lifts a 21-year-old embargo against trade with China permitting selected exports to China and the import of goods from China on the same basis goods from other Communist countries are admitted ... The President's order does not remove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the shipment of locomotives to China, one of the key items the Peking government is said to want, and of aircraft.

<sup>11</sup>但一直到尼克松访华七年之后的1979年元月美国才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承认的是中华民国)，这也表明尼克松的政策在美国国内当时的认可度并不高。与中国互换大使的第一个大国是法国，事在1964年1月27日，而这是尼克松访华八年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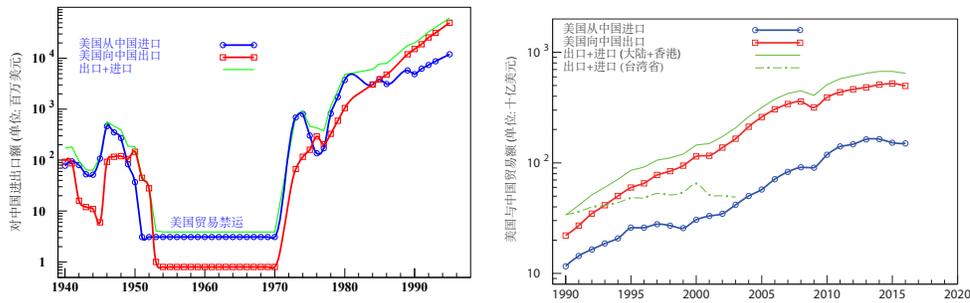


图 5.1: (左) 美中进出口贸易额(1941-1995)。美国对华贸易的最苛禁运从1951年持续到了1971年,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 期间对华口数据为零(但由于0无法表现在对数坐标上画出, 我们在图中用0.8替代0)。出于某些原因, 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并非为零, 但也只是处在非常低的水平波动(在图中我们用那些年的平均值替代这些随机波动)。伴随尼克松总统访华, 禁运被部分解除; 然而1974年之后美国对华出口出现了短暂的下降, 并一直持续到了1978年(有人怀疑这一变化与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辞职有关, 假如果真如此, 这或许说明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国内并未被很好接受)。或许有读者会对1995年之后的中美贸易情况感兴趣, 具体情况可参见右图。(右)美中进出口贸易额(1990-2016)。从1990-2016中国大陆与美国的贸易额翻了19倍, 年均增长率为11.6%。而美国与台湾省的贸易自1990年之后增长滞缓、趋于饱和: 从1965到1980年间, 两地贸易额翻了34倍; 在1990年时, 美国与台湾省的贸易额是大陆的50倍之多。近年来中美贸易也呈现类似的情况, 在2011-2016年间两国贸易额年均增长只有2.3%。应当注意的是, 右图中贸易额单位为十亿美元, 是左图中单位(百万美元)的100倍。

数据来源: 1975年《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历史统计数据)》第903-905页)、《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统计摘要)》。

在八十年代美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进行联合投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外的风险投资公司也开始逐步进入中国)。但在苏联于91年底解体之后,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就不再有必要了。

虽然这样的战略合作时间并不长,但自改革开放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似乎令人瞩目,然而这些投资与美国在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的投资相比仍然非常有限。根据2011年的《美国统计简报》,2009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为500亿美元,仅占美国海外总投资的1.4%;但在比较时可以给这个数字加上其在香港投资的500亿美元,共计1000亿美元的总投资与美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才稍具可比性:新加坡(770亿美元)、墨西哥(980亿美元)、澳大利亚(1060亿美元)、加拿大(2600亿美元)、英国(4710亿美元)、芬兰(4720亿美元)或者欧洲总投资(19760亿美元)。

### 2010-20???: 重返亚太

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战略上出现了一些转变,(其重返亚太战略)旨在支持美国和其他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防御联系以及提高美国海军在该地区的存在感<sup>12</sup>。

该政策通常被描述为一项遏制政策(围堵政策),但围堵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围堵,而是一种事实上更加敌对的态度。从后文中我们会发现该政策实则是鼓励美国的亲密盟友(也就是日本、菲律宾、韩国、越南和澳大利亚)共同反对中国。

美国与韩国在2009至2012年间进行了自韩战之后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提高美国部队在南韩地区的存在感(Ross 2012)。在2010年7月于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经过密集的关于中国岛屿申诉的讨论过后(中国并未参与讨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称美国支持菲律宾和越南在磋商中的立场。美国和越南在2011年签署了防御合作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日本与菲律宾和越南达成了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紧密联系(Ross 2012)。

美国利用其与盟友的紧密联系,还发展了新的海军基地。除了冲绳基地,美国海军启动了在新加坡樟宜新的海军基地,并将很快能够使用正在建设中的强情(Gangjeong)海军基地,这个正在建设的基地位于韩国济州岛以南、韩国西南部的海岸线上,距离中国海岸线仅400千米。过去美国在菲律宾的“临时”基地也已变成永久基地(只是并未更名)。美国海军同样“临时”驻扎在澳大利亚。

简言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似乎在经历冷战期间针对苏联的类似围堵情况(参见图5.2及本书第4章),而这样的情势实则在百年前的日俄战争

<sup>12</sup>这被称为重返亚洲/亚太战略或称亚洲轴心战略—美国将比过去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投入),将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

之前就已经存在，当时美国就已经对沙俄在进行相似的围堵。因为过去的这段历史可能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下一节中仔细研究当年日俄战争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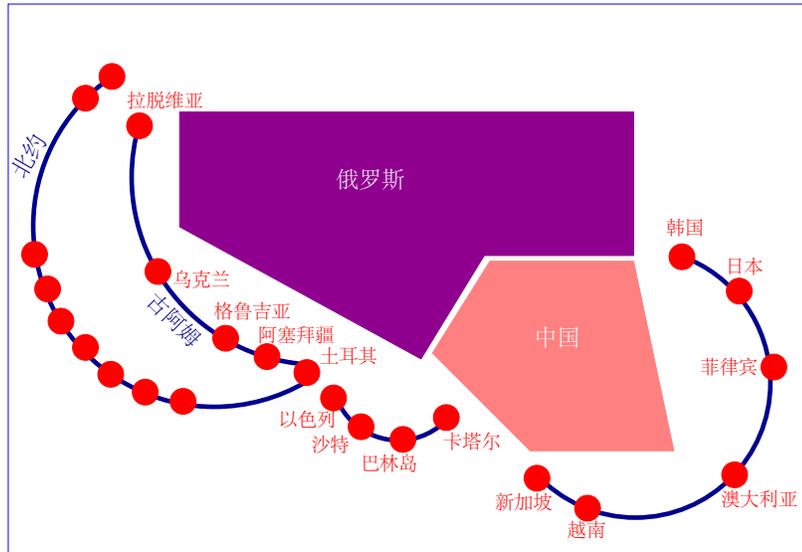


图 5.2: 目前所试图构建的遏制网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正在重演，不过相比于1960年代对于苏联的围堵来说(参见图4.3)，现在的网络节点稍有变化(例如伊朗、巴勒斯坦和泰国在60年代曾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但网络结构和分布仍大致相同。目前土耳其与拉脱维亚属于古阿姆组织的观察成员国，这也是为什么将这两个国家放到了古阿姆连线上。

不过就像我们在第2章中关于亚投行的介绍，目前已经有52个成员国、25个潜在成员国，而这77个成员中有许多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国，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韩国、英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菲律宾、加拿大、巴林(美国和日本是唯一未加入亚投行的经济大国,它们是自1966年成立的亚洲开发银行的67个成员国之二);而且本图中的多个国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参见图4.4)。

目前的情况较过去有其更为复杂之处，两国关系既有合作(例如双边贸易和互相投资)又有竞争(例如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人民币与美元、军事、网络安全)，不同关系之间也不完全独立而互有影响，同时各国互动相较过去也更为频繁，可以发现历史会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但几乎从不会完全一模一样地重演。

## 5.3 美国如何说服日本与俄国开战

### 5.3.1 背景

美国政府在19世纪末成功说服日本使其相信只有战争才是阻止沙俄帝国在满洲里和韩国扩张的唯一途径。双方的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不仅阻止了俄国的扩张，并且在第二阶段，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sup>13</sup>的斡旋下以签订《朴次茅斯和约》结束了战争。美国所扮演的和平角色得到了认可并使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6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章。对于一个曾作为志愿者在1898年对西班牙的战役中领导其“义勇骑士(Rough Riders)”在古巴奋勇作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耀眼的成就。但时人对他获得和平奖仍颇有议论。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个分水岭，日本在战后占领韩国<sup>14</sup>，美国在日俄战争之后也部分地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甚至还制定过《橙色战争计划(War Plan Orange)》<sup>15</sup>拟定战术去攻击日本本土<sup>16</sup>。虽然美军暗自制定了作战计划，但表面上看起来美国仍支持日本在韩国和满洲里扩张的野心(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当时想以此换取日本对美国占领菲律宾的认可)。

1931年日本发动对华殖民战争，并最终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部；但直到1939年，美国仍然或多或少接受了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并以此作为壁垒，来缩小苏联的国际影响及其共产主义进程。然而1941年6月，欧洲的轴心国集团决定撕毁与苏联的合作约定，联合入侵苏联领土之后，苏联不再被看作威胁而是成为了对德战争中的重要力量；同样地在1938年之后，中国红军起码在形式上正式成为了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所以对于美国国务院来说，这些进展使得日本入侵中国借以抑制共产主义发展的仅有借口也消失殆尽了。

---

<sup>13</sup>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一个牡蛎湾的共和党人，他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位是我们最为熟知的二战期间的罗斯福总统)隔了四代的堂兄(他们拥有一共同的七世祖)。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但是两个分支依旧是友善的关系：詹姆斯·罗斯福是在西奥多母亲住所的一个家庭聚会上初次见到日后成为他妻子的萨拉·德拉诺，而他们的儿子富兰克林则娶了西奥多的侄女埃莉诺。

<sup>14</sup>当时的韩国全称是大韩帝国(1897年10月12日-1910年8月29日)是朝鲜王朝末期所使用的国号。其国土与原朝鲜王朝相同，皇帝高宗亦为原朝鲜国君主。大韩帝国是朝鲜王朝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国号由“朝鲜国”改为“大韩帝国”，得名于古时的三韩。

<sup>15</sup>这一计划最早是在1911年提出，并由雷蒙德·P·罗杰斯少将制定，于1924年由陆海军联合委员会通过。

<sup>16</sup>但有趣的是，在贸易方面美日在之后十年却呈现出一番大好形势：从1930年到1939年，美国对日本出口从4.43亿美元增长到10亿美元，从日本的进口从5亿美元增长到6.5亿美元。

自1936年11月起，日本与德国一道成为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主要发起者，但矛盾之处是虽然1936年日本已占领东三省数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仍成为了反共产国际协定<sup>17</sup>的成员之一。1941年6月以后，(由于苏联在对德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西方国家看来，成为反共产主义协定的成员已不再是优势反而成了不利因素。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反共政策再次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重视和青睐。

### 5.3.2 日俄战争大事记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30年里现代化进展迅速，到二十世纪初时已经具备了与俄国这样的世界强国相抗衡的能力。

19世纪末英国依然是国际上的超级强国。尽管英国也希望阻止俄国在亚洲东北部的扩张，但其更倾向于通过协商解决；值得注意的是，一大部分英国军事资源在1900年前后投入到了对付波尔人(Boers)的南非战争，这或许是英国倾向于协商解决的部分原因。1902年1月30日，日本和英国签署了英日同盟协定。

英美之间在当时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协定，那就是地中海和印度洋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太平洋则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从英国几乎并未抗议美国兼并夏威夷、菲律宾便可大致窥见到这一点。所以相比之下，美国更加有动力去鼓动日本，以下的年表描述了美国政府如何鼓动日本对俄宣战(见图5.3)，年表中的内容均摘自刊发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众所周知《纽约时报》的观点基本反映了美国国务院的立场)。《纽约时报》上关于日俄战争的文章基本可以归类为以下4个主题：沙俄帝国在韩国的领土扩张、沙俄和日本的利益与目标并不一致、沙俄和日本之间磋商的条款、日本将要对俄作战。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最后一类<sup>18</sup>，其中中括号内的内容为我们的评论或当时的实际情况(通过与事实的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纽约时代》的很多报道都是不实而具误导性、甚至煽动性的)：

1897年12月4日：日俄冲突将要爆发的一些表现：俄国正在购买物资，而且有(美国)游客报告(报社)称沙俄调集了黑海的部队去加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驻防部队兵力。  
[随着新部队的到来，理所应当需要更多的物资补给。以此推断战争即将发生或许太草率了。]

<sup>17</sup>共产国际是一个由苏联领导的国际性组织，以传播共产主义为使命。甚至连丹麦在1941年被德国占领后也成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成员；数百名丹麦共产主义者于1941年6月被逮捕，其中大部分后来被驱逐出境。在德国和苏联签署协定之后，法国大批共产党人也遭到逮捕。

<sup>18</sup>在参考文献(Roehner 2016d)中可以找到包含四个主题的更完整的表述。



图 5.3: 这两幅漫画阐释了英国和美国在1904-1905俄日战争中的角色。(左) 日本攻击俄国, 作为日本的盟友英国试图阻止日本, 美国则在一旁幸灾乐祸。(右) 在这幅俄罗斯漫画中, 美国把日本天皇的马推向悬崖边, 而英国(穿红衣者)试图挤进来阻止。彼时英国与法国是同盟, 而法国又是俄罗斯的亲密盟友。尽管1902年英国与日本签署了一项协议, 但英国绝对不愿意俄罗斯陷入战争, 更不愿意俄罗斯被打败。网络上有许多庆祝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成为和平缔造者的漫画, 但只能说美国国务院长袖善舞、是精明的公关者。(图片来源于网络)

1897年12月24日: 日本军队中充斥着由俄国间谍乔装打扮的假日本人。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 日本就不会在随后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了。]

1897年12月24日: 沙俄正在蚕食韩国。沙俄的代理们控制着这个国家, 日本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  
[这种说法完全不实。]

1897年12月27日: 17艘英国战舰向俄国统治者发出最后通牒, 其原因是沙俄解职了一名英国海关官员。日本选择支持英国的行动, 由 30艘舰船组成的日本舰队正在等待英国对沙俄抗议的结果。  
[看到三个大国为了一个被解职的海关官员大动干戈着实令人惊讶。但实际上, 此类事件并未发生过。]

1898年1月1日：日本变得好战起来。身在旧金山的日本将军Sakuzzi声称沙俄正在羞辱他的国家。

1898年1月22日：日本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准备。《圣詹姆士公报》声称英国可以独立操控苏伊士运河东岸俄罗斯和德国的船只。  
[《纽约时报》在1898年1月10日的协议签署还不到两周之后就再次谈论战争问题。]

1898年4月6日：日本全国上下都充斥着战争的气氛。

1898年4月24日：俄国与日本交好以推进其计划。沙皇不断增加其陆军和海军力量以期能够主导并控制太平洋。  
[1898年4月短暂的西班牙-美国战争刚刚开始<sup>19</sup>。美国赢得西美战争后吞并关岛和菲律宾<sup>20</sup>，标志着美国在太平洋向西扩展的重要一步，而这也加剧了美俄冲突的进程。但美国对于俄国试图并有能力“主导并控制太平洋”的恐惧极有可能被夸大了，原因至少有二：

- 1867年沙俄帝国将阿拉斯加以七百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如果沙俄真的意图控制太平洋，那么它断不会这样做。
- 东亚距离俄国的经济重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太远，虽然事实上东亚距离美国西海岸同样很遥远，但海运比陆运便宜而且运货量大，进而更有优势。

然而美国对于俄国会全面控制太平洋地区的担忧可能放错了地方，真正的威胁其实存在于日本对韩国的控制。1882年美国与当时的朝鲜王朝签署了《和平、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Treaty of peace, amity,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通常译作《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在之后的数十年里放弃了其对于朝鲜的野心，以此来换取日本接受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见1905年7月29日的《塔夫脱-桂离宫秘密协定》)。另一件让美国格外担心的就是沙俄或许已经在中国获得了优先待遇(例如中国只给予俄国在满族里建铁路的特权)。

1899年7月26日：沙俄和日本都全副武装且都预见到双方可能会在韩国爆发冲突。

---

<sup>19</sup>西美战争开始于1898年4月25日，结束于8月12日。

<sup>20</sup>美国在赢得1899-1902年间的菲美战争之后，菲律宾正式成为美国殖民地，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菲律宾才独立。

1899年11月13日(伦敦): 正在克莱德河岸为日本建造战舰的制造商接到紧急命令, 让他们尽快完成船只的建造。这艘预计于1900年元旦下水的新船将成为最大的舰船之一。有理由相信正是日俄之间加剧紧张的局面导致日方想要尽快完成舰船的建造。

[虽然英国从外交上赞成俄日磋商, 但通过出售战舰给日本, 英国在事实上也支持了日本。]

1900年1月13日: 为阻止俄罗斯在朝鲜的扩张, 日本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1900年1月27日: 日本可能会进攻沙俄, 这一意图可以从其声势浩大的海军备战中窥见。

[日本为战争做准备很有可能是可信的, 但首先备战是军队的职责, 并不能以此推断备战与意图对俄开战有直接关系; 况且双方也曾试图磋商, 说明日俄并不完全排斥通过协商来解决争端。]



图 5.4: 《英国给日本的建议》。英国对日本说:“你抓住它的角, 我抓住它的尾巴”。相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1853-1856)中, 英国支持法国和土耳其反对俄国向南的领土扩张, 不过这次英国有直接参战。(来源: 因特网。这幅漫画很可能发表在某份美国报纸上(而不是英国报纸), 但我们没找到是哪一份报纸。)

1900年4月12日：日本对俄开战？俄国海军军官称此次冲突在所难免，并且英国也将卷入战争。

1901年2月17日：日俄都想要占领韩国。日俄之间的战争自1900年6月起就迫在眉睫并持续威胁着双方到现在。

1901年3月9日：俄国对满洲里的行动加剧了危机。据报道，英国曾询问美国是否已准备好和它进行联合行动；日本回应称将与美英一起采取行动。

[之前《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认为只有日本担心俄国在满洲里和朝鲜的扩张会威胁到自己，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对中国的物资输出在当时远超其他西方势力或者日本；尽管美国对中国的物资输出规模小很多但其增长迅速。因此，英美说服日本独自与俄国开战称得上是一个“聪明”的行动。]

1901年3月22日：对于日本来说，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俄国在中国北部的侵略会在未来变为对其自身的直接威胁。

[俄国在韩国及满洲里的扩张令日本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实这一状况同样令英美担忧。换言之，这篇文章仍是公关活动的延续，其目标仍是说服日本单独对俄开战。《旧金山呼声报(San Francisco Call)》(1901年3月28日，第一页)的一篇报道称一名内阁成员曾说过“美国并不担心中国目前的政治和领土形势，唯独担忧其经济状况”。这一说法非常奇怪，因为这三个方面显然是不可分割的。与中国签署的那些经贸协定(如1903年10月的协定)几乎都没什么用，因为当时软弱的中国政府无力执行这些协定，尤其是在满洲里这样的外围地区。在这期报纸同一页内还有两条短新闻，提供了关于中国状况令人震惊的照片：第一张是8名反基督教的暴民在湖南省会长沙被斩首；第二张是3个中国人在北京使馆街被一名德国哨兵杀害，但德国哨兵却并未被逮捕审判。这无疑显示出中国当时的软弱以及主权之丧失。]

1901年12月8日：关于俄日将要开战的预言纷纷出现。一名英国军官讲述了为战争所做的秘密准备，(英国)在所有能触及的地点都部署了军团。[关于战争的预言又一次建立在由一位普通军官提供的相当浅薄的说辞之上。]

1902年3月10日：俄国军队接到命令将他们的家人从阿瑟港<sup>21</sup>转移出去，因为对日战争的备战工作已经开始。

[根据这篇文章俄国早在1902年3月间就开始在旅顺港进行防御准备，然而

---

<sup>21</sup>现今大连旅顺港。

当1904年2月8日至9日日本真正发动袭击时，俄国却毫无准备。]

1903年6月7日：可以确信日俄之战已经无法避免。

1903年10月8日：由于俄国的恐吓，在韩国的日本人希望政府派军队保护他们。日本政府如何进行的回复尚未被批露。

[《纽约时报》再一次仅仅根据谣言就煽风点火。10月8日，美国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商贸条约，开放了满洲里的口岸沈阳(奉天)和丹东用于同美国进行贸易；条约中还包括一项用于保护美国在中国使用的商标、专利和版权的条款(详见《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1903年10月9日)。该条约似乎主要直接针对俄国在满洲里的利益。这些新闻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这样重要的报纸上显示出美俄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sup>22</sup>。从后续发展来看，美俄矛盾似乎不断升级，1903年11月8日的一篇文章谈论了美国境内的反俄热潮，刊发于1903年11月28日的第二篇文章观察到“俄国对美国施压感到愤恨”，刊发于1903年12月19日的第三篇文章则提到“美国激怒了俄国”。]

1903年10月12日：俄国和日本离战争不远了。一封急件称日本原计划于前一日宣战。

[这封信差不多写于战争真正开始前的4个月。]

1903年12月10日：俄国威胁韩国。八艘军舰(包括两艘战舰)据称已到达仁川。这或许会终结俄国与日本的磋商。

[然而日俄间的磋商一直持续到了1904年1月。]

1904年2月6日：林权助男爵(Hayashi Gonsuke, 时任日本驻英国公使)称俄国拒绝签署关于满洲里的条约就意味着战争。

1904年2月10日：三艘俄国战舰和四艘巡洋舰在阿瑟港被击沉，两艘俄国巡洋舰在济物浦港(今首尔西面的仁川)被击沉。(日本)军队在首尔附近和韩国北部登陆。

[这段历史格外有趣是因为日本在和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时使用了与日俄战争中几乎相同的战略原理。我们将着重分析以下几个特点。

- 日本鱼雷快艇在阿瑟港的行动完全是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日军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也是如此)。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仁川在当时

---

<sup>22</sup>美俄在满州里商业上的竞争或许还不是唯一的原因，这一事件背后其他的原因也值得未来进行深入研究。

是一个中立港，不只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战船也停靠于此。这也是为什么战斗发生在远离港口的公海海域。

- 日本的袭击是一项包括军队登陆以及在港口袭击俄国战舰的组合行动。与此类似，日本在1941年除了突袭美军在菲律宾的机场和美国在夏威夷的战舰外，同时还有军队登陆到菲律宾(当时菲律宾仍是美国的殖民地)。]

1904年2月10日：海军上将鲍尔斯(Admiral Bowles)评论道：“日本在战争中获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1905年9月5日：(日俄)签署《朴茨茅斯和平条约》。

### 5.3.3 日本对和平条约的反应

东京、横滨和神户在1905年9月5日至7日爆发了反对《朴茨茅斯条约》的反美暴动，因为依此条约日本并未完全获得其所预期的各项特权。四座位于东京的美国教堂被烧毁，而且美国大使馆不得不由军队进行保护。仅在东京就有17人遇难，70%的双人警察岗亭(two-man police boxes)被纵火引燃。

但绝大多数的美国报道都将这些暴动描述成是针对日本政府的暴动(而未提及这也是针对美国的抗议)。然而从一封刊登在1905年9月8日的《芝加哥论坛报》上的信中摘录的段落可以发现，实际上美国也是这次暴动主要的被攻击目标之一：

“一想到基督教堂和布道物资被暴徒毁坏就让人十分悲伤。我们获悉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居所被破坏，一座卫理公会教堂被烧毁；以及其他那些对美国不友好的行为。你或许认为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中国，因为他们总是痛恨外国人，而这些年日本已经被认为是接受西方文明的。日本人对美国的厌恶情绪显著地表现在他们对待爱德华·H·哈里曼先生(Edward H. Harriman)<sup>23</sup>和他在东京的党友的方式上。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以至于当新闻报道他在大街上被袭击、被暴徒用石头攻击时，着实令人震惊。哈里曼同其党友当时正前往财政部长的宅邸，准备参加晚宴。当他们被认出是美国人时，乱石就飞了过来。幸运的是，哈里曼并未受伤，但其党友莱尔博

<sup>23</sup>尽管哈里曼先生与《朴茨茅斯条约》没有半点关系，但他和罗斯福政府相当亲密，并且他是在美国驻东京大使的邀请下访问日本的。他是一位铁路巨头，而且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和“南太平洋铁路”的主席，“太平洋邮船公司”也和他有关。他计划建设一条受美国统一控制的联接日本、满洲里、西伯利亚、欧俄以及大西洋的环球交通线，这样一条铁路和轮船线路能将地球上的四个人口大国联接起来，使美国能够在东方占据支配地位(摘自E.H.哈里曼《传记》第二卷)。

士的肩膀被击中受了轻伤。他们已经被送到美国大使馆，由警察保护他们的安全。”

这一说法在罗斯福总统女儿的证词中得到了肯定，她曾于1905年随塔夫脱布道团前往东方国家。布道团于1905年7月到达日本，然后前往中国，并于1905年10月返回日本。以下是她的证词(Longworth 1933):

自从我们7月份离开日本，之后不久《朴茨茅斯条约》就签订了，(在日本)美国人之前有多么受欢迎现在就有多么不受欢迎，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彻底的转变。据说有人向哈里曼等人扔炸弹[作者注：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夸张说法，实际情况中扔的是石头]，并且有人建议我们，万一有人问起来，最好说我们是英国人。不过反美情绪似乎局限于普通民众，官员们还和过去一样谦恭友好。

### 5.3.4 塔夫脱太平洋外交任务

#### 外交任务的目标

美国在1905年迅速对外扩张之后，派出了以国务卿塔夫脱为首的当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太平洋外交团。其主要目标是确立美国对新殖民地的占有并向西太平洋国家(例如日本、韩国、中国)输出以美国为模版的新兴民主国家模型。

#### 对华访问

在第三章中我们强调了社会成员之间紧密且平等的互动的重要性，而在罗斯福小姐自传里回忆其访问慈禧太后的描述(Longworth 1933)中，有个小插曲揭示了清朝末期在这方面的情况是多么糟糕。社会的确可以建立在等级和畏惧的基础上，或许这能一时凑效，但历史证明建立在密切互动的协同基础上的人类组织效率更高。

- 慈禧太后宫中秘闻(1905年9月)

午饭过后，当我们在花园(颐和园)里散步时，太后加入了我们。翻译是伍庭芳大人，他曾担任驻华盛顿大使。他站在我们中间靠边一点的位置，但就在谈话进行期间，太后突然低声呵斥了一句，伍大人脸色煞白、四肢趴下、额头磕到地上。太后一说话，他就赶快抬头对我说英语；我说话的时候，他又把头磕到地上；然后再抬头把话翻译成汉语说给太后，接着又把头磕到地上。她没来由地在我们面前羞辱了他。亲眼所见一个男人在别人脚下磕头，真是一种奇怪的经历。我真切地感到，她随时可以说一句“将他斩首”，然后这个人就真会被斩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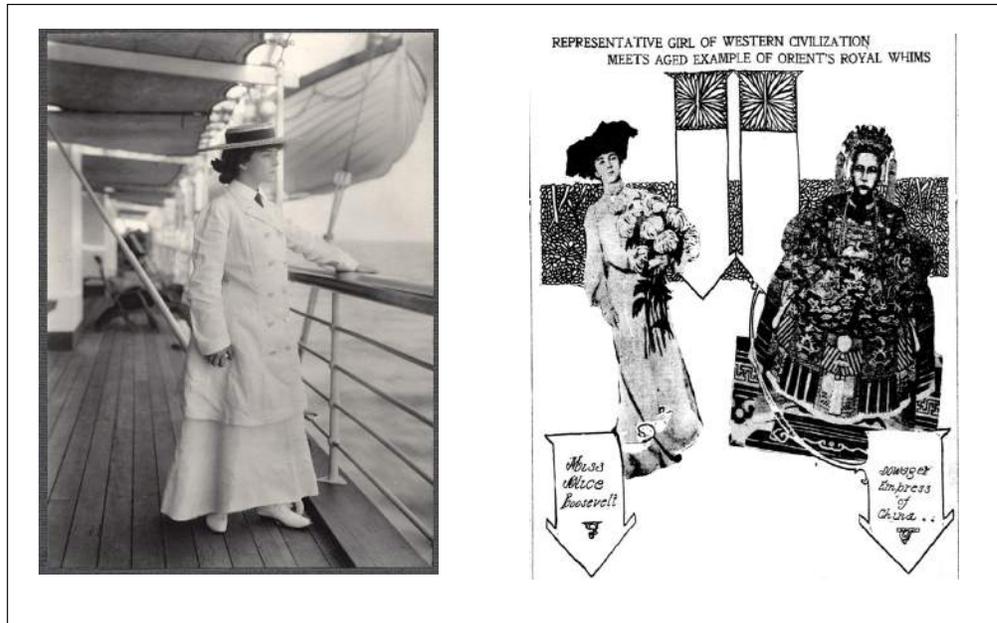


图 5.5: 爱丽丝·罗斯福(Alice Roosevelt)访问东亚的旅途。(左) 罗斯福小姐站在前往日本的船上。(右) 1905年9月14日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的图片。左边是罗斯福小姐, 右边是慈禧太后。图片上方的标题写到: “代表西方文明的女孩觐见年迈的东方皇权代表”。爱丽丝·罗斯福回忆道: “尽管见面的时候她已经七十多岁了, 我依然能感受到她的魅力。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她那个年纪的人。在御座的底层坐着刚三十出头的皇帝, 他无力地蜷缩着, 嘴唇微张, 双眼呆滞恍惚, 面无表情。没有人把我们介绍给他, 没有人关注他, 他只是坐在那里、目光空空。”

来源: <http://www.asia.si.edu/research/archives/alice/>

当我把这些告诉父亲时，他认为这可能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平等对待的人，对太后来说什么也不是。

### 5.3.5 小结

日俄战争的爆发和日本的最终胜利对于日本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分水岭。美国在1905年以后认为自己在中国应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不过一直到1937年以后，美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利益才真正开始出现分歧；1937年以前，日本在中国东北部的行动曾被美国视为对苏联实施遏制政策的有效手段。

## 5.4 美国如何鼓动其盟友对抗中国？

美国做法的原理非常简单——美国国务院会通过其在全球巨大的影响力去支持那些赞同美国战略目标的外国政治领导人，并且忽视甚至抹黑那些不支持他们的领导人。美国自然不会公然这样做而且也从不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意图。为了出现在美国国务院的“雷达”上，外国政治领导人必须首先通过一些有意义的行动为自己发出信号。

### 5.4.1 法国

2008年5月巴黎市长的做法似乎就遵循这一逻辑，这一点当然无法完全得到证实(除非市长本人亲口承认且并未说谎)，并且显然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会承认他在为美国国务院服务，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指出那些离奇的巧合。

由于许多读者可能并不熟悉法国的政治形势，所以我们先来简要描述一下各位主人公。

- 关键人物是2008年时任巴黎市长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人贝特朗·德拉诺埃(Bertrand Delanoë)。当年年底社会党会选出新的领袖，当选的领袖很有可能会成为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时的社会党候选人。
- 第二位主人公是右翼周刊报纸《观点(Le Point)》，在欧洲人人知道这是一个亲美(实际上是谄媚美国)的“大西洋主义者(Atlanticist)”媒体。
- 第三位主人公就是达赖喇嘛。尽管他打着和平的旗号周游世界，但他从1956年到1989年期间都公开支持并要求西藏独立。

故事是这样逐步展开的：

2008年4月22日：巴黎市议会授予达赖喇嘛巴黎荣誉市民称号(当时奥运火炬正在法国境内传递)，这一事件使得中法关系进一步紧张化；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及其盟友支持这一称号授予行动，法国总统萨科齐和他中间偏右的政党则表示反对。市长在市议会提出这项决议时说，这是对“为争取基本权利、尊严、自由和生命而斗争的藏族人民的兄弟般的支持”。这样的声明对美国国务院来说简直就是悦耳的音乐。但此番言论在中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数千名示威者走上中国城市街头谴责法国并呼吁抵制法货。(《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2008年4月22日)

2008年5月21日：德拉诺埃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对于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的立场和计划(例如他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干预)。

2008年5月22日：《观点》发表了长文评论赞美德拉诺埃的新书，并强调了他要成为社会党党魁的抱负，《观点》甚至用他的肖像做了当期的封面。

2008年7月28日：《观点》发表文章《德拉诺埃是社会党中最受欢迎的成员》。文章称根据一项最新的问卷调查结果，德拉诺埃在党内拥有最高比例的支持者。但无须多言这类问卷很容易被操纵和捏造，几乎可以给出任何想要的结论。

2008年11月6日：德拉诺埃在“社会党”预投票中落选后宣布放弃参选“社会党”领袖。

2009年6月8日：德拉诺埃在市政厅欢迎达赖喇嘛来访<sup>24</sup>，期间达赖接受了2008年授予他的“荣誉市民”称号。

德拉诺埃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补充一点，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最终成为了社会党2012年候选人并最终当选法国总统，他跟德拉诺埃一样是“大西洋主义者”。奥朗德的确没有会见过达赖喇嘛，但在其他方面(北约、斯诺登、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他实现了华盛顿政府的所有期望。

德拉诺埃的故事说明美国国务院的支持能够帮助政客实现部分目标，但大部分还是得靠候选人自己。对于在2012年出任总统来说德拉诺埃那时可能有点太老了，并且他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并不能打动“社会党”的党员们。最近美国国务院发现了一匹更好的“马”—2017年5月当选总统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相比于只有一两家报纸支持的德拉诺埃，马克龙简直就是一路开挂、“步入轨道(put into orbit)”的节奏—众多电视网络(尤其是BFM电视台)以及各大报纸都极力声援马克龙、为其竞选造势。

《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美国同名杂志的法语版)早在2014年8月28日就用一篇长文报道过马克龙，当时马克龙只是刚刚在几天前被任命为“经济

<sup>24</sup>早在2003年10月16日达赖就跟德拉诺埃见过面。

和财政部长”。由于那么长的一篇文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写完，所以杂志社这么快就做好了准备明显很不寻常。我们几乎不用去问马克龙先生为了满足其支持者的愿望是否会会见达赖(见图5.6)。



图 5.6: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达赖喇嘛在巴黎某酒店会面。马克龙先生在2016年9月12日已不再是经济部长而且当时也不在法国政府担任任何职务(他在2017年5月才成为法国总统); 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参议院对于此次会面很开心。马克龙先生接受了达赖喇嘛赠送的哈达(见左图)。(来源: 因特网)

### 5.4.2 日本

如果中日之间能够形成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 那么这无疑对双方都有利, 但这对于美国来说将是战略灾难, 因此对于美国而言这一状况断不可出现。这算得上是美国国务院的头号要务之一, 那么美国具体怎么达成这一目标呢?

加剧中日间的紧张局势可以有很多手段, 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阻止日本的亲华政治家(如小泽一郎或鸠山由纪夫<sup>25</sup>)担任首相; 万一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毕竟日本是一个自由选举的国家), 美国也会通过其影响力使其任期尽可能短。一旦先决条件被满足, 维持紧张状态就相对容易了, 很多时候一些老掉牙的申诉就很有效(比如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sup>26</sup>)。

<sup>25</sup>2010年1月23日《纽约时报》刊发文章《在日本, 美国在外交领域输给了中国》。但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太久, 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执政仅8个月后就于2010年6月8日就迫于国内和美国的压力而辞职。鸠山由纪夫是继村山富市和海部俊树后, 第三位访问纪念馆的日本政府前首相, 他于2013年1月17日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表示: “我为当年日本兵犯下的罪行道歉, 真心希望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sup>26</sup>说到这一问题就要提到2012年时任东京市长的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宣称其正在号召捐款将尖阁列岛买回去; 更确切地说, 他是在2012年4月16日“传统基金会(Heritage



图 5.7: 这一漫画描述了鸠山由纪夫在其短暂执政过程中的状态。他受到来自国内民众与美国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受美国影响的日本媒体(例如《日本时报(Japan Times)》和NHK电视台)对他更是批评不断。值得注意的是，NHK电台是在美国战后占领期间成立的，而《日本时报》简直就是美国《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的翻版，《日本时报》会翻录很多美国报纸上的新闻，而且更为奇怪的是他们还会报道日本民众几乎毫无兴趣的美式足球(橄榄球)新闻。

另一个发生在2014年4月19日的事件相当清楚地显示了当时的政治风向。在奥巴马总统访日的四天前，日本决定在尖阁列岛(也就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南200千米的与那国岛(Yonaguni)上建立雷达站来作为欢迎奥巴马的礼物。在一座靠近中国、远离日本的岛上建雷达基地将会扩大日本对中国大陆的监视。(《台北时报》2014年4月19日)

美国常打的另一张牌便是北朝鲜。美国借由北朝鲜导致的威胁进一步强化了其与其日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点上对于南韩同样成立，甚至其与菲律宾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而且一旦因为北朝鲜问题爆发军事冲突，对于中国可能会是更大的灾难。当年韩战爆发之后，南韩总统李承晚得以借此强化其在国内的军事独裁统治，而美国杜鲁门总统也借机以护卫台湾为由将第七舰队开至台湾。

---

Foundation, 该基金会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主义智囊团)”的讲话中宣布的。

### 5.4.3 菲律宾

1991年菲律宾参议院投票决定关闭位于马尼拉西北部的苏比克和克拉克美军基地，然而菲律宾在1999年又批准了一项允许美国军队短暂停留的协议。这就为日后美军的介入铺平了道路，之后有数百名美军成员与菲律宾军队举行联合反恐演练，并协助其处理南部的叛乱。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前数日，双方于2014年4月28日在位于马尼拉的菲律宾国防部签署了《加强防御合作协议》，这一协议允许美军在菲律宾“提前部署”战斗机和战舰。

# Chapter 6

## 可验证的预测

### 6.1 什么样的预测？

比较历史分析学的特征就是给出可验证的预言/预测。但我们能期望得到什么样的预测呢？

#### 6.1.1 比较历史分析学并非占星术

自古人们就想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从德尔菲神谕到占卜师的预言，这种愿望确实也从不同渠道得到了满足。世界各个主要文明都发展出了精细的占星学模型，而这也说明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人们都想预知未来。过去的人们对于真正有可能被预测到的未来发展的具体方面似乎并不真的感兴趣，反倒是更希望能够了解未来发展的宏大图景—未来是会变好还是会变坏？未来是否会有灾难或者世界末日？而这些正是占星术声称能够提供提供的信息。

了解历史分析学工作原理的读者会知道，这门学问只能对那些过去曾反复出现过的事件提供可靠的预测。事件发生次数越多、相似度越高，我们的预测往往就越精确。毕竟全球历史显然从未以相同的形式出现过，这超出了历史分析学所能预测的范畴。

#### 6.1.2 未来的不确定性

我们有理由认为从来都没有哪种方法能保证准确预测未来。原因很简单，“未来”这个概念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即使每一步我们都能做出信度 $p \approx 1$ 的预测，但整个事件长期的预测信度将会很低，而且步骤越多，其

预测信度越低。假设某一步骤的预测准确度 $p = 0.95$ ，在预测30步以后，其最终信度 $p^{30} = 0.21$ ，50步之后其信度更低，仅为 $p^{50} = 0.077$ 。

或许唯一能够相对准确“预测”未来的方法就是“设计”未来—如果能像心理历史学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基地》三部曲(Asimov 1951, 1952, 1953)中描述的那样，根据自己的计划控制民众以及银河系的首领，并通过各种渠道不让人们意识到自己被控制；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一个随机的系统就可能会变成确定性的系统，而这意味着 $p$ 几乎等于1。然而即使真能如此，当系统非常复杂时，仍有可能会有混沌效应(蝴蝶效应就是混沌现象极富诗意的表述方式)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初始值的微小扰动，最终也很可能会导致系统远远偏离原先预设的轨道。

而且精度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预测。你大概并不能肯定地说出明天中午你会在哪里，因为可能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朋友给你打电话叫你外出聚餐，或者你太忙了就在办公室吃午饭了；不过假如你计划从北京飞往巴黎，你就可以相对确定地说(除非航班被取消或者出现了其它别的问题)第二天中午你会在巴黎(当然具体会在怎样的位置仍然非常难预测)。不过有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指出，当我们有足够的移动轨迹历史数据时，可以证明人类看似难以预测的移动行为的预测上限为93%(Song 2010)，不过这一研究得出的也是理论上限值，目前也还鲜有算法能趋近这一极限。

### 6.1.3 真正重要的是预测须要是可验证的

“可验证”这一说法仍有其模糊性，它可以是对应非常精确的可验证、也可以对应相对模糊的可验证；即便在物理领域也是如此，大量实验证明根据量子场论预测一个电子的磁矩其误差通常只有 $10^{-6}\%$ ，但是在流体力学中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的误差范围在50%以内就已经比较让人满意了。(Richmond, Roehner 2012)一文基于多国的历史房价数据得出其背后规律并用以预测2012-2022年巴黎的房价峰值，目前看来最近6年的预测都是准确的。回到历史分析学，读者并不会惊讶于大部分预测都是关于“小”事件的，因为大事件很少重复发生而且其过程更为复杂。尽管我们私下里当然是对“大”事件的预测更感兴趣，但从科学的角度讲，大或小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预言/预测必须是可试验性的、可验证的。下面我们将例举一些与本书主题相关的可验证的预言。理想状况下，比较历史分析学的预测或许会是这样的形式—“某类事件在满足条件A,B,C时发生过数次，那么未来如果条件A,B,C满足则这类事件仍会发生”。

## 6.2 间接的军事对抗

历史证明竞争者之间的直接对抗往往会被间接对抗所超越或取代。我们不妨来看下面几个例子以及我们可以做出怎样的预测。

### 6.2.1 1920-1936年间苏联与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南部的间接对抗

20世纪20年代苏联与西方势力的关系实则非常紧张，因为多个西方国家和日本都派兵到俄国镇压十月革命，所以虽然苏联与西方势力在中国看似和平并存，但实则却是暗流涌动。中国在那时之前是没有苏联军队的，但是在国民党主席孙中山的请求下，苏维埃向中国南部派驻了武装力量和顾问，黄埔军校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他们的支持。

在孙中山与苏联达成协议后，英国认为此举是在蔑视他们。然而英国并未直接与孙中山对峙，而是利用了军阀陈炯明：“香港政府旗帜鲜明地反对孙中山，英国怀疑孙中山已经转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西方势力将陈炯明视作更好的选择。香港总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呼吁英国政府对陈炯明给予经济支持。”(Goikhman 2014)

陈炯明听从其支持者的建议开始与孙中山做对。1922年6月22日，他袭击了孙中山在广州的住所(袭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与妻子宋庆龄侥幸躲过了重型机枪的扫射，后被蒋介石指挥的炮艇营救。彼时蒋仍被视为左翼将领，但孙中山逝世后，他不久便变为中国反共产主义、反俄力量的领袖(参见图6.1)。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于1927年4月7日被入侵，多地苏联领事馆(哈尔滨、汉口、广州)在随后几个月内接连遭袭。1927年10月1日，在国民党汉口政府发动反共产主义政变后，美国成为第一个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国家。1927年12月17日，苏联驻广州副领事被国民党处决；次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六名女性职员被处决<sup>1</sup>。

简言之，苏联与西方势力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南方上演了一出间接对抗的大戏。我们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这件事相对鲜为人知，冷战期间美苏的非直接对抗则是不胜枚举。

### 6.2.2 美俄间接对抗

法国印度支那战争、越战、安哥拉内战、尼加拉瓜内战、阿富汗内战以及更晚一点的乌克兰和叙利亚内战都能说明美苏(俄)之间的间接对抗。以

<sup>1</sup>更多细节及信息详见参考文献(Roehner 2016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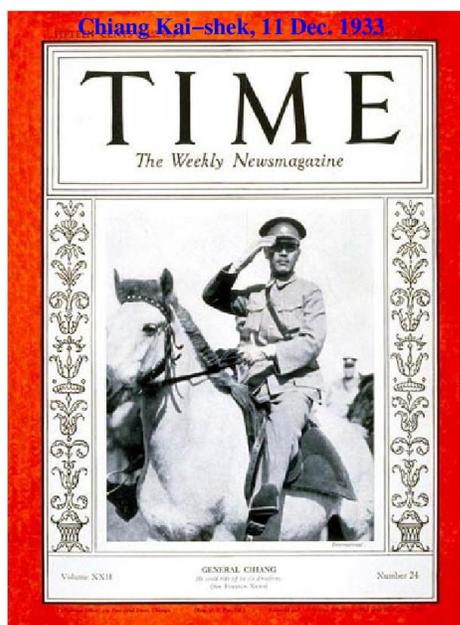


图 6.1: 蒋介石将军出现在1933年12月11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是年2月蒋派出25万精锐部队投入到第四次“剿匪”运动中。

资料来源: 英文维基百科词条“Chiang Kai-shek, public domain”

下案例中美国的介入程度也不同(依介入程度由低到高排序):

- 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Yanukovitch)于2014年倒台, 在此之前诸如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努兰(Victoria Nuland)或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在内的美国官员访问乌克兰并支持反对派领导人以及在麦丹广场露营的反政府游行示威者。在其被乌克兰国会革职流亡俄罗斯之后, 俄罗斯政府仍承认他是合法的乌克兰总统。
- 印度支那战争中, 法国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 华盛顿政府为法军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 战略规划也由美国军官监督。然而, 除了一些美国飞行员之外, 并没有美国军队参与战争。越南共产党则从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获得大批军事援助。
- 目前(2017年)美国军队在叙利亚的人数很少<sup>2</sup>, 主要充当顾问。另外, 空军不断进行轰炸, 以支持反政府团体。而俄罗斯则一直支持叙利亚政府。

<sup>2</sup>大量美国陆军部队直接参与别国内战的情况只出现在过越战和阿富汗战争中。

### 6.2.3 发生在泰国的间接对抗

马来西亚内战、菲律宾内战(即所谓的虎克巴拉哈普, 或简称虎克叛乱)、尼泊尔内战, 均为左翼人士/共产主义起义者与西方势力支持的政府之间的冲突, 然而对于这些事件很难知道中国政府介入其中的程度。我们这里讨论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例, 即2000-2017年间的泰国。

2011年路透社发表了关于泰国政治局势的长篇报道(Szep et al. 2011)。在前总理他信·西那瓦于军事政变下台四年后, 他信的妹妹英拉·西那瓦在2011年7月大选中获胜而掌权, 2014年她同样受军事力量所迫离开政坛。路透社的报道解释道, 他信·西那瓦是一位颇受农村民众欢迎的民粹主义者; 但文章并未提及他曾经坚定地支持美国而反对中国,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 从以下几个事件可以略窥一二。

- 2003年12月26日,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刊登社论《Thaksin Shinawatra, our man in Bangkok(他信·西那瓦, 我们在曼谷的人)》。从他派出泰国部队帮助美国占领伊拉克、与美国中情局合作通过“过渡程序”折磨可疑的恐怖主义者这些行为都可以看出他显然是美国的好朋友。除此以外, 泰国资源的私有化似乎也是在满足华尔街的意愿<sup>3</sup>。
- 根据中国方面的消息, 他信·西那瓦掌权时两国关系曾相当冷淡, 2006年9月他信下台后才有所改善。2014年政变以后, 中国是第一个承认泰国军政府的主要国家。
- 一直到2017年, 北京与泰国军方的关系依然很好, 这一点可以从2017年4月泰国从中国购买总价值10亿美元的三艘潜艇一事中看出。此类大宗军事采购通常具有政治意义。
- 西方媒体将泰国“红衫军”与“黄衫军”之间爆发的低强度内战报道为富裕城市和贫穷乡村之间的冲突。这种说法可能是真的, 但美国一直在背后支持着红衫军, 图6.2显示了红衫军村庄与美国的亲密关系。他信·西那瓦的网站“语音电视(Voice TV)”上写到: 目前在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工作的杰西卡·史密斯(Jessica Smith)前往东北部省份受到几十位红衫军村民的热烈欢迎。在一个村庄里有一张画着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海报, 他被视为红衫活动家的精神领袖, 上面还有英文标语: “泰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万岁(Long Live the Thai and American Peoples)”。

---

<sup>3</sup>2006年3月23日, 泰国最高法院裁定政府对出售国有电厂“泰国电力管理局(Electricity Generating Authority of Thailand, EGAT)”的授权无效, 对他信·西那瓦大面积出售国有资产的计划是一个极大的阻碍。

- 近几年来，美国国务院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每年都会拨给泰国宣传网站“实践聊泰国”超过3万美金；尽管这一数目看起来有点少，但对于这样一个报道政府腐败信息的组织来说，这笔钱足够支付正式员工的工资了。“泰国人权律师(Thai Lawyers for Human Rights)”、“泰国网民(Thai Netizen)”、“民主咖啡厅(Democracy Cafe)”这几个类似的机构，都是经常被西方媒体转载并作为独立“人权”支持机构介绍给公众的。
- 2014年5月，英拉·西那瓦最终被军事政变推翻，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清扫运动让发现她的支持者屯积了大量武器意图制造一场叙利亚式暴动。2016和2017年发生的爆炸事件足以达到制造恐怖气氛的目的(这与1970年代发生在意大利的一系列爆炸和政治暗杀事件颇为相似，而那几年被称作“Years of Lead”)。

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只要间接对抗依然存在，这样的低调内战还会继续。



图 6.2: 美国大使与泰国“红衫”村民。这张图片出现在2016年8月一篇题为《Does the US support terrorism and regime change in Thailand?(美国是否支持泰国的恐怖主义和政权更迭?)》的报道中。

来源: <http://www.globalresearch.ca/author/the-new-atlas>

### 6.3 丝绸之路倡议面临的挑战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解释过美国国务院或许并没有预见到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倡议可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美国有能力说服几个最亲密的盟友不参与其中，并且有可能说服风险超过潜在收益的国家不去参加。新丝绸



图 6.3: 瓜达尔港(Gwadar)和洽巴哈尔港(Chabahar)位置图。路支斯坦的山区是瓜达尔和洽巴哈尔的腹地。(地图来源于网络)

之路将要经过许多中亚国家，但有些沿线地区目前还相对不那么稳定，瓜达尔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 6.3.1 瓜达尔案例

瓜达尔(Gwadar)是一个位于巴基斯坦巴罗奇斯坦省(Balochistan)的海港，被认为是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地点。在2015年后半年瓜达尔港口被中国正式租用，租期为43年。2016年11月14日，瓜达尔港举行了揭牌仪式。

瓜达尔位于另一个重要港口卡拉奇(Karachi)以西650公里，开发瓜达的原因是卡拉奇港已经很拥挤了。事实上政府也正在开发第三个港口，距离卡拉奇以东30公里的卡西姆港(Qasim)。瓜达尔距离伊朗东南部的洽巴哈尔港仅70公里，洽巴哈尔港由伊朗和印度联合开发。

对于洽巴哈尔港和瓜达尔港来说，俾路支省的山区都是其内陆地区：伊朗的路支斯坦部分对应洽巴哈尔港，巴基斯坦的路支斯坦部分对应瓜达尔港。1948年、1958-1959年、1962-1963年以及1973-1977年，在巴基斯坦的路支斯坦都曾发生过分裂主义暴动。伊朗路支斯坦的分裂主义斗争并没有

像在巴基斯坦那样普遍，但2012年以来，分裂主义的影响也在扩大。以下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事件：

- 2004年5月3日，3名中国工程师在瓜达尔遇害，另有10人在汽车炸弹爆炸中受伤。
- 2016年3月29日，巴基斯坦声称逮捕了一名目前正在服役名叫Kulbhushan Yadav的印度海军军官，他受印度“研究与分析联队(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RAW)”指派在路支斯坦制造恐怖事件—用炸弹袭击居住在瓜达尔一家酒店内在此地进行深海港口项目的中国公民。
- 2017年3月12日，瓜达尔主路的一座桥下发生爆炸，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桥体也只是部分受损。

可以发现丝绸之路倡议旨在努力构建一体化，广交朋友、力求融合，通过帮助沿线国家发展基础设施促进共同的发展，这一点与美国的思路非常不同，这似乎也体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处世哲学；其实像中国致力于平台建设的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思路也是帮助其他人，促进共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两者十分相近、背后的哲学观念也如出一辙。不过丝绸之路倡议也并非完全一帆风顺，面临的具体挑战都须要在未来逐步克服。俾路支斯坦并不是目前中亚唯一的不安定、将来可能会产生更多骚乱的地区。为了给出准确的预测，需要收集之前那些暴动的相关信息，而这一问题可以是未来的研究课题。

## 6.4 信息战

现在让我们来转向一个相对不那么明显但在和平年代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信息战。我们现在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电视、网络、报纸等各类媒体可谓无处不在，而且都在竞相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注意力经济学(Attention Economy)的兴起就是例证。虽然一般都认为西方媒体是自由媒体而且现在没有所谓的信息战，但许多事实却也表明目前有些西方媒体的信息相较于从前似乎更加片面性甚至更加极权主义。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会给出一些典型例子说明现在信息战确实正在进行，而且我们还会在后面证明有些西方媒体并未变得更加自由和多样，反而在意识形态上也越发偏激。而且根据分析，我们有理由预测在未来数年内信息战会不断加剧。

### 6.4.1 应当怎样理解“信息战”？

不同媒体之间存在竞争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但“信

息战”却并非是正常的竞争，很多时候不外乎用捏造(包括假新闻)以及其他公关技术去诋毁、抹黑、诽谤对手和竞争者。

下面不妨用摘自1989年5月16日《犹他州新闻》电子版的内容为例来进行说明。以下是一些节选，中括号里的内容是我们的评论。

- “China has admit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it sent more than 300,000 combat troops to Vietnam to fight against U.S. forces and their South Vietnamese allies.(中国首次承认曾派出超过30万的战斗部队前往越南以对抗美军及其南越同盟。)” [实际上，中国从未将此事神秘化。1975年在战争一结束中国就立即报道了此事(Whiting 1975)。]
- “During the war China repeatedly denied US allegations that its soldiers were operating in Vietnam.(中国在越战期间多次否认美国对中国士兵在越南作战的指控。)” [中国仅派出了机械分队和防空营。他们在北越修建路桥、重建被美军炸弹摧毁的基础设施。根据下面的陈述，上一句中的“越南”无疑代表的是“南越”。从这个意义上讲，南越的确没有出现过中国士兵。]
- “US intelligence reports at the time spoke of US combat units finding soldiers dressed in Chinese combat gear and wearing Chinese insignia.(当时的美国情报称美军发现了一些穿戴中国作战装备、佩戴中国徽章的士兵。)” [考虑到刚才所说的，这肯定是个谎言。事实上，如果真有中国士兵在南越被俘，那么美军的情报部门一定会大张旗鼓进行报道，然而在因特网上却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证据。]

而且目前对于信息战的投入似乎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以某一免费的用15种语言在30个国家发行的反华周报为例，2016年该周刊声称其发行量达到了1500万份。我们不妨来算一笔账，以美国南加州为例，其每份报纸的成本约在0.5-2美元之间，如果依这样的成本其一年总成本约为 $52 \times 1500000 \times [0.5, 2] \rightarrow [0.39, 1.56]$ 亿美元，而这个数目差不多可以买1/4到1架先进战斗机了。而其赞助者只称自己为他们的朋友，这样一来，就不大可能知道其真正的赞助者是谁了。然而想要达到其所宣称的出版量，成本却一定是非常巨大的，这份报纸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说明对于信息战投入的成本并不小。

### 6.4.2 南奥塞梯事件

在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爆发了一场小规模战争。本书著者之一(B.M.R.)当时正在巴

黎，他记得这个消息是在一条题为《It is a tragedy, hundreds have been killed(这是一场悲剧，数百人被害)》的新闻中发布的，然而新闻并未说明这“数百人”都是谁以及谁杀害了他们。接下来的几天内也并没有更多信息被报道，但新闻标题和电视舆论一致认为俄罗斯进攻了格鲁吉亚。

随后，欧盟成立了委员会试图查明真相。由瑞士外交官海蒂·塔利亚维尼(Heidi Tagliavini)领导的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方面的陈述属实，是格鲁吉亚发动了进攻。下文摘自发布于2009年9月30日长达1150页的调查报告：

报告回答了我们之前的问题：被害的数百人是茨欣瓦利的居民，他们被格鲁吉亚军队杀害。此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军队越过边境线阻止了屠杀，解救了南奥塞梯的居民。事实上，由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一项协定，格鲁吉亚这个省的官方地位很特殊。格鲁吉亚军方(当时拥有一大批美国顾问)原计划利用俄罗斯总统在北京的机会占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除掉地方领导人，废止这一特殊地位。然而，侵占行动遭到了民兵组织的猛烈反击，这就是格鲁吉亚军队从该城市撤退并炮轰它的原因。

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所有的法国媒体和欧洲媒体都错误地报道了此事？这很可能并非由于信息难以获取，因为当时数家俄罗斯媒体都用俄语和英语报道了那条后来被证明属实的陈述。另外法国记者也完全有可能致电俄罗斯大使馆，然而最终他们展示出了一条令人困惑和尴尬的版本，并将俄罗斯描述成了侵略者。

### 6.4.3 中国对西方企业的收购

东京股市价格和日本的房地产价格在1980年代末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这让日本的公司获得了充足的现金流，得以有能力投资或收购许多外国公司(尤其是美国企业)。结果许多西方新闻媒体、小说和电影都在抗议日本人想要把全世界都买下；但事实上，日本在海外的总投资相比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可谓微不足道。同样的情景目前正在重演，只是日本被换成了中国。

从一些报道中我们可以大致体会到西方媒体目前对于中国在海外投资与收购的反应。当一家深圳公司海能达(Hytera)尝试收购加拿大诺赛特公司(Norsat)时，因特网上出现了这样一些言论<sup>4</sup>：

- “BETRAYAL: Trudeau lets China take over sensitive Canadian company WITHOUT security review.(背叛：特鲁多<sup>5</sup>未经安全审查就让中

<sup>4</sup>资料来源：<https://www.spencerfernando.com/2017/06/08/betrayal-trudeau-lets-china-take-sensitive-canadian-company-without-security-review> (2017年6月8日)

<sup>5</sup>贾斯汀·特鲁多于2015年11月4日就任加拿大总理，他在43岁上就任是加拿大历史上第

国接管敏感的加拿大公司。)” [而特鲁多澄清这一收购经过了安全审查，并曾咨询美国方面，上述言论不实。]

- “Trudeau is letting China buy up our country piece by piece.(特鲁多正在一块一块地把我们国家卖给中国。)”
- “Over and over again, Justin Trudeau has shown a disturbing willingness to do the bidding of China, even wh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Canada and our allies could be at risk.(一次又一次，贾斯汀·特鲁多面对中国投标所表现出的意愿令人不安，即便当加拿大和我们的盟友国土安全面临风险的时候也是如此。)”
- We should never let China, an undemocratic authoritarian state, buy a company that has worked so closely with both our government, and our close allies.(我们决不能让中国，一个非民主的独裁国家，收购任何一家曾密切地为我们的政府和亲密盟友服务的公司。)”
- “Hytara has been accused by Motorola of a massive theft of Motorol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s now facing a court case over the matter.(Hytara公司已被摩托罗拉起诉涉嫌大量盗窃摩托罗拉公司的知识产权，并可能因此面临庭审。)”

下面的句子表明，此类争论甚至被用于非高科技公司。

- “Trudeau also let a shady Chinese company buy the largest assisted living company in British Columbia, which gave China the chance to enter our healthcare system.(特鲁多还允许某一中国影子公司收购不列颠哥伦比亚最大的生活辅助公司，让中国有机会涉足我国的医疗系统。)”

接下来是腐败和叛国的直接指控。

- “Who can forget the Cash-For-Access fundraisers with Chinese billionaires? Does anyone believe it’s just a coincidence that Trudeau raised all that money and then approved China’s takeover attempts? It raises the serious question of whether our government is now serving as a proxy for foreign interests. There is something very disturbing about

---

二年轻的总理。

that.(谁能忘记华裔富豪举办的“交钱见总理”募捐宴会?有人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吗?特鲁多筹集了那些钱,然后同意中国的收购企图?这引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政府现在是否是外国利益的代理人?这件事令人非常不安。)”

如果我们去收集过去对于日本在海外收购的抗议或网络上的言论,进行简单的语义分析,并将这一结果与目前对中国在海外收购的反应进行对比,我们或许就能更定量地看出两者相似程度如何。不过考虑到日本毕竟是西方的亲密盟友,可以预测到对于中国的言论应该会比对于日本的更为激烈。

#### 6.4.4 反共产主义如何塑造美国媒体

百年前西方媒体曾有过非常自由且多样化的时期,各类观点和解读都能在报纸上看到。例如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作为《纽约日报论坛(New York Daily Tribune)》的欧洲通讯员为这份报纸在1852年8月至1862年2月期间撰写了大约400篇文章(相当于每个月3篇),这是一份重要的美国报纸<sup>6</sup>,对于马克思而言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论坛,因为它足够便宜,许多工人阶级都能读到。换句话说,彼时各种观点都能够在美国报纸上得以表达。

然而,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的几十年间,这种情形逐渐改变,在1945年后的冷战时期愈演愈烈。早在1920年1月,针对左翼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和俄国移民的所谓“红色恐慌(Red Scare)”和“帕默突袭(Palmer's raids)”显示了美国政府防止任何革命影响进入本国的决心。在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签署的9835号行政命令,要求筛查所有联邦公务员的“忠心”,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个人行动于1954年6月结束,但实际上麦卡锡主义只是一段插曲,反左翼分子运动持续的时间要比麦卡锡主义<sup>7</sup>时期(1950-1954)长的多(参见图6.4)。除了政府雇员,所有能够影响公众意见的专业人士(如记者、作家、教师、教授和电影导演)也都受到影响,许多人因此失去工作甚至被监禁。而结果就是原本多样化的意见被单一的共识所取代(例如当时在经济学课堂上几乎只剩一种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目前其仍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是全球绝大多数西方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

<sup>6</sup>1924年它与《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合并,合并后更名为《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这一报纸到1962年一直在发行。

<sup>7</sup>McCarthyism/,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人颠覆和叛国等罪名。(参见维基百科文章《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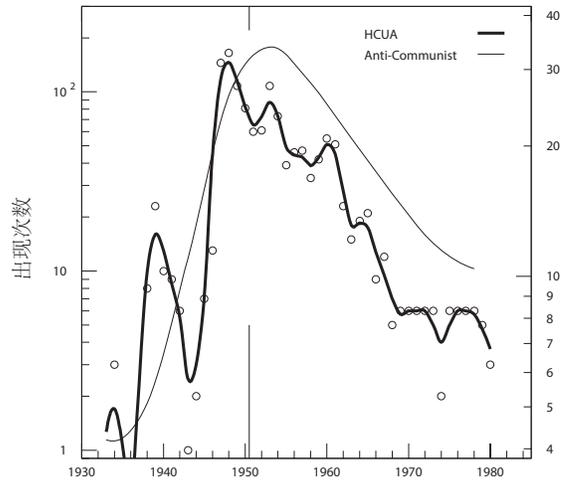


图 6.4: 《纽约时报》上与反左翼运动相关的文章的数量。粗实线表示每年《纽约时报》发表的包含“Communists(共产主义者)”和“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HCUA(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两个词条的文章数量, 1941年之后这一数字大幅跌落是因为美国和苏联在二战中形成了对德军事联盟; 细实线表示《纽约时报》每五年发表的包含“anti-Communist(反共产主义者)”词条的文章(其数量对应右手边的坐标尺)。竖线对应朝鲜战争开始的时间。注: “Communist”一词有相当宽泛的含义, 它常常被用来指称所有的左翼人士(不论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 HCUA成立于1933年, 其任务是获取外国颠覆性宣传如何进入美国、以及那些传播相关言论的机构的信息。(资料来源: 《纽约时报》电子索引)

无独有偶, 在大量其他案例中, 欧洲媒体都歪曲事实, 紧紧跟随美国国务院的版本。例如近年来发生在叙利亚的冲突就一直被误传, 媒体忠实地报道了英国的反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站(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的消息, 但却未费心采访叙利亚大使。不幸的是, 欧盟不能也没有成立委员会来调查所有这些案件。

#### 6.4.5 西方政府进行的媒体监管

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声称他们拥有“自由的”媒体。这种自由应该如何理解? 大部分西方媒体确实是在自我审查的基础上运转的, 但如果认为政府机关完全不进行干预则是错误的想法。下面是三个例子。

- 不列颠联络办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s)是英国管理各广播电

台为它们设定规则的机构，它有权吊销任何电台或电视台的执照。2011年11月一家盎格鲁-伊朗网站“新闻电视台”，由于在一档节目中“不恰当地”报道了2009年6月的伊朗大选而被联络办公室罚款10万英镑。随后，2012年1月，联络办公室吊销了“新闻电视台”的执照。根据这一决定，“新闻电视台”在英国无线电波上无法播放。

- “媒体高级理事会 (Conseil superieur de l'audiovisuel, CSA)”是法国管理各电子媒体(如广播和电视)的机构。2004年12月14日，CSA命令法国基站卫星公司(欧洲电视卫星)在48小时内停止转播黎巴嫩电视台Al-Manar，因为后者播出了对法国的仇恨言论(参见BBC新闻2014年12月14日)。Al-Manar是一家黎巴嫩卫星电视台，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也在这里”运动所支持，问题不在于这项运动是否出于正当理由，而在于禁令本身。有趣的是，2004年12月17日美国也禁止转播Al-Manar，随后西班牙和德国也禁止转播该台。
- “广播理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BBG)”是美国政府的代理机构，负责监管“美国之声”(VOA)、“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和“马蒂广播电视台”。理事会由9名成员构成，其中8名由总统任命，第9位由国务卿担任。2016财年，BBG的预算达到了7亿5千万美金。

信息战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对因特网的控制。自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曝光以来，谷歌、推特、脸书等美国主要公司都与美国安全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由美国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资助的国际报业网站，其官方目的只是为了以他们声称的公平方式分享信息；但这就跟医生们说制药公司给他们的津贴不会影响到他们给病人开药时对药物的描述一样是信口开河。

#### 6.4.6 谁将赢得信息战

要做出这一预测很容易，只需要观察对于每个事件欧洲媒体如何转载美国版本而不试图以任何方式检查信息。此外，在国际问题上，美国媒体的观点与美国国务院的愿望密切相关，而且大小事件几乎都是如此。例如对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歪曲(见Schwarz 2013)，以及对许多其他重大事件的误传，例如所谓的“柏林封锁”<sup>8</sup>。

<sup>8</sup>柏林位于东德，但柏林本身又分为西柏林与东柏林，西柏林可以被看作某种意义上的飞地。由于冷战的原因苏联和西方国家关系恶化，苏联遂封锁了西方盟国通向在其管制下的西柏林地区的道路和铁路。但事实上西柏林和东柏林及东德之间的流通仍是可能的，通过这些渠道也仍有贸易活动在进行。

为什么欧洲媒体如此怯懦地跟随被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务院主导的美国媒体，这仍然是个迷。然而，我们依然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1977年12月26日，《纽约时报》刊发长文(Crewdson and Treaster 1977)披露美国政府<sup>9</sup>拥有或控制了大量欧洲和亚洲的报纸和图书出版商。那么几十年后的今天，情况是否还一如从前呢？或许是，或许不是吧。

顺便说一句，美国对欧洲媒体的影响不仅限于新闻部分，在文化届也有重大影响，甚至起主导作用。根据本书法国著者(B.M.R.)的实际经验，法国最流行的电台“卢森堡广播电视台(Radio Television Luxembourg, RLT)”播放的歌曲中，60%为英文歌，剩下的40%是法语歌。这就意味着，德语歌、意大利语歌、西班牙语歌(这些都还是法国的欧洲近邻)的份额差不多为0%；小说和电影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 6.4.7 媒体在日本的作用

200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日本民主党秘书长小泽一郎率领600人的代表团访华(其中包括146名上下议院的议员)，在北京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称小泽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访问期间，胡主席表示他和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改善了两国战略关系并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中日之间亲密的战略关系对于美国来说简直是灾难；而要摆脱这位不理想的领导人，最简单的办法或许就是经济丑闻，真假并不重要。

2009年，小泽一郎就被指控伪造政治献金报告。2010年1月，小泽一郎的两位助手被捕。2010年4月，某起诉调查小组得出结论称“小泽一郎很可能是(其助手的)同谋”。2010年1月，小泽一郎宣布辞去日本民主党秘书长一职。然而小泽一郎在2011年4月被东京地方法院宣布无罪。而对小泽一郎的调查也影响到了鸠山由纪夫，有消息称鸠山在2009年12月从他母亲那里收到一笔400万美元的捐款，但没有适当地进行汇报。经过媒体长达数月的骚扰之后，鸠山在2010年1月2日宣布辞去首相一职<sup>10</sup>，当时他执政还不

<sup>9</sup>这是一篇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的文章，这个组织执行的当然是国务院和白宫的决定。CIA由美国国会拨款，他们本身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是不得采取任何行动的。

<sup>10</sup>这位前首相被来自同一党派的其他人所取代，但新首相对中国并不友好。

2012年4月，鸠山辞职还不到两年，东京右翼总督启动了钓鱼岛-尖阁列岛事件。不过与中国的争端在2012年9月才真正开始，当时日本民主党政府(即鸠山所在的政党)将其中三个岛屿纳入了日本版图。

随后在2012年12月的大选中，日本自由民主党以压倒性的胜利重新执政。这个党派从1946年就是执政党，几乎没有间断过。因此对于美国国务院来说，局面又恢复正常、甚至更好了——因为钓鱼岛-尖阁列岛争议足以使中日关系长期不和。

到9个月，不过鸠山从来没有因为400万美元捐款的事被起诉。

显然，对小泽和鸠山来说，这些指控或许都缺乏确凿的证据，但事实上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媒体对此事的放大。而此类事件往往如出一辙：先是对不恰当行为的爆料指控，紧接着是媒体的轰炸，直到目标被迫辞职。尽管在每个独立事件中几乎不大可能知道谁是真正的幕后推手，但对重复出现事件的比较分析通常更具启示性(Roehner 2007, p.147-148)。

## 6.5 结论

根据本书前述部分章节的内容我们可以做出哪些可以验证的预测呢？

- 根据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的GDP有望在2020年左右超过美国。
- 201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超过了美国，根据第2章中英镑-美元案例的估测表明，2050年前后人民币有望超越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这一推测应被视作物理学中的数量级的估计，换句话说，这一情况可能会在2040年或2060年实现，但几乎不可能是2025年。同样的思路，进一步的推测显示，人民币将在2100年左右达到央行储备金的主体地位。这一推测比上一个更困难、更难以确定，原因是上一个预测是一个二体问题，仅涵盖美元和人民币，而这一推测是一个多体问题，涉及到了其他各主要储备货币。印度的卢比即可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的候选。
- 人民币与美元在贸易(尤其是石油贸易)中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 在高附加值产品市场上也会有竞争。
- 美国的盟友国会继续协同合作实行一定的遏制措施。
- 在某些丝路沿线国家的分裂团体会继续活动。
- 信息战已经开始，并且会在未来数年内进一步加剧。美国在媒体产业的统治地位可以被用以影响全球舆论，例如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被描述成一种威胁，而且中国军队的力量也可能被过分夸大。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的数月，西方媒体将伊拉克军队描绘成全球最齿具战斗力的部队之一；而在冷战期间，美国媒体也将前苏联的军事力量描述地非常强大(而且这样的报道也会让美国大众对于前苏联更加恐惧)。这样的报道实则都是受到国防部欢迎的，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从国会得到更多的拨款。所以一个预测便是美国媒体或许会

对中国军队持同样的观点和态度，而且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一些报道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例如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海军的驱逐舰远比日本与印度的先进，甚至可能比美军驱逐舰先进<sup>11</sup>，但文章却忽略了美军驱逐舰的数量是中国海军的5倍之多这一事实。

想要将这些一般化的预测转变为更具体的描述和预测，就须要对于每一个案例进行细致分析。例如对于瓜达尔案例就须要找出尽可能多的过去分裂活动事件(例如爆炸、枪击、人质劫持等等)，从中找出其潜在的模式与其行为策略集。当然对于这一具体案例的分析显然超过了本书的范围，但是对于计划在相应地区工作的中国公司，进行这样的分析则会十分有用，这样的研究或许能够为公司提供如何避免严重事件的发生提供一些建议。

---

<sup>11</sup>参 见<https://www.forbes.com/sites/ralphjennings/2017/06/29/chinese-navy-destroyer-can-beat-japan-india-and-maybe-the-united-states/#51283d795000>



## 第二部分：概念与方法



## Chapter 7

# 比较历史分析学：历史学与社会学之合璧

发表于1992年的《Where History and Sociology Meet(历史学与社会学交汇之处)》(Jhon R. Hall 1992)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但也问题重重的学科，事实上从马克思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的年代开始，历史上就有过数次试图结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尝试。这一领域通常被称作社会历史学(sociohistory)或者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这一新学科原则上可以融合其父学科的不同潜能：历史学能够提供对特定事件广博详细的知识，而社会学凭借其理论洞见得以让我们组织和构建海量的经验证据。这一构想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毋庸置疑，这两个学科的联姻也有多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包括Connor, Goldstone, Hechter, Laitin, Flora和Tilly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对历史社会学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但现在的历史社会学看起来仍然更像是多种不同方法的拼接，而不是拥有完整体系的学科。不过这一领域丰硕而多样的研究成果也证明这个学科极具生命力与吸引力，而且近年来其发展也非常迅速。霍尔(Hall)在其1992年的文章中就对这一领域可能的和已有的不同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给出了颇具洞察力且一针见血的分析。

我们将在本章的第一节简要介绍我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在第二节中将讨论不同研究方法的选择，这些方法的细节将会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中详细给出。我们方法论最重要的特征是聚焦于“简单的”现象，这是我们方法的出发点。因此，考虑一系列这样的“简单”历史现象(historical manifestations)，使得我们能够把握内在规律进而对不断重复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入研究 and 讨论。最后为了让读者对我们的方法所能提供的解释力有一个切实的感受，我们将在第五节中简要介绍一些在后面的章节中被详细讨论的模式(patterns)。一般来讲，对一个确定性模式的观察是理论

探索的起点。我们也将在本章中介绍一些包括模块化(modularization)、同源性(paronymy)、节约性(parsimony)和集体历史记忆(collective historical memory)在内的一般概念，这些概念也会贯穿本书始末。

## 7.1 因为简单而非因为重要

法国大革命<sup>1</sup>只发生过一次，但是巴士底狱(见图7.1)历史上曾被攻占过三次(1560、1588和1789年)、三级会议一共召开过大约20次、没收教会资产的事件(episodes)<sup>2</sup>在欧洲发生过不下15次。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将复杂的现象或大事件划分成简单的小模块或过程，我们就可以研究多个事例(instances)而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历史事件。这样一来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方法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完全不同的视角，因为众所周知，对单个事件我们能做的更多的是描述，但想要对这一特定事件给出科学、系统的解释是几乎不可能的(每个特定事件总有偏离于统计规律和一般理论的特殊之处)。换一种说法，通过考虑一系列的事例，我们就可以从单纯的历史学研究转向比较历史学和比较社会学的范畴。下一节中的类比能够解释为什么将复杂现象分解为简单过程同时也具有其他的许多优点。

### 7.1.1 没那么简单的实验

我们不妨设想下面这样一个实验：一个人从冰箱拿出一瓶可乐，倒进一个纸杯，可能她或他不喜欢喝冰可乐，就把纸杯放在了餐桌上阳光能照

<sup>1</sup>事实上法国共有过三次大革命，分别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当我们没有特别说明时“法国大革命”一词指的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切源自于1789年5月召开的代表全国民众的议会，国王召见议会，希望他们支持征收新税。议会被称为“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其中“财产(Estate)”一词指代人民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一，“全体(General)”一词说明了一个事实：该议会代表了整个国家，而不是仅代表某个省份。议会共分三级：教士、贵族和普通民众。“三级会议”在1614年以前召开得相当频繁，但这一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召开过。因为议会试图掌权，而不仅仅是支持通过新税，议会对国王的抗议迅速激化。随着巴黎人民对议会的支持，抗议演变成一场武装起义。武装群众于7月14日攻占了位于巴黎东部的巴士底狱。

由于国家负债在过去数年中已然成为法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财政形势在1789年依然紧张，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议会于1789年11月2日宣布教会的财产“应由国家处置”。教会财产(约占全国土地的10%)随之被出售，其购买者也就成了大革命的拥护者，因为他们很清楚，旧秩序一旦恢复，他们将不得不交回他们的财产。在一些欧洲国家从天主教(Catholic)转向新教(Protestant)的过程中(基督教主要分成三大宗派：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类似对天主教教会财产的充公已经发生过。

<sup>2</sup>Episode是事件(event)之意，但通常它指持续时间较长的事件，而英文中的event则通常是指时间相对短(例如适于一天)的事件。举例来说“三级会议”这样的事件通常会持续数周，在英文中它被称作episode而非event。



图 7.1: 历史绘画中描述的巴黎城墙(左)和巴士底要塞下面的护城河(亦即水路)。这座城堡大约建于1380年。在1588年宗教战争期间,巴士底狱向天主教联盟领袖吉斯公爵(Duke of Guise)投降。来源: 维基百科文章《巴士底狱》: 十九世纪绘画, 作者Feodor Josef Hubert Hoffbauer。

到的地方。可乐会慢慢升温, 这个实验可以被称为“一杯可乐的升温”(如图7.2所示)。这个实验虽然听起来非常简单, 但从物理学家的眼光来看, 它实际上却异常复杂(见表7.1)。首先, 在纸杯表面和可乐的上表面, 阳光转化为热能; 直到20世纪初, 物理学家才完全搞懂了电磁辐射如何转化为热能(Wien法则)。然后, 热能由纸杯传导到液体; 热传导过程相当复杂, 直到19世纪末, 热传导的物理模型才建立起来。最后, 向阳一面的可乐升温比较快, 这样就在可乐中产生了对流; 流体力学的Navier-Stokes方程组把对流现象描述得非常清楚, 但这些方程非常复杂。即使只是为了近似地预测这一系列过程, 高速计算机也需要计算好几个小时。

这个实验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1) 很多人都声称社会学和经济学现象远比自然科学现象复杂, 但正如上述实验所展示的那样, 这种断言是有问题的: 一杯可乐的升温过程实际上非常复杂, 尽管我们已经做了许多简化(例如我们并没有考虑气泡的影响); (2) 我们如何解释近几个世纪以来物理学获得的巨大成功呢?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物理学家只考虑简单问题。从没有人尝试为一杯可乐的升温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物理学家只关注实验现象里不同的子现象: 光能到热能的转化、固体中的热传导等; 并且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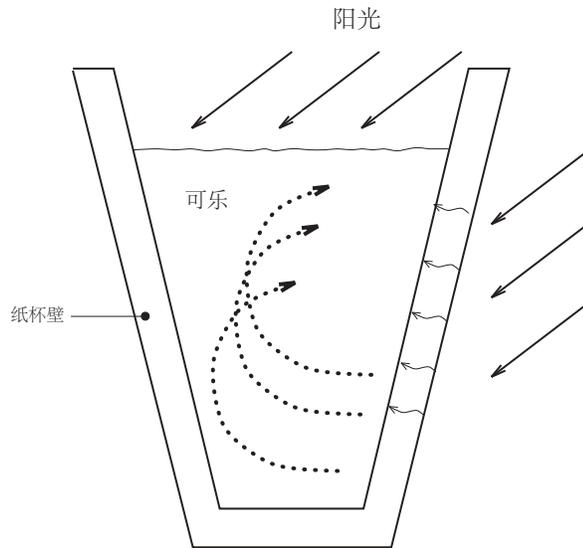


图 7.2: 一杯可乐的升温。图中展示了一杯冰可乐放在阳光下的升温过程。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但是以物理学家的眼光来看，这个实验实际上非常复杂。理解这个实验需要物理学四个分支的知识：利用光学解释光能转化为热能的过程，统计物理解释杯子的热传导过程，流体物理解释杯子内部不同位置上不同温度的可乐导致的对流现象，热力学解释液体内部的热能扩散过程。大多数人通常认为社会现象比自然科学更复杂，但这个例子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

可能的最简单的条件下研究每个子现象。举例来说，相比于非均质材料(比如纸张或者硬纸板)，铜或铝的热传导更易于研究。一般地，物理学研究都会忽略过于艰难的问题，即使那是非常基本、非常有实用意义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水的沸点是100摄氏度而不是120度？为什么铁具有磁性而铜或铝不具有？这些问题在教科书中都没有被提到过。

### 7.1.2 简单性：人类思维的基本要求之一

把复杂现象分解为简单过程不仅适用于物理学，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学科。在天文学中，火星的天体力学法则首先被建立。虽然受大体相同的力学法则支配，但是彗星和小行星的轨道更难计算。同样的道理，正如帕累托敏锐地指出，引力法则的发现也是受益于一定的简单性(Pareto 1917)：太阳的质量远大于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大约是其质量的一千倍)，如果是在其他更复杂的情况下(比如较轻的太阳或者双子星系)，行星的运动轨迹

一杯可乐的升温过程	
现象	涉及的学科领域
光能转化为热能	光
热能在固体和液体中的传导	统计力学
温度差导致的对流	流体力学
可乐中热能的扩散	热力学

法国大革命		
现象	在法国发生的次数	在欧洲发生的次数
债务对君权的削弱	10	30
资产阶级与教会的政治联姻	5	15
没收教会资产	1	20
在首都发生的暴动	5	25

注：各类事件与现象在法国发生的次数是经过详细统计得出的，而对于在欧洲发生的次数则是一个相对粗略的近似估计。

表 7.1: 将复杂现象分解为小模块

将更难计算，进而导致牛顿法则更难被发现。同样在化学领域，分析简单的化学元素让我们成功建立起了化学基础概念，而如果一开始就研究那些更有实用价值但也更复杂、更难以分析的木头、钢铁或者葡萄酒之类物质，那么化学学科的建立将会更加困难。类似的，遗传学的基础法则也是通过孟德尔分析简单的豌豆实验和摩根对果蝇实验的分析而建立的。

事实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分而治之”，这个法则在三百多年甚至更早之前就被哲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尔(Descartes 1965 [1637])提出了。这样，“模块化方法(modular approach)”这个术语就是指把复杂问题分解为简单的小问题。

现在模块化方法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非常流行，因为模块化方法能够有效利用自然界中最稀缺的资源—智力资源(Snooks 1997)。假设一个程序员要编写一个机票预订系统。他会首先设计不同的模块(诸如时刻表模块、票价模块、还有预订操作模块等等)，每个模块同样也有子模块结构。这样一来，如果由于需求变化或流量变化导致需要进行一些更改，我们就只需要修改相关的子模块；相反地，如果软件没有实现模块化，任何小变化都可能需要修改整个系统。简言之，模块化方法有两个优势：一是节省工作劳

力，二来更为重要的是模块化得以让人类知识进行累加。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从另一个视角来讨论第二点。

### 7.1.3 现象学方法的局限性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来解释一杯可乐的升温过程：通过重复观察可乐在不同强度的阳光下的变化，我们还是可以大略得出光的强度和对流的速度、可乐上层温度的变化存在关联这样的结论。这样做可以绕过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复杂过程；在物理学领域这种方法被称作唯像/现象学模型(phenomenological model)：这是一种纯粹基于实证数据和统计学工具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被应用在计量统计学领域，也有一些社会学研究者采用了计量经济学家的这一技术方法。

这种方法因其简易性确实很吸引人，但是这种简易性很多时候只是一种错觉：现象本身仍然是复杂的，只不过模型看起来简单了而已。而且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把纸杯换成玻璃杯，那么所有的研究都要重新从头开始；类似地如果我们把可乐换成牛奶或者水，之前所观察到的关联可能也就不成立了。换言之，使用唯象模型进行研究时，即使只是某一参数发生了变化，整个研究都须要从头开始。相反，一旦通晓了光能如何转换成热能，那么当液体的颜色或反射率发生变化时，物理学家就知道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得到正确的结果。

经济学家有时会叹息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并没有出现积累性增长(Summers 1991)，这种“西绪福斯综合症”(Sisyphus syndrome)可以被归因于历史学研究者对将复杂的现象分解成简单问题缺乏兴趣。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检视这种模块化方法如何被应用到历史学中。

### 7.1.4 历史学中的模块化方法

让我们回到法国大革命的例子来看简单性和模块化的想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体现。我们已经提到了法国大革命所包含的三个可能的模块(三级会议、没收教会资产、巴黎暴乱)，而且无需明言，这三个事件(episodes)只是一个更大样本空间的一部分(参见图7.3)。韦纳在法国大学的公开演讲中也曾提出过类似的将复杂现象分解成模块的研究方法(Veyne 1976)，可惜的是他后来没能真正进行这样的研究。

接下来要展示的是如何分别研究这些不同的模块，以及从这种模块化研究方法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方法具体的过程，我们须要先了解一下三级会议：在1789年之前的法国、英国、西班牙、瑞典、德国的某些州(如巴伐利亚、黑森、普鲁士、萨克森、符腾堡州)和其它许多欧洲国家，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和议会(parliaments, 18世纪以前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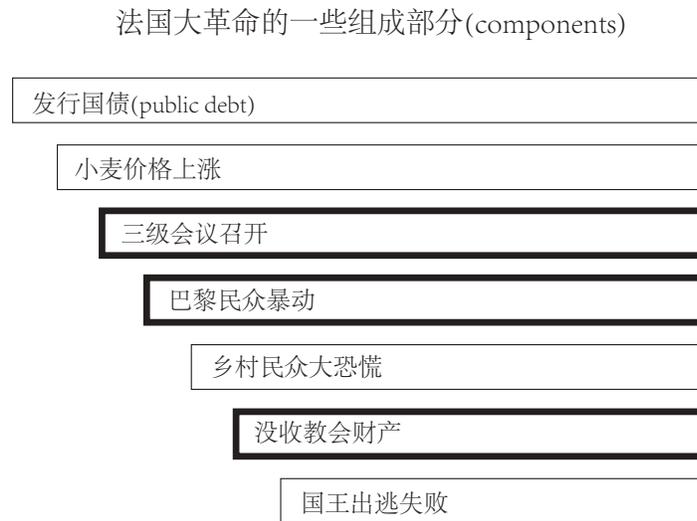


图 7.3: 法国大革命就如一杯可乐的升温过程一样, 可以被分解成几个独立的阶段(其中加粗线框的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因素)。不言自明的是, 其它的阶段也可以加入到这个列表, 例如旺代(Vendee)和布列塔尼(Brittany)之战。通常这些部分还可以分解成更细小的组份。理论上这种把复杂现象分解成组成模块的做法, 有点类似于利伯森所提倡的把知识累积建构出新知识的方法(Lieberson 1992)。

两个词几乎可以交换使用)都在反复召开。通过比较不同国家间的这些会议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例如它帮我们了解了在何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和教士结成战略联盟、显示了负债对君权的削弱程度[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 请参见文献(Goldstone 1991)]、还能发现对《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的投票是中产阶级和君权力量博弈中的关键一步。所有那些在1789年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事件其实都可以在早期法国或其它欧洲国家的三级会议上观察到。许多研究都和类似的问题相关: 例如对于德国各州议会的研究(Carsten 1959)、详细介绍法国三级会议历史的书籍(Picot 1872), 但当时那些研究都是比较偶然、非系统化的。虽然当年也因对这类问题的研究而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比较历史学家, 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 比较历史学仍然缺乏可靠且统一的学科基础。

### 7.1.5 应用

下面我们将用三个例子来展示将复杂现象分解成小模块所能具有的实用

性意义。

- 1789年的路易十六要怎样做才有可能保住他的王位？

如果路易十六在1789年能够仔细研究他的祖先查理五世面临的类似情况以及其在1358年2月至3月间所采取的行动路线，那么路易十六也许能够保住他的王位和性命。

国王的权力在1789年7月后的几个月内受到了侵蚀，他似乎接受了国民议会的改革，但实际上，他的优柔寡断使其在许多重要决定上越来越依赖王后。值得一提的是，王后是奥地利女王的女儿。在大革命爆发两年后的1791年中期，法国与欧洲其他主要的君主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特别是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关系。

在王后的怂恿下，路易十六决心铤而走险，向东北部的边境逃亡。1791年6月20至21日的那个夜晚，大约凌晨1点钟，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以及若干仆人(加起来大概有12个人)乘坐两辆马车(一辆小马车以及一辆为这次逃亡特别制造的重型马车)离开巴黎。这次逃亡计划主要是由王后的最爱(可能是情人)——瑞典伯爵Axel von Fersen——设计的，这位Fersen伯爵已经获得了瑞典国王格斯塔瓦斯三世(Swedish King Gustavus III)的支持。王后和Fersen伯爵此前交换了用繁复密文加密过的信件(见图7.4)。

Fersen和王后究竟有什么计划？他们的目的地是距离巴黎东北方向250公里、边境以南大约10公里的蒙梅迪(Montmédy)要塞(现在该地区属于比利时，但在当时是奥地利的一部分)。Franois de Bouille将军在蒙梅迪集结了一支拥有近万兵力且并被认为是忠于国王的部队。这支部队包括两个瑞士和四个德国雇佣军团。有人希望借助这些部队的力量迫使法国人民反对大革命。来自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 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的私人信件表明她的目标是不加让步地恢复旧君主制。

马车在距离蒙梅迪大约50公里的瓦兰(Varennes)被拦下，国王被捕并被押解回巴黎。在王后及其奥地利和瑞典支持者的建议下，国王随后拒绝执行他曾宣誓维持的1791年宪法，而且他本人还致力于一项秘密的反革命政策。

上面的论述来源于英文版维基百科上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章，而这篇文章是对法文版维基百科上关于法国大革命文章的相当简短的总结和翻译。依其论述方式来看，这篇英文版维基百科上的文章并不太可信：

— 国王出逃是在6月21日早晨8点被发现的。拉斐特将军(General Lafayette, 其部队本是负责保护国王)立即派出骑兵侦察员前往国王可能逃脱的方向。国王只比追兵提前了7个小时出发，而且他们的重型马车比侦查员的马匹慢得多。因此国王的踪迹应该很容易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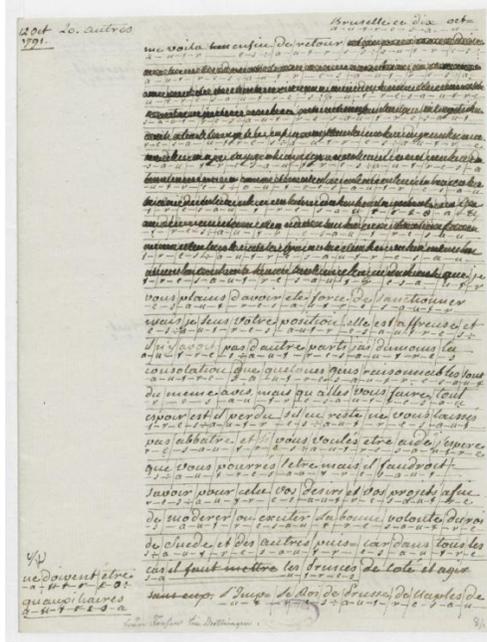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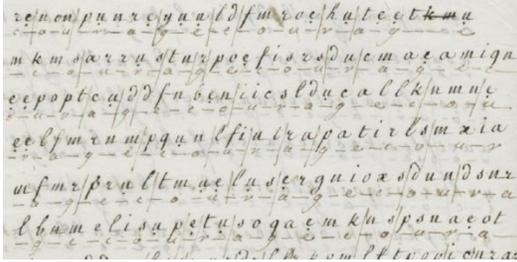


图 7.4: 摘录自两封由法国王后Marie-Antoinette送给瑞典伯爵Axel von Fersen的加密信件, 后者时任瑞典国王的官方代表。信件中的内容用了三种手段掩盖: (1) 有些部分使用了当时外交官们常用的加密方法予以加密; (2) 另一些部分是在可见字的行与行之间, 用隐形墨水书写, 这是一种相当原始的方法, 很容易被识破; (3) 有些部分被Fersen本人或他的后代所划掉。然而在20世纪法国国家档案馆购得这些信件后, 一些新的内容得以解读, 比如下面这句写于1792年1月4日的话: “在合上这封信之前, 我甜蜜的、最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告诉你, 我多么疯狂地爱着你, 我的思绪始终与你同在”。

图片来源: 法国杂志《科学与未来(Science et Avenir)》官方网站。

— 我们说过国王被捕的地点距离蒙梅迪只有40公里，那里有10000名士兵正对他翘首以盼。他们当然应该听说了国王被捕的消息，并且应该曾计划在他到达之后交出他。

— 据说国王在离瓦兰并不远的圣默努尔德(Sainte-Menehould)才被当地的邮政局长。这可信吗？从巴黎到瓦兰的旅程花了18个小时，在此期间还得换马好几次。

通过两种论述的对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英文版本的论述中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只是不完整，但这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差异。选择性遗漏是故意制造假消息的常用手法。

当年查理五世面临三级会议和巴黎人民的反对时，相比于路易十六他的处境是更加艰难的，因为当时国王约翰二世被关押在英国，而他还只是王储。然而查理五世不仅保住了他的宝座，而且在一年之内就遏制住了巴黎起义。他的计划是离开巴黎前往各省会城市来获取支持，并以此隔离巴黎叛军。他逃离巴黎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失败了，但一周后他设法逃到了巴黎北部约40公里外的桑利斯(Senlis)，这里有他的许多支持者。正如我们所知，路易十六也试图离开巴黎，但他的计划和查尔斯的战略却鲜有共同点。第一个问题是他等得太久了：在1789年时议会还没有很强的影响力，在那时他仍是国家的权力中心；但到了1791年6月，自他同意国王的权力应该受到议会限制之后，他的权威就已经开始下降，而与此同时议会的权力在不断扩大。第二个问题是他当时直奔一个比利时边境上的小镇蒙梅迪，而不是前往主要的省会城市寻求庇护(见图7.5)。比利时当时是奥地利的一部分，而向奥地利寻求庇护被法国民众视为背叛。路易十六在瓦雷纳-阿尔贡被发现并被逮捕。当然我们无法确知当时他是否能有更聪明的计划来力挽狂澜，但至少学习查尔斯的经验应该会让他采取更明智的行动。

类似的情况第三次在法国发生是二十世纪。在1968年5月法国国内学生和工人运动不断高涨，从五月中旬到五月末的大罢工几乎让全国处于停摆状态。戴高乐总统(President de Gaulle)在5月29日下午乘直升机忽然离开了巴黎，而且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动身。总统的这一举动导致了一个权力的真空状态(power vacuum)。事实上他前往了位于德国城市巴登-巴登(Baden-Baden)的法国军事总部与雅克·马苏将军(General Jacques Massu)进行商讨。因为他要确保军队在必要时会站在他一边。戴高乐在次日回到巴黎之后，马上向公众宣布自己前一天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这样他几乎没有费什么口舌就让示威的民众意识到他已经确保了军队会忠诚于他，而这无形中增加了他在民众当中的权威。

总而言之，戴高乐在更短的时间内重复了查理五世的策略<sup>3</sup>。查理五世

<sup>3</sup>当年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六离开巴黎有两个相同的目标：一是他们的离去会导致短期内难以填补的权力真空，二是通过加入外部支付者来增加其权威

在1358年3月25日离开巴黎并于1358年8月2日返回(具体信息可参见法文维基百科词条“Charles V le Sage”), 而戴高乐则只用了一天时间。不过在结果上二者都是成功的, 当他们再度返回巴黎时都受到了多数民众的欢迎和庆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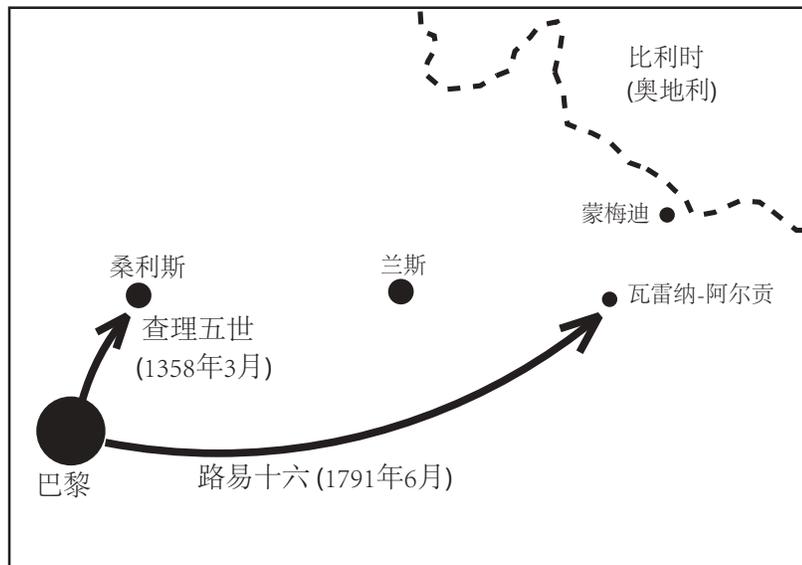


图 7.5: 查尔斯五世(1358年)和路易十六(1791年)出逃路线的比较。查理五世并没有远离巴黎: 他在距巴黎仅40公里的桑利斯得到了他的支持者的庇护。相反, 路易十六试图前往距巴黎240公里的比利时边境小镇蒙梅迪(Montmédy)。比利时在当时是奥地利的一部分, 在1791年6月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已经闹僵, 两国间的战争随后一年内便爆发。路易十六在瓦雷纳-阿尔贡(Varennes-en-Argonne)被发现, 他的卫兵被解除了武装, 而路易十六就此被捕入狱。

有时对历史事件的仔细分析并不足以改变当时的历史进程, 拿破仑在俄罗斯的战役就是这样一个例证。拿破仑从不把他的命运交由运气, 所以他在出征之前下令仔细地分析卡尔十二(瑞典语: Karl XII, 英文: Charles XII)在1709年的俄罗斯战役。

一个包括丹麦和俄国的北方国家联盟在1700年发起了一场针对瑞典的进攻。尽管国王卡尔十二常常明显地寡不敌众, 但他还是领导瑞典军队赢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还在他18岁的时候, 卡尔十二就在纳尔瓦战役中面对强大的俄国军队赢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

卡尔十二在1709年6月开始入侵俄罗斯, 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然而,

俄国在1709年7月6日的波尔塔瓦战役(battle of Poltava, 在今乌克兰南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剩下的瑞典军队在这场战斗的三天之后被迫投降。卡尔十二和他的一些军官穿过第聂伯河(Dniepr)躲在了奥斯曼帝国。

然而这样仔细的分析并没有挽救他的军队, 拿破仑的军队并不须要投降, 但他的军队却在撤退期间被俄罗斯寒冷的冬天所摧毁。俄国的战略纵深也许确实是太大了<sup>4</sup>。不过拿破仑至少没有重复卡尔十二的错误。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规划

虽然二战也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是特殊的历史事件, 但二战的很多模块却并不特殊。二战时欧洲战区的战争便是例证。1942年欧洲有两大阵营: 英国、美国和苏联组成的联盟, 他们控制了太平洋和地中海, 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 德国及其盟友意大利和其它一些它们所占领的欧洲国家(包括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希腊和法国)组成的大陆联盟, 拥有很强的陆战实力。将“德国”替换为“法国”, “美国和英国”替代“英国”, 那么二战时欧洲战区的情形就和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非常相似了, 而且这不只是表面形式上的相似。许多其他事件所涉及的战略战术情节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些事件包括两场战争(利比亚对抗埃及、意大利对抗西班牙的战争)、抵抗军和起义军在被占领的国家的博弈、以及在大西洋上对抗私掠船的海战。<sup>5</sup>

- 1995年12月法国大罢工

图尔(Tours)的铁路工人于1995年11月23日开始进行大罢工以抗议提高退休年龄这一计划。11月25日罢工蔓延到其他铁路中心, 到了11月28日, 法国电力公司的工人也加入了大罢工。从这种意义上此次的罢工明显属于所谓的“蘑菇罢工(mushroom strikes)”。蘑菇罢工是指罢工运动并非事先由公会决定而是自发出现后又传播开来引发一系列后续的罢工。这也正是为什么这类罢工只会在工会组织相对较弱的国家发生(例如比利时和法国); 在像瑞典这类的工会化率接近100%的国家, 工会是一定不会允许这类罢工在其掌控之外发生的。这种罢工之前在1936年、1953年、1960年和1968年都发生过, 而且全部持续了大约一个月。因此在1995年11月底, 预测这次罢工将首

---

<sup>4</sup>俄国极大的战略纵深在1941-1944年二战期间也走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德国在1941年夏取得了重大胜利, 但苏联还是能够将兵工厂搬到德军轰炸机无法触及的乌拉尔(Ural)城外。在1942-1943年这些兵工厂制造了数以千计的坦克、枪炮和战斗机。

<sup>5</sup>具体分析详见(Roehner and Syme 2002)一书的第5章。

先蔓延到整个国家然后会在12月结束也是不无道理的。而且这也正是当时事件真实的走向。<sup>6</sup>

## 7.2 历史社会学的比较方法

有一则轶事与本节内容有关。本书著者之一在1995年的9月参加了由詹姆斯(James Foreman-Peck)在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St. Catherine)组织的计量经济和社会历史会议。会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地分成了两类。占绝大多数的第一类文章关注的是描述诸如“追溯最近魏玛(Weimar)失业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或“丹麦1845-1901年间的失业问题”这样的社会、经济历史事件。而另外一小群参会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他们的报告从问题开始，然后分析任何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的言论或现象。会议上这两种视角的不同没有引起与会者的注意，然而这种差异是巨大的。在第一种情况中，过去的事件(events)是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在第二种情况里，过去的事件(events)被当做回答特定问题的集合。用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的话来讲，第二种方法有真正的比较式方法的特点，这个想法也主导了他之后的实验(Bernard 1865)。

比较式方法是由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引入经济史并使用的，史称年鉴学派<sup>7</sup>，而且这种方法至今仍被一小部分经济史学家所使用。

在社会学研究中情况又有所不同。社会学从19世纪中叶才开始成为独立领域，多亏了像涂尔干(Durkheim, 1858-1917)和帕累托(Pareto, 1848-1923)这样的学者，比较性方法才得以快速取得核心地位。但也是从那时起，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就没有间断过。

### 7.2.1 关于比较性研究方法的争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重要的成果见证了关于比较性研究方法争论的活跃性，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献有(Abbott 1998), (Abrams 1982), (Burke 1992), (Dogan 1994), (Goldstone 1982, 1997, 1999), (Lieberson 1985, 1991, 1994), (Lloyd 1993), (Monkkonen 1994), (Ragin 1987, 1997), (Rule 1997), (Skocpol 1984), (Stinchcombe 1978), 以及(Tilly 1985, 1997); (Bunge 1996, 1998)则从更哲学的层面上分析并比较了社会科学与物理学的解释。

<sup>6</sup>具体分析详见(Roehner and Syme 2002)一书的第5章。

<sup>7</sup>布洛克是年鉴学派的两个共同创始人之一，学派创立之初他们还创办了名为《年鉴(Annales)》的期刊，这一期刊最初的目标是发展比较性和跨学科的历史学研究，它现在仍然存在只是不再只以发展比较历史学为目标了。

此时来讨论我们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多靠近那些完备的研究方法就显得很有趣了。金(King)、基奥恩(Keohane)和韦尔鲍(Verba)在他们1994年出版的《Designing Social Inquiry(设计社会研究)》(King 1994)中讨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性要求。首先是金(King)和他的同事们聚焦的是简单性，而这也是我们的核心论点。他们说：“通往有用的知识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是系统性简化。作为经济史学家的琼斯(E. Jones)认为如果一味追求独特性可能会忽略所有规则而社会学很可能就被否定了，历史学家进而变成了漫无目的叙事诗歌编者(balladeers)。”其次金(King)和他的同事们建议当开始研究复杂和相对独特的事件时，研究者应该考虑这些事件在一大类事件中的位置，如此这些事件才可以借此被放在系统性的和比较性的体系下研究。像这样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会被大量地应用于(Roehner and Syme 2002)一书的案例研究中。再次《设计社会研究》一书强调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没有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区别。在我们的书中，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互相补充。

简而言之，我们的研究方法跟金(King)和他同事们的方法是一致的。当然毫不惊讶的是，我们的很多方法与他们相比在某些地方也背道而驰。比如，在选择研究问题这一点上，他们这样解释：“一个研究项目应该提出一个在现实世界中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显著影响多数人的生活。”[详见(King 1994)一书第15页]就像我们在这一章节中他处解释的那样，就政策的应用，我们偏好简单性，主要的目标是找出稳定和正确的规律性事件，而不是它们直接的用处。

## 7.2.2 寻找模式和行为策略集

开始这一节的内容之前，我们不得不对Repertoire(行为策略集)这一概念进行解释：Repertoire指经常做的、甚至是有一定标准、而且通常会与一些过程有关，比如钢琴家演奏的时候会有很多可能的操作(例如自己所掌握的和谐、组合、弹奏的方法等)；而且他的Repertoire很可能会和其他人的不一样。Repertoire不强调流程，而主要说所有要做、能做的事情的集合。它可以是个人所知道的能够有的策略、行为的集合。Repertoire一词在中文中没有对应的词汇，我们在本书中根据其含义将其译为“行为策略集”。

帕累托在《社会与思想》一书(Pareto 1935)中评论道：“我们知道社会事实能够揭示一致性就够了。”这里帕累托说的一致性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规律或模式。找到规律性是很重要的一步，这是研究者建立模型的前提，因为规律性正是模型想要去解释的东西。

凭借一系列大量的观察，提利(Tilly 1986)提出了人的行为策略集(Repertoire)这一概念：“每个族群的集体行动及策略的集合(Repertoire)都不是无限大

的，人们总是在已知的限制中行动，在已有形式的边缘创新，人们知道表现的总体原则，并据此做出不同行为去满足当时的目的”[参见(Tilly 1986)一文第390页]接下来，提利对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的集体行为形式做了分类，深入研究了这其中集体行为集合的变化。他指出新的行为模式不会一下子出现，它们是在许多支持与反对中逐渐传播开来的。

帕累托在他对迷信的研究(Patero 1935)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有个奇妙的事实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在时间长河中竟是如此的长存。其实每天尝试全新的不同组合是很容易的，但只有这样一种绝妙的组合可以战胜所有的其他对手。”

在所有领域里，就某一主题进行不同的阐释和变形是比创造一个全新的主题要来得容易的。因此生物演化如果真是在各处创造了新的形式和功能，那么它首先是把一些基本的模式拼凑在一起才得以产生难以置信的生物多样性。雅各布(Jacob 1970)把这当做是演化的缝补功能：没有东西被废弃，革新只是被暂时搁置以备未来之需。这也是这本书的主旨之一。历史上产生全新的组织和行为是及其罕见的，一个有效的结构会被应用很多次，即使有人相信它会因为时间而失去作用，但人们仍然可能会在几十年后注意到这些基本要素被用在了不同的情境下而已。这个观点也是詹金斯(Jenkins 1986)在研究瑞士的Jurassians<sup>8</sup>独立运动之后所强调的论点。

### 7.2.3 “为什么”与“怎么样”

想要说明两个现象A和B相关(或者有关联)是很简单的，但要确定因果的方向则是很棘手的——是A导致了B还是B导致了A呢？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例如当泰恩特(Tainter 1988)说当政府无力时财政总收入会下降时，我们就很难明确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了。

在社会科学中确定因果关系有两个主要的难点，一个是技术层面上的，另一个是认识论层面上的。第一个难点是大多数现象是复杂的，但一个现象不能被单一原因所解释并不意味着找不到因果关系，而是在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情况下，对其中某一因素的因果检验须要更加谨慎。这个问题这几十年来受到了大量来自计量经济学家的关注，在格兰杰(Granger 1969)开创性的文章<sup>9</sup>之后，若干复杂的因果检验方法得以出现。但即使在现代经济学

---

<sup>8</sup>“The Jurassians are a French-speaking linguistic minority who live in the Jura region of the otherwise predominantly German-speaking Swiss canton of Bern.”

这是一个当年生活在法国东南部侏罗省(Jura region)以法语为语言的少数民族，当地的多数族裔来自瑞士首都伯尔尼(他们以德语为主要语言)。现在侏罗地区已经是瑞士的一部分。详见<http://www.everyculture.com/Europe/Jurassians.html>

<sup>9</sup>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也让格兰杰获得了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样时间序列数据很准确的领域，几十年来因果检验的结果也相当令人失望。泽尔纳(Zellner)在其1988年的一篇综述(Zellner 1988)中讲到：“在过去的20年关于因果的定义和因果检验的研究中，它可能会被质疑，有多少新的经济因果律是因为这些研究而产生的呢？我相信最坦诚的回答恐怕是：没有任何一个。”

按照泽尔纳的说法，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可能是模型要么太宽泛要么太局限。如果解释模型是太过宽泛的，那么它可能包括很多变量，那么即使是在很长的时间序列数据上进行因果检验，其在技术上也会变得非常棘手和危险；如果解释模型太过局限(只关注很少的变量)，那么它很可能会忽视某一个(或几个)重要变量，而这种遗漏可能会导致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因果推断这一问题。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维尼(Veyne 1984)所进行的研究分析。对于苹果掉落的抽象意义，一个人可能对于这样的问题毫无头绪：为什么这个苹果会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掉落呢？实际上根据你视角的不同，可以得出许多可能的答案：苹果可能太重了、苹果枝太干了而变得易折、突然一阵大风刮过、树枝开始摇晃等等。维尼总结道，一个人试图详细解释苹果掉落的原因和过程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做不会让他发现苹果掉落和松球或水滴的掉落遵循同样的原理，他可能最多能探索到“没有得到支撑的物体会掉落”。但如果他把问题从“为什么(苹果会掉落)”变成“(苹果)怎么样(掉落)”那么问题就豁然开朗，他就可能可以发现物体掉落背后的普世规则。

除了理论上的基本困难，其实也有实践上的障碍。对于一个复杂现象，通常没有客观标准来决定一个原因比另外一个原因重要。美国内战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可能有无数答案，一个人倾向于哪些答案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品味。

#### 7.2.4 弥合宏观与微观社会学的差异

有时我们是在可以在微观层面识别出在宏观层面产生作用的机制的。我们可以考虑以下问题来作为例证。就国家形成而言，19世纪的历史呈现出两个相反的走向：有许多帝国与王朝相继覆灭，例如西班牙王朝、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丹麦王朝；却也有许多分裂的实体合并形成新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意大利。那么如何解释这两种相反的变化呢？微观社会学对此有一种有趣的解释，那就是定义国家的基本准则的重心从宗教演变成了语言。那些当时分裂的帝国都是依靠某一种共同的宗教聚合在一起的多语言国家(西班牙王朝和奥匈帝国信奉天主教、丹麦王朝信奉新教、奥斯曼帝国信仰伊斯兰教)；而反观那些新兴的国家(例如德国)则是说同一种语言只是过去被不同的宗教所割裂的地区。

这个例子是典型的微观层面的变化导致宏观层面的变革，这样的解释

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类微观层面的现象通常并不局限于特定国家，因为非常易于进行比较分析。虽然比较分析方法在过去数十年内一直在被使用，但实际的进展却非常缓慢。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解释可能的原因。

### 7.2.5 发展比较分析方法的障碍

在我们看来，发展比较分析方法最主要的障碍是缺乏大量的数据；虽然大数据这一概念目前可谓甚嚣尘上<sup>10</sup>，但在历史学研究的很多方面我们仍然处于数据匮乏的状态。我们不妨来看下面这个例子：1997年印度尼西亚和华人居民与当地爪哇居民发生了种族冲突，而这类骚乱也完全不会是第一次出现，其实自1945年以来(甚至在印尼独立以前)，类似的冲突就不断地重复发生。假设我们想对这类事件进行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那么可以从哪些来源获取数据呢？可以用《时代周刊》或者《纽约时报》上的报道吗？但这些报纸显然没有理由把印尼国内较小规模的骚乱拿出来报道。鉴于印尼曾是荷兰的殖民地，我们或许更可能从荷兰的报刊上获取到有用的信息，但是研究者必须得能读懂荷兰语或者找到一位荷兰的合作者才行。就算这些实际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如果原始数据没有电子化、或没有现成索引、搜索工具的帮助，直接从相关的日报上准确找到相关事件的信息将会是非常巨大的工作量。

从这个例子也可以大致理解，为何目前众多微观社会学研究都关注于英国或美国的事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这两个国家的新闻索引建设良好、许多数据都可以公开获取到。但总体来说，在微观社会学方面，几乎找不到跨国的比较研究；按时间顺序的年代学分析(chronologies)是这类研究现有的唯一体系。

在历史领域的比较研究比社会学领域更少，其中数据障碍和心理障碍似

---

<sup>10</sup>大数据这一概念在很多时候实则是处于一种被滥用的状态，许多研究但凡数据量相对大一些就开始声称自己是大数据研究，在一些过去数据相对难以获取的学科，但自己的数据量达到数万条时也会声称自己是大数据；而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来看，只有当数据远大于机器的计算能力才能被叫作大数据，目前的大数据起码也应是TB级别以上的数据量。而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类似的滥用同样发生在结构主义、幂律分布等许多宏大却又模糊的概念被提出之时。

目前许多大数据研究所用到的数据其实都只是大量的单一类型数据，以手机通话记录数据为例，无论数据量有多大，其数据类型都是固定的，这样的大数据所能给出的信息量其实是有其边界的，很多时候“大数据”并非无所不同，这样的宏大概念看似给人以无限希望，但在具体问题上仍然须要谨慎对待。当然我们应当承认，当数据量变大之后，确实可以挖掘出更多的信息，例如从长期的手机通话对应的位置信息中，再结合一些日常经验，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用户的家与工作地的位置(但是仍然无法做到完全准确)，但我们对于用户的其他行为或特征(例如支付行为、年龄、性别等等)却难以下定论。所以在很多时候，一味强调“大”而不强调数据的类型是否全面多样，是很容易让人产生迷思的。

乎成为了主要的原因。目前评判历史领域研究文章的最主要标准是所用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样一种评判标准对于比较研究是不小的障碍，例如我们想要进行十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就须要分析这些国家相应的史料与记录，但可以想见语言的障碍与时间的消耗都是极大的挑战；这有点像让一个经济学家自己去亲自收集自己的数据模型所依赖的所有问卷资料以及统计数据。除非比较历史研究被视为独立的研究方向，并且具有独立的评判原则，否则其发展仍将受到损害。这类数据障碍在社会学研究中要稍小一些，但阿彻和高德纳(Archer and Gartner 1984)的研究表明，仍有许多工作须要去完成。关于心理上的障碍则主要表现在历史学家和他研究的课题之间存在着看似特别的情感纽带，许多历史学家会专注于一国或一时的研究(但这种情感纽带的存在有时也是由于其他障碍的存在)。举例来说，如果一位美国或是英国历史学家选择北意大利史作为课题，那么他只要对意大利语非常熟悉、或常常旅居意大利并且好好利用意大利的图书馆或档案馆可能就可以相对顺利地进行自己的研究；但是在比较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可能会须要分析数十甚至更多个分布于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历史时段的事例，研究者想要完全熟悉每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和风土人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 7.3 昨天是明天的最佳预言

本节标题中的“预言(Predictor)”来自于提利(Tilly)的定义。预言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如果一个程式化事件(例如罢工或起义)发生，那么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预测它将来的走向和发展态势。同时有两个条件必须满足：首先，“昨天是明天的最佳预言”仅适用于简单的现象(意即我们前面提到的模块)，一般来说事件越简单预测效果越好；其次，如果社会或政治环境方面出现重大变化，那么通常情况下这一法将不再适用。举例来讲，在新西兰的毛利人抵抗殖民化的活动仍然活跃，却不能从十九世纪的情形来认定今天的战争形式(即公开战争)，因为这时军队的火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两个要求也将贯穿于本节中的分析。

一旦复杂现象被分解成更简单的事件(episodes)，相同类型的事件之间通常看起来会存在强烈的相似性。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它将引导我们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检验“模仿(imitation)”这一概念、传统(tradition)所导致的约束以及集体历史记忆(collective historical memory)所起的作用。

### 7.3.1 同源性、模仿、行为策略集

历史从来不是单纯的完全照搬重复，即使对于相对简单的事件(episodes)，事件A和事件B也只会是相似却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的相同。为了描述这种形式的相似性，我们用从语言学领域借用来的“同源性(paronymic)”这一概念来表示。如果两个英文单词的拼写只有一个或两个字母不同，那么它们就是同源的：例如“collision(碰撞)”和“collusion(串通)”是两个同源词语，“graduation(分级)”和“gradation(渐变)”是另一对同源词。要注意当我们描述同源性的时候，具体的词义就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正如我们所举的例子，两个同源词不一定有相近的含义。

“同源性事件(paronymic episodes)”这个术语在我们的研究中非常适于指代形式上相似但目的却未必相同的两个事件。首先，众多历史情节不完全相同只是相似；其次，它传递了我们主要关注历史事件的形式而非其具体政治意义这样的研究理念<sup>11</sup>。学界内近年来已经有一系列案例研究介绍了同源性事件(paronymic episodes)这一概念(Roehner 1993, 1997a, 1997b)。它不同于斯诺克斯(Snooks 1996, 1997)所提出的模仿(imitation)这一概念，因为斯诺克斯所指的主要是集体(和或多或少无意识)的模仿行为。

- 模仿

斯诺克斯三部曲著作(Snooks 1996, 1997, 1998)中的基础概念之一就是模仿，而且据我们所知这也是在如此广度和深度上系统性运用这一概念的首次尝试。他写道：“模仿是塑造生活的重要力量”[详见(Snooks 1997)第124页]；“绝大多数人的决定都是通过模仿那些成功的例子来做出的”[详见(Snooks 1997)第4页]；“这一决策机制起源于早期的动物形式”[详见(Snooks 1997)第11页]；“如果一个部落中的某些成员都食用新的食物而没有任何不良反应，那么其他人就很容易跟着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走……我们更倾向于节约自然界中最稀缺的资源—智力”[详见(Snooks 1997)第112页]。

南极燕鸥是动物世界中模仿行为的绝佳示例。这种燕鸥的所有食物几乎都是从海中获得；当它们钳住鱼的头部之后通常会直接将鱼整条吞下，这种吃法行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鱼的头部是其身体中最大的部分，所以吞下鱼头后就可以将整条鱼顺利吞下。这些海鸥也会攻击刚刚出生的小企鹅。如果密切观察这样的场景，就会注意到燕鸥其实是试图在将成功使用在鱼身上的方法用在企鹅身上，但是因为企鹅

---

<sup>11</sup>不妨让我们来举个笼统些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同源性事件这一术语：一般来讲组织一个十万人规模的游行可能会有多种技术方法或形式，对于不同的游行其目的或政治意图可能非常不同而且非常容易改变，但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情况，组织游行的技术方法或形式往往却是大同小异。

的身体比其自身头部更大(一般也比燕鸥的头大)且企鹅并不像鱼那样光滑, 燕鸥在吞下小企鹅头部之后最终往往不得不松开它们的猎物。为了克服这个问题, 有时两只燕鸥会一起一只一边将小企鹅撕成小块然后用喙来啄肉; 这样的做法非常耗时而且它们的动作明显都很笨拙。我们可以发现当动物面对新的情况时, 它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用过去已经被使用过的成功方法; 只有在明显失败的情况下这些过去的做法才会被放弃, 但发展新的有效方法通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例子中值得注意的是, 动物并不是在模仿群体中的其他成员, 而是在模仿自己过去的行为。换句话说, 这种现象更接近于同源性的概念。与斯诺克斯的模仿概念相比, 同源性这一概念增加了社会维度。个人层面的模仿似乎不足以解释1936年和1968年法国的大罢工之间的相似性。

在研究社会历史力量在社区层面塑造同源性行为之前, 我们需要更详细地讨论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

- 个体选择与集体行为

个体选择理论(Individual choice theories)之所以吸引人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决定, 所以对所有个体选择进行建模从直观的感觉上来讲应该能够解释我们最终观察到的现象<sup>12</sup>。其次, 个人的理性选择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s)可以被清晰明确地公式化/形式化(formulated)。经济学在这方面已经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成功传统了, 社会学在最近几十年沿着这条线路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 例如赫克托的众多佳作(Hechter 1994, 1997, 1998)。

但与分析个体行为所不同的是, 这一理论在分析集体行为时却问题重重, 因为作为个体我们并不能确切感知到影响我们做决定的集体因素都有哪些。首先人与人之间的联接非常复杂构成的网络就很复杂, 而且人与人之间交互的模式与强度也非常不确定, 另外还有社会舆论、风俗习惯、法律规定等等各类因素都会产生影响。当我们构建数学模型时上述各类因素都会是巨大的挑战, 目前另人满意的数学模型只出现在描述最为简单的交互形式(forms of interaction)中, 例如伊辛模型中个体间的交互网络是固定的晶格网络而且相邻个体间的交互方式也是固定的不会发生变化。当然这些模型(例如物理中的相变模型)已经使我们确信集体行为与个体行为存在极大的不同。水到冰的相变是典型的集体行为, 但是这样的集体行为对于单个分子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

<sup>12</sup>但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看似“自由”的决定实际上还是受到了当时环境的影响。

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已经指出个体抉择理论的框架结构太过局限不足以解释历史事件间的相似性，因为它完全略了个体意识之间的交互(interaction of many minds)作用。涂尔干的工作强调了群体表达(group representation)和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是分析历史事件相似性时非常重要的因素。<sup>13</sup>

戈德斯通199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令人信服的论据(Goldstone 1999)。接下来我们会简要复述一下：塔洛克认为如果所有个体都是独立来做是否要参加某一革命运动的决定，并且(通常情况下都是如此)革命的好处会惠及每个人而不仅仅是参加暴动的人，那么这个革命就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如果无论他们是否参与都能够享受革命的好处，那么作为个体就不会有冒险参与的动机；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计算，那么革命就不可能发生(Tullock 1971)。经济学家们毫无疑问是支持塔洛克的结论的，他们认为这是逻辑的胜利。但事实上革命事件时有发生，这表明塔洛克的论点当中有一些错误须要被找出。戈德斯通发现塔洛克理论的一个前提有问题：“个人决定加入或不加入革命运动是孤立的个人决定”(Goldstone 1994)，事实上却是个体的决定“是作为先前承诺的团体的一部分”(Goldstone 1999)。

下面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社会约束的作用。

- 社会约束之魔<sup>14</sup>

斯努克丝当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个人意识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在他的案例研究中也分外清

---

<sup>13</sup> 物理学家们通过相变理论、伊辛模型(Ising Model)和其他的群体/集群效应[collective effects, 例如铁磁性(ferromagnetism)]已经意识到了群体效应的重要性，而且物理学家们也非常清楚各种外部因素和外部作用力对系统的影响。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虽然并非物理学家出身，但早在19世纪末他就已经清醒地意识群体作用的重要性。所以当他在研究自杀问题时，他并不将注意力放在个体的选择决策过程，而是着力去研究不同个体与其周围人的社交关系/联接对于自杀的影响。但令人失望的是，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和传统的社会学家[社会网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个例外]大多都已经忘记了群体效应和外部作用力的影响，他们大多重新回到了个体选择的理论框架。当然运用个体选择模型(对等到物理学它就像理想气体这一概念)来解释群体现象在未来也并非完全没有丝毫希望，它最终会依赖于心理学以及大脑的运作机制，但不幸的是大脑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系统；而且群体效应仍然会对个体选择产生影响。

<sup>14</sup>本节的英文标题是“The Weight of Social Constraints”，对于这一观念，马克思(Karl Marx)在他1852年的论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中有一个更精彩的表述：“大众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这种创造仍然是基于已经存在、由过去赋予和继承而来的条件。那些过往年代留下的各种传统有如梦魇一般始终压在现在这一辈人心头。”

晰，因此在关于古希腊的研究中他写道：“希腊宗教是一种有秩序且理性的社会活动，进而支持了商人对和平与繁荣的渴望。它可以与征服社会的宗教对比，这些宗教强调人类想象中更黑暗和更混乱的力量...奥运会也有助于将商业战略印刻在社区意识(community consciousness)上”[详见(Snooks 1997)第230页]。斯诺克丝的上述论据的确是非常“涂尔干式(Durkheimian)”的观点。

总之，人类思想与社会影响(诸如传统、宗教、地理和制度上的限制等等)之间存在着永久渗透。这里我们会给出两个微观社会学的实例来证明这一点，虽然这两个事件的历史意义微不足道，但它们却揭示出了传统和集体历史记忆所发挥的作用。第一个例子是法国古代国王的御前会议(the king's council)是在周三早上召开，所以法国部长理事会(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in France)也是在星期三早晨开就不令人惊奇了(Marion 1976 [1929])。尽管经历了数次革命和宪法的变化，这一习俗历经三百年依然保留了下来。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机构内部平衡的：历史上法国曾有过打扑克牌税(the tax on playing cards in France)，像许多其它被废除的税目一样，这种税在1790年被废除。然而它在1797年和之后的1804年又被重新征收过。有趣的是，新的法规几乎是1751年的“刑法”规定的翻版：要求制造商仅使用由管理部门提供的纸张、只能在管理部门的办公室中制造铸件、对每副扑克的包装进行统一等等[其他细节详见(Stourm 1885)第2卷第121页]。应该注意到扑克牌上的图像受到革命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国王和王后曾一度被古代数字取代，但之后又回到了传统的图像。

现在让我们讨论具体是什么因素导致社会不愿意创新。

- 复杂任务经过多次重复也会变得简单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强调了社会表征<sup>15</sup>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因为它们永久性，社会表征无疑是复发事件的同源性质的根源之一。现在我们来描述另一个虽然经常被忽略但却能够将同源重复(paronymic repetition)和最小努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联系起来的因素；从齐普夫(Zipf 1972 [1949])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原则很可能在人类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简而言之，当一项复杂的任务被重复多次之后往往可以更快更好更省力地被执行。我们的“复杂任务(complex task)”是什么意思呢？带领军队穿过大西洋无疑是一个复杂任务。而且我们现在的论点也适用于看起来远远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微观社会学方面的任务。例如组织大型演出绝

<sup>15</sup>social representations, 它是个笼统的概念，传统、宗教和其他的约束都是它所指代的含义。

不是一个简单的业务，它包括以下步骤：(1) 从市政当局获得所需的授权；(2) 撰写、制作和散发广告信息；(3) 与可能支持演出的当事方、工会或地方委员会联系；和(4) 呼吁人们来参加，例如在过去通过带扬声器的汽车进行宣传。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团队来说，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通过频繁的重复人们通常可以将相应的能力提高到一个还不错的水平，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是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尔(Algiers)的行动(这是本章后面将讨论的一个案例)。这里需要再次重申团队能力是一个整体行为：每个参与者并不能只知道自己的任务，同时必须能够与其他成员协同合作。

重复是军队训练的基本原则。我们有一个涉及大型组织的复杂任务的极好案例。虽然训练和演习在军事方面显然很重要，但最好的训练仍是重复进行实际军事行动。因此在1938年3月和1941年5月之间，德国在入侵俄罗斯之前就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复”(这里指的是较小规模的入侵)：奥地利(1938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波兰(1939年9月)、丹麦-比利时-法国(1940年6月)和南斯拉夫-希腊(1941年5月)；每次重复都提高了军队的表现。同样盟军在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之前也进行过一系列重复：北非(1942年11月)、西西里(Sicily, 1943年6月)、卡拉布里亚(Calabria, 1943年9月)；在越来越困难的地形中进行这些重复毫无疑问大大提高了军队执行任务的技能。

连续重复的预期效益可以被定量估计。众所周知，在军事行为研究领域，完成复杂任务所需的时间会因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执行而大大减少，这一点在训练初期尤为明显。通常第十次执行特定任务所需的时间仅为第一次执行任务所需时间的一半(参见图7.6)，重复 $n$ 次后所需的完成时间平均会减小为 $l/n^{0.3}$ 。重复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心理影响，一个人在第一次执行某个给定任务时可能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愿意接受，但通常经过多次重复后，恐惧和不情愿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快乐和自信的感觉。会有自信的感觉是很好理解的，因为重复多次有经验之后，人们在还没正式开始之前脑中就已经能有如何按部就班将其完成的思路，就感觉这个工作好像已经完成了一样。

- “人们从历史经验中得到的好处并不多”

斯努克丝和其他学者强调过个体会倾向于模仿那些“明显成功的人”，但奇怪的是在集体层面，群体反而似乎有明显重复甚至不成功的事件(episodes)的趋势。许多国家失败的分裂斗争都是例证(包括阿尔及利亚、匈牙利、爱尔兰、毛利(Maoris)在内的众多斗争。很多时候由于社会限制的作用，群体被一次又一次地推向了过去失败过的老路上。另一个有趣的类似事件或许是美国的房地产投机性泡沫：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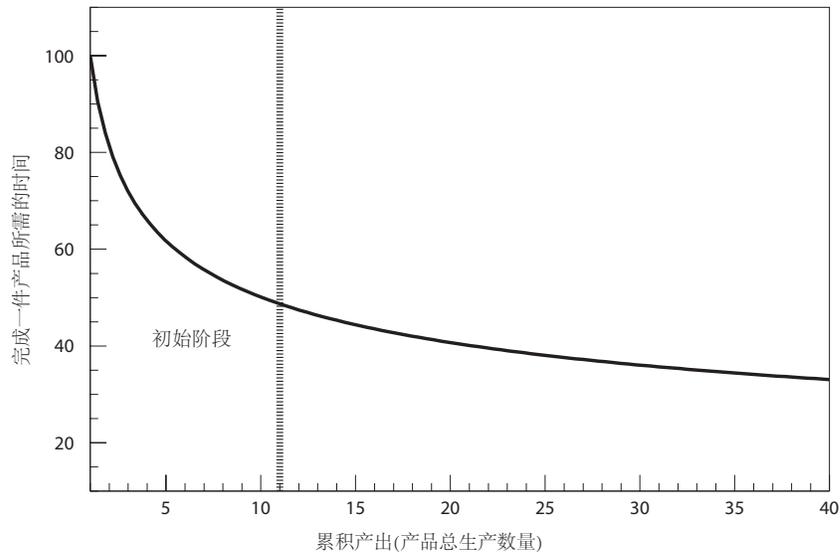


图 7.6: 学习曲线。制造新的复杂物品(例如飞机)时, 随着生产次数的增加, 生产所需的时间会稳定地减少; 从所谓的初始阶段到结束, 生产时间可以变为原来的1/4。该曲线图显示了生产时间与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成反比[幂指数等于0.3—这也是在航空工业中通常观察到的一个数字(Baloff 1971)]。

在1990年美国就曾暴发过一次大规模的房地产泡沫, 然而到了2007年过去的惨痛教训早已被遗忘, 新的更大规模的房地产泡沫再度卷土重来(或许并不完全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历史, 也可能是贪婪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使得人们不再能够回想过去)。

甚至在一些被认为可以做出理性决定的情况下, 同样的错误依然不断被重复;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指出“人们很少从历史经验中获得教训, 这一事实是历史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选择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希特勒于1923年4月17日在慕尼黑的演讲中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犯的的的错误: “(德国)到1914年8月3日都依然认为英国会保持中立, 德国为这一错误的判断承受了巨大损失。然后对于俄罗斯的判断也非常错误: 据说俄罗斯是一个腐败到几乎无力进行战争、不堪一击的国家。第三的错误就是对意大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希特勒在1912年就已经指出意大利根本没有作为盟友的价值(Baynes 1942), 但他敏锐的分析仍然未能阻止他在二十年后一点一点地犯同样的错

误：英国加入二战、错误判断俄罗斯战争潜力(这样的双线作战无疑成了德国总参谋部最可怕的噩梦)、最后又遭遇了意大利的背叛。

- 古生物学与历史社会学的对照

古生物学家的研究通常分为两个独立的步骤，下面我们不妨以现代马的演化为例来进行说明：第一步是将马的演化问题分解成若干子问题：头骨、下巴、牙齿等器官的演化；第二步则是分别调查这些器官的演化并找到足够的化石来进行佐证。

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是独一无二的；同样，马也是独一无二的动物物种，但马并非突然出现，它们是有祖先的：古生始祖马(Eohippus)、渐新马(Mesohippus)和中新马(Merychippus)。同样的，历史事件往往也都有一些先例和先行者可溯。法国大革命这样复杂的事件，实则由许多组份和层次构成；历史学家可以借用古生物学家的思路先找出组成大革命的独立元素：巴士底狱暴动、“三级会议”等等，这些独立元素就像是古生物学家研究马的演化时关注的头骨或牙齿。对于古生物学家而言，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找出尽可能多的早期化石并研究这些化石都长什么样；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则是找出足够多的相似事件进行分析。

从这样的角度进行研究会有怎样的不同？这种方法乍一看似乎并不一定能让我们更好地预测历史的走向(对于古生物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从马的化石上，未必能看出马这个物种未来会发生怎样的演化)，但至少这些社会“化石”能为我们提供对于许多事件的更合理与自然的理论解释。与其说历史学家应成为著书立说、开天辟地的“创造论者(creationists)”，或许历史学家更应成为“进化论者(evolutionists)”。简而言之，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许多更小的问题还未洞悉之前，就想要构建出一个可以解释复杂历史现象并进行准确预测的理论实属空中楼阁。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解释为什么历史分析学的目标看似远不如那些“正史(standard history)”那么野心勃勃。

- 历史分析学的小目标

研究所有召开过的“三级会议”，而不是把它们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似乎是一种相当人为和不切实际的做法；然而这正是古生物学家的做法，他们的大部工作正是重构出特定部分(例如臼齿、下颚、前足)的演化时间序列。当然，臼齿的进化与下颌骨的进化甚至前足的演化是有联系的：在进化过程中臼齿变大时，颌骨的尺寸必须一同增长；臼齿的尺寸变化与前足的演变之间也可能存在关系，但这种关系

绝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表面关系。这样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且通常非常复杂。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让古生物学家鞭长莫及，所以他们才先把注意力和努力集中在更为简单的问题上，即重建各部分独立的演化序列。

不同的是，历史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研究各个元素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街头暴动如何影响着“三级会议”中王权的势力，还有路易十六被处决给大革命发展带来怎样的一系列影响等等。这些都是结构性问题，用古生物学家的方法难以得到满意的解释。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历史学家就需要一个关于革命如何演进的理论(同样地，古生物学家想要解决研究中遇到的结构性问题，就需要一个描述马类进化过程的整体性演化模型)。

历史分析学的研究目标并不宏大而是就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可及之处。相比之下，当“传统”历史试图解释和预测(而不只是描述)一系列复杂事件的发生和演进、甚至国家的兴衰治乱时，它就开始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大事件与小事件

“小事件”往往比“大事件”的发生更加频繁而且其模式也更相近。为了说明这一观点，让我们来猜测一下下面引文中描述的“事件”是在何时何地上演——“他被愤怒的群众推上了断头台，他的头颅被长矛刺穿，并在城市里欢庆胜利的庆典中游街示众。”这段话完全适用于巴士底狱暴动之后典狱长的头颅被砍下来游街时的场景；但事实上这段话描述的是发生在科索沃的一个事件(它与巴士底暴动相隔一个多世纪)：被杀的是一名奥斯曼帝国的元帅(Malcolm 1998, p.233)。实际上，用长矛穿过战败者的头颅是整个欧洲的常见做法，不论是大不列颠还是阿尔巴尼亚；这样的事件不仅仅是十分相似，而且其发生频率相当高(参见图7.7与图7.8)。

这个例子还引出了历史分析学研究方面的选题问题。假如我们想写一本关于人们用长矛刺穿敌人头颅这类现象的专著，从比较分析的观点来看，我们将拥有非常理想的素材和事件集合；因为有超过100例的事件可以作为样本，这实际成为了一个“大N”事件分析。不过这样血腥的课题是否能让读者感兴趣就首先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其实找到一个愿意出版这类话题的出版社很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在确定研究模块时，也须要找好平衡，因为这些模块不能太过于微观(许多模块仍然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更小的模块)，但同时它们必须具备一个相当大量的出现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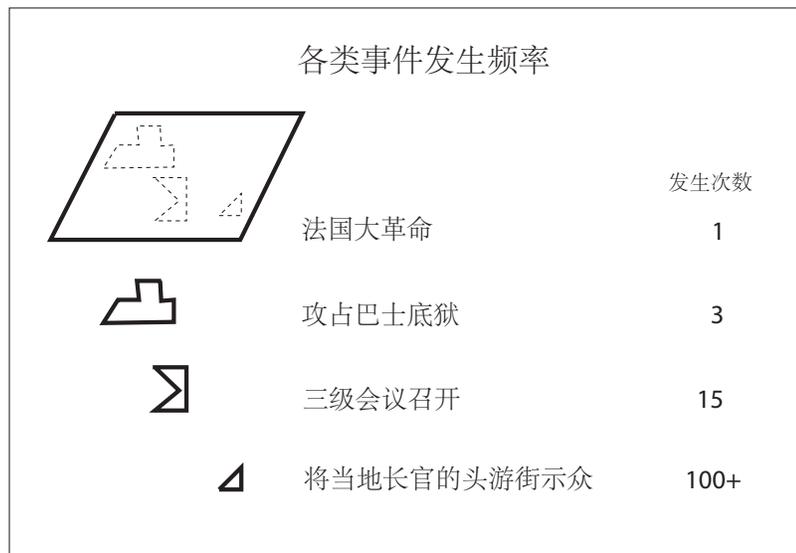


图 7.7: 特定事件发生得有多频繁? 法国大革命可以看做是一个复杂的由不同元素构成的集合。作为一个整体, 法国大革命只发生一次, 但其中的组成部分可能发生过不只一次甚至是很多次。总的来说, 组成结构单元越小, 其被观察到的发生频次就越高。举个例子, 用长矛把战败者的头颅穿起来游街在欧洲就是非常常见的做法, 类似的事件出现过不下几百次。

虽说在历史学领域这一研究方法受到的关注甚少, 但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在政治领域这一方法却似乎颇为流行。

### 7.3.2 历史类比的运用与滥用

通过类比和比较来进行推理是进行政治决策时常用的做法, 领导人试图在过往中找寻与他们当前所面临的相似情况。他们这样做实则是隐含地认同过去可以是预测未来走向的重要参照。二十世纪的几个世界领导人(例如温斯顿·丘吉尔、查尔斯·戴高乐)对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但如何使用历史类比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虽然这种工具可能已经被几位大师运用得炉火纯青, 但在其他领导人的手中, 这种工具却成为了欺骗和误导的伎俩; 这些都在(May 1973)这一开创性研究中进行了分析, 随后又在(Neustadt and May 1986)和(Khong 1992)这两项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研究。

我们不妨来考虑那些导致了朝鲜、越南和海湾战争的决策。杜鲁门总统在其回忆录中用下述方式解释了美国对朝鲜的干预: “我记得每当民主国家未能采取行动时, 侵略者就会被鼓励继续前进, 共产主义在朝鲜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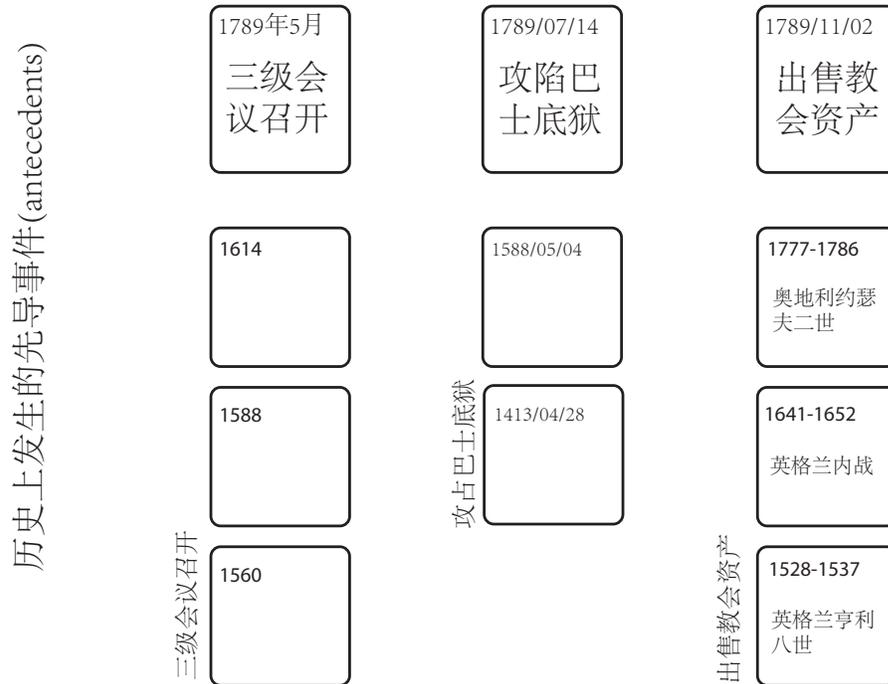


图 7.8: 法国大革命中模块事件的同源先辈事件。该图表显示了1789年发生的三个事件以及它们的先辈事件。图中的“三级会议”指的法国的议会(在西欧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会议)。没收和出售教会财产的事件过去并未在法国发生过,但在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在改革时期)却一再发生。

像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在10、15或20年前做的事情一样”<sup>16</sup>(Neustadt and May 1986)。随后杜鲁门又用发动朝鲜战争的理由来类比解释对越南的干预。这种方式也被许多后来的美国总统所沿用,(Khong 1992)一文精确地计算了约翰逊政府<sup>17</sup>在公开演讲和私人报告中使用的具体类比的次数(表7.2)。不论是公开演讲还是私人报告,其对朝鲜的引用都排在第一位。私人报告是特别有趣的研究样本,因为它们表明类比不仅仅用于传达思想,还被运用于进行决策。对于法越战争(一场对法国来说堪称灾难的战争)的类比就几乎全部出现在私人报告中,但即使这样,它的频率还

<sup>16</sup>其原文如下:“I remembered how each time that the democracies failed to act, it had encouraged the aggressor to keep going ahead. Communism had acted in Korea just as Hitler, Mussolini and the Japanese had acted 10, 15 or 20 years earlier.”

<sup>17</sup>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在1963年至1969年担任第36任美国总统,1961年至1963年于约翰·肯尼迪任下为第37任美国副总统。

不到使用朝鲜战争进行类比的一半；尽管事实上，在对越南干预的决策中通过法越战争进行类比肯定比用任何跟朝鲜有关联的例子要更为精确。海湾战争(1991年1月至2月)也提供了类似的例子，对布什总统而言，他认为适当的比喻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希特勒、莱茵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Yergin 1991)。

公开演讲	类比次数	私人报告	类比次数
韩国	63	韩国	46
20世纪30年代	42	法越战争	26
希腊	33	马来西亚	12
马来西亚	22	20世纪30年代	10
柏林封锁(blockade)	19	希腊	8
菲律宾	15	菲律宾	6
古巴	14	二战	5
土耳其	10	柏林封锁	4
二战	9	古巴	3
德国	8	土耳其	2

表 7.2: 在进行对越决策时最常用到的类比 (Khong 1992)

但上面这些例子中无论类比的选择还是类比的使用方式都相当不成熟。首先，这些类比仅仅选材于西方国家近代史，韩日或中越之间冲突的历史均被视而不见。第二，北朝鲜或伊拉克与德国的相似性并不强。1949年北朝鲜的人口只有900万，1990年的伊拉克人口只有1600万人；而在1939年，德国的人口超过7000万，国民生产总值全球第二(只被美国超越)。

只要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政治家们滥用类比的原因实际上是他们只获取到了十分有限而且糟糕的信息。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以越南战争为例。如果有人做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即越南战争的最佳类比是越南人民自己曾经发动过的战争，这就会引起人们对美国历史学家提供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的质量产生怀疑。一项对美国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资源的研究表明，只有极小一部分(约占百分之五)关于越战书籍中有些微关注过那些由越南发动的连续战争(越南人抵抗法国、日本，之后又是再一次抵抗法国的战争)；而他们在十六到十八世纪对抗中国的不懈斗争则几乎找不到任何相关的描述。因此，决策者们很可能根本无法获取到相应的有效信息。

外交政策并不是滥用比较分析的唯一领域；在公共卫生领域，是否应将软性毒品(soft drugs)合法化的问题不时被提起。公安机关通常会设立由医师、法学家、警察等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来评判，这些人会就他们所看到

的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讨论。另外一种方法是比较法，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软性毒品的使用在一些国家已被合法化，例如西班牙和荷兰。因此观察别国软毒品合法化后社会的反应是可行的方法之一，但这种比较方法仍极少被人们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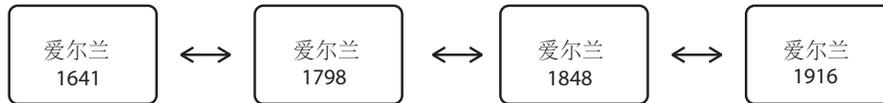
### 7.3.3 历史在何种程度上是不断重复发生的？

历史通常不会依过去的剧本完全照搬重演，那么历史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不断重复发生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Roehner and Syme 2002)一书对此有详细研究，我们在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来描绘一个大致轮廓。复发性事件的研究涉及跨时间(纵向)和跨国对比(横向)这两种分析方式(如图7.9所示)。粗略地说，可以分为三个复杂程度不断增长的层次：枚举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处于第一个层次的枚举性研究只是陈列许多相似的事件，那么这样的研究有怎样的价值？要知道一个事件绝对不是特殊唯一和独立存在的，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可能有一系列类似的事件曾经发生过。从以下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尽管费迪南大公于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被暗杀酿成了巨大的灾难，但这并不是这个时期的特殊事件，恰恰相反，政治暗杀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1911年俄罗斯总理被暗杀，1912年西班牙首相被暗杀，1913年萨尔瓦多总理、墨西哥总统和希腊国王被暗杀(参见1925年《世界年鉴》第693页)。第一层次的研究能够逐步构建起一个更大的事件集合，而拥有一个更大的事件集合之后我们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认识也可以更加客观。第二个层级的定性分析的目标是尝试对重复性事件集合进行比较以期从中找到一些规律。到了第三个层级时，定量分析可以研究各个因素之间相关性的强弱。在本章中(实际上在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将自己限制在前两个层次上。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反复发生的事件。

- 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水手起义

喀琅施塔得是距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西北方数公里外位于芬兰湾(the Gulf of Finland)基地重要的俄罗斯海军兵工厂。兵工厂的水手们在彼得格勒(Petrograd, 圣彼得堡在1914-1918年战争开始时更名为彼得格勒)的游行在1917年10月的革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次革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它却不是最早发生的，在此之前还发生过几起类似的哗变事件(表7.3)，只是它们最终都被不同程度地镇压了下去(Wieczynski 1988)；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先前的尝试并未完全成功，但类似的事件仍在不断上演——这一现象与个体层面的模仿行为是十分不同的，个体层面许多模仿行为如果不成功那么个体未来通

## 纵向分析



## 跨国对比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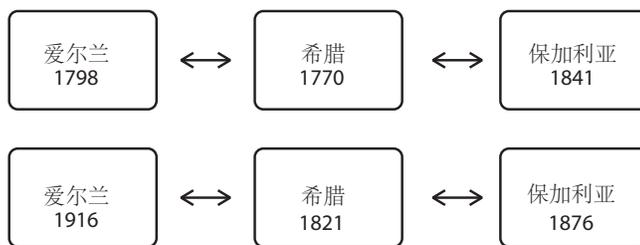


图 7.9: 时序型(纵向)和跨国对比(横向)分析。图表中引用的是爱尔兰分裂起义的例子。纵向分析比较了一个国家历史上不同时刻发生的事件: 1641、1798、1848、1916是爱尔兰连续发生起义的年份。在跨国分析中, 比较了不同国家发生的类似事件: 例如1798、1770和1841年爱尔兰、希腊和保加利亚分别发生的三次“失败”的起义; 而1916、1821和1876年则是各国“成功”起义的年份, 而且这些事件都导致了数年后各自国家的独立。

常不会继续这一行为。不过1921年的血腥镇压似乎强有力地阻碍了进一步起义的尝试。

- 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

在喀琅施塔得的例子中, 所有事件发生在短短二十年之内。在重复性事件的分析中这是相当特殊的, 因为找到事件重复发生的样本通常需要扫描更长的时间跨度。此处所举事例有关于克什米尔冲突的历史根源。在题为《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Kashmir Conflict(克什米尔冲突的历史根源)》的文章(Mohan 1992)中, 作者对1945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几乎毫不在意, 这是典型的政治科学家的做法, 他们往往不愿意认真对待更遥远的过去; 但这种遗漏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错误。莫汉(Mohan)宣称的“在1931年和1932年发生的社区骚乱, 是在长达80年的和平稳定之后”的评论并不正确(见表7.4), 穆斯林人民

日期	描述	死亡 人数	成败
1905/10/26	一名水手在10月26日的冲突中被杀；当天有3000名水手和1500百名士兵参与到了起义队伍当中。两天之后，经过特殊筛选的船员抵达喀琅施塔得，水手们被解除了武装；不过一场声势浩大且团结的罢工在圣彼得堡爆发阻止了进一步镇压。	1+	成-败
1906/07	第一和第二舰队在7月19日爆发了由400名工人参与的起义，第二天起义军被政府武装击败，共有43人被审问枪决。	43	失败
1917/02	一场新的叛乱在2月28日爆发，水手们被叛乱分子从监狱和训诫所释放了出来。海军上将维伦(Viren)和几名其他的高级官员被谋杀。	约10	成功
1917/07	不成熟且失败的针对克伦斯基(Kerensky)政府的起义。一万人(其中三千为武装水手)抵达彼得格勒，在短暂的武装冲突之后，他们被解除了武装；他们中的大部分被允许返回了他们的基地。	-	失败
1917/10	喀琅施塔得水手在彼得格勒的游行保障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	-	成功
1921/03	起义被托洛茨基(Trotsky)大力镇压，2月28日采纳的一个决议成为了这次起义的政治基调。布尔什维克政府于3月7日调集六万兵力开始进攻喀琅施塔得，并在3月17日最终攻入喀琅施塔得城中。苏联官方数据宣称大约1000名叛军被杀、约8000人逃到了芬兰。	600	失败

表 7.3: 1917年10月喀琅施塔得水手起义的先驱事件和后继模仿事件 (Wieczynski 1988)

在1924年的一个纪念仪式上向印度总督提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与十九世纪爱尔兰人民所提出的要求相当吻合：(1) 土地的财产权应该交给农民；(2) 强制劳动制度应予废除；(3) 政府应将拥有的所有穆斯林清真寺交给穆斯林。这些诉求显示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与当年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一样也面临着经济和宗教方面的双重压迫。

1951年10月，克什米尔山谷的人民大规模抵制议会选举；如果人们意识到1951年的局势是长期冲突的结果，那么克什米尔人民的这种反应也就不足为怪了。

日期	描述
18世纪	阿富汗总督严厉限制印度教的宗教仪式。
19世纪	穆斯林教徒在锡克教(Sikh)统治时期被认为是最下等的民众。在1871年的大饥荒中，锡克教王公没能解救他们。
1921	穆斯林佃户起义对抗印度教地主和放款人。
1924	斯利那加(Srinagar)丝绸厂穆斯林工人起义并占领了一块土地。
1931/06	大规模集体暴动在斯利那加和杰赫勒姆谷(Jhelum Valley)的其他地区爆发，印度教的商店和民房被抢掠和烧毁，很多印度教徒被杀。
1931/07/13	斯利那加的中央监狱被袭击，意在营救一名被囚禁的穆斯林领袖；警察开火还击，共有21人被杀。
1931/09-10	穆斯林群体进行政治游行。
1932/10	斯利那加发生暴动。

表 7.4: 1945年之前穆斯林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冲突 (Bazaz 1954, Koul 1972, Rahmat 1933)

日期	西方国家	殖民地人民	西方部队阵亡人数	参考文献
1791/11/04	美国	印第安人	900	(Debo 1970)
1824/01/21	英国	阿珊提族 (加纳)	1000	(Vincent 1898)
1842/01/06	英国	阿富汗人	3500	(Vincent 1898)
1879/01/22	英国	祖鲁人 (南非)	1300	(Vincent 1898), (Clammer 1973)
1883/11/05	英国	马赫迪派 (苏丹)	11000	(Vincent 1898)
1884/06/22	法国	越南人	800	(Teueres 1978)
1896/03/01	意大利	阿比西尼亚人 (埃塞俄比亚)	9000	(Vincent 1898)
1921/07/21	西班牙	摩洛哥人	-	(Martin 1990)
1950/10	法国	越南人	4000	(Teueres 1978)

表 7.5: 在1954年奠边府战役之前西方军队被殖民地当地民众击败的案例

- 奠边府战役法国战败的先辈事件(antecedents)

在东京(北越)奠边府的法军于1954年5月7日被迫向越盟投降，这场失败在舆论上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被认为是西方势力对殖民地人民的第一次军事失败；但这一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详见表7.5)，得出这番结论证明了各国都不喜欢追溯过往苦涩历史这一事实。即使我们只把研究范围限制在印度支那，在1884年和1950年，至少就有两场比奠边府战役更早的失败案例。1884年，一支由800人组成的军队在中印边境上遭到伏击。1950年10月，在查尔顿(Charton)和勒帕热(Lepage)上校指挥下的两支部队在同一条路线上被歼灭，约有四千人阵亡或被捕。

- 1958年5月13日前后发生在阿尔及尔的游行事件

在先前的例子当中，我们只是列出了某一事件的同源先辈事件，但并没有强调这些不断重复发生的事件为何看起来那样相似；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为了说明如何进行更为详细的进一步分析。从阿尔及尔的一系列政治示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首先，1958年5月13日的示威导致了第四共和国的结束和戴高乐将军的再度掌权；这是法国历史上极其罕见事件，那次国内重大的政治变化竟然是由外围事件(而非发生于巴黎的事件)所引发。其次，如果有人注意到当时阿尔及尔人口只有五十万人，那么规模达五万多人之众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为何能如此频密地发生本身就是一个谜。不论是在法

国或欧洲其他地区同样规模的城市里，都没有观察到过类似的现象。阿尔及尔人是如何成功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下面我们不妨以这一问题为例来说明什么样的事件可以重复实现。

一个典型的事件包括以下几步。(1) 首先，示威由一些组织决定和计划：爱国联盟(the patriotic leagues)、警戒委员会(vigilance committees)和本地单位(territorial units)。这些组织占阿尔及尔人口的很大比例。(2) 通过分发小册子和喇叭广播来敦促人们参加示威。(3) 在示威期间，商店停止营业、一些公共设施被关闭。(4) 通常在战争纪念馆前铺设花圈标志着示威的开始。(5) 然后游行队伍会登到这个城市最大的空地—格里尔斯高原(he Plateau des Glieres)上。(6) 一旦人群聚集到那里，大家就会开始听演讲、唱国歌和其他爱国歌曲。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当时的录音我们可以证实当地民众演唱法国国歌“马赛曲”的水准远远高于法国大都市的民众，而且他们所能唱的国歌节数也更多<sup>18</sup>。即使对于一群人而言，重复也是进行一次成功示威的关键因素。

从表7.6可以看到1958年5月份之前的游行示威大多都是成功的，在5月13日更是达到了高潮；但是5月同时也是一个分水岭：所有在此之后的游行示威都失败了。由于无法阻止阿尔及利亚走向独立，越来越多的欧洲极端分子选择诉诸暴力<sup>19</sup>。

- 奠边府(Dien Bien phu)行动的同源复现(Paronymic Repetitions)

我们已经指出奠边府行动的失败有一些预兆。但是这个论点可以扩展到这场战役本身的规划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着印度支那(Indochina)的日本军队投降撤走之后，胡志明(Ho Chi Minh)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the Viet Minh)取得了越南的实际控制。在1949年到1954年期间，法国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重新夺回实际控制。法军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占领

---

<sup>18</sup>法国国歌共分3节，大多数法国人都只会唱第一节(重大体育赛事中如果播放法国国歌通常也只会播放第一节)，所以阿尔及利亚人在示威中能够唱出国歌的第二节与第三节是很让人刮目相看的。

<sup>19</sup>从历史上各类大的进程来看，一旦有效沟通、和平争取权益的通道被关闭，暴力往往会成为事实上不得已的选择。以美国的民权运动为例，当年黑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司法挑战远未成功之前，各类暴力冲突不断；而工人运动同样如此，美国并不过五月一日的国际劳动节而是过自己本国九月份的劳工节，而这也是起源于劳工向资本家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却无果后爆发的“干草市场事件”。很多时候如果这些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有效的渠道进行沟通，许多暴力冲突或许都可以避免；只是从历史上来看，往往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某一方才妥协让步。再上升一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继位后的国家转型着实有其值得称颂之处。

日期	描述	成败
1870/10	在普法战争最激烈的10月24日，法国军事部任命沃尔森·艾斯特拉齐(Walsin Esterhazy)将军为阿尔及利亚总督。任命军人作为总督使得殖民地居民极为不满。在市议会的号召下，民众大举入侵总督府，而总督府的军队未做任何抵抗。艾斯特拉齐将军迫于民众压力不得不辞去总督一职。他在一片嘘声中乘马车到达“光荣号”护卫舰等待返回马赛。	成功
1956/02/02	前总督雅克·苏斯戴(Jacques Soustelle)深受阿尔及利亚人民爱戴，他的离开导致殖民地居民的不满，进而引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	成功
1956/02/06	法国总理盖伊·莫莱特(Guy Mollet)的访问引起了数场针对他的敌对示威。示威的结果是阿尔及利亚法国人迫使法国政府任命文官出身的罗伯特·拉科斯特(Robert Lacoste)代替卡特罗(Catroux)将军成为总督。殖民地居民的意志又一次取得胜利。	成功
1956/12/29	被暗杀的阿尔及利亚市长联盟主席阿梅迪·弗洛格(Amedee Froger)的葬礼队伍为高喊着“法属阿尔及利亚”和“军队掌权(The army to power)”(*)口号的大型示威队伍让路。 (*) 虽然阿尔及利亚人不喜欢军人作为他们的总督，但1954年的独立战争导致了后续一系列谋杀、爆炸、冲突和流血事件，所以阿尔及利亚民众急切盼望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保护他们；但在当时法国政府相当软弱，几乎每过三四个月总理和内阁就会更换，所以在1956年民众希望“军队掌权”也就可以理解了。	成功
1958/04/26	一场意在影响当时在巴黎进行的组建新政府谈判的示威游行爆发(这次的游行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5月13日大游行的排练)。	成功

表 7.6: 阿尔及尔在1870年至1962年期间的政治示威和暴动

日期	描述	成败
1958/05/13	<p>在国民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处决了三名法国士兵之后，一场有组织的示威游行在5月13日爆发了。在战争纪念馆前放置花圈后，示威者朝着位于格里尔斯高原的政府所在地继续前行。示威人群于下午5点30分强行打开大楼的门，而马苏(Massu)将军的伞兵部队没有进行干预。其他大规模游行示威在5月13日之后陆续爆发，但由于巴黎政府的强硬(**)，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不能再将他们的意见强加给政府。</p> <p>(**) 5月13日之后法国政府的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宪法的通过使得总统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进而使得政府能够比过去更加强硬。这次通过的新宪法是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第五部宪法，所以当时的政府被称作“第五共和国”。由于示威可能会对新安宪法的通过与否产生一定影响，这也是为什么5月13日在阿尔及利亚的示威显得重要的原因。</p>	成功
1958/05/15	<p>阿尔及利亚总司令萨兰(Salan)将军在聚集在政府大楼阳台下的五万民众面前(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对夏尔·戴高乐将军的赞赏，并且以“戴高乐将军万岁”结束了他的演讲。</p>	成功
1958/06/04	<p>在戴高乐将军访问期间爆发了一场新的大型游行示威。人群翘首期待戴高乐将军念出“法属阿尔及利亚”一词，但是戴高乐将军并未照作。</p>	失败
1960/02	<p>在所谓的路障暴动期间，有一场支持示威爆发。安全部队试图用催泪弹驱散人群，但在与示威人群的交火中有数人丧生。</p>	失败
1962/03	<p>最后(也是最悲剧性的)一场示威发生在3月26日。这场示威是由秘密军组织(OAS)策划组织的，这一组织三天前在巴勃圣乌尔德(Bab-el-Oued)地区与艾勒瑞特(Ailleret)将军领导的正规军刚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游行期间，在伊斯利大街(rue d'Isly)街角上发生的交火事件造成了46人死亡。</p>	失败

表 7.7: 阿尔及尔在1870年至1962年期间的政治示威和暴动(续)

咽喉要道上的战略重地并修筑防御工事，以期威胁敌方的供给线并监察敌方部队的行动。这基本上是表7.8中提到的所有行动的模式。但是为了证明这些军事行动之间的高度相似性，我们必须多花些笔墨对其进行更详细的描述。

– 和平(Hoa Binh, 1951年11月-1952年2月)

法军在1951年11月14日动用伞兵占领了距离海防(Haiphong)以西180公里的和平地区，并在这里修筑防御工事，试图切断越南的通讯线路。武元甲将军(General Giap)决定不直接攻击这个防守严密的地区，转而集中火力攻击法国的供给线—黑河(the Black River)和6号公路(Route 6)。到1952年1月越盟的火炮已经几乎封死了黑河，法军的护航队基本无法再驶入黑河。因此战斗转移到了6号公路上，越军不断在沿线发起袭击并暂时性地切断了路线，法军动用了12个营的兵力重占据了6号公路，但由于战线太长，法军为维护这条运输线不得不投入巨大兵力(约两万人)，最终萨兰将军(General Salan)于1952年2月22日命令法军从和平撤离(O'Neill 1969)。

开始时间	持续时 间(月)	军队数量	地点	成败
1951年11月	4		和平	成-败
1952年10月	10	8, 000	纳讷	成功
1953年03月	3	6, 500	石缸平原	成功
1953年11月	7	12, 000	奠边府	失败

表 7.8: 奠边府行动的同源先辈(antecedents)行动 (O'Neill 1969, Teulieres 1978)

– 纳讷(Na San, 1952年10月23日-1953年8月)

法军在一个小机场附近构建了一个堡垒营地，这为奠边府战役埋下伏笔。所有部队(12个营大约8000人)和所有设备以及火炮都空运到了这里。武元甲将军针对这个加强堡垒派遣了19个营的兵力。越军的重型炮兵351部由于缺乏合适的道路未能赶到。主攻在1952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夜间开始。但是面对吉勒斯(Gilles)上校指挥的航空兵和炮兵，越盟的作战手段显得不足。据估计越盟有4000人阵亡(Teulieres 1978)。法军在越盟眼皮底下将纳讷的驻军于1953年8月空运回河内(Hanoi)，这一过程中越盟没有发动任何袭击。

– 石缸平原(Plain of Jars, 1953年春)

法军在老挝的石缸平原上新建了一个机场并空投了部队(十个营)和坦克, 以对抗已经占据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上前哨基地的越军的进攻。虽然石缸平原营地距离河内800公里、距离西贡(Saigon)1600公里, 但法军的后勤保障没有问题。法军于4月21日成功击退了越盟的一次攻击。而雨季的开始迫使武元甲撤出了他的部队。

– 奠边府(Dien Bien Phu, 1953年11月20日–1954年5月)

成功地防守住了纳讷似乎误导了法军最高指挥部的判断, 他们自负地认为可以在东京(Tonkin, 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任何地方以一个分区堡垒(divisional-sized fortress)的力量战胜武元甲将军。因此在奠边府采取的军事行动和在纳讷如出一辙。在吉勒斯上校指挥下的六个伞兵营首先占据了有利地形, 并修建机场和防御工事。然而与在纳讷的情况相反的是, 由于道路通畅, 武元甲的351重型炮兵师得以转移至此。另外越军还挖掘了近350公里的战壕和隧道, 越南人将建造堤坝这种古老传统应用到了战争的艺术上, 这一传统使得他们得以几个世纪以来都控制着红河(the Red River)和北河(the North River)。

奠边府行动的失败导致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the Geneva Accords)》的签署。十多年后美国愈发地发现自己深陷于一场类似于法越战争的新的冲突当中——越战。在越战中美军主要采用了加固阵地的策略。1968年(1到4月), 武元甲将军试图通过包围溪山(Khe Sanh, 位于北越边境以南50公里、老挝边界以东约10公里处)来重演他在奠边府的成功。由于美军没有足够的兵力且此处林深地广, 美军无法展开有效的巡逻, 而越南军队在该地区兵力充足, 于是便出现了类似于当年奠边府战役初期阶段的结果。更为不妙的是被围困的美军部队发现溪山完全被一个复杂的隧道和碉堡系统所包围。尽管美军有大量的空中支援, 然而在2月6日兰威特种部队营(the Special Forces camp of Lan Vei, 驻扎于溪山西南10公里处, 驻军共有1000名士兵, 其中主要是老挝人及部分美国人)依然遭受到了越南军队的猛烈攻击。在之后的77天总计有10800枚炮弹射向溪山(当年奠边府在55天内遭到103000枚越盟军队炮弹的轰炸), 22架美军飞机和直升机被摧毁[当年法国空军在奠边府被围期间损失了62架飞机(Clodfelter 1995)]。美国利用其在溪山的空中力量确保了充足的补给和火力支援[仅1968年2月15日就有5万吨凝固汽油空投至溪山附近(O'Neill 1969, p.195; Mangold and Penycate 1986; Welsh 1991)], 这使得美驻军得以

守住了阵地并赢得溪山战役的阶段性的胜利。

上面这个案例研究为我们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第一个例证。我们首先选取了一些事件(events)，然后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并调整放大倍数，直到我们所感兴趣的元素达到最大清晰度。我们有意使用“显微镜”这个词是意在强调我们在进行比较历史学研究时使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中使用的方法的相近性，而且现在一个趋势也是历史研究学者越来越多的开始转向使用自然科学中的方法进行研究。

## 7.4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本书的宗旨和目标之一就是缩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在方法上的差距。事实也证明大多数人对这一目标的反对源于对“自然科学”这一概念的过时理解。过去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的观点通常依赖于以下论点：(1) 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可以重现的；(2) 社会科学中的现象过于复杂而无法运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经典逻辑；同时(3) 个人意志和人类自由与理论模型不相容。下面就让我们来逐一检验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所坚持的立场同戈德斯通(Goldstone 1997, 1999)、提利(Tilly 1997)所主张的观念非常相近。其实早在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时代就已经有非常精彩的反驳上述观点的论证，我们在后面三个小节中所给出的解答基本是与涂尔干的理论[以及日后提利(Tilly 1997)与戈德斯通(Goldstone 1997, 1999)对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一脉相承的。

### 7.4.1 自然科学的实验真的可以完全重现吗？

在诸如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动力学这样的自然科学领域，大家显然可以意识到进行实验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就是进行观测。当然我们如果只举这样的特例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天文学、气象学或地球动力学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均源自于物理学。我们下面会证明即使是一般意义上的物理学实验也是不可能完全丝毫不变地重现的。我们完全不用考虑涉及随机扰动(random perturbations)或混沌(chaos)的复杂实验，只来考虑一个在一般人看来或许最为简单的实验——钟摆的摆动——就足以说明问题。现在假设我们要测量钟摆的振动周期，并进一步假设两个连续测量结果为2.37秒和2.35秒。如果我们接受0.1秒的精度，那么可以得出周期为2.3秒的结论，而这也正是教科书中的表述(参见图7.10)。在教科书中所设想的状态中影响钟摆的唯一外力是地球的重力，实验在这种要求下可以说是可重复的。

现在不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需要得到0.01毫秒测量精度的振动周期时的情况，此时我们就不再能忽略影响钟摆运动的各种微小扰动[例如同一建筑中的人的行走、街上行驶的汽车或飞过这一建筑的飞机造成的振动(参见图7.11)，这些都是主要的高频扰动]；由于太阳、月亮和大行星的引力作用所引起的低频扰动也同样存在(参见图7.12)：这些力的方向在地球自转时会发生改变；换言之，即使在看似相同的条件下我们也不可能再完全严格地重复这一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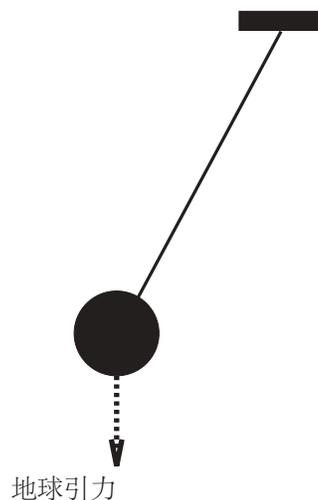


图 7.10: 钟摆的摆动：教科书中的表述。钟摆由轴上的悬臂及其悬挂的质量块组成。在这个理想的表述中(Main 1978, p. 17)，作用在摆上的唯一外力是地球的重力(当然也包括支撑架的作用力)。然而通过悬轴，钟摆连接到实验室天花板(或地板)，并且天花板本身也是建筑物的结构的一部分。来自外部的振动因此会被传递到摆锤(如图7.11所示)；此外摆锤也受到来自其他天体的万有引力作用(如图7.12所示)。

综上所述，只有当人们对影响系统的所有可能的力及其相对数量级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时，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才能被认为是可重复的。这种清晰的理解也正是社会科学中普遍缺乏的，许多社会科学中的分析都不够全面且没有厘清各种因素的作用强度。我们不妨来通过从众多例子中随机选择的两个示例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案例与石油工业的一段历史有关(Yergin 1991)：作者引述了1974年石油价格突然爆涨的几个原因：阿拉伯国家对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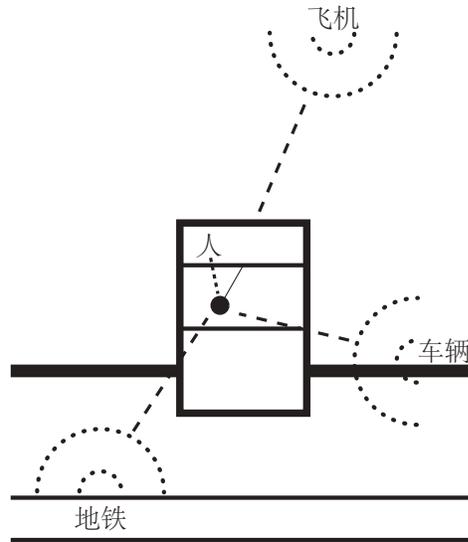


图 7.11: 钟摆的摆动: 高频扰动。发生在建筑物内部或外部的运动(例如人的行走、车辆、地铁和飞机)都会引起振动。这些振动会传递给钟摆并影响钟摆的振动。

美石油公司提出的民族主义要求、阿拉斯加石油矿床开发的延误、水门丑闻剥夺了美国总统的行动自由。这些事件和价格上涨之间的主要联系是存在一定同时性(synchronism)。然而作者的出生地等环境因素无疑影响了他的判断: 他提到的“原因”都无一例外的与西方世界有关。作者非常奇怪地提到了阿拉斯加, 但其产量即便在其顶峰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末也从未超过世界产量的3.5%; 而且作者完全没有提及有关苏联的原因, 彼时苏联正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占当时世界总量的20%)和第二大出口国。第二个例子是(Hallgarten 1961)关于1851年法国拿破仑三世上台的报导: “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所制造的国际局势首先消除了政变造成的所有困难。”这两个事件之间确实有一定的同步性, 因为第一个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847年9月(Vincent 1898, p. 188); 但是这一发现对法国国内政治局势会有显著影响是令人怀疑的, 相比之下, 小麦的价格对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肯定有更决定性的影响。在1848和1850年之间, 法国小麦的平均价格从每百公升约30法郎下降到15法郎, 然后在1855年又再次上升到30法郎。霍尔加腾(Hallgarten)提到了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 大略是因为他曾在伯里克利担任教授长达数年进而对于这个区域非常了解所致; 对等到钟摆周期的情况下, 他的观点就这等于是考虑木星的影响却忽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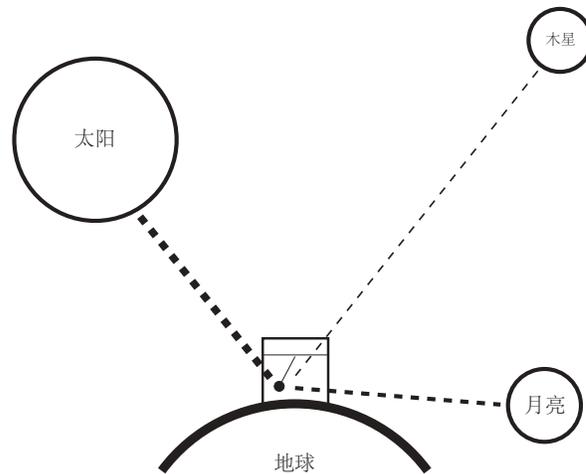


图 7.12: 钟摆的摆动: 低频扰动。除了地球引力, 摆锤还受到太阳、月亮和最大的几个行星(木星、土星)的引力场的影响。虽然这些引力远小于地球引力, 但它们在高精度测量中仍然会有一些影响。举例来讲, 如果钟摆的周期是5秒的量级, 那么由于月亮和太阳的导致的校正将分别大约为2和0.7微秒。因此测量在微秒的精度水平上将在不同时刻产生不同的结果; 换句话说, 实验结果不再能以教科书中的标准方式重现出来。应该注意到的是, 该图给出了相当示意性的表述; 严格来讲钟摆的驱动力是重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差(即所谓的潮汐力(tidal force))。

地球的吸引力。

### 7.4.2 米尔的经典逻辑

利伯森(Lieberson 1991, 1994)利用两个汽车事故的简单例子表明基于米尔(J. S. Mill)的逻辑规则的演绎推理对于小N对比研究(即只有少数观测资料)是不充分的。此外戈德斯通(Goldstone 1997)指出, 由于在社会科学通常涉及大量影响因素, 米尔的逻辑规则对于无论是小N还是大N的对比研究都作用甚微。不过这个现象倒不仅局限于社会科学, 正如我们上文提到过钟摆也受到大量不同的外力影响(我们甚至还没提到实验室内部的因素)。为了得到精度足够高的测量, 我们还得考虑温度(温度影响钟摆的长度)、压力或空气湿度可能出现的变化。影响因素的列表显然可以变得更长, 这使得应用米尔的方法变得非常困难。我们只有完全掌握了所需具备的直观认识和具体操作知识之后(以期厘清哪些是真正最重要的因素)才能应用米

尔的方法。

### 7.4.3 历史分析学和人类自由

还有什么行为比人们决定自杀的选择更能象征人类自由？然而自杀人口的百分比在任何国家的特定时间段内通常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美国在1900年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10.2，在1970年为11.2。人们选择的不同自杀方式是个体自由选择的另一表现形式，但我们还是再次看到这些比例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例如服毒自杀在1900年占自杀的30%，在1970年占了28%(Historical Statistics 1975, p. 414)。这些现象和其他规律在涂尔干的著作中被首次提出，而这也标志着量化社会学(quantitative sociology)的发端。戈德斯通(Goldstone 1997)在他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为个人行为 and 团体行为之间的关系赋予了一种时髦优雅的表达：“我们可能不确定某个特定个体是如何反应的，而且从小群体(最多几十个)的统计结果中我们不能确定宏观结果，因为个体的随机差异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数千或数百万的对象组(pool)，特定的个体的细节行为就真的不那么重要了，得到的群体预测结果的方差也会非常小。”(Historical Statistics 1975, p. 117)。

从上文我们可以知道，虽然个体的自由选择是存在的，但当某一社会现象涉及足够多的人数时，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测。不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前面所提到成功预测自杀率的案例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从1900到1970年间美国的家庭与社会结构基本上保持不变。如果这类底层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系统往往就不再处于平衡态(equilibrium state)，进而进行预测往往就变得不可能了(在物理中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且我们也是借用了物理学中相应的概念和想法)。虽然我们流体力学的方程足够了解，但我们仍然无法精准预测数天之后的天气。这就引出了利伯森(Lieberson 1985)所说的静态的“可解(doable)”问题和基于时间(time-dependent)的“不可解(undoable)”问题。由于不可解问题太过复杂，研究者们通常应避免试图去求解它们；大体说来，涉及多个连续事件的历史问题都是不可解的，想要对这类问题进行预测是几乎不可能的(未来或许也极难有解决的可能)。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用爱尔兰独立战争(the Irish war for independence)为例来具体解释这一概念。

### 7.4.4 不可预测问题和混沌

为什么长达百年的爱尔兰独立战争会那样展开并最终在1921年取得成功？这是一个不可解问题的示例。这场斗争包括一系列行动；在每个步骤之后，有许多可能的选项用于下一步(如图7.13所示)。如果我们假设在每个步骤结束之后有两种同等可能的选项(这肯定是保守估计)，那么包

含8个步骤的任意一条路径的可能性都将是 $(1/2)^8 \approx 0.004^{20}$ 。换言之，在这众多可能的轨迹中观察到其中某一个的概率将会趋近于零。因此，试图去预测轨迹是个不可能的任务，这被利伯森称为“不可解问题(undoable problem)”。

图7.13表示的是一个混沌系统(chaotic system)，这一概念最初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当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开始意识到，即使对于相当简单(且确定性)的系统来说，它未来的演变也可能是不可预测的。由于系统存在太多的分叉(bifurcation, 如图1.8所示)，所以系统对初始状态极端敏感(常常会是失之毫厘便谬之千里)。利伯森(Lieberson 1985)在1985年就提出一个著名的研究范式来描述这一特性，这是非常具有洞见和前瞻性的，因为当时自然科学界也才刚刚开始认识到混沌的重要性。将历史事件分解为更简单的模块可以被视为应对混沌系统问题的一种方式。

前面的段落专门讨论了在认识论上能有的选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性常常被低估的关键因素——能否获得可靠的数据。

### 7.4.5 进步的必要条件：获得可靠数据

无论是对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进步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拥有大量的可靠数据。如果没有充分的数据，即使选择最好的方法也无济于事。这一点可以通过两个科学史的例子来阐明。雅各布(Jacob 1970)给出了第一个例子。英国医师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当年研究了两个重要的话题：血液循环和遗传规则。如我们所知，他能解决第一个问题，但很难在第二个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为什么呢？在哈维的时代里，人们大量研究了压强、流体速度、脉搏、压迫器和管中液体的运动等概念。流体力学所发展出的可靠知识和积累下的大量数据为哈维解决血液循环问题做了极好的铺垫；但相比之下，当时遗传机制方面的研究方面则还没有太多新的结果与数据积累。第二个例子更能体现这一观点。笛卡尔(1596-1650)的《Discourse on Method, Optics, Geometry, and Meteorology(论方法、光学、几何学、气象学)》分了两个部分：他在第一部分中介绍了一种新的方法，随后他在第二部分开始将其方法应用于几个案例研究。他试图理解彩虹和一些其他气象现象(例如雷声)。他能够解决第一个问题，但无法在第二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彩虹是由阳光照射到半空中的水滴，光线被折射及反射而产生的。在笛卡尔的时代，笛卡尔本人和很多其他学者做了大量关于折射问题的实验。有了关于折射问题的第一手知识和数据，笛卡尔离解决彩虹问题就已经只是一步之遥了。但对于

---

<sup>20</sup>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平均假设也并非总是成立，这实则是假设各个步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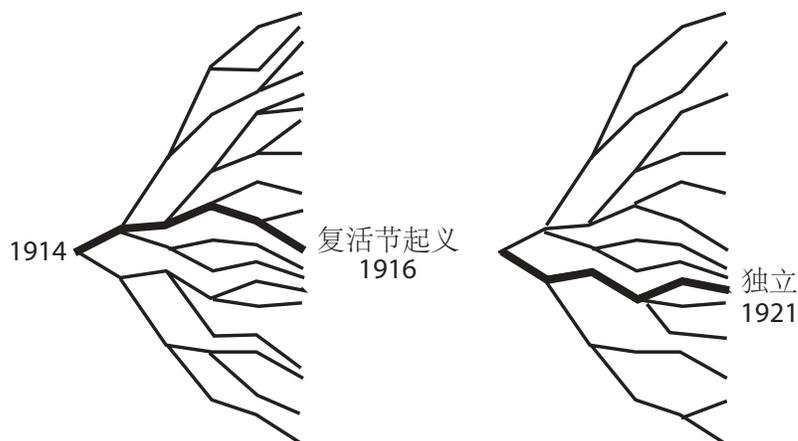


图 7.13: 就利伯森(Lieberson)给的这个表达而言, 预测爱尔兰的独立战争的连续几个阶段是个“不可解问题(undoable problem)”。从1914年到复活节起义(the Easter Rising)中间所采取的这些步骤, 在每一步都受大量因素的影响而有多种可能, 而历史最终只会是这众多可能选项中的某一个。这同样也适用于从复活节起义到最终独立中间所经历的过程。如果我们假设这一过程共有八个步骤, 每个步骤有两个等可能的选项, 那么实际轨迹(由粗线表示)只具有 $0.5^8 \approx 0.004$ 的概率。在一个混沌系统中存在太多的分叉导致准确的长期预测几乎不可能。

雷声的研究则完全相反, 在那时没有任何关于声音传播的新证据和数据可供他使用或参考; 所以虽然笛卡尔在方法论方面有很多颇具洞见的认识, 但他仍然无法解释雷声的起源。

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类似, 历史社会学发展的前景也受限于比较历史数据的可获取性。所以到目前为止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 不过提利(Tilly)的工作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

## 7.5 总结及《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简介

在本节当中我们会解释我们是如何将本章前面所提出的基本方法应用于不同的案例之中的。对于一些案例的具体应用我们已经在英文版的著作《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Patterns and Repertoire in History)》中进行

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在后文中将《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Pattern and Repertoire in History)》缩写为《模式》。如果读者对于这些具体内容感兴趣，可以在下面的网站找到这本书：<http://www.lpthe.jussieu.fr/~roehner/prh.pdf>或<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523063028/www.lpthe.jussieu.fr/~roehner/prh.pdf>。《模式》共分为三大部分：革命、战争和前景(prospect)。我们在本章中解释了比较方法的哲学观和方法论；《模式》一书主要关注革命和战争这两个主题，书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说明这种方法如何实施的案例研究。

《模式》第一部分开篇研究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所有革命的原型。同时，由于美国革命是那样独一无二，研究美国革命对于比较分析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在西方国家，大罢工时代在1848年大革命时代结束之后如约而至，一些大罢工(例如1918年瑞士大罢工、1968年法国大罢工)最终险些转变成真正的革命。

第二部分对战争的讨论试图说明传统观念和后勤补给所导致的限制(constraints of tradition and logistics)如何为从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各种冲突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视角。如第一部分所述，我们对战争进程而不是其原因更感兴趣。

第三部分则着重讨论了如何扩大、深化和发展比较历史分析学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

### 7.5.1 模块的确定

我们如何知道哪些历史的类比能揭示显著的模式，而哪些类比只是徒劳无功？什么标准能用来识别真正重要的比较？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一些合理的判定标准包括：(1) 考虑定义清晰的历史现象；(2) 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满足标准“大N”条件)；(3) 有准确的可量化的历史来源。综合起来，这些标准可以指导我们筛选比较对象，并缩小研究范围；沿着这样的线路进行的任何研究将产生有用甚至非凡的结果。

然而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标准并不能回答真正的问题：如何能得到不仅有用而且能够提供新视角和洞见的结果？让我们再次诉诸苹果坠落的例子。虽然乍一看苹果的坠落似乎是一个明确定义的现象，但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事实上它有许多须要考量的地方。我们可以进行以下分析：(1) 可以分析树干和树枝之间的连接的断裂。这方面的研究将触及材料科学和植物枝干的破裂。这种情况下，类似事件的集群将包括不同种类的果实(櫻桃、栗子等)的花序梗的破裂。(2) 可以研究苹果击中地面时的震动。根据土壤的硬度，苹果将或多或少被损坏。这种现象具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因为每个园丁都知道，摔坏的苹果难以保鲜。第二种情况下，类似事件的集群将包括比苹果更软或更硬的果实的坠落。(3) 也可以研究苹果的(自由)坠

落。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类似的事件将包括下雨、冰雹(不同大小)、叶子或迫击炮弹。

如果细致地进行前两项研究，我们肯定能得到有用的结果，但两个结果都不会是科学的突破。而正如我们所知，对于第三项问题的深入研究让牛顿一步步走进了令人惊叹的伟大发现。当牛顿凭借直觉把月地运动纳入物体坠落这一类别中时，定律就在牛顿脑中迸发闪耀开来。于是，随着类似规律的事件集群不断扩大，万有引力理论的提出水到渠成。不得不说的是，世界上并没有方法一定能找到牛顿的那种直觉，但是类似事件的集群的识别和分析可以为这种划时代的科学突破铺平道路。

从更技术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有两种方法将复杂的历史现象分解为更简单的模块。首先，可以按时间顺序进行分解；这样一来，复杂事件序列可以分解为单独的事件。第二，分解可以通过将大型事件(例如罢工)分解成更小的子集来完成(如图7.14所示)。《模式》的第2章到第7章将使用这两种方法进行相应的研究(如表7.9所示)。

比较可以基于不同国家之间(即类空比较, spacelike comparison)或基于不同事件进程(即类时比较, timelike comparison)进行。我们在图7.9中介绍了这两种方法。基于不同国家的比较可以在《模式》的第2、3、4、5和7章中找到，基于不同事件进程的比较在《模式》的第3、5、6和7章中给出。

## 7.5.2 后续案例研究小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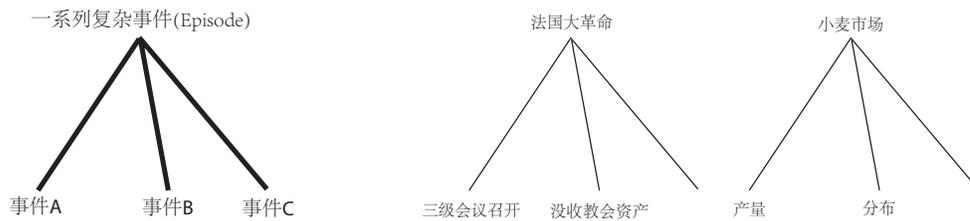
这本书和《模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事实上遵循共同的模式、在一个明显混乱的事件集合背后事实上可能隐含着某种秩序。《模式》一书将提供更多的示例。

在《模式》的第3章中通过比较法国1356年的革命(以失败告终)和1789年的革命，可以发现它们都遵循了同一种逻辑轨迹——第三产业与神职人员结成了同盟、资产阶级的权利得到巩固等等(详见《模式》一书中的表3.2)。

《模式》的第3章证明1789年、1830年、1848年2月、1848年7月和1870年在巴黎发生的起义遵循同样的剧本。这些事件涉及相同的行动者——国民警卫队、东郊的群众和一些自由资产阶级——他们的一系列行动也由过去的类似事件(episodes)构成：对抗军队、巴黎议政厅会议、街道游行等等。

在1936年、1953年、1960年和1995年，法国和比利时发生了一些罢工事件，这些事件似乎是互不相干的；然而《模式》第5章中的研究表明这些事件遵循相同的动态过程(即扩散过程)、相同的时间过程和相同的情节和行为策略集合(repertoire)。举例来讲，罢工的初始积累阶段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协议往往在罢工达到顶峰的那一周达成，然后让所有的工人回复工作大约需要两三个星期(定量描述见《模式》中的图5.2a, b)。

## 1) 分解为独立事件(episodes)



## 2) 分解为子集(subs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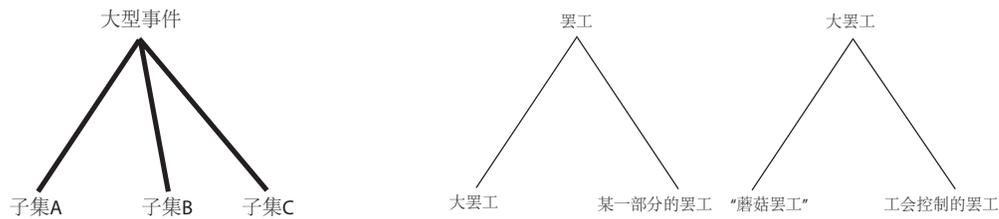


图 7.14: 将复杂现象进行模块化分解的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已在图7.3和7.8中展示, 即按照事件的时间序列进行分解。分解后, 一大部分单独的事件被定义出来。右侧给出了两个说明性示例: 小麦市场是一个包含大量内容的事件, 可以分为若干子集。植物学家和自然学家也使用类似的分类方法。有意义的是, 这种分类必须基于客观标准。例如, 在一个领域中将所有罢工的集合分解为大罢工与某一特定领域的罢工的基础是基于罢工内涵的延伸; 第二个分解是基于工会所扮演的角色: 弱联盟导致“零星发展的小罢工”(又被称作“蘑菇罢工”), 而强联盟导致联盟控制的大型罢工。《模式》第5章对各类大小罢工进行了研究。

章节	复杂现象或大型事件	模块或事件(episodes)
1.分解成独立事件		
第2章	资产阶级为获政治权力	与贵族/教会/王室斗争
第3章	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年	三级会议/巴黎起义/ 没收教会财产
第4章	美国大革命	后勤因素/统一与独立的对峙
第6-7章	为扩张领土发动的战争	后勤因素/战略需求/ 战术需求/潜在利益
2.分解大事件为子集		
第5章	罢工	大罢工/零星罢工
第6章	战争	领土扩张战争/等等

表 7.9: 《模式》一书后续章节中的模块化实例

《模式》的第6章通过对1805年至1815年间英国惠灵顿远征军入侵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二战期间盟军攻入意大利两场战争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实际上是两股力量相互角逐而又互不干扰的两条战略线路：前者是一个海洋力量的战略步骤，后者是一个是大陆强国的战略步骤。我们更一般地分析了欧洲的拿破仑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似之处—例如封锁国境的影响、远征俄国的意义以及被占国民众的爱国主义觉醒。

正如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日本攻击美国的决定几乎不能在理性的基础上解释：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十倍左右。《模式》第6章中的研究表明，如果把日本的行动方针解释为基于以往战争经验的近似重复/同源重复(paronymic repetition)，问题就变得清楚了。事实上，在偷袭珍珠港五十年以前，日本就反复对人口或国民收入比其自身大几倍的国家(例如中国和俄国)发动过战争。此外，攻击珍珠港的战术设计在许多方面是在1904年2月袭击亚瑟港战役(the raid on Port Arthur)的翻版。

很多人都对德军将领冯·克拉克(Von Kluck)在1914年8月的“抗命”事件大书特书，当时克鲁克不顾德军统帅小毛齐<sup>21</sup>的命令进军巴黎。《模式》的第6章将展示克鲁克对总参谋部命令的弹性解释实际上是德国将军们的共同态度。同源重复(paronymic repetition)这一原则为克鲁克的冒进提供了一

<sup>21</sup>其全名为赫尔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又称小毛奇；他是老毛奇—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的侄子。

个自然的解释。

1914年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并进攻了比利时。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从8月3日到30日，德国军队迅速向巴黎方向进军(见图7.15)。冯·克拉克将军时任第一集团军总指挥。根据施里芬计划，他应当从西面向巴黎行进。8月30日，当距离巴黎北部只有20公里时，他指挥军队向东推进，这与他接到的命令正好相反。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克拉克在德军战线制造了50公里的缺口，暴露了他的右翼部队并使其遭到法国第六集团军的袭击。发生在9月5日的这场袭击标志着“马恩河战役(Battle of the River Marne)”的开始。此举不仅阻止了德军的进攻，同时迫使德军后退了60公里，退至恩河(River Aisne)后方。这次行动之后，前线局势一直维持到1918年。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克拉克将军的决定并不反常。早在1866年发生在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军队之间的萨多瓦战役(Battle of Sadowa)(亦称“克尼格雷茨战役(Battle of Königgrätz)”)中，普军总参谋长老毛奇临阵出险招，但好在其判断正确，最终帮助普鲁士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1870年格拉沃洛特战役(Battle of Gravelotte)是法军对普鲁士王国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Grand Duchy of Hesse-Darmstadt)的袭击，德军赢得了胜利。萨多瓦和格拉沃洛特两场战役的总司令老毛奇元帅的成功为之后的战地指挥官们留下了极大的主动权。只要毛奇体系(Moltke system)能够带来成功，它就会受到赞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冯·克拉克将军在1914年9月的决定并不难理解。

## 总结

最后我们简要概述下案例研究。《模式》的第2章和第3章主要用来分别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基于事件进程和基于不同国家的比较分析。基于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日内瓦(1781年)、荷兰(1785年)、比利时(1787年)和匈牙利(1848年)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尝试。它也突出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英格兰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 in England)之间一些事实上的相似之处。研究还表明，不同行为者的战略和改革的速度因国家而异。君主制(monarchy)在法国是站在贵族的一边，而在一些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的州，君主制与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基于事件进程的分析表明，在某些方面，对于法国历史上其他时候已经发生过的运动来说，1789年5月至8月的事件就像是这些过往事件所孕育出来的一样。

《模式》的第4章中试图对美国革命进行比较分析。鉴于事件的独特性，这个目标对本书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独立战争在英国、法国或西班牙殖民地的某个地方爆发，那么在一起的十三个殖民地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同时我们的分析还表明，18世纪70年代的十年是让独立战争成功的



图 7.15: 德国士兵在货运列车上赶赴前线, 时间大概在1914年8月。车身上的标语从左至右依次表示以下意思: “Elsas Lothringen”=阿尔萨斯, 洛林。“Ausflug nach Paris”=前往巴黎。“Auf wiedersehn auf dem Boulevard”=在林荫大道上见。“Auf in den Kampf, mir jucket [jucket] die Säbelspitze”=即刻进入战斗, 我的剑尖在渴望。图片来源: 英文维基百科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

最恰当的时机。本章结束于对拉丁美洲独立斗争和美国独立战争的比较分析: 为什么前者会带来分裂而不是团结。

《模式》的第5章讲的是大罢工。它与前几章有关, 因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 大罢工被认为是革命的前奏。不仅大罢工的目标往往具有公开的政治性, 而且军队经常被调动以监控游行。本章首先对西方国家的大罢工进行了概述, 并特别强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在法国和比利时, 大罢工的形式是我们所谓的零星发展的罢工, 这种罢工的开始和扩散之初往往不理睬工会的温和建议。因此, 他们特别关注到团体化率低的国家。1968年5月在法国的罢工是这种类型, 类似事件也在1936、1953、1960(比利时)和1995年发生。

《模式》的第6章是关于战争的研究。但与其他社会学调查[例如(Bouthoul

1970, Singer and Small 1972)]相反,我们不关心战争的根源而是关心其形式。于是迄今为止,历史社会学已经扩展到了过去仅由历史学家占据的领域。正是因为战争的形式表现出了确定的模式,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它们是有意义的。第6章研究了自17世纪以来对一大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的领土扩张战争,特别是关于瑞典、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战争。这些战争事件(episodes)在战术和策略方面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例如,在七年之战(the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年)和拿破仑战争(the Napoleonic Wars, 1796-1815年)之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种深层次上并行发展的态势。所有这些战争都是世界大战,并且都是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的对抗。

《模式》的第7章是对第6章的补充,主要分析了发动战争的财政和后勤要求。举例来讲,我们研究了战争支出如何在债务和通货膨胀方面影响国家经济。在后勤补给层面,研究显示军队的行军速度很少超过每小时20公里,这个速度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几乎没有增加。

《模式》的第三部分讨论了未来研究的议程,特别探讨了预测和改进比较数据来源的可能性。可以看出,一些令人惊讶的准确预测对历史的进程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同时代人对这些预测的真实性没有什么信心。

### 7.5.3 撰写比较历史时会遇到的问题

在我们结束这个兼具总结性与介绍性的章节之前,必须提醒读者一句:在比较历史事件时会出现一个基本的困难—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事件都不可能详细描述和重演,这首先是因为作者受到篇幅限制,其次是因为几乎没有读者会有时间和耐心阅读那么冗长的书。因此作者不得不假设读者对书中的事件有一定了解,否则富有成效的比较就变得很困难。这个障碍是定性比较分析所固有的: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 1976[1836], 详见《模式》第173页)在他的军事活动研究中就遇到了这类问题,他研究了不少于130个军事活动,并且毫无疑问他是详细地重述所有这些问题的细节。

我们在本书和《模式》中试图以两种方式克服这个困难。首先,考虑到美国、欧洲、非洲或亚洲读者的历史背景的不同,我们并不试图将研究案例限制在一个大陆(然而我们同时意识到亚洲和非洲的历史未被充分研究);第二,我们用一些数字和图表对事件的定性描述进行了补充,后者特别适合于进行比较。

无需赘述,还有另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即使用定量数据。但很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不可行的,因为压根就没有适合分析使用的数据。



## 第三部分：结语



# Chapter 8

## 还要做什么？

### 8.1 物理学与天体物理学为何能取得巨大的成就？

在我们看来有两个因素对于物理学与天体物理学在过去数百年来巨大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1) 对于简单性的坚持(物理学家一直都关注简单的问题，例如为了理解碳原子他们先从更简单的氢原子开始入手)；(2) 物理学与天体物理学的发展是一个集体性(collective)和累积性(cumulative)的过程。我们稍后会对这两点分别进行阐述。

#### 8.1.1 希腊在科学上的突破以及随后欧洲长期的停滞

希腊世界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200年间在多个自然科学的方向(尤其是物理和天文学)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阿基米德(Archimedes)和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是那个年代的杰出代表，他们两人生活的时期也基本相同(约公元前280到公元前200年)且互相时有往来。阿基米德住在西西里岛(当时那里是希腊殖民地)，埃拉托色尼生活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他们两人在数学、物理、天文和工程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阿基米德的许多成就都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埃拉托色尼最为著名的实验则是测量地球的直径(其结果误差在10%以内)，而且他还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或许他的工作让他有了充足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研究)。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作“希腊奇迹”，但这之后(起码在欧洲)却是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物理学和天文学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甚至是衰退状态。

而与此相反，天文学在中东和中国的发展却一直在持续，北宋末年更是天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现存最古老的星图之一就绘制于北宋年

间(1092年)。大约40年之后蒙古的入侵给中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过天文学的发展似乎并未中断，忽必烈在位期间(1260-1294)曾命伊朗天文学家在北京修建了一座新的天文台(目前这一天文台仍可供游客参观)并成立了天文研究机构。一百多年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又建立了一个国家天文台。

我们可以很确信地说在1400年之前，伊朗与中国在天文学领域的成就远超过欧洲。但为什么之后天文学的突破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或伊朗呢？这一问题当然受很多因素影响，可能会有非常多种回答。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无疑是从占星术向天文学的转变。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一直使用“天文学”这个词，但其实我们在前言中也提到早期数百年内对于夜空的观察也都是为了发展占星术而非现在意义上的天文学。

### 8.1.2 以简单性为指导方针

脱胎于占星术的天文学能够成为科学，其过渡过程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从最为简单的问题和系统着手进行研究分析，而这也是伽利略、开普勒与牛顿能够取得巨大科学成就的重要原因。伽利略所研究的自由落体和开普勒、牛顿所研究的行星轨迹都是两体问题中的简单形式(two-body problem)<sup>1</sup>。当其中某个物体处于完全稳定的状态下，另一物体的运动就成了在中央引力场(central gravitational field)下的单体问题(one-body problem)；从复杂度上来看，这种情况只比匀速直线运动稍微复杂一点而已。

简单的过程在通常情况下由于其过于简单而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在伽利略的时代，计算炮弹的发射轨迹和射程是更有实用意义的，而相比之下他所做的自由落体实验就简单很多但也没有任何实际用途。但通过坚持这样的简单性，他最终成功地理解了更为复杂的运动现象背后的核心因素。

开普勒和牛顿的研究中，从简单情况开始显然是重要的一步，当然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便是认定天体之间的力与我们在地球上观察到的力是相同的(不知在古代中国是否有人也曾有过这样的“异想”呢？)。

### 8.1.3 物理学研究的集体性与可累积性特点

两体问题的解决为研究整个太阳系(其内部的行星、小行星、卫星及彗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面的许多研究基本都遵循相同的模式与研究范

---

<sup>1</sup>两体问题研究两个天体因彼此互相的引力作用而产生的运动，但对于地球上物体的下落或者火星/金星绕太阳的轨迹问题当中，其中一个物理的质量远远大于另外一个，因此可以将其中质量大者看作近似稳定。这也是为什么这类问题被称作简单两体问题。

式：那就是将在地球上发现的物理定律应用于星体的研究上。我们不妨来看下面两个例子：

- 光谱学(Spectroscopy)与电磁波多普勒效应使我们得以测量星体相对于地球的速度。多普勒效应最初是由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于1842年发现，荷兰气象学家拜斯·巴洛特(Buys Ballot)在1845年让一队喇叭手站在一辆从荷兰乌德勒支附近疾驶而过的敞篷火车上吹奏，他在站台上测到了音调的改变。多普勒效应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就被天文学家们用来测量恒星的视向速度，现已被广泛用来佐证观测天体和人造卫星的运动。
- 关于原子反应的知识让我们得以理解星体如何产生能量，虽然我们无法在实验室里进行关于星体如何产生能量的实验，但通过粒子加速器所做的实验让我们能够识别出哪些反应是可能的。对于原子反应的研究涉及包括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sup>2</sup>、约翰·考克饶夫(John Cockroft)、艾琳·约里奥-居礼(Irène Joliot-Curie)<sup>3</sup>和佛烈德瑞克·约里奥(Frédéric Joliot)在内的众多科学家。

这两个例子可以显示出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特点——那就是物理学的发展是一个集体性和累积性的过程，后人通常都能很好地利用前人已经得出的各种结论并进一步发展(不幸的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情况却远非如此)。

## 8.2 将社会科学转变为可累积的学科

与自然科学不同，到目前为止社会科学方面的新发现大多都是些独立的非累积性发现。一个最直接的证明就是过去社会学方面的重要成果，诸如(Alfred Espinas 1878), (Emile Durkheim 1894), (Vilfredo Pareto 1917)以及(Charles Tilly 1994)，现在都已经被大部遗忘。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未来还应该做什么、应该在哪些方向上努力。我们不妨以提利的论文《1758-1834年前英国的大众抗争》(Tilly 1994)为例，他在

---

<sup>2</sup>卢瑟福于1919年在曼彻斯特大学实现了利用 $\alpha$ 射线轰击氮原子核将氮原子转化为氧原子的实验( $N + \alpha \rightarrow O + \text{proton}$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核反应。从此元素再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了。卢瑟福通过一系列核反应发现了质子也就是氢离子是一切原子核的组成成分，并预言了中子，中子后来由他的学生查德威克发现，并且最终确立了以质子和中子为基础的原子核结构模型。

<sup>3</sup>艾琳是我们所熟知的居礼夫妇的女儿，她和她的丈夫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们四人也成为唯一两代夫妇都获得了诺奖的家庭。

文中列举和描述了过去77年间发生在英国的数百次游行示威和暴力冲突，这些成果对于发展分类法<sup>4</sup>将非常有用；当然这样的工作完全不应只局限于英国或某个特定的时间。换言之，提利的工作更像是拼图中的一部分，未来还须要更多的努力来完成整个图景。但现在这样的过程并没有发生，其原因就是提利的工作仍然个体孤立的努力，当然在其他国家可能也会有类似于提利的研究，比如像法国历史学家简·尼古拉斯(Jean Nicolas)就曾发表过关于法国在1661-1789年间叛乱的分类目录(但这样的工作也仍然是个体孤立的努力)。

现在一个成功的集体性、集成性和累积性的数据库是由明尼苏达大学开发的IPUMS(详见图8.1)，这一数据库提供多种多样的关于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多国各类统计数据。

这类数据库未来将会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甚至改变很多现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规则。不过很不幸的是，欧洲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任何的努力。例如法国有一个“Quetelet网络”但它的设计极度不友好而且数据涉及的范围也非常有限。不得不承认这很可能是因为信息技术和用户导向的设计在欧洲发展太过落后；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的多家互联网公司在这方面确实是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所以如果这样的技术能被应用于类似的项目开发当中，那么中国或许能做出比IPUMS更好的项目。

《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Roehner and Syme 2002)一书中记录了许多历史事件并且对于构建历史事件数据库提出了一个三层模型：第一层是简短而标准的描述；第二层是对于主要的第二手史料(secondary sources)的讨论；第三层是第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s)和相应的英文翻译。维基百科部分地实现了第一层与第二层，最为重要的且要求最高的无疑是第三层。

目前我们主要关注于数据库的建立，因为只有拥有了充分的数据，我们才能更好地找出各种现象背后的规律。而且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应该从“简单”问题入手，当然如何一般化地定义何为“简单”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我们认为有两条原则还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 一般说来，一个系统的组分越多、内部的相互作用越多，那么这个系统通常就越复杂。举例来说，如果某个国家有5个少数民族那么它显然会比只有一个民族的国家在许多现象上要复杂。
- 从可以相对容易观察到(更理想的是能够做实验)的问题开始入手。有些社会现象不只能在人类社会中发现，在动物中也会出现(Espinas 1878)。在社会性动物中研究相应的社会现象的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

---

<sup>4</sup>就像对于天体物理学家来说，星体分类目录(catalogues of stars)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实用的工具。

做实验[当然这些实验也必须符合一定的协议(protocol)和道德规范,在19世纪大众及研究者对于动物实验的接受度比现在要更高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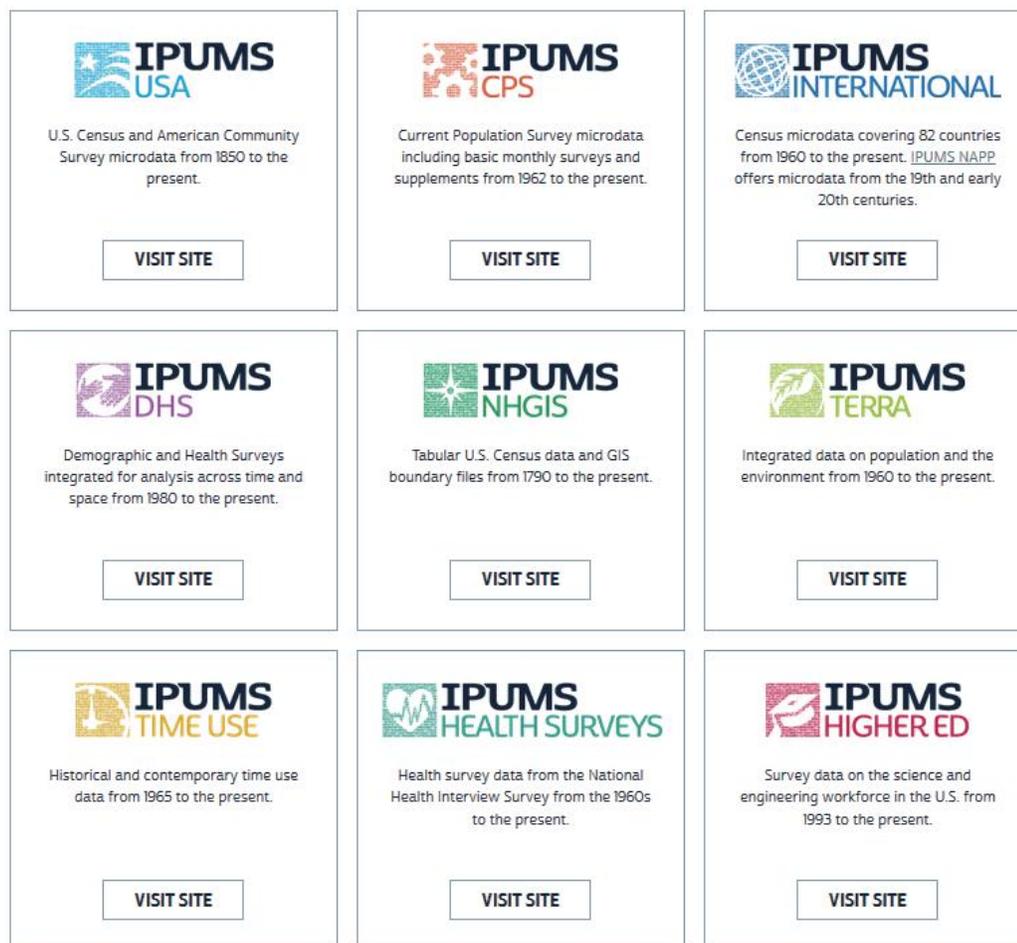


图 8.1: IPUMS是一个基于自然科学模型的社会科学项目，其目标就是为了将社会科学转变为集体性与可累积性的学科。IPUMS的全称是综合开源微数据系列(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其中微数据(Microdata)指的是这些数据都是有关于个人的(比如普查数据)，而综合(Integrated)则表示所有不同的数据源都会用相同的方式来展现以使得它们具有可比性，开源(Public)则是说这个数据任何个人和研究者都可以使用它。这一项目由几个模块构成：1850年至今的美国普查数据、微数据问卷数据、国际普查数据、人口学及健康问卷数据、地理数据、人口及环境数据、个体时间使用方式的数据、健康问卷数据。

## 参考文献

- Abbott (A.) 1998: The causal devolu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7,2, 148-181.
- Abrams (P.) 1982: *Historical soci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rcher (D.), Gartner (R.) 1984: *Violence and crime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simov (I.) 1951: *Foundation*. Doubleday, Garden City (New York State).
- Asimov (I.) 1952: *Foundation and Empire*. Doubleday, Garden City (New York State).
- Asimov (I.) 1953: *Second foundation*. Gnome Press, New York.
- Baaquie (B.E.), Roehner (B.M.), Wang (Q.-H.) 2016: The wage transi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Physica A* 470, 197-216.
- Baloff (N.) 1971: Extension of the learning curve: some empirical results. *Oper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2,4, 329-340.
- Banister (J.) 1992: China's changing mortality. in "The population of modern China", Plenum Press, New York.
- Baynes (N. H.) 1942: *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Vol. 1: April 1922-August 19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zaz (P. N.) 1954: *The history of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Kashmir,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age*. New Delhi: Kashmir Publishing.
- Berrut (S.), Pouillard (V.), Richmond (P.), Roehner (B.M.) 2016: Deciphering infant mortality. *Physica A* 463, 400-426.

- Bernard (C.) 1865: *Introduction a l'etude de la midicine experimental*  
Paris: J. B. Ballifere et fils.  
English transl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7.
- Bloch (M.) 1924: *Les rois thaumaturges: étude sur le caractère surnaturel attribué à la puissance royale, particulièrement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Librairie Istra, Strasbourg.  
[The thaumaturgist kings. Study of the supernatural character attributed to the kings, especially in France and England].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royal touch" 1989. Dorset Press, New York.
- Braudel (F.) 1967: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 A. Colin, Paris.  
English translation: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Harper and Row 1973).
- Broadberry (S.N.), Harrison (M.) 2006: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 A comparative quant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6, 2, 514.
- Bunge, M. 1996. *Finding philosoph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unge, M. 1998. *Social science under debate: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Burke, P. 1992.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arsten, F. L. 1959. *Princes and parlia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hen (J.) 1995: China's involvement into the Vietnam War. *The China Quarterly* 142, 356-387.
- Chinn (M.), Frankel (J.) 2008: The euro may over the next 15 years surpass the dollar 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currency. *International Finance* 11, 1, 49-73.  
[The prediction made by the authors about the euro was far off the mark. History rather suggests that the strength of a currency is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strength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backs it. A paper written 4 years earlier (Persaud 2004) gives a much more lucid view. However, the present article contains some interesting data abou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ound sterling and the dollar back in the

20th century.]

Clodfelter, M. 1992. 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s: a statistical reference to casualty and other figures, 1618-1991. Vol. 1:1618-1899; Vol. 2: 1900-1991. Jefferson, N.C.: McFarland and Co.

Clodfelter, M. 1995. Vietnam in military statistics: a history of the Indochina wars, 1772-1991. Jefferson, N.C.: McFarland and Co.

Cooper (H.) 2017: White House pushes military might over humanitarian aid in Africa. New York Times, 25 June 2017.

Crewdson (J.M.), Treaster (J.B.) 1977: How the CIA built and controlled its worldwide network for propaganda.

New York Times, 26 December 1977, p.1 and p.37.

[The mention of the CIA should not lead us to think that the CIA can do anything by itself. As an agency of the US government, all its actions must first get the approval of the White House and State Department. To those inside the CIA, the propaganda network is known as the “Mighty Wurlitzer” (a Wurlitzer is an electric piano) because (in the words of the article) at the push of a button it will play in almost any language and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atever tune the US government wants to hear.]

Descartes, R. 1965 [1637]. Discourse on method, optics, geometry and meteorology. Indianapolis: Bobbs-Merill Co.

Dogan, M., and D. Pelassy. 1984. How to compare nati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Durkheim (E.) 1894: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Paris, Payot. English translation: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1982.

Chinese translation: 迪尔凯姆(著), 狄玉明(译)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Durkheim (E.) 1897: Le suicide. Paris: Alcan. English translation: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Glencoe, Illinois, Free Press, 1951.

Dong (L.), Li (R.), et al. 2016: Population-weighted efficiency in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Scientific reports, 6, srep26377.

Espinas (A.) 1878, 1935: Des sociétés animales [About animal societies]. Thesis, University of Paris.

[In 1879 the thesis was translated into German and in 1882 into Russian.

- It does not seem to have ever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1935, it was re-edited by “Librairie Félix Alcan”, Paris.]
- Firth (N.O.), Noren (J.H.) 1998: CIA’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Economy. Chapter 2 of: “Soviet Defense Spending: A History of CIA Estimates, 1950-1990”.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James Noren is a retired senior economic analyst at CIA.]
- Goikhman (I.) 2014: Chen Jiongmeng. Becoming a warlord in republican China. In: Leutner (M.), Goikhman (I.) editor: State, society and gover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
- Goldstone, J. A. 1982. Th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revolutions. *Annual Reviews in Sociology* 8,187-207.
- Goldstone, J. A., J. R. Gurr, and F. Moshiri, eds. 1991. *Revolutions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Granger, C. W. J. 1969. 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spectral methods. *Econometrica* 37,3,424—438.
- Granger, C. W. J. 1991. Reducing self-interest and improving the relevance of economic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Uppsala.
- Hallgarten, G. 1961. *Histoire des dictatures de l’antiquité nos jours*. Paris: Payot.
- Hechter, M.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Hechter, M. 1994. The role of values i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318-333.
- Hechter, M. 1997. Sociologic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nual Reviews in Sociology* 23, 191-214.
- Tullock, G. 1971. The paradox of revolution. *Public Choice* 1,89-99.
- Hall, J. R. 1992. Where history and sociology meet: forms of discourse and sociohistorical inquiry. *Sociological Theory* 10,2,164-193.
-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5.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 Ho (P.-T.) 1959: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tate).
- Huang (R.) 1988: *China, a macro history*. M.E. Sharpe, Armonk (New York State).

- Jacob, F. 1970. *La logique du vivant: une histoire de l'heredité*. Paris: Gallimard.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logic of life: a history of heredi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 Jacobs (J.) 2010: Dark age ahead. *Vintage Canada*, 2010 Jun 25
- Jan (G.P.) 1964: Mass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communes. *Asian Survey* 4, 10, 1102-1114.
- Jenkins, J. R. G. 1986. *Jura separatism in Switzer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Joffe (B.) 2017: Has China won the drone war? *Forbes Asia*, 17 January 2017.
- Khong, Y. F. 1992.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ng, G., R. Keohane, and S.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ul, G. L. 1972. *Kashmir then and now*. Srinagar: Chronicle Publishing House.
- Lafargue (F.) 2005: China's presence in Africa. *China Perspectives*, 61, 1 October 2005.
- Li (R.), Tang (M.), Hui (P.M.) 2013: Epidemic spreading on multi-relational networks. *Acta Physica Sinica*: 62 (16), 168903-168903.  
In Chinese: 李睿琪等 2013: 多关系网络上的流行病传播动力学研究. *物理学报* 62 (16), 168903-168903.
- Li (R.), et al. 2016: Review of Threshold Theoretical Analysis about Epidemic Spreading Dynamics on Complex Networks. *Complex systems and complexity science*, 13(1), pp.1-39.  
In Chinese: 李睿琪等 2016: 复杂网络上流行病传播动力学的爆发阈值解析综述. *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 13(1), pp.1-39.
- Li (R.), Dong (L.), Zhang (J.), Wang (X.), Wang (W.), Di (Z.), Stanley (H. E.) 2017a: Simple spatial scaling rules behind complex citi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1), 1841.
- Li (R.), Wang (W.), Di (Z.) 2017b: Effects of human dynamics on epidemic spreading in Côte d'Ivoire.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467, 30-40.

- Lieberson, S. 1985. *Making it 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eberson, S. 1991. Small N's and big conclusion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asoning in comparative studies based on a small number of N's. *Social Forces* 70,307-320.
- Lieberson, S. 1992. Einstein, Renoir, and Greeley: some thoughts about evidence in sociology. 1991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1-15.
- Lieberson, S. 1994. More on the uneasy case for using Mill-type methods in small-N comparative studies. *Social Forces* 72,1225-1237.
- Liesner (T.) 1989: *One hundred years of economic statistics*. Facts On File, New York.
- Lloyd, C. 1993. *The structures of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 Longworth (A.R.) 1933: *Crowded hours. Reminiscences of 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 C.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This is a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Roosevelt, the daughter of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Chapters 5 and 6 are an account of her 1905 travels in the Pacific and Asia as part of a diplomatic delegation led by then-Secretary of War William Howard Taft. Excerpts are available on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asia.si.edu/research/archives/alice>]
- Malcolm, N. 1998. *Kosovo: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arion, M. 1976 [1929]. *Dictionnaire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xXV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Picard.
- Marx (K.) 1852: *Der 18th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in German]. Published in "Revolution" [a monthly magazine], New York. (p. 135).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1978. (available at <http://www.marx2mao.com/M\&E/EBLB52.html>)  
[Through the choice of this title, Marx draws a parallel between the coup of Napoleon Bonaparte on 18th Brumaire in year 8 of the revolutionary calendar (i.e., 9 November 1799) and the coup carried out by his nephew,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on 2 December 1851.]
- May, E. R. 1973.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nkkonen, E. H. 1994. *Engaging the past: the uses of history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ozur (P.) 2016: China, not Silicon Valley, is cutting edge in mobile tech. *New York Times*, 2 August 2016.
- Neustadt, R. E., and E. R. May. 1986.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 makers*. New York: Free Press.
- Nicolas (J.) 2004: *La rébellion française.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conscience sociale (1661-1789)*. Seuil, Paris.
- O'Neill, R. J. 1969. *General Giap, politician and strategist*. New York: Praeger.
- Okeowo (A.) 2017: The enduring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in Africa. *The New Yorker*, Daily comment, 3 May 2017.
- Owen (C.) 2017: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update. The evolution continues. Published by "RMB Global Advisors".
- Pastor-Satorras ( R.), Castellano (C.), Van Mieghem (P.), Vespignani (A.) 2015: Epidemic processes in complex networks.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87(3), 925.
- Pareto (V.) 1917: *Traité de sociologie générale*. Lausanne: Payot.  
The French version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Italian version published in 1916 under the title: "Trattato di sociologia generale".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ppeared in 1935 which was entitled: "The mind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 Persaud (A.) 2004: When currency empires fall. Seminar given at Gresham College on 7 October 2004.  
[This talk provides a view which seems much more insightful than the one presented 4 years later by Chinn and Frankel (2008). The author states his conclusion as follows: "The most likely candidate to replace the dollar is not the euro, it is China's renminbi" but he warns that: "The principal risks to this forecast are whether China can maintain a degree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fails the dollar's reign will last a little longer".]
- Peterson (G.) 1994: The struggle for literacy in post-revolutionary rural Guangdong. *China Quarterly* 140, 926-943.
- Picot, G. 1872-1888. *Histoire des Etats Giniriaux*. 5 vols. Paris: Hachette.
- Ragin, C.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gin, C. C. 1997. Turning the tables: how case-oriented research challenges variable-oriented research.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L. Mjösset et al.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vol. 16.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Rahmat, A. 1933.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conflit hindou-musulman*. Thesis. Paris: Paul Geuthner.
- Richmond (P.), Roehner (B.M.) 2012: The Predictable Outcome of Speculative House Price Peaks. *Evol. Inst. Econ. Rev.* 9(1): 125–139 (2012)
- Richmond (P.), Roehner (B.M.) 2016a: Effect of marital status on death rates. Part 1: High accuracy exploration of the Farr–Bertillon effect. *Physica A* 450, 748-767.
- Richmond (P.), Roehner (B.M.) 2016a: Effect of marital status on death rates. Part 2: High accuracy exploration of the Farr–Bertillon effect. *Physica A* 450, 748-767.
- Roehner (B.M.) 1982. Order transmission in large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13,5,531-546.
- Roehner (B.M.) 1993. *Les logiques de l'histoire*. Preprint. LPTHE-University of Paris 7.
- Roehner (B.M.) 1995. *Theory of markets*. Berlin: Springer-Verlag.
- Roehner (B.M.) 1997. The comparative way in economics: a reappraisal. *Economie Appliquée* 50,4, 7-32.
- Roehner (B.M.) 1997a Spatial and historical determinants of separatism and integration. *Swiss Journal of Sociology* 23,25-59 (1997).
- Roehner (B.M.) 1997b: Jesuits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ir expulsions. (1500-1990). *Religion* 27, 165-182 (1997).
- Roehner (B.M.) 1997c. Spatial and historical determinants of separatism and integration. *Swiss Journal of Sociology* 23,1,25-59.
- Roehner (B.M.), Sornette (D.) 1998: The sharp peak-flat trough pattern and critical speculation.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B* 4,387-399.
- Roehner (B.M.) 1999: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speculative trading and one of its basic manifestations: postage stamp bubb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C* 10,6,1099-1116.
- Roehner (B.M.) 1999. Spatial analysis of real estate price bubbles: Paris, 1984-1993.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9,78-88.

- Roehner (B.M.) 2001. Hidden collective factors in speculative trading. Berlin: Springer-Verlag.
- Roehner (B.M.) 2007: Driving forces in physical, bi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phenome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Roehner (B.M.) 2015: How did Europe become an American turf? Working Report, University Pierre and Marie Curie, Paris.  
[Available in several university libraries (locations can be found on WorldCat) and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http://www.lpthe.jussieu.fr/~roehner/ocn-min.pdf>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06081009/www.lpthe.jussieu.fr/~roehner/ocn.pdf>]
- Roehner (B.M.) 2016a: Relations between US forces and the population of Iceland. Working Report, University Pierre and Marie Curie, Paris.  
[Available in several university libraries (locations can be found on WorldCat) and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http://www.lpthe.jussieu.fr/~roehner/oci.pdf>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17015158/www.lpthe.jussieu.fr/~roehner/oci.pdf>  
All archive records from various national archives (US, Australia, New Zealand, etc.) that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are available at the archive department of University Pierre and Marie Curie (Paris-Sorbonne).]
- Roehner (B.M.) 2016b: Relations between US forces and the population of South Korea.  
Working Report, University Pierre and Marie Curie, Paris.  
[Available in several university libraries (locations can be found on WorldCat) and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http://www.lpthe.jussieu.fr/~roehner/ock.pdf>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012020748/www.lpthe.jussieu.fr/~roehner/ock.pdf>  
All archive records from various national archives (US, Australia, New Zealand, etc.) that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are available at the archive department of University Pierre and Marie Curie (Paris-Sorbonne).]
- Roehner (B.M.) 2016c: Relations between US forces and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Working Report, University Pierre and Marie Curie, Paris.  
[Available in several university libraries (locations can be found on WorldCat) and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http://www.lpthe.jussieu.fr/~roehner/occ.pdf>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624054656/www.lpthe.jussieu.fr/~roehner/occ.pdf>

All archive records from various national archives (US, Australia, New Zealand, etc.) that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are available at the archive department of University Pierre and Marie Curie (Paris-Sorbonne).]

Roehner (B.M.) 2016d: China versus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king Report, University Pierre and Marie Curie, Paris.

[Available in several university libraries (locations can be found on WorldCat) and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http://www.lpthe.jussieu.fr/~roehner/oce.pdf>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06091957/www.lpthe.jussieu.fr/~roehner/oce.pdf>]

Roehner (B.M.), Rahilly (L.) 2002: Separatism and integration. A study in analytical histor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am (Maryland).

Roehner (B.M.), Syme (T.) 2002: Pattern and repertoire i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Rozoff (R.) 2010: Mongolia: The Pentagon's Trojan Horse. US-NATO partner wedged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Global Research, 1 April 2010.

[Available on Internet; the article provides a summary of US military bases and facilities worldwide.]

Rule (J. B.) 1997: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warz (B.) 2013: The real Cuban missile crisis.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ose 13 days is wrong. The Atlantic, Jan-Feb 2013. [available on Internet]

Skocpol (T.) 1984: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ourm (R.) 1885: Les finances de l'Ancien Regime et de la Rivolution: origines du systeme financier actuel. 2 vols. Paris: Guillaumin.

Snooks (G. D.) 1996. The dynamic society: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Snooks (G. D.) 1997: The ephemeral civilization: exploding the myth of social 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 Song (C.), et al. 2010: Limits of predictability in human mobility. *Science* 327(5968),1018-1021.
- Summers (L. H.) 1991: The scientific illusion in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93,2,129-148.
- Szep (J.), Ahuja (A.) 2011: Special Report: Defiance in Thailand's "red shirt villages". *World News, Reuters*, 7 June 2011.
- Tainter (J. A.) 1988: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empest (R.) 1997: How China beat India in race for success. *Los Angeles Times*, 10 August 1997.
- Teueres (A.) 1978: *La guerre du Vietnam, 1945-1975*. Paris: Editions Lavauzelle.
- Tilly (C.) 1981: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Russel Sage, New York.
- Tilly (C.) 1985.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 Tilly (C.)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rench translation: *La France conteste de 1600 ä nos jours*. Paris: Fayard, 1986.
- Tilly (C.) 1992. How to detect, describe, and explain 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 Working paper no. 150.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York.
- Tilly (C.) 1993. *European revolutions, 1492-1992*. Oxford: Blackwell.
- Tilly (C.) 1995, 1998: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tate).
- Tilly (C.) 1997. Means and ends of comparison in macrosociology.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L. Mjöset et al.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vol. 16.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Trefilov (V.) 2015: The Russian ruble's tumultuous history. RT (formerly "Russia Today"), 6 January 2015.
- Turse (N.) 2013: The startling size of U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Africa. Subtitle: The Pentagon's Africa Command will tell you there is one military base on the entire continent. Don't believe them. *Mother Jones*, 6 September 2013.

- Available on Internet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http://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3/09/us-military-bases-africa/>
- Veyne (P.) 1976: *L'inventaire des différences: leçon inaugurale au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Seuil.
- Veyne (P.) 1984: *Writing history: essay in epistemology*.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Translation of: *Comment on écrit l'histoire: essai d'epistemologie*. Paris: Seuil, 1971.
- Vincent (B.) 1898: *Haydn's dictionary of dates and universal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ll ages and nations*. London: Ward, Lock and Co.
- Whiting (A.S.) 1975: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Vietna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Harbor.
- Wieczynski (J.-L.) 1988: *The modern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Soviet, and Eurasian history*. Gulf Breeze, Fla.: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 Xu (Y.), Li (R.), et al. 2017: *Clearer skies in Beijing—revealing the impacts of traffic on the modeling of air quality*.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96th Annual Meeting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No. 17-05211).
- Yergin (D.) 1991: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Zellner (A.) 1988: *Causality and causality law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39,7-21.
- Zipf (G. K.) 1972 [1949]: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